



# 陕西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 陕西文史资料

## 目 录

回忆两当兵变····· 吕剑人 (4)

开展陕北红军游击战争的片断回忆·····高明镜 (12)

西北红军的组建和党中央拯救西北

    革命根据地史事纪实·····高朗亭 (44)

李仪祉先生年谱·····胡步川 (101)

陈树藩事略·····韩维墉 (125)

### 北洋军阀统治陕西时期的史料

    陆建章血洗陕西省模范监狱二则·····侯明玉等 (139)

    刘镇华筹建铜元厂弹药厂的经过·····李宗祥 (145)

    刘镇华种烟敛财，对周至人民的危害·····周至县政协调查组 (155)

    陕军冯毓东部两次参加驱刘战役回忆·····叶雨田 (162)

    北洋陆军第十五混成旅王鸿恩部被消灭经过·····俞嗣如 (170)

    吴新田祸陕记略·····本会史料调查组 (175)

    盘踞陕南之吴新田与鸦片烟·····薛紫丰等 (185)

    陕西学生驱吴运动回忆·····吕颖荷 (199)

    陕军截击吴新田史料三则·····冯幼青等 (205)

    郑克斗领导石泉县农民反抗吴新田的斗争·····郑修华口述 (210)

    冯玉祥部驱逐吴新田及其在陕南的活动·····张宣武 王恒心 (222)

###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阻击红四方面军的史料

    第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商洛战役之回忆·····刘子潜 (240)

陕西警二旅张鸿远部和红二十五军作战的经过·····	鲁秦侠(243)
在陕南堵截红军历次战役的片断回忆·····	王明钦(250)
十七路军在汉中阻击红四方面军的回忆·····	韩光琦(263)
一九三五年川北红军攻夺汉中战役·····	党文科(267)

# 回忆两当兵变

吕 剑 人

一九三二年春的两当兵变，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发动的兵暴起义之一。我参加了这次兵变，现就追忆所及，并征求了李特生等几位同志的意见，记述下来，供研究这段历史的同志参考。

## 杨虎城主陕，两当兵变前的西北形势

一九三〇年，杨虎城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参加蒋军一方作战，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同年十月，杨打下洛阳就乘胜率部向西北进军，赶走了西北军的省主席刘郁棻，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并且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多年来，陕西一直在外来军阀势力的统治下，战争连年，土匪遍地，特别是一九二九年的大旱，赤地千里，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因此，陕西不论是士绅阶层还是一般群众，都希望有一个本地人出来治理陕西，企苏民困。杨虎城返陕正适应了人们的这一心愿。杨虎城既是陕西人，又有拥护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等一系列功勋经历，是一个较有众望的人物。

杨虎城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在西北地方人士的支持下，以“大西北主义”相号召，不仅接纳士绅，而且重用年青人，甚至对思想进步的人，也敢任用。他还采纳地方人士的建议，以工代赈，兴修泾惠渠，颇得民心。在军事上，他大量收编地方各种武力，凡不愿归顺者则坚决消灭。这样，就很快把陕西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统统归到第十七路军的统率下，总兵力达到六万余人。在两年多时间内，杨基本上统一了陕甘两省，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杨虎城的崛起，这是西北

的新形势。

## 两当兵变前，党的地下兵运工作

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给我党在杨虎城部队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当时陕西省委曾作了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指示各地党组织派出秘密党员去十七路军中工作，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因此，地下党员在杨部做秘密工作的很多，如十七师、四十二师、五十八师和几个警备旅、骑兵团、炮兵团等部队，大都有我党的秘密兵运工作者。

一九三一年三月，我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到凤翔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随营步兵训练班当学兵。杨虎城开办这个训练班的目的，是为部队培训基层干部。学习期限一年，结业后由总部统一调配所属各部队。步训班先随十七师师部驻凤翔，后移驻西安的西营房。在这个步训班里，我党建立了地下组织，我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到这年冬，我只学习了十个月，还未结业，第十七路军总部从步训班中提前调出几十个学兵，我是其中之一，派往新编的部队中去了。我们一起去驻彬县警三旅的有十二个人。该旅旅长唐嗣同，下辖两个团，一团团长刘子潜，二团团长曹润华。

我同几个人被分配到二团一营，营长是王德修。王原是“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司令，后编入苏雨生骑兵旅第三团任营长。这个营当时就有党的地下组织。当苏雨生背叛杨虎城时，党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避免无谓牺牲，就鼓动王德修不跟苏行动，苏部很快垮台。王德修部即改编为警三旅二团一营，王德修仍任营长。曹润华是杨虎城的亲信，他对王德修及其原有军官并不信任，采取掺沙子的办法，予以逐渐更换。我们这些从随营步兵训练班调去的学兵，就当作沙子掺到各连去，都当上了带兵的排长。我在一营一连当排长。一连连长原是营长王德修的亲信，后被曹润华排挤走了。曹派他自己的朋友充

当连长。三连连长也予以调换了，只有二连连长唐福亭未动。王德修这个营，党的地下组织成立的比较早也比较强，在营部、排长、司务长、班长和士兵中都有党员，我所在的一连就有党的小组。可以说，当时这个营的三个连都在我地下党组织的控制之下。先期成立的营党支部，李秉荣、李特生同志先后任过支部书记。后来成立了营党委，领导全营地下党的活动。营党委书记是习仲勋同志，营党委委员有李秉荣、李特生，现在能记得当时的党员还有刘书林、许天杰、左文辉、高祥生、张子敬、吴彦俊、魏明山、张茂修、张彦芳、张克勤、郭立山、吴进才等人。当时在敌军中党的工作就是要求党员按照组织决定的方针，进行极其秘密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广交朋友，通过个别谈心，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了解国民党军队中的情况，在情况许可下也进行一些社会调查和社会活动等。总之，那时在敌军中工作的总的目的，是为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对进行武装起义，把部队逐步改造为公开的红军武装，壮大红军力量。

警备三旅是收编的杂牌部队，是杨虎城的补充兵团。大凡补充兵团，总不外乎有三差：一是器械装备差；二是物资服装差；三是生活待遇差。一营所用的枪，都是杂七杂八的破枪，大多是陕西造的。还有一些是土造的，只有连长有一个盒子枪，排长扛的是老套筒长枪。子弹很少，衣服常常不按时发，有的士兵没鞋穿，赤着脚上操。不按月发饷，就连伙食费所用的几个钱也不按时给。在国民党军队中，吃空名字，克扣军饷，是很普遍的现象，士兵生活十分困苦。因此，我们做士兵工作，总是先从关心士兵生活入手，联络感情。或利用同乡同里的关系，以至结拜兄弟建立私人间更密切的关系，再进一步讲些国民党统治如何黑暗之类的事情，逐渐提高士兵的觉悟，经过若干事情的考验，才个别发展秘密党员。

一九三一年冬，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几个县，杨虎城派陕西警卫第一师师长马青苑率全师到天水攻打川军，警三旅二团也奉命进驻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打川军。战后，一营就驻防凤县和两当县整训。

## 两当兵变的经过及失败

一九三二年春，营党委派刘书林同志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决定警三旅二团一营举行兵变，起义后要把部队拉到陕甘边去与刘志丹同志的陕甘游击队汇合。营党委决定俟机而动。时隔几天，二团团部突然下了命令，要一营和二营换防，把一营调到徽县去。一营的战士大都是山外头的人，不愿到那边去，嫌生活苦离家乡远，抵触情绪很大。这时，陕西省委派刘林甫同志到一营来领导发动兵变，这正是——营就要调防的那一天。刘林甫同志和营党委决定，部队开到两当县宿营后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在当晚的营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省委关于兵暴的决定以及兵暴后将部队拉到陕北参加红军的决定。到会同志一致同意，决定当晚就举行兵暴。并对兵暴如何进行也作了具体部署：由各连负责收拾本连的连长，排长不是党员的，下枪带上走，以后再作处理。并决定由一连负责收缴机枪连的枪，三连负责收缴营部的枪。兵暴就这样开始了。各连收拾本连反动军官的枪声，震惊了机枪连和营部。敌人即有了戒备，结果未能把机枪连和营部的武装解除。这对已到鸡叫时分，我们就把三个连的部队集合起来，约略给士兵们宣布了一下，就把部队拉出两当县县城，向北进发，第二天上午，行军至某地，部队吃饭休息，营党委开会决定了部队编制等事宜，还决定由刘林甫同志代表党给部队讲话，宣布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杰同志是支队长，负责支队的军事指挥；习仲勋同志是政委。我是一连的连长，高祥生同志是二连连长，三连由许天杰同志兼任连长，左文辉同志任副连长。各连都提了几个班长当排长，在新提的排长里，有的还不是党员。

秦岭里的山路，说是大路，其实都是一些小路，山大林深，人烟稀少。我们沿途多次遇到民团阻挡道路，不消灭或打垮他们，就不能通过，记得沿途小战斗可能有五、六次，如在赤沙、香泉、通峒峪、

高崖等地都有过战斗。除此而外，在麟游山中的陕甘接界地区还遇到过杨虎城的军队，我们没有能打过去，只得靠南边绕道前进，到了麟游北边山区。由于在启程时，我们宣布过行军注意事项，因此一路上纪律还好。

从两当兵变到把部队拉出来到达麟游山区，我们已经走了千把里路程了，沿途多次战斗，部队十分疲劳，只要说一声休息，马上躺倒就睡着了；在夜间行军时，有的战士走着路都睡着了。这支部队是才从敌军中哗变出来的，大多数人对革命并没有认识，加之当时的地下党组织也不懂得如何在行军途中去搞政治思想工作，途中发生了几起逃跑事件。一连、三连都跑掉了几个人。那时候，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说是一个连，实际上并不够一个连，连长为了吃空名字以少报多。以我们拉出来的三个连总共约有二百来人，枪不论好坏，一人总算有一条。一路上接连不断的打仗，子弹也差不多打完了。到了麟游山里，据说冲过西兰公路过了泾河，就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营党委原决定沿陕甘边界向西北进至亭口一带抢渡泾河，已派习仲勋、左文辉同志侦察。后因在甘肃灵台县地区和杨子恒部队遭遇，未打过去，当晚又决定部队向南绕道前进。当时打听刘文伯驻在乾县剿大土匪王结子。同时又决定派人去乾县设法以同刘文伯谈判改编为名，争取几天时间好让部队在麟游山中休息一下，然后再过泾河，就派我和刘林甫同志去乾县。不料在那天晚上部队行军至拂晓，到了岳御寺地方，偶然和盘踞那一带的大土匪头子王结子遭遇，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兵力薄弱被打垮，兵变也随之失败。

## 两当兵变的经验教训

这次起义，虽然和清涧、旬邑、渭华等几次起义一样，也失败了，但意义很大。这是当时在陕西地下党领导下的一次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连续不断的起义，振奋着人心，鼓舞着广大



人民的革命斗争情绪，说明我们党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了革命事业。兵暴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有客观上和主观上的，总结起来，可以有三条：

一、这次起义是党内盲动主义的产物。一九三二年，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残余还在继续起着影响。左倾思想的错误，首先是对形势的分析不正确，它否认有政治上的中间营垒和第三派力量的存在，而且把第三派势力看作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错误的主张“打倒一切”。其次，在策略上搞关门主义，“要兵不要官”。在军事上搞盲动主义，急于求成，不审时度势。这次兵暴的失败，就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影响的必然结果。当时省委作出发动两当兵变的决定，实际上就是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作出的。

二、判断和准备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在当时情况下，应该不应该发动这次兵变，我们对主客观情况缺乏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就盲目作出了兵变可能成功的判断，没有考虑到时间和地点都不相宜，起义地点距离要去的目的地——陕甘苏区那么远，一支刚刚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的部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千里迢迢行军，要越过渭、泾两个大河，必然会受到各种敌军前后左右的攻击，加上沿途多次战斗，不停步的行军，部队疲乏不堪，弹药殆尽，怎么可能把部队拉到根据地去！准备工作不说别的，就连一张较详细的行军地图也没有，只凭着东南西北的大方向瞎撞，沿途情况完全不了解，又没有取得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以及友军的配合，完全是孤军作战，结果瞎扑到了大土匪的老巢中去了。

三、部队里虽然有党的组织，但它是活动在敌军中的地下党，就战斗经验来说，懂得的很少，只认为干起来就行了，只凭一股勇气、一股子热劲干革命，经验少，办法不多。例如对思想政治工作，就不知道怎么做。加之部队拉出来以后，一直得不到休整机会，思想涣散，沿途遇到敌人，因情况不明，只知盲目冲打。有的民团被打退了，遇到敌正规部队，就未能打垮取胜，被迫改变计划，以致盲目走进大土匪巢穴而失败。

现在，当我们拿起笔来写下这段历史情况的时候，谨以崇敬的心情向在那次兵暴中和以后的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刘林甫等战友表示深切的怀念。正是由于无数先烈和同志们的奋斗，中国革命才有了今天，活着的人们应该永远缅怀他们，并要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目标奋斗到底。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日

## 开展陕北红军游击战争的片断回忆

高 明 镜

一九二七年十月清涧起义和一九二八年夏渭华起义相继失败后，谢子长和刘志丹同志回到陕北。他们根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精神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走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道路。

### 一、延川游击队袭击永坪镇，西北先锋队诞生

早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经陕北特委批准，并在特委书记赵伯平同志单线领导下，共产党员刘善忠和共青团员高朗亭二人筹款买枪，在横山、绥德、清涧、吴堡、延川、安定、米脂等县积极进行秘密串联，向群众宣传“打土豪，抗税减租”的主张，并组织秘密农会，设立秘密联络站、点。到了一九三二年二月，这些地区便建立了十七、八个秘密联络站和点，几十个秘密小农会。这些组织起了传送情报，保护来往人员，宣传党的工农革命思想和政策，酝酿组建工农红军游击队的作用，深得群众的拥护。在这一年多的活动中，延川区委（后建立县委）的曹必明、梁乃斌、杨育先，延川县田家川第五号联络站的田得雨，绥德县沐沟峪联络站的康自盛，安定县井尔湾联络站的王生祥、王世民等数十人出了大力，经济上也给予很大支持。

一九三二年二月底，秘密串联活动已具备了可靠的群众基础，也掌握了一些情况。三月十二日，刘善忠、高朗亭、杨秉权和高文清（以后叛变）化装到清涧县属的淮宁湾寨子上，缴了民团的六支步枪。接着，中共延川县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全队人数二

十多名，其中党、团员和群众各半。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游击队成立后，主要活动在延川、清涧、安定、绥德、延长等县，打土豪，焚烧契约、帐簿。武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并积极筹款，新实了一挺冲锋机枪和一支步枪。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八日拂晓，延川游击队在群众配合下，袭击了延川县永坪镇的民团，打进国民党区政府，缴获步枪十七支，活捉了区长兼民团团总刘广汉，焚烧了区公所的税捐档案。还没收了基督教堂和高利贷者刘光明的财产、粮食。此外，在永坪镇街头上张贴很多标语传单，在镇中心的戏台上召开了群众大会，以扩大声势，宣传革命。随之延川游击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以下简称先锋队），刘善忠任先锋队司令员，高朗亭任政委，杨作栋任参谋长，高中岳、杨森茂任经济员。在部队中还建立了党、团总支委员会，党思恭（后来脱党）任书记。先锋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杨秉权，第二中队长党克明，第三中队长康作桂。这时部队已发展到七十余人，装备了线膛枪三十余支，其余都是大刀和长矛。

当天，先锋队利用永坪镇的延川县立第三高小的油印机，印制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成立宣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告农民书》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简明军律》各二百余份，分别在镇上和附近的村庄上张贴，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的反动统治，打倒蒋介石，打日本救中国等。先锋队还化整为零分别到永坪镇附近的村庄，广泛宣传抗缴捐税、重租和高利贷，出抗缴捐税的告示，发动群众参加工农红军，扩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

先锋队在永坪镇紧张地活动了一天。傍晚正准备集合部队出发，突然东门楼枪声大作，紧接着四面枪声都响了起来，先锋队随即被冲散。事后得知是距永坪镇四十华里的瓦窑堡敌军骑兵团的两个连赶来偷袭我们。

高朗亭只身逃出了永坪镇，当晚到达距永坪镇三十华里的田家川第五号联络站，同站长田得雨商量如何收集队伍，并秘密通知各联络

站、点和中共延川县委寻找失散了的先锋队指战员。田得雨同志出主意说：距永坪镇十五里处有座高山叫姐姐格堆，上面有真武庙、娘娘庙各一座。周围的大小山头都能看到这两座庙宇。如把先锋队的军旗插到庙顶上，指战员们看到红旗，就会前来集合。高朗亭也觉得这是个好方法。于是决定在高山庙顶插红旗和秘密通知县委及各联络站、点并行，收集先锋队员。随后，还派出了侦察员去永坪镇，打探先锋队指战员伤亡被俘情况和敌人行动的消息。安排妥当，田得雨和田霏霖、田汝霖给高朗亭找了个秘密的地方隐蔽起来。

四月十九日中午，刘善忠悄悄到了田家川第五号联络站。接着，去永坪镇的侦察员回报，敌人已经撤回了瓦窑堡，只抓走了先锋队的-一个伤员，并没有发现先锋队员阵亡的尸体。傍晚，先锋队参谋长杨作栋，经理处长刘益三，第一中队长杨秉权，司令部的传令员张士勋、霍得胜，经济员杨森茂和掌旗员高文俊携带军旗陆续来到第五号联络站。二十日拂晓，刘善忠、高朗亭等都上了姐姐格堆山，把先锋队的军旗插到真武庙顶上。同时，召集已经回来的指战员在庙里学习《宣言》、《告农民书》和《军律》。还派人去山下的村庄里买粮、菜作饭。

当军旗插上真武庙后，先锋队员们相继归来。截至二十二日下午整队点名，除受伤被俘而牺牲了的杨桐同志外，还有三个青年参加了先锋队。刘善忠、高朗亭先后在队前作了自我批评和战斗总结。而后，部队遂向绥德县田庄方向进发。

先锋队走了一夜，四月二十四日晨，在安定县东区好岔峪村宿营，下午，尾追之敌二六旅一个步兵营赶来，企图包围我们。先锋队迅即上了好岔峪北山。敌人见我已有准备，包围不成，只是胡乱鸣枪。我们未还击而撤走了。

先锋队又行进一夜，拂晓前到达距绥德县城五十华里的沐沟峪联络站。站长康自盛及康成厚等动员全村男女老少让房作饭，站岗放哨，封锁消息，从各个方面保护先锋队。

二十五日中午，敌人又追到距沐沟峪只有五华里路的清涧县淮宁湾镇，并派一个排长带领一个班，去田庄镇侦察，路经沐沟峪联络站时，敌排长在村边盘问村民昨晚有没有“赤匪”经过，村民回答没有看见，敌排长带兵即去。返回来时，也没有在沐沟峪停脚。为了迷惑敌人，先锋队赶紧派了一个班，佯装向淮宁湾镇北的小理河方向进军，一路上张贴标语、路标等，制造假象，把敌人引向歧途。至此，先锋队才摆脱了追击的敌人。

先锋队在沐沟峪联络站一边休整，一边学习了党的有关文件，还从敌人报刊上发表的我井冈山根据地粉碎“围剿”的消息中，分析红军胜利形势；另一方面，部队也得到了休整。三天后，联络站派出的侦察员回报，清涧县店子沟镇民团没修工事，毫无戒备，可以利用拂晓时间一举歼灭之。先锋队当即决定消灭这个民团。四月二十七日晚，我们从沐沟峪联络站出发，途中因向导不习惯于走夜路，方向搞错，耽误了时间，天大亮时距店子沟还有十华里路。民团哨兵发现我们后，全部逃跑了。

四月底，先锋队回到延川县青平川、永坪川一带。这支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已有一百来人。这时，敌二五六旅的一个步兵营正在永坪镇查抄先锋队指战员的家，乱捕亲属，勒索财物。我先锋队战士闻讯，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以惩罚敌人。但因敌众我寡，如若战斗，难以取胜，遂研究决定兵分两路：刘善忠带些精干分队，北上绥德县田庄镇，抓捕大地主田子厚的孙子作人质罚款；高朗亭带一路在延安东北和延川西南发动群众，开辟游击根据地。

刘善忠所带一路，去田庄镇抓地主未获，于五月二十日晚回到延川县东北的华家洼，他被混进部队里的三个反革命分子暗杀，凶手逃跑投敌。高朗亭闻讯，于次日上午带部队赶到延川东北的铸珠原，收集了刘善忠所留的分队。这时，敌清涧民团尾追上来。我军为了保存实力，与敌稍有接触即撤出战斗，摆脱敌人向东疾进。当晚，先锋队在延川城东育龙渊村调整编组，全队指战员公推高朗亭任司令员兼政委。为了纯洁组织，有几个革命意志不坚定者被劝说离队。高朗亭集

合全队讲话，动员大家要继续干革命，团结一致，打土豪，抓地主，分粮食，分财物，抗租抗捐。争取白军士兵和团丁带枪过来参加我军；同时，还要提高警惕，吸取刘司令员被刺的教训，防止敌人钻进来破坏捣乱；团结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四省，宁死不作亡国奴等等。然后分别召开了党、团支部和各中队指战员全体会议，进一步动员大家献计献策，提供作战行动意见。

先锋队中有几位同志从亲属朋友处获确实消息：延长县北区农民正在集合万人进县城抗粮、抗税，并希望先锋队配合行动。先锋队随即召集党、团总支部书记和参谋长、经理处长、各中队长商议决定：部队绕过延川县城去延长北区。先锋队以一部分人在城外打土豪抓地主开仓分粮，迫使县政府尽快地答应群众所提条件，并组织男女老少给进城群众送粮送款，支援群众持续斗争。另一部分化装成农民群众进城，侦视敌人动静，如敌人抓捕弹压群众，应帮助群众脱险。会后，部队星夜兼程，当赶到延长县境内的育福里村时，得悉农民已经进了城。于是，部队急向延长县城进发，不料到达张家村时，农民群众已经撤出县城。支援农民斗争的行动遂告结束，先锋队只得南渡延河，绕道延长县南的麻洞川，经延安县和延长县交界的王良寺、甘谷驿，复回延川、安定、清涧一带。

六月二日夜，先锋队宿营延长县安沟镇附近的二格台村（距临镇四十华里）。三日凌晨四点钟，带哨的班长报告，临镇方面有机关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音响震天，不知有何战事。高朗亭命令第一中队立即在通往延长县城路上放哨，严防敌人突然袭击。凌晨五点，由延长县城出来敌人一个连和百来个民团士兵，向我军发起进攻。共产党员战士高自立和经济员高中岳同志阵亡。高朗亭和经济员杨森茂（党员）受重伤，被俘四人，失散了一些人，损失步枪三支。激战后与敌人脱离接触，部队迅速向麻洞川方面转移，几乎每前进十来华里，不是正面碰上土围子中的民团挡道，就是左右两侧土围子中的民团袭击。也有少数民团讲条件，只要不打他们，愿意送点粮食给我军，对空鸣枪而放行。就这样，我们艰难地行进在丛林之中。

六月三日傍晚，先锋队在延长县梢沟村宿营。是夜天色黑暗，伸手不见五指。高朗亭正在调理伤口，有一个人突然进门来问，你们是师储杰（土匪）的人吗？众人猛抬头一看，那人身着便衣，手持自来得枪。我们立即缴了那人的枪，然后答话说：我们是红军，你是什么人？那人回答：我名叫党益三，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人，总指挥刘志丹。我的支队长阎红彦，大队长高岗，我是中队长。今天拂晓陕甘游击队奔袭临镇未克，部队失散。我们是找大部队（当时陕甘游击队有一千五百来人）的，不料碰到你们，原来是自己人。高朗亭又问：你们同来多少人？党接着回答：我们中队十九个人，二十一支枪，高岗大队长带队，就在南面的山上。因为先锋队经理处长刘益三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在延安中学读书时，认识高岗，所以，高朗亭决定，让党益三徒手去找高岗下山来。不一会儿，高岗带着自来得枪木套和皮子弹带来了。他讲的同党益三的话完全一样，并动员我们也同他一道去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高朗亭同意联合行动，随即把自来得枪退还给高岗。接着，先锋队把统辖的八十来个人，近五十支枪，缩编为两个中队，加上党益三的一个中队，共三个中队。高岗随先锋队司令部一起行动。当时，人们只知道高岗这个大队是敌打散的，后来从阎红彦和吴岱峰那里得知，高岗是在临镇战斗，临阵脱逃的。为此，刘志丹同志于六月四日曾下令通缉高岗，如若抓获，就地枪决。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并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

两个星期后，我们决定经延安、甘泉之间，再通过保安去甘肃省宁县的盘克原地区会合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主力。此时，因高朗亭的枪伤未愈，决定留在延安县城南川三十五华里的红市村继续疗养，高岗和先锋队的参谋长带部队向盘克原方向去了。

高岗带先锋队，经过延安县城南川三十五华里的马步踏河，翻越杜甫川到达延安西川的高桥镇。一路上打击地主武装民团，抓土豪劣绅，筹经费，开仓放粮，并缴获了一些枪械和骡马七、八十匹。这时，敌延安驻军二五六旅得知我军行动，即派一个营尾追上来，保安县敌民团也集中一百五十余人，在安条岭布设了埋伏。当我军进到安条岭



的深腰，山岭上敌民团首先开枪，尾追的敌军也赶到。几十匹骡马听到枪声受惊，成群地向后狂奔，冲散了尾追之敌。先锋队趁隙躲进右侧森林里隐蔽，只阵亡了一位战士。一匹马负伤。高岗听到枪声后，放弃指挥，向右侧狂逃。先锋队司令部传令员霍德胜立即大喊：“高大队长，你站住，快指挥队伍；你再跑，我就向你开枪。”高岗没有回头看一眼，急速躲进灌木丛中，再未露面，又一次临阵脱逃了。

安条岭遭伏击后，高岗所带的十八个人，分枪散伙；先锋队只好绕安塞县的侯家河湾、真武洞，延安县的蟠龙镇再回到延川、安定、清涧游击根据地。寻找刘志丹红军陕甘游击队的计划没有实现。

先锋队在回根据地途中，抓住了蟠龙镇的区长兼民团团总宋永昌，缴得步枪一支，并以宋永昌作人质，向他要款要枪。宋家派人来队央求，党团总支商定，必须缴款两千元，步枪五支，即将宋放回。其实我们本打算在他家款枪备齐后，再枪毙宋永昌。不料看押宋的人无经验，宋永昌趁隙逃跑。因此，在部队中引起了互相猜疑，指战员思想混乱。造成一些指战员离队他去，一些指战员去异乡种田。还有几个不良分子投降了白军。至此，先锋队成员只剩下了十几个人，十几支枪了。

## 二、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成立

一九三二年七月中旬，高朗亭伤愈归队，目睹先锋队极为混乱的情况，立即报告中共延川县委和有关联络站，决定把部队整顿一下。在田家川第五号联络站田得雨站长和田霏霖、田汝霖、高文秀、高元亭及先锋队掌旗员高文俊，第一中队长杨秉权等协助下，于七月二十六日晚，设计将一批坏分子诱入先锋队部。缴了他们的枪。经审讯核实后，处决了为首的杨作和高清文，开除了几个胁从分子。

先锋队整顿后，又召回一些指战员，重新活动起来。但队伍如何

搞得更好？仍是个大问题。为此，高朗亭到井尔湾联络站，派先锋队经济员王保民先进清涧县城与共青团员惠金瑞接洽，然后再化装找到中共党员惠世温（后改名马万里）、刘国梁、霍建德（后改名王俊），让他们协助找中共陕北特委的关系。

不久，中共陕北特委通过联络站秘密告知先锋队负责人，迅即去米脂县的镇子湾联络站找杜世宏、高庆思（公开身份是小学员）接洽，向特委汇报工作。

高朗亭、王保民接到通知后，立即化装从第五号联络站动身经绥德县沐沟峪联络站、绥德、米脂县城，到达镇子湾联络站，找到陕北特委的秘密机关，见到了特委书记赵伯平，宣传委员马明方，向他们汇报了先锋队的情况。

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把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以下简称九支队），高朗亭任支队长、艾龙飞任支队政委（后违犯纪律被撤职，改派李成荣任政委），张承忠、王保民任经济员，并指定王保民立即给特委筹办八百银元的活动费用。九支队的活动地区，仍然在延川、安定、清涧、绥德、延安、延长等县。同时，指定延川县永坪区田家川第五号联络站为中共陕北特委和九支队的专门联络点。陕北特委还指示党员马万里、杜修直，共青团员贺吉祥、栾新春、高庆思等十几人参加九支队。马万里任党的队委书记，王保民、高朗亭任委员（高当时是共青团员，还未转党，称为跨党）。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日，在延川县的高家格塔，毕维舟代表陕北特委，宣布九支队成立，并授了旗，发了印。陕北特委还命令九支队积极筹款，择机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自己，进一步组织群众斗争。

十二月九日，九支队抓住了清涧县城地主兼商业资本家、第二高级小学校长白明扬，关押三十天后，罚银币三千六百元。随即组织九名精干战士，分三路秘密武装护送陕北特委两千银元。还相继缴获民团、土匪武器十余件，壮大了自己。此期间，还组织了一些秘密农会，

从农民中发展了一些党、团员。九支队和根据地进一步的巩固了。

一九三三年元月，强世清、史法直等先后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回到安定家中。九支队派高朗亭动员他们参加游击队。强世清说他是回家养病的，现在还不能参加战斗；史法直说他是回家结婚的，可以参加战斗。史并将自己带的一支枪也交给九支队，还参加了其它一些作战活动。

这时，陕北特委巡视员毕维舟到了瓦窑堡。同时，地下党组织给九支队送来可靠的情报说：安定县长刘述明将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阴历正月十五日），由安定县城去瓦窑堡。毕维舟和强世清合计，在必经之道栾家坪打掉他，又联系了九支队的史法直和栾新春两人一起行动。他们四人带着冲锋枪一挺，自来得枪一支，手枪两支，埋伏在栾家坪附近的秀延河桥左侧。大约是二月九日十点前后，敌县长刘述明骑着白马，后面跟着两个护兵，一个背着自来得枪，一个背步枪，徐徐而来。刚走上桥头，强世清撩起长袍，端起冲锋枪，一夹子枪弹射出去，刘述明一头栽到桥下的冰滩上丧命。背短枪的护兵仓皇骑马向瓦窑堡狂逃。背步枪的护兵正想逃跑，被史法直、栾新春扭住，缴了枪。接着，他们把预先写好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队的布告张贴在大路旁和栾家坪的显眼地方。然后，毕维舟等四人轻轻快快上了山梁。

这时，瓦窑堡白军开出一个骑兵排，向栾家坪奔驰而来，但毕维舟等四人已安然转移。接着，敌人又派兵三路出城搜捕红军战士。毕维舟、强世清去了陕北特委；史法直潜回瓦窑堡，栾新春回家过元宵节，让民团瞎折腾了一番。

高朗亭在战斗中又负了伤，陕北特委决定强世清任九支队副队长，同李成荣政委一起，继续在安定县、延川县一带打游击。四月，陕北特委又把九支队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以下简称一支队），强世清任支队长，李成荣仍任政委。改编为一支队后，除留白德胜几人仍在安定地区活动外，强世清、李成荣带十

几人，于五月一日南下去红二十六军学习取经，沿途夺得骡马三十余匹。到杨坡头后，刘志丹同志给一支队讲了话，并支援了一些枪支。同时，决定李成荣去西安工作，派杨仲远任政委，马佩勋任副支队长。

不久，强世清、杨仲远带一支队回返陕北，途经安定县边境的董家寺同白军和民团遭遇，缴枪十余支。五月二十九日到谭家岙，敌两个连追来。一支队边打边撤，杨仲远同志不幸中弹阵亡。

### 三、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及陕北红军的发展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的高祁家洼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特委代书记马明方同志主持会议，与会代表有马文瑞、王兆卿、毕维舟、鲁学增、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高长久、贾怀智、常学恭、赵福祥、王国昌，游击队代表高朗亭，北方局巡视员崔逢运等二十人左右。马明方同志作了第三次扩大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及今后任务和目前形势分析报告。崔逢运传达北方局的指示，尽是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游击主义”，反对“富农路线”等等不着边际的空话。代表们很冷淡，讨论不起来；而对于马明方的报告，却讨论很热烈。会议决定：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收复失地。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抗缴预征粮和苛捐杂税，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焚烧契约帐簿；进一步组建工农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陕北第一支队及其根据地延安、延川、安定、清涧等地区。此外，在清涧地区组建第二支队；在神、府地区组建第三支队。其它地区也要创造条件，尽快地组建游击队和根据地。

第四次扩大会议原已选定马明方任书记，马文瑞任委员兼团特委书记，王兆卿任军事委员。崔逢运突然提出说，北方局有指示，书记要工人当。代表们只得重新选雇工崔田夫任书记，马明方任宣传部长。

会后，特委派王兆卿去巡视整顿一支队，派毕维舟任一支队政委，

派高录孝去一支队接款。他们一行三人途经榆林县镇川堡，被叛徒董培义出卖，连同当地支部负责人崔明道一起被捕，四人都英勇牺牲。

### （一）创建第二支队

在第四次扩大会议期间，崔田民曾说：清涧县的共产党员王据德，绥德县共产党员崔正冉已经从冯玉祥部队中哗变的士兵手里得到自来得枪三支。这是创建游击队的很好条件。会后，高朗亭随同崔田夫、崔田民去清涧、绥德地区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以下简称二支队）。

崔田民带着高朗亭经过绥德县刘家湾联络站，绥德县城边和铁茄坪，沿无定河顺流而下，经苏家岩、学武村、惠坞里到王家山找到王据德和哗变士兵罗永宽（已由王据德、王有贤介绍入党）。

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由崔田民主持，在王家山组建了二支队，罗永宽任支队长，高朗亭任政委，王据德任经济员。队员崔正冉、白玉光、宜宝才、贺胜等十余人。二支队成立后，一方面宣传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打土豪，抗捐抗租，动员群众行动起来，与剥削阶级作斗争；一方面寻找战机消灭敌人，壮大自己。

二支队成立两个星期后，在清涧县的袁家沟碰到了白雪山。罗化宽因脚受伤秘密疗养，高朗亭、王据德即主动地去请白雪山介绍红二十六军武装斗争经验，并动员他也参加二支队。白雪山说自己有肺病，回家休养，暂不能参加战斗。他把红二十六军的作战经验介绍了两个半夜，高、王二人很受启发。

不久，在中共铁茄坪区委领导下，二支队召集铁茄坪、王家沟的党、团员二十多人，由崔世俊（公开名义是国民党副区长）作向导，于中秋节夜晚抓住了绥德县薛家峁区区长、地主薛运通，夺得四个元宝，没收了一些财产，烧了契约帐簿。为了打击敌人，还以二支队的名义出示布告，公布薛运通的罪状，就地将薛枪决。夺得的四个元宝，上缴陕北特委两个，剩下两个二支队买了两支手枪、一支步枪。

这时，陕北特委为了开展神木、府谷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决定调高朗亭、罗永宽去组建神府三支队，并拨三支枪给神、府地区。二支队留下两支手枪和一条步枪，由王据德、崔正冉负责，坚持游击战争。

## （二）创建第三支队

一九三三年九月，高朗亭、罗永宽奉陕北特委之命，徒手去神、府地区筹建游击队和开辟根据地，携带的三支自来得枪留给特委使用。

高朗亭、罗永宽化装沿黄河西岸北行，几天后在神木县的贾家沟找到南区区委书记贾怀光。这时，神府地区已经由王兆相、马万里、李成兰、李成荣、杨炳文（杨仲远的儿子）、贾兰芝、邱积鱼、乔六十等人弄到勃浪宁、双背劲、折腰子手枪各一支，步枪一条，手榴弹四枚，组成了神木南区特工队，指定王兆相、马万里、李成兰负责。贾怀光见高、罗二人到来，即让贾汝胜作向导，到高家堡的一个联络站找到李成兰等人。见面后商议决定先计划筹款，解决陕北特委的生活经费和游击队筹建费。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特工队筹集现金数百元和一部分物资，给陕北特委和神木南区区委送了少许活动经费，余额都作为三支队的筹建费。特工队已发展到十五个人，九支枪，在群众中有了一定影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在神木县尚家峁村，神木南区特工队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以下简称三支队）。制作了镰刀、铁锤图案的红锦旗，旗上边横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旗右边写着支队的全称队衔。贾怀光代表陕北特委授旗后，宣布王兆相为支队长，马万里为政委，杨炳文（此人三四年夏在瓦窑堡被捕叛变）、李成兰为第一支队队长，温治国为第二队队长，并鼓励大家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东四省；打土豪，分田地，组织群众斗争，壮大红军游击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接着，王兆相、马万里带队宣誓：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听党的话，为共产主义事业，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为解放被剥削的人民，终身干革命，

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夺取胜利。誓毕，全队三十余人分队欢聚，学习党的文件和内部通讯。

三支队成立后，主要活动在窟野河下游两岸，公开组织农会、赤卫军和少先队。开展打土豪，分粮物，烧契约和帐簿的斗争，群众斗争的积极性逐步高涨。

不久，王兆相、马万里率队抓了英寨子地主乔增德，罚款两千元。这时，特委派张毅忱来三支队任政委，调王兆相、马万里去特委组建特务队。三支队长改由高朗亭担任。马万里与张衡、张岗同志带款一千元上缴给特委。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陕北特委又派马佩勋、马万里、张岗给三支队送来自来得枪三支。路上，当他们化装到游击区边沿的张家沟联络站接头时，该村的一个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张宗昌，冒充税务局人员，要检查行李（行李内装枪支）。马佩勋、马万里、张岗连忙解释说，我们刚从山西过河，什么东西也没买到，检查就免了吧。张宗昌执迷不悟，硬要检查。争吵中，围观群众越来走多。就在这紧急时刻，马佩勋敏捷地拿出备用自来得枪，对准张宗昌，大喊一声“不许动，不老实就要你的命！”张宗昌大惊，混在围观的群众中向大门外狂奔，只听扳机一响，单发正中人群中张宗昌的脑袋，他摇摇晃晃地倒栽下沟岩陡坡，送了命。

打死张宗昌的消息传开后，游击区及其周围，再也没有谁敢盘查地方党和三支队来往出入的人员了。三支队新收到了三支枪，更加激发了指战员们的革命热情。

不久，三支队又打了佳县龙尾峁的土豪。当晚宿营虎头峁。午夜以后，寄宿古庙中的叫花子感觉寒冷，起来拣柴生火取暖。一位新战士站岗，误认为敌人来模哨，鸣枪告警。正在酣睡的指战员惊醒后，以为发现敌人，个个跃起，枪上膛，刀出鞘，奔出房院。仓促之间，马佩勋所带的勃朗宁手枪走火，误中第一队长李成兰右腿膝盖骨。大家随即绑好担架，轮流抬着随队起营，约行二十余华里，把李成兰寄

藏在张家寨的群众家里。部队继续前进，在安崖底对面的山村中宿营。次日早饭后，李成荣带着手枪化装去张家寨探视李成兰，进门不久，就被敌人一个连包围。李成荣依托土窑洞抗击，敌人用火烧烟熏。李成荣同志打完子弹，被火烟熏烧窒息死亡；李成兰同志被押送神木县城英勇就义。

### （三）一九三四年春季的革命斗争

一九三四年春，是陕北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大发展的时候。

一九三三年年底，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谢子长同志为西北军事特派员来到陕北。陕北特委派白雪山、王据德等护送他到安定、延川地区恢复一支队。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在刘家格崂恢复了一支队。李盛堂任支队长，谢绍安任副支队长，刘明山任经济员。一支队恢复后，多次袭击敌人，缴得十余支枪。此期间，谢子长任命贺晋年为一支队政委。接着，又在横山县的大庙山、冷窑子等地打了几次胜仗，支队扩大到五十多人。赤卫队、少先队也发展到五、六千人。

二支队的白雪山、崔正冉、王据德等护送谢子长到安定后，把一支队送给的十支枪带回清涧。特委并任命白雪山为二支队长，王浩（原名王怀德）为二支队政委。王据德为副队长兼经济员。随即组织了一些农会、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一九三四年元月二十一日即腊八节前夕，二支队获悉：国民党清涧县东区的豪绅准备在解家沟镇集会，研究在春节前逼收帐款、捐税、租利钱。二支队决定收拾这伙坏蛋。腊八这天，夜幕渐深，豪绅们正在七嘴八舌地争论着征收粮款的办法。二支队指战员在赤卫队的配合下，突然闯入会场，当场抓了十个豪绅，张贴布告，列数罪行后一律砍头。其中有一人被砍一刀，昏倒在地，游击队走后苏醒逃跑。这就是流传在四方的红军在解家沟杀了九个半豪绅的故事。自此之后，清涧东区、绥德南区的豪绅再也不敢伸手逼租税了。群众过了个安乐的春节。二支队趁机广泛地宣传组织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革命群众



也自己起来闹翻身，自己起来抓豪绅、斗地主，还配合二支队袭击了店子沟镇的李成善民团，缴枪十余支。到了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支队也扩大了，并开辟了清涧东区、绥德南区、延川东北区的大块地区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元月，神府的三支队接到群众的报告说，豪绅地主限春节前要交齐一九三三年的租税，交不齐的就用铁链拉着游村示众，所到之处还要杀鸡宰猪来款待。有的农民已开始卖儿女，卖农具。地方党的组织也来信，要求三支队保护人民。队委派人四出侦察后，从元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先后在佳县北区，神木县东区、府谷县南区，杀掉豪绅差役各三人，并用三支队的名义出示布告列数他们的罪行。真是杀一儆百，这些地区的地主豪绅的气焰被扫光了，群众也过了个安稳的春节。地方党和游击队乘胜加紧组织农会、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群众也自己起来，拿起刀斧棍棒，打土豪斗地主，分粮食、烧契约帐簿。百日之内，三支队陡然扩大了两倍，革命根据地也东西南北扩大百余华里，除沙峁镇和黄河边的盘塘镇还有民团和白军的连队驻守外，所有农村小集镇，都是人民的天下了。

一九三四年元月，陕北特委派马佩勋到吴堡县的宋家川和佳县螭崾崙一带，联络一些保运鸦片烟的镖客组成了抗日义勇队。薛俊山任队长，马佩勋任政治委员。义勇队当时仅有毛里拴短枪两支。

义勇队成立不久，在佳县县委领导下，经过一番准备工作，终于在元月底二月初的一个晚上，举行了木头峪暴动。二月四日，陕北特委派委员高长久于天亮后到达樊家圪坨，队伍吃饱饭后集合，高长久宣布义勇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以下简称四支队），任命薛俊山为支队长，马佩勋为政治委员，刘子义为队委书记兼经济员，薛五拴为第一分队长，高亭为第二分队长。四支队的成立，对创建吴堡、佳县、绥德交界的革命根据地，起了重大的作用。

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不久，绥德南区王家沟的地下党组织，首先在本村组织了秘密的农会、赤卫队和少先队，积极开展打土

豪，斗地主，杀差役的斗争，陆续筹款买枪九支。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在绥德县的苏家圪坨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以下简称五支队），队员十五人。郭洪涛代表陕北特委授旗，任命崔正冉为支队长，马万里为政委，王海山（后改名为王子文）为副支队长。五支队活动在绥德县的东、南、北和吴堡县的南区等地。

此期间，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和斗争的不断胜利，革命根据地一天天扩大和巩固，充分地证明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的威力。

#### 四、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

鉴于游击队不断发展的形势，陕北特委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在佳县南区的神堂沟召开了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普遍组织群众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条件成熟时，组建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到年底扩编红军一个师；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逐步把各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和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对剥削阶级实行工农民主专政。

五月二日，在佳县王家畔召开的陕北游击队和游击区代表联席会议上，又把特委神堂沟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做了传达。这次会议对于发展红军游击队和扩大根据地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七月八日，在安定县的礞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成立后，率第一、二、五支队及赤卫队、少先队六百余人，一举袭入安定县城，打开监狱营救出许多被捕的同志和红军游击队员的家属，缴枪数十支。因为守城之敌未能全歼，我军随即主动撤出城，战斗顺利结束。

为了进一步加强陕北红军和陕甘边红军的战斗联系，谢子长决定率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二百余人南下。七月二

十五日到南梁地区与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会合。谢子长、刘志丹等老战友重逢，叙旧言欢。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四十二师召开了欢迎大会，杀猪宰羊，表示慰问。还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黎原堡的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和部队生活管理的经验，搞了战术演习，并派人到陕北游击队讲解中华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在陕甘边区的执行情况。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人慰问了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并介绍了陕北游击队作群众工作的经验。兄弟部队之间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的热情场面，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团结战斗友谊。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还给陕北红军游击队赠送了一批武器，对陕北游击队支援很大。

在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之后，陕北特委又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特务队，负责保卫陕北特委机关的安全和筹款集资的任务。任命高朗亭为队长，马佩勋为政委。佳县县委又组建了第六支队，樊文德任支队长，王效曾任政委。六支队指战员数十人，枪矛参半。七月十五日，安定县委把石窑湾折柯达民团中哗变出来的十余名团丁，改编为第八支队，栾新春任支队长，贺吉祥任副支队长。这些游击队成立之后，都积极参加了粉碎白军对陕北各根据地第一次“围剿”的战斗，战绩显著。特务队还跟随总指挥部参加了攻打石窑湾寨子、张家圪台、河口镇等战斗。

## 五、阎家洼子会议，陕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委员会，在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的指示，并邀请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郭洪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各支队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谢子长照文宣读了明显存在着左倾机会主义倾向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及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红四十二师的负责同志向谢子长汇报了作战和领导

群众斗争、政权建设情况。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步兵三团到陕北协助发展红军游击队和扩大根据地。会议决定撤销高岗的师政委职务。谢子长自兼红四十二师政委，杨森仍任师长。

郭洪涛作为被邀请参加的兄弟部队代表，根据上海临时中央局指示信中的错误观点，作了指责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错误发言。

阎家洼子会议上，虽然照文宣读了两封错误指示信，但是仍然按照陕甘边、陕北两兄弟部队长期形成的规律办事，正确的指示就执行照办，错误的东西就搁置起来。阎家洼子会议的积极因素毕竟是主要的，加强了兄弟部队的团结友谊，统一了步调，达到了共同对敌的目的。这些均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落实。

会后，谢子长率领红四十二师步兵第三团和陕北各游击队由南梁地区出发北上，于八月十五日到达安定县西区。中共安定县委立即召开了欢迎红三团大会，群众热情慰问红军指战员，大大地鼓舞了斗志，进一步加强了兄弟部队的团结。

红四十二师三团与陕北游击队一起，先后在安定县的井吴家塌，清涧县的张家圪台和河口镇打了几仗，歼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敌人怕我歼灭，变分散进攻为集中固守战术，这就标志着我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同时，红色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逐渐连接起来了。

## 六、中共陕北特委惠塬里扩大会议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谢子长亲自率领红二十六军步兵第三团和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四、五支队和特务队、赤卫队、少先队近千人，夜袭清涧县河口镇。守敌八十六师五一五团三营十一连被沉重打击后，不久即放弃据点逃回清涧县城。不幸的是，谢子长同志在这次指挥作战中，被敌弹侧击胸前负伤，所幸未伤心脏。子长同志负了重伤，随即撤出战斗。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清涧县惠塬里，召开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谢子长同志带伤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中心为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出了《关于冲破“围剿”的决议案》。会议还号召陕北革命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四省，保卫华北，誓死不当亡国奴；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扩大赤卫军、少先队和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会议决定，把第一、二、三支队，扩编为陕北红军独立第一、二、三团；同时成立第七支队，在府谷的西南区和黄河西岸开辟根据地，力争南与神木根据地接连起来；重新成立第九支队，高朗亭任支队长，王文良任政委，王保民任副支队长，负责巩固扩大延安东北、延川西南、清涧西南、安定东南地区根据地，并组建贫农会、赤卫军、少先队，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会后，红二十六军步兵三团返回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红军游击队各回原地，在当地党的领导下，为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而斗争。

## 七、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分配土地和创建红色政权

一九三四年八、九、十月间，中共陕北特委确定在安定、绥德、清涧等一部分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内，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清涧的袁家沟，安定的玉家湾是分配土地较早的试点乡。贫苦农民分了地主的土地、粮食、牲畜、农具，烧了地主的契约、帐簿，强令地主迁往破窑、烂房，令其劳动，自食其力。对富农则没收其多余的土地和粮食。中农的土地、财物一概保护。分配土地中，对红军指战员给予优待，并留有红军公田。白军起义投诚的士兵，愿意在根据地落户者，分给一份土地。为了瓦解敌军，给家在根据地的出身贫雇农的白军士兵，留下一份土地，交其家属管理。

陕北革命根据地分配土地运动，从一九三四年九月始至一九三五年九月结束。在分配过程中，受到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执行者的一些干扰，局部地区犯过一些左的错误。如地主一些亲属不分田或者

杀掉；富裕农民分坏地或禁止他们经营油房、粉房、染房等小型作坊开业，个别地区动员中农“自动”献出多余土地，侵犯了中农利益等。尽管如此，这次陕北分配土地和其它革命根据地一样，是历史上第一次土地革命，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分到了土地，解放了生产力，激起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革命根据地很快地巩固和扩大了，自愿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的青少年如同潮涌。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当红军的事屡见不鲜。有很多青壮年，自动到部队要求参军，部队发展壮大很快。

一九三四年八、九、十月是陕北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时期。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政权机关。

安定、延川地区：革命根据地开辟较早，此时发展扩大也最快。八月二十五日，在李家岔成立了安定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十月底把安定县划为赤原、秀延、仲远三个县。赤原县向北扩展到靖边、横山南区，并延伸到安定以东和米脂西区，向南扩展到安塞北区，向东和清涧县根据地接连起来，一直接到延川老根据地。秀延县南到侯家岔，东到清涧县的淮宁湾，西至下十里铺与赤原县衔接。仲远县包括安定县南区，延安北区，安塞县东区和靖边县的一部分。到年底，延川县革命委员会也在张家屯成立，所辖区有延川县的西西北区，延安县的东北区，延长县的西北区。

绥德，清涧地区：九月十二日，在二郎山成立了清涧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根据地向北发展到石堆山、义合镇周围，东与吴堡县根据地相接连，只隔着绥德县城至义合镇再至吴堡县宋家川的一线之地。向南发展到延川县的东北区，向西发展到绥德县城的新店、邓家楼、高丽市、田庄以南。

佳县、吴堡、米东地区：九月在宋家坡成立了吴堡县革命委员会；十月在贺家沟（也可能是特牛沟）成立了佳县革命委员会。根据地扩展到北至店头，南至吉镇店、义合镇，东至慕家原、岔上、黄河西岸。

这时，米东县委和游击队也成立了，县委书记郭子华，委员艾楚南、马汝义，开辟了米脂东区根据地。佳、吴、米东一带是东西宽五十华里，南北长七十华里的人口稠密区。到十月底这一地区周围，只有绥德的吉镇店、义合镇，佳县的店头镇、螳螂峪、木头峪，吴堡县的岔上、宋家川、慕家原等地，因驻有敌八十六师二五八旅的守点部队，而未解放外，其余广大农村和小集镇都成为连成一片的解放区。

神木、府谷地区：九月十八日，在温家川成立了神木县革命委员会。革命根据地由神木的一、二、三区扩展到东至黄河，西到高家堡、解家铺、神木县城附近，南到佳县的通秦寨，北到府谷的镇羌堡、孤山以南一带。

一九三五年元月二十九日，在安定县的白庙岔村，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召开了陕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大会历时三天，到会代表近百人，选举马明方为主席，霍维德、崔田民为副主席。省政府设土地部、财政部、粮食部、劳动部、军事部、民政部、保卫部、监察局等。大会通过了《陕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法》、《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法》、《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土地法执行细则》、《募劝法》、《婚姻法》等法令。代表大会还决定了各县、区、乡都建立工农民主政府（改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名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颁发土地证，保卫和发展根据地等重大问题。

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时，所辖已有赤原、秀延、延川、延长、安塞、清涧、绥德、吴堡、佳县、佳芦、延水、仲远、靖边、米东、米西、横山、神木、府谷等十八个县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会后都经过选举改成县工农民主政府。区、乡也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各级政府一成立，就继续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肃清反革命，纯洁内部，巩固解放区；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文化教育，破除迷信，宣传执行婚姻法；宣传抗日救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收复失地；组织生产建设，发行货币（纸币）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充分发动了群众，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对支援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从中共陕北特委惠塬里扩大会议到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各地新建与扩建的红军游击队有：神府地区的第七、十一、二十一支队；安定的第八、十三支队；横山的第八、十六支队；延川的第九、十七支队；靖边的第十、十五支队；安塞的第十一支队；绥德的第十二支队；米东的第十四支队；米西的第十五、二十三支队；吴堡的第十五支队；延安的第十八支队；延长的第十九支队；内蒙古乌审旗骑兵游击队。还有各区的突击队、武工队数十个。共计约千余人，各种杂枪五百余支。各地组建的赤卫队、少先队人数约两万人。各地游击队和赤卫队及少先队对所在区域的民团进行瓦解和围攻，迫使白军士兵归降的活动十分踊跃。半年的时间内，拔除民团据点百余个。陕北革命根据地逐渐由许多小块连成几大块，各大块又互相连接起来。敌八十六师只能据守各县城和大的集镇，断断续续保存了由延安至榆林的一条大路和绥德到宋家川，米脂到螭蛭峪，榆林到府谷的三条支路，要运粮柴煤，只能整连整营的在白昼行动。

## 八、陕北红军各独立团与红八十四师的组建

### （一）独立一团

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惠塬里扩大会议的决定，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在安定的崖窑沟，把安定第一支队和第八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团（以下简称独立一团），辖步兵两个连和骑兵连，共二百余人，长短枪近百支，其余都装备大刀长矛。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同时组建了新的第一支队，支队长姬占庭，政委刘明山。

独立一团成立后，适逢刘志丹命令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步兵三团二次来陕北。十月五日，步兵三团与延川第九支队配合，在安定县的秋峪沟与白军一个新兵连（有枪三十余支）作战，把敌追到清涧县属的折家坪镇后全歼。十月十日；杨森率步兵三团与独立一团打击安定县的长蛇湾据点白军一个连，由于未协同好，未能全歼，部分敌



人逃跑。此后杨森师长率步兵三团返回陕甘边。十月十三日独立一团在玉家湾伏击敌二五六旅炮兵营（营长张云衢），因我军组织计划不周，敌人逃跑。步兵三团二次北上陕北的作战行动震撼了敌人，使敌深感营连为单位守点可能被围，行军可能遭伏击。敌人也意识到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密切联系。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谢子长带伤和贺晋年指挥独立一团一个连及安定县第一支队和第十三支队袭入安定县城，打死敌民团团总李丕成（绰号狼儿子），缴枪十余支，子弹千余发，物资一部。解救了被敌关押的革命同志和劳动人民出狱。战斗中也锻炼和壮大了两个游击支队。

在地方党委、赤卫队、少先队、农会配合下，贺晋年、马佩勋率领独立一团连续作战，拔除了根据地内和边沿的一些白军、民团据点，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横山、安塞、延安、米西等地与延川的老根据地逐步连接起来。但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的炮兵营（实际上是步兵）很难对付，营长张云衢是个顽敌，与之屡战不能取胜。战斗中，贺晋年、马佩勋都负过伤。

独立一团在分散活动期间，梁文郁、李宗贵曾率第三连到清涧、安定、延川交界的地区与九支队配合，清除了折家坪、呼家河、湫峪沟、杨家园、阎家格崂一带的反革命侦探，打通了清、安、延的交通联络线。

一九三五年元月十九日，贺晋年率独立一团到延川与安定交界的老根据地楼儿沟与延川县第九支队会合。贺晋年、马佩勋、路文昌和高朗亭、王保民一起研究决定：趁延川民团总指挥高善亭带领全县民团二百余人要与第九支队决战之际，将高善亭民团歼灭于城外。

二十日零时，一团和九支队冒雪出发。九支队为前锋并派遣了尖兵。贺晋年、马佩勋和路文昌率团部居中，一团各连队押后，向延川县的青坪川进军。晨六时，到达青坪川川口大掌里村（老根据地）吃早饭。九支队即派该村赤卫队员张来顺西上侦察高善亭民团的动静。

原来，高善亭出县城进永坪川西上要找九支队决战未遂，乃经永坪镇转到青坪川鸦儿巷，东下准备回县城，到贺家庄抓住了张来顺，得悉第九支队现在大掌里村，要沿川西上。其实，张来顺只知道有九支队，根不知道独立一团来这里。延川县民团立即在贺家庄大路旁集合，据说高善亭在队前大声嘶叫：本总指挥这次出城，是手拿铁锤找锣打的。今天，高朗亭碰到本人的手掌上来了。我们一定要活捉高朗亭，今晚回城，明天给弟兄们喝庆功酒。高善亭带着高鸣歧、郑德胜、冯康军、苏彦武、刘广汉、郝国灵、梁似虎、李兴、刘正才等民团，在王家格凸村内外及附近山上和川道设埋伏，企图一战消灭九支队。

元月二十日八时，独立一团和九支队从大掌里村出发仍按原来编队行军。九支队的尖兵到达距王家格凸村两华里官庄里时，该村的赤卫队员即向尖兵报告：在一顿饭左右时间，有几百穿黑军装的民团，在王家格凸和南北山布了埋伏，前面龙王庙里也有埋伏。尖兵回报，九支队指挥员命令部队立即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并和独立一团指挥员研究了敌情和战法。决定从独立一团抽调四十名指战员为奋勇突击队，夺占龙王庙后，向王家格凸村继续突击；独立一团一连由官庄里登山，向王家格凸北山进攻，得手后由北向南压下王家格凸村；二连由李家河岔登山向王家格凸南山进攻；三连为预备队；九支队向敌右侧李家河、关家沟插进，到李家河登西山，由南向北，与二连协同，把敌人压进王家格凸川道，并堵截敌人向西退逃的道路。布置停当，各连分别作了十五分钟的政治动员和作战准备。顷刻间，五支军号齐鸣，各连队指战员在茫茫雪原上，如猛虎扑群羊似的冲往敌阵。奋勇突击队首先夺占了龙王庙，活捉了敌民团团总刘广汉，全歼其团队，并继续向王家格凸村冲去。高善亭带了十余人，向南山逃跑。与此同时，一、二连在南、北山也已打响。敌人象被打惊了的鸭子狼狈向南逃窜，正好被二连和九支队分段割截。九支队活捉了延川县民团总指挥高善亭，缴获自来得枪三支，步枪二、三十支，独立一团缴获自来得枪五支，步枪一百五十余支，子弹几千发，活捉民团团总五名。此次战斗，敌我兵力基本相等。敌人装备武器好、子弹多，我军则相反。由于我军认真分析了敌情，迅速果断的布置兵力，只用了五个小时，

就消灭了敌人。我军只伤战士一名，阵亡排长一名。此战胜利，振奋了我军士气，改善了武器装备。而对敌人震动很大，延川县的民团从此一蹶不振，再也组建不起那么大的力量，只能孤守县城和永坪镇两据点；并教训了延安东部，延川北部，安定南部的敌人，再不敢出据点抢粮捕人了。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扩大到延河北面的蟠龙镇、甘谷驿附近。延长县城的东西北地区，只留了交口镇的一个孤立的民团寨子。贫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延川县、延水县革命委员会也于此时建立了。

## （二）独立三团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八日，神府的第三支队在王家庄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三团（以下简称独立三团），下辖第一、第二连和先锋连，约二百人左右，枪百余支，其余均是刀矛。王兆相任团长，杨文谟任政委，刘镇西任参谋长。与此同时又组建成新的第三支队。独立三团成立后，为打通神木与府谷之向的联系，到达府谷县一区的木瓜堡与第七支队会合。随以一部分指战员化装袭击蒙、陕边界的重镇哈拉寨，歼灭了该寨敌团，缴获了大量物资。接着，第七支队在赤卫队和群众配合下，在清水堡的牛面梁打击了府谷县保安第一队，夺回了被敌人抢去的牲畜和财物。

不久，独立三团由府谷南下到佳县的万户峪附近，与敌八十六师二五八旅五一四团八连的文书、共产党员张德超联系，策动该连十几名士兵起义后，再次北上府谷，打土豪分粮食，焚烧契约，并筹得一部分经费，解决了部队的冬装问题。同财，与七支队配合，歼灭高粱据点敌军苏保山连数十人。独立三团还积极协助七支队发展到四十余人枪。革命根据地也贯通了府谷南部和神木东南部及佳县北部。

## （三）独立二团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在清涧县的大马家山，第二支队（支队长白雪山同志在土黄岭战斗中英勇牺牲）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二团（以下简称独立二团），下辖步兵第一、二、三连和学兵连，共

约三百余人，各种杂枪百余支。郭育仁（又名任山）任团长，马万里任政委，惠世良（化名马三）任参谋长。同时又组建起新的第二支队，惠永秉任支队长，惠爱胜任政委。二十天后，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杨祺带领独立二团、安定一支队、清涧二支队、延川九支队、约七百人左右，南下延川。在清涧县无定河边的川口镇把第一、二、九支队编一个总队，杨祺指定高朗亭为总指挥，刘明山为政委。行军序列按第九、一、二支队顺序，九支队派出前卫分队和尖兵。游击总队为前队，独立二团部居中，杨祺行军、宿营在二团部，独立二团的各连队为后队，挺进到延川东南区、延长县北区、延川县西南区普丰川和青坪川到达永坪川老根据地。沿途消灭了延川县葛连里民团三十人。所到之处，动员组织群众，打土豪，开仓放粮，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并向南开辟了大块革命根据地。

#### （四）红八十四师的组建

一九三五年元月三十日，在中共陕北特委和谢子长领导下，在安定县的白庙岔，将陕北红军独立一、二、三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了师部。杨祺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休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记不清是谁了，经理处长崔世俊。与此同时，吴堡的十五支队扩编为独立第五团，团长王士杰，政委初为慕生忠，后是王国昌，参谋长樊文德（化名老霍），团教练李启贤，下辖六个连，共七、八百人。不久，红八十四师在清涧阎王砭，把独立五团改归为第三团建制。红八十四师成立后，为了锻炼部队指战员的作战能力，采用从打小仗入手的办法，即伏击歼灭白军的一排一连，围歼民团据守的寨子和崖窑等，每战必胜，战战有缴获。这样，指挥员提高了指挥艺术，鼓舞了战士的士气，单兵战术也比较熟练了。

中共陕北特委惠塬里扩大会议后，成立了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和十几个党的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发展成神府、佳吴、清绥、安延四大片，并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交错地连接起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镇的态势。陕北红军游击队由八个支队发展扩大到三十多个支队和数十个武工队、赤卫队，约计两千余人，五百余支枪。

至此，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从能对付敌人的地方武装和以排连为单位的正规军，发展到可以对付整营整团的敌军了。这就迫使敌人只能守卫较大的镇子和县城，而广大农村都成了人民的天下。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即将连成一片，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联合作战也势在必行。这标志着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一九八〇年九月

## 西北红军的组建和党中央拯救

### 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事纪实

高 朗 亭

一九三三年八月到一九三五年八月，是陕甘边和陕北红军游击队与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内，分配了土地，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区工农民主政府，所辖共有二十六个县。陕甘边的革命武装，由原来的红二十六军的一个第三团和骑兵连，耀县、渭北、照金、平子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大队等，发展到步兵第一、二、三、四团（为了避免与红二十七军的各团番号相混，对红二十六军各团都冠以“步兵”二字），骑兵团，红军指战员由二百余人发展到二千余人，都装备了当代武器；由五支游击队发展到二十多支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黄龙山东部地区的一支游击队名称），共二千余人，一千五百多支枪。陕北红军游击队，由原来只有一个第一支队，发展到三十多支游击队，共二千余人，一千余支枪；此外，创建了红二十七军三个团（以下通称红一、二、三团）和独立团，红军指战员由六百来人发展到二千五百余人，都准备了当代的步枪、轻机枪和迫击炮。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

在这一段时间内，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够胜利的发展，其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原理，依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建军、建政和阶级斗争的光辉榜样，结合当地的实际，不断总结了自己的实践经验，逐步地克服了主观盲目性，使自己的行动比较符合于客观实际和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的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其次是由于党内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对这两块根据地的影响较小，因此正确路线尚未受到干扰。虽然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执行者，在两特委内散布过一些左倾空谈；作过一些“钦差大臣”式的批评，但仅限于指示文件、书刊议论，

而没有在具体行动上强加干涉，加之受到同志们在实际行动中的抵制反对，因而危害尚浅，受灾较少。

在建军问题上，由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游击队指战员学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并运用于自己的实践，所以得到了许多的胜利。虽曾经因违背了这些原则，也遭受过血的惩罚和失败，但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在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中创建和壮大起来。先由少数的游击队或武工队，大量地组织农会、赤卫军、少先队，经过斗争锻炼后，上升为主力红军。指战员都是经过党的教育改造、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和经过斗争翻身的人民群众子弟，还有少数是改造好的白军士兵和旧行帮会的成员。因此，红军和游击队的成员是纯洁可靠的。

红军和游击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坚强力量，担负起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任务。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是和人民群众亲如骨肉、鱼水相依的人民子弟兵。指战员同甘共苦，团结一致。既反对军阀主义残余，部队里没有打人骂人的恶习，又反对极端民主化，部队中根本没有不听指挥、不服从命令的行为。这都是古田会议精神光辉照耀的硕果。

两个特委在发展壮大红军游击队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相互之间是团结友爱的，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虽然郭洪涛同志在闫家洼子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和尔后在《西北斗争》上发表的《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中，照抄照套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错误地批评指责了红二十六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但尚无损于两个特委之间的革命团结与在实际斗争中的互相帮助和支援。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两支红军游击队，发动了统一的“围剿”部署，因此，两个特委、两支红军游击队、两块革命根据地，只有在组织上，作战行动上统一起来，联合起来，

才能有效的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此时，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巡视员黄汉来到陕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北方代表的指示，倡议召开中共陕甘边和陕北特委的联席会议，并写信给陕甘边特委，这将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会议。

## 第一、国民党蒋介石对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部署

一九三四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与敌奋战七个月，驰骋南北，作战三十余次，歼敌三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各游击队，在红二十六军步兵三团的协助下，也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底粉碎了敌八十六师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同年十月，蒋介石国民党就开始部署第二次“围剿”：把北面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七个团的防地加以收缩，仅负责保安、定边、靖边、横山、榆林（八十六师师部和专员公署所在地）、佳县、神木、府谷一带的剿防；从洛阳地区调来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四个团，接替延安、安塞、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八十四师师部和专员公署所在地）、米脂一带的剿防；东面晋军七十一师集结于黄河东岸各要点，并派遣第二〇六旅的两个团西渡黄河，接替吴堡县和宋家川、辛家沟、绥德县的义合镇、定仙塬镇的剿防；南面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四个团向北增强宜君、中部（即今黄陵县）、洛川、宜川、富县、甘泉地区的剿防；西面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七个团增强甘肃的合水、华池、庆阳、曲子镇、环县地区的剿防；西南面蒋介石调来其嫡系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六个团增强甘肃的宁县、正宁和陕西的淳化、旬邑、长武地区的剿防。白军第二次“围剿”总兵力共六个师，三十个团，近五万人。蒋介石为了协调解决八十四师和八十六师之间的新旧矛盾，派出毛侃为首的参谋



团来驻绥德城，调整、监视各军阀的关系、行为，代行军统特务工作。由于西北很少有铁路，公路也不多，汽车少，敌人上述兵力部署，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三五年四月才完成。

蒋介石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完全袭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其特点是：

1、在军事上，采取战略上六个师、三十个团的大包围圈；战术上分割“进剿”，各个击破，驻点筑碉、修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合并村庄，抢光杀光，制造无人区；加强地主武装民团、还乡团和建立“铲共义勇队”，配合抢劫烧杀。

2、在政治上，进行反共宣传，推行保甲制度，建立“肃反会”，实行连坐法。侵犯我根据地后，即行破坏我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行政组织，抓捕革命工作者，逼迫自首，策反，采用酷刑，残杀革命人民。

3、在经济上，加紧封锁，禁止一切工业品运入根据地，大肆烧杀，抢夺牲畜、家禽，破坏我工农业经济，实行焦土政策。

蒋介石国民党虽有各方面的政策和准备，但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困难：白军兵力少，革命根据地地域宽广，只能分片分段地“剿防”，无法创造与红军营团级的决战条件；参加“围剿”的杂牌师，除六十一师外，都是原来的军缩编为师的，各军阀之间都想保存实力，各自为战，扩大地盘，不打硬仗，不执行统一号令；八十四师虽然装备优良，驻守点都是中心根据地内的要点，但是初到陕北，人地生疏，不习惯于山地作战，师长高桂滋与陕北老军阀井岳秀之间旧有私仇，为了争地盘又积了新怨，互有戒备，很难协同；白军都驻城镇据点，处在我红色农村包围之中，各据守点之间的地面联系都很困难，更缺乏机动兵力；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一师也是尽量促使杂牌师出力卖命，自己保存实力，冒功领赏，等等。上述白军的这些弱点和困难，对红军来说，都是反“围剿”的有利条件。

红军的困难和不利因素：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还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形成打击敌人的拳头；陕甘边和陕北两大片革命根据地还没有完全连在一起，各块根据地之间，也被敌点线封锁割开，不能完全畅通，互相支援不便，与敌周旋范围受到限制；白军驻守在城镇和重要据点，修筑碉堡、寨子，步步为营，红军没有重兵器，缺乏攻坚经验，还不能强攻城镇。

## 第二、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组建西北红军

我们为了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采取了统一陕北和陕甘边两地党和红军的重要决策：

（一）**陕甘边和陕北特委约定召开联席会议**。陕北和陕甘边特委接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巡视员黄汉倡议，双方约定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组织部长郭洪涛等同志，到安定根据地开联席会议，商讨两地共同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大事。

中共陕甘边特委由于要集中全力反对国民党三十五师、四十二师和六十一师的进攻，书记暂不能到会，以刘志丹同志为全权代表并率领红二十六军步兵二团团团长刘景范、副团长孔令甫、政委胡彦英及陕甘边第五、六支队，通过敌据点间隙上陕北参加联席会议；中共陕北特委机关，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由清涧、绥德根据地转移到安定、延川根据地，只待陕甘边同志们的到来。

刘志丹同志于一九三五年元月二十日到达陕北根据地中心区赤源县的水晶沟。元月二十一日，刘志丹同志由白坚同志陪同探望了谢子长的病情。刘、谢两人广泛地交谈了意见。白坚同志生前对我讲：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在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工委）、统一陕甘边、陕北党的领导方面；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

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北军委）、统一领导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两个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在战略指导方针、战术法则，集中两军的主力兵团形成拳头，打歼灭敌营、团规模的运战，各游击队向外发展扩大根据地的方向，根据地内围困敌人的据点，限制敌人外出抢夺烧杀、骚扰人民群众方面；在选择我军主要打击对象为国民党八十四师方面；高举反帝抗日旗帜，争取瓦解白军政策方面；在根据地内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分配土地等方面。双方交谈的意见都完全一致。只是在西北军委主席人选上，谢子长同志主动提出要刘志丹同志担任，刘志丹同志再三推让，要请谢子长同志兼任西北军委主席，两人谦让良久，最后谢子长说：我是军事特派员，就决定你担任西北军委主席。

（二）**两特委联席会议**。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同志授意，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在赤源县（今子长县）周家岭召开。参加者：刘志丹、崔田夫、郭洪涛、惠子俊（张秀山说惠参加了联系会议，郭洪涛说惠没有参加，待查）、高岗，白坚作记录。谢子长同志因病重，没有出席联席会议。刘志丹同志转达了他自己和谢子长同志的共同意见。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惠子俊，组织部长崔田夫、宣传部长张秀山、秘书长郭洪涛。马明方、刘志丹、习仲勋、杨森、张达志、杨祺、霍维德等为执行委员。

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谢子长、刘志丹、杨森、杨祺、张秀山、张达志、高岗等为委员。研究主席、副主席人选时，刘志丹同志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高尚美德和风格，推荐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兼任主席，与会者都同意；与会者又推荐刘志丹同志任副主席，一致同意。

联席会议还讨论通过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术原则；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抗日反帝的政策和策略等等；与会同志一致赞同谢子长、刘志丹同志的建议。

（三）西北军委发布《动员令》。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刘志丹同志在冯家梢塬村，召集待命分配的指挥员开会宣布：西北军委今天开始办公，军委主席谢浩如（即谢子长的号），副主席刘志丹，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宋子休（还未到职），作战训练科长雷恩俊，情报侦察科长高朗亭（兼医疗卫生科长），总务处长刘汉武，经理部长张成武，总会计王彩文。

西北军委开始办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联席会议精神，起草一份《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动员令》（以下简称《动员令》）。刘志丹同志授意白坚同志拟制草稿。白坚完稿后，交刘过目。刘志丹同志看后笑了笑说：你这位大学生，连联席会议的精神都没有领会，还是我自己来吧。于是，刘志丹同志思考了一会儿，就运笔如飞地写了一天脱稿，交给我们在现场的几个参谋人员传看，提修改意见。我们传看后，刘志丹同志又召集座谈，集中意见亲自修改，并送西北工委讨论通过定稿。落款签署主席谢浩如、副主席刘志丹、高岗，白坚同志亲自复写两次（十来份），编为第一号绝密件，于二月十八日发出，注明各师、团党委、各军分会党委、各游击纵队党委讨论，了解任务后自行焚毁、不许保存。

《动员令》的原件不存了，据我和白坚同志生前以共同回忆与调查，主要内容如下：

《动员令》首先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对敌六个师三十个团的“围剿”，只能集中主力首先打击被我根据地分割包围之敌八十四师，对其它各师暂时采取游击队袭扰，节节抗击；并在敌后开展工作，动员组织群众，开辟敌后根据地，形成红色农村根据地包围城镇敌人据点的态势。号召红军指战员和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员及全体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白军的第二次“围剿”而英勇战斗。

《动员令》指出，为了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由刘景范接任主席，统辖陕甘边地区的各游击队和军事建设；红二十六军步兵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会

合，组建主力兵团，集中兵力运动作战，由西北军委直接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杨森领导指挥步兵第一、二团和骑兵团沿咸榆路东出宜川、韩城、合阳等地区，以及在陕甘边西南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分散活动和孤守据点之敌，发动组织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配合照金地区、庆合环地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动员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机动灵活地对敌斗争，巩固与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

《动员令》指出，陕北根据地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军分会，马义（原名白炳新）任主席，在清、绥根据地办公，统管清、绥、佳、吴地区的武装力量和军事建设。陕北根据地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编成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二、第五纵队和山西游击队。其共同任务是：积极地做好发动群众工作，公开或秘密地组织贫农会、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协同工农民主政府分配土地，开辟红色村庄，扩大新根据地，坚决对敌斗争，壮大武装力量。各纵队的基本任务：第一纵队以米西区、横山南区为根据地，向北面的神府地区发展；第二、五纵队坚持绥德、清涧东区、吴堡、佳县根据地的斗争，沿黄河西岸向北面的神府方向发展；第三纵队依托靖边、横山地区根据地，向靖边县城和安边以北的长城外发展；第四纵队依托安塞北区根据地，向延河南岸发展，完成对延安、安塞县城的包围态势；第六纵队依托黄河西岸的清绥、清延根据地，相机东渡黄河，袭扰晋军，组建秘密据点、联络站，为开辟根据地创造条件，同时向驻定仙塬、枣林坪之晋军据点袭扰或伏击其来往分队；第七纵队依托延川东南区、延长北区根据地，向延长南区和宜川方面发展，开辟根据地对延长和宜川县城形成包围态势；山西游击队在山西工委领导下，想尽一切办法东渡黄河，开展游击活动，开辟根据地。各纵队对已经包围的各城镇据点，加紧袭扰，消灭其小股外出抢劫烧杀分队，配合主力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动员令》指出，红军主力兵团集中后，国民党三十五师、四十二师、六十一师的活动，可能更猖狂。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党、政、

军、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于必要时可以转移到洛河川地区，继续坚持战斗。

《动员令》最后要求红军、游击队指战员，赤卫军、少先队队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树立积极战斗、不怕牺牲，共产主义必定胜利，中华民族必定解放，人民生活必定改善的信心。实行严格的军事化训练，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

**（四）谢子长同志逝世。**西北人民敬爱的革命领导人，西北军事特派员兼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同志，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病故。为了防止敌人乘危袭击，避免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西北工委决定绝对保密。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家属和战友都不着孝服、不戴黑纱，谢子长同志的家属亲友表现了高度的革命品德，件件依从，毫无怨言。行文布告仍签署谢浩如的职衔姓名。一直保密到五月上旬，吴家寨、马家坪战斗后，解放了安定县城和延川县的永坪镇，才逐渐地解除保密，行文布告落款，才签署军委主席刘志丹，不再签署谢子长的职衔姓名了。

### **第三、解放六座县城，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遵照《动员令》规定，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张委同志率领步兵三团（团长吴岱峰、政委黄罗斌）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郭宝珊、政委任浪花），于四月十五日到达赤源县的黄家岭、王家渠一带。红军、义勇军所到之处，群众敲锣打鼓，杀猪宰羊，夹道欢迎；赤卫军、少先队站岗放哨、当向导传递情报；妇女缝洗衣服，做鞋袜，看护伤病员。这些革命行动使指战员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决心，要积极主动地作战，消灭更多的敌人，报答人民群众的期望。

刘志丹副主席亲自指挥步兵三团为主攻，西北义勇军为预备队，和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赤卫军、少先队配合，于四月二十二日在长

胜湾一举全歼敌二五六旅五一团的一个连，大大地鼓舞了军民斗争的积极性。

**（一）白庙岔会师。**西北军委命令步兵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在赤源县的白庙岔会师，当日举行了数千人联欢大会。刘志丹同奉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了打击的主要对象和作战法则。各团的代表也在会上表示了团结战斗的决心。会场上军民洋溢着团结友爱的革命气氛。会师时，步兵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共有九百余人；红二十七军第一、二、三团（以下简称红一、二、三团）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余人。两军合组主力兵团二千一百五十余人，共有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四挺。会后，各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鼓足了士气，增强了战斗力。

五月二日，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的政策制度。

这时西北军委根据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总），刘志丹同志兼任总指挥，红八十四师司令部就作为前总的参谋部，白坚任前总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委任命范子文同志为秘书长。

此时，“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国民党八十四师和八十六师，由于其驻守城镇的小分队，被我红军和游击队连续打击歼灭，再也不敢以连为单位远离据点行动了。各据点之间的来往，只能以营为单位进行；以连为单位的行动，只能在两边指定会合点相接、十分保密的情况下才敢进行。

**（二）吴家寨、马家坪战斗，解放安定县城和延川县的永坪镇。**四月下旬，国民党八十四师和八十六师各抽一部，企图以营为作战单位，向秀延县、赤源县进攻，步步渐近，分别扎点，然后连成一片，向我根据地中心区心脏挤压。

前总的作战计划是：在我巩固的根据地清涧县城与瓦窑堡之间，

选择保密好和地形有利之处，待机歼灭护送军用物资和分散活动之敌；我主力红军集结在秀延县的魏家岔、蜜蜂峪、黄家川、玉家湾、冯家岔一带待机。四月三十日，国民党八十四师五〇二团一个营（营长郭子封）进驻杨家园，修寨筑碉，妄图扎点久驻。我前总决心乘敌立足未稳，歼灭该敌。

五月七日拂晓，我红军主力分三路向杨家园驻敌进攻。一路以步兵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为主攻部队，步兵三团作为第二梯队，从黄家川、玉家湾出发，向玉皇峁进攻，夺取制高点墩儿山寨堡；一路命红一团从魏家岔出发，向杨家园西街敌兵营地进攻，夺取敌野营工事，攻占和歼灭驻守临时营房之敌，并阻击瓦窑堡来援之敌；一路命红三团从冯家岔出发，经单头向杨家园东街敌兵营地进攻，夺占和歼灭驻守临时营房之敌。红二团为预备队，另派陕北游击第九支队配合赤卫军、少先队去杨家园南山，待主攻部队打响后，摇旗呐喊助威，捕捉溃散南逃之敌，不使漏网。当我主攻部队接近玉皇峁寨时，发现寨墙很高，不好攀登，地形狭窄，兵力展不开，不宜强攻。因此，刘志丹同志毅然决定，作战计划撤销，部队仍返回魏家岔、黄家川、蜜蜂峪、冯家岔一带待机。部队撤退时天已大亮，我军的行动被敌人发现。

杨家园守敌发现我军撤退，分兵两路向我追击：一路向青皮梁方向追击抗日义勇军；一路向吴家寨方向追击红一团。红一团边阻击掩护，边撤退到吴家寨时，赤卫军报告：瓦窑堡驻敌五〇〇团一个连，护送一批“犯人”，正向吴家寨前进，已经到了吴家坪。红一团立即将敌情报告前总请战，同时将部队埋伏于铺儿上。八时许，敌五〇〇团一个连进入我伏击圈，我军勇猛冲击，全歼敌前卫排，敌后续分队掉头西逃，我军战士们乘胜追击，歼敌于张家峁一带。俘敌百余人，缴步枪九十余支，轻机枪九挺。并将敌押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救出。

杨家园出击之敌于十时许进占吴家寨及其后山制高点。红一团歼灭了敌五〇〇团一个连后，返回到黄家山与红二团二连会合，立即向前总报捷，同时向吴家寨及其后山之敌冲击。敌立即返回白家园后山



老虎塢、园峁高地构筑工事，与青皮梁之敌形成鼎足之势，企图依山据守顽抗。此时，敌脱离杨家园的工事依托，形成野战状态，处于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四面包围之中。前总立即命令各部队向心围歼该敌；步兵三团和抗日义勇军抢先占领如天山、大小坞山制高点，分左右两翼向老虎塢钳形冲锋。抗日义勇军的英雄们为争夺一个腰峴，连攻数次，越战越勇，手榴弹打光了，拾起敌人未及揭盖甩来的手榴弹，又给又给敌人甩回去；步兵三团也并肩冲锋，攻占了敌前沿阵地，迫敌退到园峁高地。与此同时，红一团、三团也从西南侧击敌后，遂将敌压入泥泞沟，下午四时将敌全部歼灭。此战击毙敌营长郭子封以下五十余人，俘敌副营长以下四百五十余人，缴骑、步枪五百余支，轻机枪二十七挺。

五月七日，国民党八十四师五〇〇团第三营，保护着四百余驮军用物资和军官家属，由绥德经清涧运往瓦窑堡五〇〇团本部，清涧城内地下党立即经赤卫军传递出情报。敌出城后的进程，亦由赤卫军的“传山哨”连续节节传来。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因打杨家园作战计划撤销，由杨家园南山撤下，在单头村待命。第九支队队长阎应娃、政委杨凤歧率队在单头村东边南北流向的河坎设伏。上午十二时，敌前卫班十二人进到九支队的伏击圈，被全歼。敌前军本队进至马家坪。敌营长听枪声登高瞭望，见其前卫班被歼，当面又有无数的赤卫军、少先队在周围山头上摇旗呐喊，鸣枪阻击，不知虚实，认为自己被包围，于是，在马家坪卸下辎重，占领有利地形，构筑防御工事。这时阎应娃队长，杨凤歧政委找秀延县中心区委书记陈克功同志商量决定：九支队、秀延县武工队（小组游击队）和赤卫军、少先队把敌人包围起来，不让敌人跑掉；立即派人给前总送信，报告刘志丹同志派主力红军歼灭敌人；敌人离瓦窑堡较近，向西突围的可能性大，九支队在单头以东阻击敌人；敌人向西突围不成，可能向东返回清涧县城，秀延县武工队在湫峪沟村制高点阻击敌人；赤卫军、少先队轮流换班昼夜不息地在周围山上摇旗呐喊，迷惑敌人；夜晚在山上点篝火，接近马家坪摸敌哨点，鸣枪袭扰敌人。八日，赤卫军、少先队越来越多，周围山上形成了万人长城，红旗漫山遍野，呐喊声震撼山谷，十分威

武壮观。敌人在包围圈内如热锅里的蚂蚁，焦急翻腾、不知所措。这天上午，敌人抬起辎重骡马，编成战斗行军队形，向西战斗前进，被九支队的几十支步枪和一挺机枪齐射百余发，打伤打死敌前卫战斗侦察队十人后，敌被迫返回马家坪；午饭后，敌人又抬起辎重骡马，编队向东战斗前进，前卫分队到达湫峪沟村东头高地时，被秀延县武工队齐射几十发，打倒几个，敌人又畏惧不前，再退回马家坪安营构筑工事。七、八日两昼夜，秀延县中心区委和几支队连续向前总报告情况多次，故前总对敌我情势了如指掌。

五月九日，刘志丹同志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赶到，发起冲锋。步兵三团向马家坪北面的鹰山东梁冲击；红一团向马家坪北面的鹰山西梁冲击；抗日义勇军从单头向东侧击马家坪；红二团从湫峪沟向西侧击马家坪；九支队配合赤卫军、少先队在史家沟村及其两翼，等待捕捉溃兵。四面八方齐冲压，一鼓作气，约两小时将敌全歼，无一漏网。此战毙敌营长左向恒以下四十余人，俘敌营副以下四百五十余人，逃亡地主和“铲共义勇队”等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四百五十余支，轻机枪二十七挺，八二迫击炮两门，马克沁重机枪两挺，单军衣两千余套，银币两万万余元，医药、医疗器械八骡驮（十六大箱），还有其他辎重一部。

由于吴家寨、马家坪两战连胜，歼敌一千三百余人，迫敌五〇〇团团团长李少堂于十日就将驻守安定县城的第一营和延川永坪镇之分队，撤回瓦窑堡，安定县城和永坪镇得以解放。敌进犯秀延、赤源县的企图被粉碎，各自龟缩回据点，不敢再出扰。安定县城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吴家寨、马家坪战斗的胜利，是红军主力兵团、游击队和赤卫军、少先队、武工队等群众武装密切合作战的范例。战前，根据地人民群众严格保守军事秘密，侦察敌情，传递情报，造成我明敌暗的良好条件；战斗中，人民积极踊跃地自动参战、参军，抬担架、救护伤员、送水送饭，尽其全力地支援红军和游击队；战后，打扫战场，处理善后，把敌人的伤病员分别送到瓦窑堡和清涧县城，对瓦解敌军，挫伤

敌之士气，扩大宣传效果，起了很大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竖排版第一〇四〇页）

五月十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举行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兵团向南出击，从运动中歼灭敌人，要求五月底打通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使两根据地连成一片。下午，陕北工农民主政府主持召开了祝捷大会。红军集合时，将缴获的新枪炮整齐地摆出来，轻机枪齐放十发，重机枪齐放二十发后，二十名司号员齐奏凯旋谱，司仪开会，万名与会群众无不欢欣鼓舞。西北军委主席兼前敌总指挥刘志丹同志在会上作了吴家寨、马家坪战斗胜利的总结报告，号召红军指战员，戒骄戒躁，下一步还是要寻找、歼灭力量较小、防御疏忽和运动中之敌。会后部队整训，补充新战士，总结战术经验，操练新武器。

**（三）解放延长、延川县城。**前总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从秀延县的玉家湾、黄家川、王家沟一带出发，东进到清涧无定河边。五月二十日，远途奔袭张家圪台，全歼守敌八十四师四九九团一个连；驻苏家岩之敌听枪声后，派一个连渡无定河来支援也大部就歼。击毙敌连长以下二十余人，俘敌一百五十余人，缴获长短枪一百五十余支，轻机枪十六挺。

战后，前总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夺取延长县城。二十二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转移到清涧店子沟地区，制造假象，扬言要打清涧和绥德县城，给敌人造成错觉，我军则隐蔽星夜南下。二十五日，部队到达延川县大连沟一带，封锁消息，隐蔽待机。

延长县城守敌八十四师直属骑兵连一百四十人，一百七十余匹马，延长县民团二百多人，敌县警察队和矿警队各三、四十人，合计四百余人。

前总为了减弱敌守城防御力量，于五月二十五日命令红二团三连

协同陕北游击队第七纵队（即九支队、十七支队），诱敌出城，规定不准打机枪，防敌发现我红军主力。我七纵队和三连昼夜急行军到距延长城二、三十华里的东北原上，打土豪，分财物，虚张声势。二十七日晚，延长县民团总指挥李鸣吾果然一百三十余人星夜出城。翌日与我接触，我诱敌部队边战边退，一直把李鸣吾民团拖到距延长县城近百华里的茄子峪，继续对峙。

前总刘志丹同志率红军主力兵团，于二十八日秘密转移到延长县城北七十华里的交口镇、拓家川一带，与我延长县农村的党、政、民领导机关协同，进行偷袭攻城的准备工作。二十九日晚，部队隐蔽运动到延长城下。三十日晨四时开始攻城。刘志丹同张达志亲临指挥。红一团和义勇军登上东北城墙时，守敌还在酣睡，我军一举歼灭全城制高点的大墩山碉堡守敌。尔后，红一团沿东城攻占东门，打开了城门，控制了敌县政府。抗日义勇军沿西城墙由上而下直扑敌骑兵连，经过激战，将敌全歼，生俘敌骑兵连长汪振河。步兵三团也攻占西山寨，歼灭了附近的矿警队，夺取了西城门，控制了西城楼。全城之敌于七时全歼，我前总随即进驻县城。

五月三十日七时，我红军主力兵团攻占延长县城，十二时敌民团总指挥李鸣吾带队返回县城。前总即派红二团出城迎击于烟雾沟，尾追敌民团的我第七游击纵队和红二团三连配合，前后夹击，逼敌到呼家川西山的贺家原，下午三时将敌全歼，当场毙敌民团总指挥李鸣吾，缴获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解放延长县城的战斗到此结束，我军仅伤亡二十余人。生俘国民党延长县长董松寿和骑兵连长汪振河，毙伤俘敌共四百五十余人，缴长短枪四百余支，轻机枪十五挺，无线电台一部，战马一百七十余匹，银币十五万元，还有大批军用物资。战后一个星期，将战马补充给红二十六军骑兵团。

延长县城，是我西北红军主力兵团采取攻坚作战打开的第一座县城。刘志丹同志指定贺晋年任警备司令，明确任务：（1）维护好社会秩序；（2）查获坏人，清理档案；（3）宣传党的政策，维护红军纪律，纠察指挥员的犯法行为。部队休整四天，秩序井然，群众拥护

红军。中共延长县委员会书记白如冰率机关工作人员进城，领导全县工作，召唤延长县城内地下党员出来参加革命工作；延长县工农兵民主政府主席罗成德同志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进城办公；主力红军接纳新战士，补充弹药，总结作战经验，演练新战术。

六月二日，延长县委、县工农兵民主政府、前总政治部共同组织召开祝捷大会，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和第七游击纵队，城周围的赤卫军、少先队都整队进城参加，机关工作人员和城内居民都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台上，白坚同志任司仪，刘志丹同志讲话，他鼓励军民继续战斗，争取更大胜利，保卫人民，改善人民生活，鼓励军民要尽更大的努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东北、华北被奴役的同胞；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拥护为人民谋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工农兵民主中央政府。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万岁！接着白如冰同志也讲了话。大会最后枪决了国民党延长县长董松寿和几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会后刘志丹和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指战员一起合影留念。

红军解放延长县城威震敌顽，延长县工农兵民主政府主席罗成德同志和步兵三团团长吴岱峰同志带了一个连，乘胜于三十日下午赶到延长县属甘谷驿镇，勒令该镇民团五十余人交械投降。接着，延长县属安河渠镇民团也于六月四日交械投降。延长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二座县城。

敌人惊慌万状，延川县城守敌八十四师二五〇旅五〇一团一营和地主豪绅民团，由于惧怕歼灭，于六月一日弃城逃往清涧县城，延川县全境无敌据点，遂告解放。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三座县城。

**（四）解放安塞、靖边、保安县城。**延长、延川县解放后，刘志丹同志决定拔除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中间衔接地带的敌人据点，使两大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前总计划决定：先打甘泉县城，后打安塞县城，孤立延安城守敌。

前总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六月四日由延长县城出发，昼夜兼

程南下，奔袭甘泉。甘泉县城守敌四十二师一二五团的一个营，已知悉红军解放延长、延川城的情报，戒备很严，寻无战机。前总决定改变计划，沿洛河西岸西上，到甘泉下寺湾休整九天。

六月十日，前总命令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由第十一、十八支队组成）和延安县赤卫军、少先队包围延安县属的高桥镇民团，部队求战心切。十五日又派红一团去强攻或打援兵。红一团到达后，敌民团就动摇了，表示只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可以缴枪，撤出寨子，并请红军进寨受降。红一团指挥员为了防止中计，决定贺晋年团长带奋勇突击队进寨受降；张达志政委组织几挺轻机枪占领有利地形掩护，万一有诈，用火封锁寨门，支援突击队歼敌。贺团长进寨时，敌民团已经架枪列队受降。延安民团总指挥带百余人增援高桥，红一团预设的第一连，将敌击溃，俘敌二十余人，缴步枪二十余支，延安民团总指挥李汉华被打死，缴手枪一支。

1、前总派红军一、三团于六月二十日围攻敌安塞县政府所在地时兴隆寨。该寨三面环沟，一面连山，地形险要。步兵三团主攻，红一团打延安来援之敌。强攻未克，红三团挖地道爆破也来成功，但敌人已动摇，国民党驻军一个连和民团趁夜悄悄逃往延安。我军进寨，缴获了全部公文档案、印信关防，俘国民党安塞县新旧两任县长。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四座县城。

前总派红一、二团于六月十七日围攻李家塌。李家塌寨子是安塞县敌人据守的最后一个据点。位于两沟会合点的山角上，三面是悬崖峭壁，高不可攀，北面细梁连山，被人工挖掘的深沟切断，宽陡不能攀越，进出只有东面一道寨门。该寨控制着我陕甘边与陕北革命根据地互相往来的必经之路，又是附近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及其家属二千余人麇集的反动据点。驻寨民团经常外出抢劫焚烧人民财物，捕杀四周的革命群众，老百姓对此恨之入骨。我向李家塌的攻击开始后，反动民团据险顽抗，红二团多次轮番攻击，都未成功。

刘志丹同志于二十二日亲自到前线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发现寨子

南岩有久经雨水冲刷形成的陡石峡槽，两腿左右阶移，可以攀登。寨子南端又是敌防御的薄弱点，由此爬上去，出敌不意，可抢占寨子南角，然后向东门发展，打开寨门，接主攻部队进寨。刘志丹同志立即派传令员找师长杨祺、政委张达志和红一团团民贺晋年等同志，轮番观察，当面指点，要他们组织奋勇突击队，并令义勇军、红二团用二十挺轻机枪，组织火力掩护，其他部队向寨门佯攻。下午两点发起进攻，红一团组织三十七名战士为奋勇突击队，贺晋年为队长。届时冲锋号齐鸣，佯攻北山梁和寨门。贺晋年团长则率奋勇突击队攀登寨南岩峡槽，他第一个先登，其他英雄鱼贯而上。当突击队全攀上岩边，距寨墙还有二、三十公尺时，被敌发现，有几个敌人向我突击队射击，并投手榴弹，接着石块、瓷盆、瓦罐、饭碗各种器皿倾盆而下。我二十挺轻机枪顿时开火，压制着敌人，掩护突击队奋勇攀登进寨。贺晋年团长被敌石块砸中，苏醒后继续指挥突击队攀登，架起人梯，翻过寨墙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突击队的英雄们向寨门战斗前进。敌人将其预备队投入战斗，企图消灭我突击队。我掩护轻机枪延伸射击，用火力的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反冲击。突击队的战士们，虽然人人血汗交流，个个负伤，终于夺占了寨子东门楼，打开寨门，迎进主攻部队。寨子里的民团、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及其家属，拼命顽抗格斗，激战到下午七时，全歼守寨敌人，缴获长短枪二百余支。

六月二十三日，在李家塌村大柳树下，设了临时法庭，刘志丹同志亲自审判被抓到的民团团总唐海燕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头目，宣布判处死刑。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拍手叫好。

此时，安塞县境内的其它岩窑、寨子所据守的地主武装，也被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和陕甘边安塞游击队逐个扫光，全县完全解放。到此，陕甘边和陕北两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只有延安府城、甘泉县城两个据点，尚在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的层层包围之中。

战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休整、补充。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积极性极为高涨，赤卫军、少先队员纷纷赶

到部队要求参军。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已经由白庙岔会师时的二千一百五十余人，发展壮大到四千余人。革命人民群众仍络绎不绝地自动来报名参军，连队指挥员再三劝告编制满员，暂时回去，群众还是硬磨软缠的几天不回家，有的直接找师、团首长和刘志丹同志要求参军，最后，刘志丹同志决定，各师和各军分会，都可以组建少共营，训练新战士和班、排长。

中共西北工委给前总来信说：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旅长高双成又派第五一一团从横山县石湾镇进犯赤源、秀延县，有袭击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后方机关的迹象，要前总派兵来保卫。为此，前总命令红一团团长路文公、政委刘光显率部队去石湾镇以南游击活动，如敌以团的兵力出镇，我军则袭击石湾镇二五六旅旅部，即可保卫我后方机关。

此时，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组建了延安、甘泉围城总指挥部，刘秉温同志任总指挥，李景林同志任政委，统一指挥围城的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

2、前总决心打靖边县城，调步兵二团参加主力兵团作战，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开往青阳岔、卧牛城进行攻城准备。

靖边县城守敌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二团二营，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共四百余人。敌营长曲志鹏狡黠惯战，所辖各连装备虽旧，战斗力较强；还有安定县的外逃民团、靖边县民团、县警队和保安队一百七十余人，共约六百余人。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奔袭靖边县城的参战部队有四个团、抗日义勇军和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共计三千余人。敌我兵力对比一比五，我占优势。靖边县地处榆林和绥德至三边的要道，奔袭不成，形成相峙，必有来自榆林、定边、石湾镇等三方面之一方，或三方面同时来找我主力决战的可能性。为了避免主力部队与敌决战、拼消耗，前总决定奔袭靖边县城。

靖边县城略为正方形，是依山面水的半山城，芦河湾转环城东北



两面，向北流去，西面紧靠长城，西南有座“皇府城”，当地人称旧城，早已荒无人烟。现在的靖边县城当地人称新城，四周城墙高筑，开有东南北三道城门，东北角另开一道水门。城西耸立着一座二百多公尺高的山岭，上筑寨堡，通称西山寨，寨内面积约四百平方公尺，高低不平，寨内有小庙和一些窑洞可住人，西山寨地势高峻，能俯瞰全城，是攻守必争之地。城内正南北、正东西两条大街，在正中心的钟鼓楼相交，从南城楼起，一行排列着钟鼓楼、城隍庙、北城楼等制高点。敌营长曲志鹏把他的分队一部分置在西城外、西山寨脚下，遇有情况，上坡进寨作战；其余兵力分布在北门楼、城隍庙、钟鼓楼、南门楼等制高点和东门、东南城角。东南城角的一段城墙破损，徒步可攀登上城，还没有来得及修筑，其余城墙很难攀登。

根据靖边县城的地形和敌之兵力部署，前总决定：抗日义勇军攻打西山寨；步兵二、三团由东南城角偷袭登城，得手后向钟鼓楼进攻；红三团攻打南城楼；红一团为预备队，兼负阻击可能由宁条梁来援之敌；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布置在楼沟嘴，配合赤卫军，准备阻击横山援敌。规定义勇军打响为作战开始信号，各团不许早开枪，避免过早惊动敌人。

前总按照作战计划部署，各行军纵队都于六月二十八日两点，隐蔽渡过芦河，到达各自的指定位置，编组战斗队形待命，等待抗日义勇军在西山寨打响。因为抗日义勇军的向导带错了路，把皇府城当作西山寨，耽误了时间，没能按时投入战斗。步兵三团团长吴岱峰眼看天将大亮，再晚登城困难，遂命令突击队首先登城，拂晓前攻占了东南城角。在沿城墙向城南楼进攻时，被敌发现，城内顿时枪声四起。此时采用奔袭的方法已不成，遂改变部署，转为强攻。这时，红三团也夺占了南门楼。五时，步兵三团后续部队从东南角突破口进入战斗，一连夺取东门，二、三连向钟鼓楼攻击前进，因地形开阔、不好隐蔽，前进受阻。刘志丹命令红一团于八时也进入战斗，绕到东门突破敌人防御。十一时，夺取敌城隍庙据点，随即分两路，一路向北门进攻，一路向钟鼓楼进攻。钟鼓楼守敌，在步兵三团和红一团的夹攻下，顿

时动摇，步兵三团在机枪掩护下乘势攻击，攻占了钟鼓楼。守城敌人被歼一部，其余之敌退距祖师庙，负隅顽抗。攻打西山寨的抗日义勇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登上西山寨，歼灭了守敌，红一团也攻占了北门城楼。敌营长带了几个残兵逃走，我红一、三团派兵追赶，将曲击毙于途中，缴获了曲的战马，送交前总刘志丹同志。攻打靖边县城的战斗于六月二十八日十二时结束，毙伤俘敌营长以下六百余人，缴长短枪五百五十余支，七五迫击炮两门，六〇迫击炮四门。俘国民党县长、民团总指挥、肃反会主任、警察局长、县党部书记长和一大批土豪劣绅等共一千余人，都交给中共靖边县委和县工农民主政府处理。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五座县城。

此战我军由奔袭转为白昼强攻，所付代价较大，阵亡五十余人，其中包括步兵第三团第一连长魏四儿和抗日义勇军第二大队长王东来等同志，负伤指战员一百零三人。

此战打得英勇顽强，对敌震动很大。保安县城守敌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二团二营长高培（字雨亭）于六月三十日晨五时，仓皇弃城逃窜，保安县金弗坪守敌营长张廷祥于七月一日晚，也率部逃往安边镇，保安县境内，只剩了土围子旦八寨一个敌据点。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六座县城。

占领靖边县城的当日下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撤离靖边县城，经卧牛城、青阳岔，到安定县城和唐家川一带休整补充。召开了庆祝解放六座县城的祝捷大会，刘志丹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创建西北红军后胜利发展的进程。强调指出：在西北红军创建只有五个月，西北主力兵团组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转战八百华里，连续解放了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我们西北红军的力量更加壮大了，根据地更加扩大了。这是我们西北红军指战员学习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刘志丹同志告诫全体指战员，不要骄傲，不要麻痹大意，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还会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刘志丹同志勉励全体指战员，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知识，

再接再厉，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刘志丹同志接着说：全国大多数人民还在受难，东北和华北的父老兄弟姐妹还在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我们要解放全西北，解放全国人民，还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允许外国人奴役我国的任何人，这是咱们红军指战员的天职。现在更要团结努力，争取在咱们这一代人手里，解放全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红军胜利万岁！

**（五）西南线作战的胜利。**红二十六军步兵一、二团、骑兵团和陕甘边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第二、三路游击纵队和各县游击队、抗日义勇军（司令黑志征、政委杨凤歧），在南线、西线和咸榆大路东西两侧以及宜川，韩城、澄县地区作战活跃，骑兵团还一举袭入长武县城，歼灭了守点驻军和民团，处决了国民党县长和县党部书记长，战绩辉煌。拔除了敌军和民团据点五十余处，开辟了大块革命根据地。歼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千余支。新组建了红二十六军步兵第四团，骑兵团也发展到四百余人，战马五百匹左右。组建游击队（包括抗日义勇军）二十余支。各步兵团和游击队发展到近两千人。牵制了国民党三十六师、四十二师、六十一师的全部兵力，并给予有力的打击，在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作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六）北线作战的胜利。**陕北红军独立第三团，陕北红军游击队三、七、十一、二十一支队，府谷骑兵游击队，在中共神府工委领导下，进行土地革命，开辟革命根据地，积极地寻机作战，牵制了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八旅所属各部及地主民团武装“铲共义勇队”等五千余人。我红军游击队歼敌五百余人，缴获各种枪四百余支。致使国民党八十六师丧失机动能力，无法以团级兵力同我红军决战。虽然在战争发展过程中，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严重错误，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积极性一度受挫。但是在神府工委领导下，纠正了错误，恢复了战斗活动，重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斗争积极性，恢复了根据地党、政、军、民的革命活动，坚持斗争，为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

第二次“围剿”，作出了重大贡献。

**（七）红军建设。**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红军队伍，西北军委在各团和游击队里，都配备了军事教练员，边战斗，边提高指战员的战术水平。还组建了红军干部学校，培养红军的基层指挥员。设置了少共营和随军学校，训练战士和班兵，补充红军部队。建立了三个赤少队训练大队，培养不脱产的人民武装指挥员。成立了大小三个被服厂，给红军缝制军服；西北红军的制式军装，规定帽、衣、裤、绑带为浅灰色，帽徽红布质五角星，红布质领章，袖章红布圈宽三市寸。由于部队发展壮大很快，三个缝纫厂赶制都供不应求，常有半数指战员领不到制式服装。开办了三个红军医院。建立了十几个修械厂所，有的可以自造马枪和手榴弹。西北军委和各军分会机关建设逐渐健全，并改善了工作制度。

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工、青、妇人民群众团体等领导机关，在红日照耀着的七月三日，进驻延川县的重镇永坪镇。立即开办了西北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吴岱峰同志任校长，张秀山同志任政委（张秀山同志被诬陷逮捕后，郭洪涛同志兼政委），张文舟同志任教育长，李登瀛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王士英同志任校务长。在永坪镇开始铸造工农民主政府的银币和印刷纸币，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制度。

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自从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成立，到七月五日，只有五个月的时间，领导西北军委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英勇战斗，不怕艰难，不畏强暴。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近五万敌军的第二次“围剿”。歼灭了敌人正规军二千二百余人，民团、地主武装三千余人，缴获各种枪炮五千余门、件；解放了六座县城，创造了陕甘边和陕北连成一片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西北红军在反“围剿”，战斗中发展壮大。到此时已发展到五千人左右，武器装备齐全。

各路游击队和各游击纵队已经发展壮大到四千余人，武器装备有二千五百余件，还有部分指战员使用刀矛。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才能，经过作战训练，进步很快，学会了打游击运动战，并且进行了一些攻坚作战。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支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竖排版二二一页）刘志丹同志亲自指挥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只用了红二十六军步兵二（后期参加）、三团，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的三个团，共二千一百五十余人。所余的红二十六军步兵第一、二、四团，骑兵团、陕北红军独立三团和各地游击队都在原地坚持战斗，有的牵制敌人，有的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因而战胜了敌人，获得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胜利。事实证明，刘志丹同志的军事指挥，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基本原则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刘志丹同志不愧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好学生。

#### 第四、西北代表团的到来和左倾错误对西北红军的干扰

西北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以后，正当高歌凯旋，继续胜利发展之际，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遣了一个以朱理治同志为书记的派驻西北代表团（以下简称西北代表团），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来西北工委、军委和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的延川县永坪镇。

##### （一）西北代表团的左倾错误

朱理治同志一来到陕北，就组成了以他自任书记，有聂洪钧同志

参加的西北代表团，把产业工人出身的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同志批评、攻击的一无是处，撤销了书记职务，派到米西区作区委书记。朱理治自己以代表团书记身份直接领导工委。这是西北代表团所做的第一件事。

西北代表团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夺取西北军委的领导权，朱理治同志自己不懂军事，指定聂洪钧同志接任西北军委主席，夺了刘志丹同志的权力。

西北代表团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所谓调查研究。朱理治同志带着“陕甘边党委和红二十六军主要干部是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反革命的包庇者”的成见，加以刘志丹同志“不攻打绥德县城、瓦窑堡”，“不打通佳、吴根据地和神府根据地的联系”的口实，并且只找郭洪涛同志一个人调查，郭又以《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的观点，给朱理治同志“反映了一些不真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朱理治同志偏听偏信，带着成见把这些错误的观点和材料，作为以后进行肃反扩大化的主要依据。竟认为刘志丹同志在政治上不可靠。

朱理治同志利用西北代表团书记和领导西北工委的职权，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主持召开了西北工委永坪镇执委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永坪镇扩大会）。在会上，朱理治同志亲自传达了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三日《中央驻北方代表致陕北特委的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甘边特委及全体同志的信》；一九三五年五月十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北、陕甘边特委指示信》；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驻北方代表五月份机密指示》。这五封指示信，对西北革命斗争情况了解极少，含有严重的左倾错误观点，它要求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展所谓反右倾取消主义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北方代表和朱理治同志传达“指示信的目的，是先进行思想理论斗争，以便孤立右派，以后再肃反”。

朱理治主持的永坪镇扩大会，根本没有召集西北工委在前方打仗

的和在陕甘边工作的执委委员，更没有召集在前方打仗的西北军委委员来参加。永坪镇扩大会开的时间很长，几乎是朱理治一个人讲话，他除了宣读上述五封指示信外，又增加了他自己的一些华而不实的错误言论。朱理治同志还自编自演地通过了《中共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文中围绕西北党内必须“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一中心问题，对西北的形势及党的任务，做了极左的估计和规定。

《决议案》中错误地估计“两条道路——苏维埃与殖民地——的决斗同样在西南尖锐地表现出来”，因此要“西北党的共同努力”，“迅速创造一块包括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此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已退出根据地了）的革命根据地，并打通新疆和内蒙古国际路线。”“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

朱理治和聂洪钧同志自编自演地通过了《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决议》极其错误地认为西北红军“陷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毫无根据的指责原西北军委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没有普遍地发动广大的群众进行革命战争。在某些地方允许组织清乡会，和敌人和平苟安地进行妥协；在敌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战略上的退却逃跑，以及执行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革命的开展；没有充分开展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完全忽视地方暴动的配合；没有定军事计划，既经决定计划之后，军事行动迟缓，不得迅速执行”等等。他们下马伊始，就对以刘志丹同志为主席的原西北军委作了许多诬蔑和攻击。这又导致了对西北红军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的指导和不切实际的任务要求，《决议》要西北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运用红军的基本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的进攻敌人”，“要夺取中心城镇”（指绥德县城、清涧县城和瓦窑堡），“不让敌人践踏苏区的一寸土地”。在战略发展方向上，更是毫无根据，连地图都没有读懂，无重点地提出，既要“争取神府和吴绥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又要“以马栏做中心，向同官、富平、耀县、泾阳发展，坚决执行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与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部队取得呼应，同时还要“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合发展，恢复已失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

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富等地的白区”。总之，要“争取这次战役的全线胜利，巩固发展陕甘基本苏区，创造新苏区与新游击区，联系陕南与川陕苏区为一片”（此时张国焘已经撤出川陕苏区了）。更荒唐地提出，以洛川（当时是敌驻守的据点）为中心，向宁夏、定边、安边、靖边、（县城已经解放）发展。这是极左的四面出击的纲领。

实际上，在朱理治、聂洪钧同志编演《决议》时，敌人已经在部署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了。但是，永坪镇扩大会议，对国民党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的军事态势没有分析研究；对红军主力兵团如何使用，也没有措施。

## （二）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的兵力部署

一九三五年四月，蒋介石在西北设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剿总”），进行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和堵截红军北上的军事部署。东面沿黄河一线，为晋军正太护路军孙楚部的三个旅和七十一师李生达的两个旅；北面仍有八十四师和八十六师的四个旅，长城外还有傅作义的一个骑兵师；西北面的宁、陕交界一线有第十五路军马鸿逵部的三个骑兵团；西南面有东北军五十七军董英斌部的五个师，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的三个骑兵师与另一个骑兵团，还有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一〇五旅；南面的洛川、甘泉、富县以至延安府城为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四个师和原来的四十二师与六十一师；兰州、平凉地区还有蒋嫡系三十七军毛炳文，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等部。蒋介石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合计为十五万左右。为了统一指挥，便于利用地方军，杂牌军打红军，蒋介石自任西北“剿总”的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蒋介石严令各军边部署边进攻，从四面八方方向心进攻夹击，妄图赶在我中央红军到达西北之前，全歼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彻底摧毁西北革命根据地。

在这样的强敌面前，西北代表团无动于衷，且专心致志地策划在西北党内、西北红军内进行肃反，结果冤狱大兴，造成了西北红军内部的严重危机。此时，光明磊落的刘志丹同志胸怀坦然，把自己的精



力放在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上，全力以赴地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前线对敌作战。

刘志丹同志为捕捉战机，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七月十日东进到绥德小理河川三皇峁地区，红二十七军二团归还建制，部队隐蔽待敌。十二日，敌四四九团第一营的一个连，离开碉堡寨子到王家沟侦察抢夺，同我遭遇。敌一发现我军，立即退上三皇峁制高点的柳树圪塔，在寨内营部和机炮连的掩护下顽抗。我红军主力兵团即从西、南两侧向柳树圪塔和三皇峁寨进攻。激战至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军占领柳树圪塔制高点，毙伤敌七十余人，缴枪三十余支。当我准备对三皇峁寨进攻时，因敌八十四师骑兵团张廷芝偷袭我军侧后，我军立即撤离战场，转移到秀延县的蛇沟一带，隐蔽待机。

七月十七日，前总获悉敌五〇一团一营和五〇二团三营及张廷芝骑兵团，由清涧县老君殿镇出发，到高家塌地区抢粮掳柴。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配合下，给敌以迎头痛击，敌逃匿囿山寨。红军在追击中歼敌一个营，毙伤俘敌二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轻机枪十八挺。

### **（三）刘志丹同志反对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措施，遭到西北代表团的干扰**

前总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七月二十一日集结于杨家园、湫峪沟一带，准备修整数日，总结经验后再战。刘志丹同志得悉蒋介石国民党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新部署后，立即召集团以上的军政指挥员介绍敌情，研究战略战术计划。他分析当时敌人要调动那么大的兵力，一定会受到交通不便，运输工具不足的限制，会发生粮秣供应的困难；各个军阀之间都有保存实力、地盘，不为尔先之虑；敌军各线“围剿”行动不能完全协同一致，会产生调动部队与兵力展开的时间先后不齐等弱点。于是，前总决定：集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乘敌之隙，各个击破，积小胜为大胜，以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计划在敌人部署未完成以前，首先打击伸入我东线根据地的晋军先头部

队；后打南线孤军深入我根据地、立足未稳之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为了配合红军主力兵团作战，要求各地赤卫军、少先队、游击纵队、独立营、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到敌后方去，开辟根据地，袭击敌军用物资运输队和粮、弹堆集转运站，牵制敌人。命令红二十六军步兵第一团和骑兵团仍在洛河以南和咸榆大路东西两侧根据地坚持斗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和迟滞南线敌人的行动。上述作战计划，用前总职衔，由刘志丹同志签发至各作战单位执行，并上报西北军委。

### 1、消灭慕家原之敌，反对敌第三次“围剿”的第一仗。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八月一日，在清涧县的袁家沟、花岩市一带集结，编组精干部队，由刘志丹同志亲自率领北上，秘密插到吴堡县的宋家坡地区。与此同时，前总已经部署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和当地的赤卫军、少先队把定仙塬镇及其周围的敌人据点包围起来。吴堡县的革命群众知悉刘志丹同志带领红军主力兵团到来，欢欣若狂，痛斥敌人暴行，纷纷要求尽快出战，献计献策，军民斗志昂扬，求战心切，前总决定首先歼灭慕家原守据点之敌。

慕家原守敌晋军二〇六旅四一二团的一个连，与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之敌同属四一二团建制，击其一点，敌必三面来援。前总指挥红一团强攻慕家原敌寨碉堡，其余部队分别伏击三路来援之敌。八月十日凌晨开始作战，偷袭未成，第二天强攻，令步兵三团参加作战，经过一场反复争夺的苦战，团长王世泰同志负重伤，最后歼灭了慕家原守敌一个连。十二日晨，又歼灭了由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来援的敌一个营另两个连，合计歼敌六个连六百余人，缴获长短枪近六百件。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首战告捷，军民同庆，奔走相告，振奋人心。敌人遭受突然袭击，惊魂不定，误认为刘志丹要率主力兵团北上神府地区，急忙在黄河两岸增兵，加强防御，时刻准备应战。

前总当即决定：利用敌人的错觉，贴标语散传单，扬言北上打通佳、吴、神、府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实则秘密回戈南下，寻机再战。行军到绥德县属的义尚坪，接到朱理治和郭洪涛同志以西北工委的名

义写来的指示信：命令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向北发展，转攻深沟高垒之敌八十六师二五八旅，打通佳、吴、神、府革命根据地的联系；还要护送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霍维德同志带的一批党政干部，到神、府革命根据地去工作。

前总于八月十三日即进行研究，认为敌人错误判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北上，已有阻击我北上的准备，在三百余华里的筑碉扎寨地区行军作战，虽然能打上去，但是我军要付出极大的伤亡。敌人如发现我主力兵团北上神、府地区，瓦窑堡之敌五〇〇团或清涧县城之敌二五一旅就可能乘机奔袭永坪镇，致使我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机关受威胁或造成损失；丢开冒进、且战斗力不强之晋军不打，不依托中心根据地，远途转战筑垒坚固、战斗力强的敌八十六师，这是弃易就难的失算。前总据此决定：暂不执行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工委的这一指示；说明道理，请霍副主席带领党、政干部暂回永坪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继续南下，寻机打击晋军；并给中共神府特委写信，通报南面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胜利，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第一仗的胜利，鼓励神府地区革命根据地积极向南发展，坚持与敌人战斗，夺取胜利，不要消极等待。刘志丹同志完成这些部署后，继续南下，沿途与敌八十六师五二团三营遭遇，我步兵三团将其打垮，到绥德县城东新庄一带待机。

## 2、定仙塬围城打援，反对敌第三次“围剿”的第二仗。

定仙塬守敌晋军二〇六旅四一二团的一个营，被我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围困的连水都喝不上，粮食、烧柴也很困难。敌营长史泽波，日日夜夜叫苦连天，央求派兵来援或接他们撤出重围。

前总获悉定仙塬敌情，决心围城打援。于是，加紧围困定仙塬，令步兵二团之一部也参加围困定仙塬各山寨，并由二团政委胡彦英负责指挥围寨的游击队和赤卫军、少先队，缩小包围圈，断绝敌人的一切饮水渠道（因敌人都驻扎在山寨上），用火力封锁，不准敌出寨抢粮抢柴。步兵二团团团长孔令甫带领主力在王家新庄东北构筑工事，抗

击来援之敌，不许敌接近定仙塬；西北抗日义勇军和步兵三团配置在王家塬、老舍窟圪塔一带高地，隐蔽待命，闻信号出击；红一团、二团分别配置在马家塬、井尔塬、刘家洼、寨沟等地，闻信号出击；派陕北游击队第二、五纵队的第五支队向枣林坪方向侦察警戒，随时报告敌情。我军安排已定，专待敌军来援。

果然，晋军正太护路军第三旅旅长马延寿带第六团从军渡过黄河，沿西岸而下，宿营枣林坪。八月二十日八时许，敌自枣林坪（距定仙塬三十华里）出发，沿尽绊拦沟及其东山梁，向定仙塬开进，行进至石塬圪塔山腰，已是十一时，我步兵二团依托工事，堵住了敌人的前进道路。西北抗日义勇军和步兵三团闻枪声立即自石格溜嘴向敌行军纵队侧击。敌第六团集中全团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猛攻我步兵二团阵地，企图向定仙塬靠拢。前总命令红一团投入战斗，该团首先用一个连迂回截击敌后，不许其后逃，随即使用团主力和奋勇突击队猛扑敌阵，大胆穿插，打乱了敌前卫营的建制，迫使敌人失去指挥能力。红二团也自邢家山、后冯家山以南向敌进攻。晋军在我三面分割合围中全线崩溃，狼狈逃散，我红军主力兵团将敌全部压入尽绊拦沟内十余华里的沟道内。红军战士、赤卫军、少先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一起下沟捉敌，到场者人人都有缴获。激战到十四时，除个别敌人化装逃跑外，全部被歼。战后统计，毙伤敌副团长齐汝英以下二百余人，俘敌一千八百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六门，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五十四挺，长短枪一千九百余支，骡马八十余匹及其它军用物资一部。

定仙塬围城打援，是西北红军反第三次“围剿”的第二仗，创造了西北红军第一次歼灭敌人一个整团的作战记录。战术上是成功的，指挥上灵活机动，发扬了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勇猛冲锋的战斗作风，时间短、伤亡小、战果大。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和革命群众互相配合作战，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战后，晋军除留一部分兵力收缩在宋家川到枣林坪和石堆山到绥德三十里铺的两条碉堡线内，其它主力部队全部撤回黄河东岸。红军游击队收复了佳、吴、绥地区大块革命根据地，解放了几十个村寨的

人民。

至此，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实力大大增强，为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围剿”的主力东北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 3、文安驿会议，朱理治出难题。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按照刘志丹同志的作战计划，向南运动，准备接近南线的东北军，寻机作战。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行军到延川县的文安驿、禹居镇一带，休整数日，将历次作战缴获的八二迫击炮，分别编制给步兵三团、红一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各一个连，给部队进行短期的战术、技术训练和新兵器操练。做好去南线作战的准备工作。

鉴于中共西北工委永坪镇扩大会议时，在前方作战的执行委员和军委委员们都没参加。因此，刘志丹同志邀请西北代表团朱治理同志和西北工委秘书长郭洪涛同志来到文安驿，于八月二十七日传达永坪镇扩大会议的决议。朱治理同志把一九三四年七月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的五封指示信，以及永坪镇扩大会议的两个决议案，集中一块儿传达，讲用了三个半天的时间，讲给连以上党员军政指挥员听。朱理治传达后，立即勒令听传达的军政指挥员“以如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为中心，讨论两天”，并将随身带来的巡视组，派到部队检查讨论情况。在讨论中，对朱治理传达中提出的问题很多，广大军政指挥员都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因此，提出了一些疑难问题。朱理治同志对所提出的问题不但不作解释，反而诬认为这是“右倾取消主义者布置挑拨的阴谋”。

文安驿会议上，在讨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步作战行动中，朱理治同志要求“运用红军的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地进攻敌人”，要夺取绥德县城、延安县城、清涧县城、瓦窑堡等“中心城镇”，首先是夺取瓦窑堡。这种错误的作战行动，遭到刘志丹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刘志丹等同志认为，西北红军的装备条件，还不能担负以攻坚战来夺取中心城镇的任务；对于瓦窑堡等中心城镇

之敌，只能利用敌处在我根据地红色农村层层包围之中的优势，使用游击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以及非武装的革命群众，采取长围久困的战术，分化瓦解的策略，相机夺取，而绝不能用强攻硬打的战术。面对十几万敌人的进攻“围剿”，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只能去南线，对立定未稳的东北军寻机打击，宣传抗日反蒋，收复东北失地的道理，来分化瓦解敌人，开展人民游击战争，不断地歼灭敌人的班、排、连（营）分队，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团级部队，集小胜为大胜，夺取南线的胜利，其它方面的敌人也就不敢长驱直进了。这些符合客观军事形势的真知灼见，经再三讨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军政指挥员都认为是对的。朱理治同志却固执己见，最后运用西北代表团书记领导西北工委的权力，决定先强攻瓦窑堡或清涧县城，置南线之敌予不顾。

文安驿会议后，新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同志，立即在永坪镇召见西北军委参谋部的侦察情报科长高朗亭，当面交待：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要打清涧县城和瓦窑堡，令你带一个骑兵侦察排，到九里山警戒侦察，发现晋军二〇六旅或敌八十四师二五二旅（旅部在绥德田庄）增援清涧、瓦窑堡之敌，立即报告前总和军委；动用绥德城内、老君殿、田庄的地下情报网，时刻观察敌人动静，发现了敌人的行动迹象，立即传出来报告前总、军委。他要我立即整装出发，暂时保密，战斗打响后才能公开。我遵令而行。

在这种情况下，前总刘志丹同志只得先派步兵三团团团长黄罗斌（兼政委）、副团长王富贵，带领全团到南线侦察敌情，牵制迷惑敌人，在咸榆大路西侧寻机歼灭东北军分队的作战，摸索东北军的战术规律和技术装备性能，积累资料，随时报告前总。

同时，命令红军主力兵团沿永坪川、青平川两路向瓦窑堡城郊外围开进。刘志丹同志带领主力兵团的团以上指挥员，于九月三日赶到瓦窑堡郊外的黑山梁和米粮山西南高地，勘察地形，看到敌人在瓦窑堡城郊构筑了大量的工事，城墙内外碉堡林立，山寨相连，个个都能构成互相支援的火力网，密无死角。城外寨外都有梅花陷坑相套，接连成梅花套环，围绕城寨。梅花套环宽约三、五十公尺不等。每个梅

花坑直径三至五米，坑底栽立着锋利的枣、竹尖桩和部分金属刺数十枚。全部梅花陷坑，又都在碉堡的各种火力控制之下。刘志丹同志观察后，愤慨地说：“敌人这样的据点，依我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完也无济于事，咱们都要作历史的罪人！”随即征求一同勘察的各指挥员的意见，何怎样打法？兵力、怎样部署？使用什么器材？各团指挥员异口同声地说：西北代表团规定这样的硬性任务，会把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毁灭掉，会把全军指挥员白白地伤亡完，这个任务不能执行。刘志丹同志说，我看也不能打，还是要另寻战机。

刘志丹同志下山来到前总营地郝家川，召集各团军政指挥员们共同研究。鉴于清涧县城的敌人更多，防御工事更强，地形更险要，更不能硬打强攻。于是对西北代表硬要我们先打北线之敌怎么办？议论纷纷。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总指挥曹动之同志提出建议说，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发展到横山县周围十华里左右的各村庄，据侦察确悉，横山县城险要，但工事简略，只有敌八十六师骑兵第三营驻守，防御不严，我们可以在巩固的根据地鲁家河一带集结准备，三个钟头就能走到城根底。众人议论了一番，刘志丹同志最后决定：奔袭横山县城。如果乘敌不备得手后，石湾镇之守敌二五六旅高双成及其五一团可能不战自退，米西根据地即可扩大到无定河上游的南岸，从而进一步巩固我后方；还可以牵制敌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对神府根据地的压力，有利于我集中力量打击南线的东北军。与会各军政指挥员都同意此决定。

#### （四）奔袭横山县城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九月九日到达横山县鲁家河一带集结，进行攻城准备。具体部署：红一团由城西北架梯登城；步兵二团及第三游击纵队由城东架梯登城；西北抗日义勇军攻占南山制高点；红二团攻占城西娘娘庙；红三团开到斩贼关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向波罗镇、榆林方向警戒侦察，准备阻击来援之敌。一切准备就绪，九月十一日晨三时，各部队同时登城。届时登城，因我准备的云梯短了一点，且是独竹杆套接而成，攀上人多，把竹杆压弯反转，战士们即掉了下来，

反复几次，被敌人发觉。偷袭不成，转为强攻。经过激战，城外各制高点、要点及南关都已攻占，仍未攻入城内，激战到下午，前总鉴于部队伤亡太多，指挥部队主动撤出战斗。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深入北线奔袭横山县城，完全出敌意料之外。敌八十六师为了巩固其重要防地，只得再次收缩兵力，还抽调了“围剿”我神府革命根据地的二五八旅的部分兵力，加强横山地区和镇川堡、武家坡的防御，减轻了我独立三团和神府地区各游击队的压力。奔袭横山县城战斗，虽因技术上的缺点，失去突然性，攻城未克，还是达到了打击北线敌人，巩固革命根据地后方的战略目的。这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反对敌人第三次“围剿”所打的第三仗。

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反对敌人第三次“围剿”所打的第三仗，除奔袭横山县城不克外，其余全是以少的伤亡，赢得较大的胜利，人力物力补充齐整，连队满员。主力兵团扩大到五千余人，武器装备大为改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游击队也已发展到近五千人，有枪支武器近四千件。西北军委机关组建了一百人左右的步兵侦察连和八十人左右的骑兵侦察连，还组建了一个五百余人的少共营。

西北红军从总的发展历程来看，建军方面是符合古田会议要求的，作战指挥上是符合毛泽东同志关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竖排版第九八四页）的正确反“围剿”作战方针的，在创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方面，也是符合毛泽东同志人民游击战争指导思想的。

## **第五、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西北代表团**

### **召开永坪镇联席会议，搞肃反扩大化**

#### **（一）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三日，西北军委前线总指挥刘志丹同志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秀延县的七里沟、玉家湾、黄家川一带宿营，接到西北工委指示，要前总立即带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回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对兄弟红军的到来，刘志丹同志亲笔写出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在玉家湾召开了军叙指挥员会议，领讨论欢迎事宜。动员全军指战员虚心学习二十五军好的建军、作战经验，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增强与红二十五军的团结，密切协同红二十五军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

经过艰苦转战的红二十五军，胜利地经甘肃庆阳的赤城、合水县，越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的豹子川，于九月九日到达永宁山，与地方党组织接上了头。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兼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同志，知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后，立即报告西北工委，并召开会议组织动员干部群众欢迎慰劳红二十五军。习仲勋、刘景范同志亲自带着保卫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的来路迎接红二十五军，西北工委发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支部的紧急通知》。因此，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受到各地军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连红二十五军路经下寺湾、王家坪时，群众奔走相告，人如潮涌，川流不息。群众杀猪宰羊、送黄米、磨面粉，热情慰劳红二十五军战士，有如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

红二十五军于九月十五日胜利地到达永坪镇，受到西北党、政、军机关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夹道欢迎，热情的慰问，并召开了欢迎大会。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也于九月十六日回到永坪镇。两军永坪镇会师，标志着西北革命力量的大会师，预示着陕北革命面临着更大规模蓬勃发展的形势。为了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前总随即组织团以上军政干部去红二十五军慰劳和参观访问，学习他们的建军、作战经验。会见时，两军指挥员之间的兄弟友谊和阶级感情，十分融洽，开怀畅谈，亲如一家。同时，前总把西北军委直属的少共营五百余人，交给红二十五军补充部队。

## （二）永坪镇联席会议

朱理治同志凭借西北代表团书记领导西北工委的职权，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鄂豫陕省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以下简称永坪镇联席会议）。朱理治同志在会上发言，除表示对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欢迎致意外，又重复了文安驿会议上讲的那一套，联系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没有打清涧县城和瓦窑堡，奔袭横山县城亦未克等事实，把惠子俊同志为书记的原西北工委和刘志丹同志为主席的原西北军委与前总，说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归根结蒂一句话：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前总都要改组，要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要进行肃清右派反革命的肃反运动等等。在两军会师之初，那些刚从远方来的战友不明真相，难以判断是非。朱理治同志则利用职权，以大帽子压人，使得联席会议只能一边倒，只能和朱理治同一个口径讲话，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容不得丝毫答辩。这次会议，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这次会议上，扩大了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仍任书记，聂洪钧，仍兼西北军委主席，增补了程子华同志，由三位同志组成西北代表团；撤销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组建中国共产党陕甘晋省委员会，朱理治自兼书记，副书记郭洪涛，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郭述申，政治保卫局长戴纪英；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仍兼军委主席，原来的委员一位也没有留，也没有设副主席，新的委员是些谁？因为保密，西北军委机关的科长们都不知道，撤销了参谋部长朱子休的职务，戴纪英兼任西北军委参谋长，原西北工委宣传部长张秀山改任供给部长，政委张贤才。撤销了医院院长李向富的职务，吴子南任院长；委派王文良为侦察情报科政委。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以下简称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程子华兼政委，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十五军团所辖三个师：红二十五军编成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后叛变），政委赵林波（后叛变）；红二十六军编成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后脱离革命）；红二十七军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全军团共七千余

人。

永坪镇联席会议后，朱理治和郭洪涛同志还分别在党的刊物《西北斗争》上发表文章，号召“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与调和主义的残酷斗争”，还“必须把斗争深入到全体党员中去”，以便“使任何一方面的工作”，都能依照西北工委七月十五日《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和《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以及九月十七日永坪镇联席会议的决定来进行。因此永坪镇联席会议后，西北代表团专门研究了所谓肃清右派的问题。确定进行肃反，并认定“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即当时的七十八师）”，从而使肃反扩大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晋省委发出指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动员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工作”。在永坪镇立即把张庆孚同志诬定为叛徒，逮捕起来；把蔡子伟同志诬定为右派反革命分子，抓起来；进瓦窑堡后被诬逮捕的还有张秀山、高朗亭、贺笑晓、刘汉武等同志，朱子休及其夫人段秀珍、黄子文、张文华；真的右派反革命分子李西平（一九三六年元月判死利）、姜绪等人。在逼供中，只相信李西平等人的口供，不相信同志们的革命斗争事实。并在审讯中带着成见诱供，使肃反扩大化很快地波及到前方和陕甘边。

永坪镇联席会议，讨论了很多重大问题。但会只开了一昼夜就仓卒结束了，使很多想发言的同志失掉了讲话的机会。

召开了永坪镇联席会议后，九月十八日在永坪镇石油矿广场召开了万人联欢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刀枪林立，歌声嘹亮，口号震天。徐海东和刘志丹同志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西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两支红军亲密团结，互相学习，并肩战斗，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为消灭更多的敌人而英勇战斗。联欢大会上，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宣布成立十五军团，公布了军团领导人和所辖各师番号及首长名单。

联欢大会以后，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下指令，将红军七十八师和红八十一师的轻机枪全部调出（朱自己说西北红军不会使用），把连以下指战员的自来得枪（驳壳枪）全部调出，说是十五军团要新成立手枪团，并给红七十八师和红八十一师团以上（含团）的指挥机关都派宣传员督战督训，这是笔者亲自听朱理治同志讲的。

十五军团开会，西北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参加，讨论当前的作战行动时，高岗提出建议：十五军团再次强攻横山县城，然后打米脂、绥德、清涧，进一步向北发展，与神府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革命根据地。这种错误建议遭到反对，刘志丹同志仍坚持主攻方向是南线，应打击敌六十七军。他指出，该军长王以哲率军部直属队和一一〇师何立中部、一二九师周福成部（欠一个团），于九月十五日进驻延安城，一〇七师刘翰东部、一一七师吴克仁部和一二九师的一个团留驻洛川、富县、交道、榆林桥之线。该敌立足未稳，战线拉得很长，便于我寻找战机。若我军佯攻甘泉县城，敌必由延安来援，延安到甘泉九十华里，其间七十华里内的村庄都组织了农会、赤卫军、少先队，建立了革命政权。我军团主力设伏于大小劳山和东西山的森林灌木丛中，便于隐蔽，可出其不意伏击敌人。由于与会者都同意刘志丹同志的建议，故决定南下先打六十七军。上述会议情况，是我在六十年代前期访问程子华、朱理治和聂洪钧同志所悉。

### （三）劳山之战

红十五军团的兵力部署：八十一师师部驻关家沟，令二四三团包围佯攻甘泉县城，二四一团在距甘泉县城十五华里的白驼铺村及其东山上设伏构筑工事，阻堵敌人的行军纵队，不许敌人接近甘泉城，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顶住。红七十八师各步兵团在大小劳山西山一带隐蔽设伏，打响后全力以赴把敌人压回大小劳山村沟道内，骑兵团埋伏在土黄沟里，打响后乘马出击大小劳山，冲杀敌指挥所和重兵器阵地；红七十五师在大劳山北边东西山隐蔽埋伏，堵截敌人逃回延安的退路（大劳山距延安六十华里，距甘泉城三十华里）。从延安南十里铺，到甘泉城北十华里的张庄，全是革命根据地，延安城和甘泉城在一九

三五年五月就被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包围，敌人运粮和柴煤都要营级兵力保护。因此，消息封锁得很好，敌一一〇师刚出延安城，我们就知道其每小时的进程。敌人对我军的埋伏（已两三天）毫无所知，所以我明敌暗，这是劳山之战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部于十月一日晨，从延安出发增援甘泉城。当天十四时许，前卫营到达白驼铺北边，师本队也行至大小劳山。我二四一团，放过敌尖兵，当敌前卫营本队到村边时，就开了枪。这也是对敌行军纵队发起总进攻的信号枪。顿时，我军伏兵四起，冲向敌人行军纵队。敌人训练有素，装备良好，轻重机枪、迫击炮多，还有几门山炮，指挥战术灵敏，立即占领公路两侧有利高地，就地顽抗，有时还组织进攻，强夺我已占山头。我七十八师和八十一师就靠步枪、手榴弹和连以上指挥员的自来得枪，同敌死打硬拼，反复争夺，浴血奋战。红七十五师也从大劳山北边东西两山冲下，切断了敌人逃回延安城的退路。打响后两小时，我骑兵团从土黄沟冲出交战，从大劳山镇冲入敌师部，北冲南杀于大小劳山，冲乱了敌人的指挥机构和重兵器射击阵地。此时，我步兵各团也将敌压下沟道，浴血激战至十八时，终于聚而歼之。此战歼敌一一〇师师直全部，六二八团、六二九团一个营全部。六三〇团由三十里铺逃回延安，王以哲下令不准进城，驻扎在延安东关。此战毙敌师长何立中以下千余人，伤敌近两千人，俘敌四千余人，缴获七五山炮四门，八二迫击炮二十四门，重机枪二十四挺，轻机枪一百八十挺左右，长短枪五千支左右，无线电台四部，军用物资一部。

此战红七十八师和红八十一师伤亡最大。以二四一团为例，阵亡指战员一百〇五名，伤指战员二百余人，这是该团建团以来伤亡最多的一次。以担任主攻的二三二团（原步兵三团）为例，阵亡副团长王富贵等指战员百余人，伤二百余人。作战中红十五军团的英雄健儿，人人奋勇战斗，前赴后继，不怕苦不怕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同志也亲临八十一师阵地观察指挥，他的警卫员阎应娃同志，就是阵亡在八十一师阵地上的。根本不存在谁贪生怕死，畏缩不前的问题。

战后清查战利品时，发现敌“西北剿总”电令：“空军航悉‘赤匪’毛泽东、周恩来带五千余人到甘肃通渭、静宁地区，企图窜入陕甘‘匪’区。命令骑兵二军何柱国、五十七军于学忠、三十五师马鸿宾、三十七军毛炳文等立即率部将毛、周聚歼于通渭、静宁地区。命令五十七军董英斌、六十七军王以哲、正太护路军孙楚等立即率部聚歼刘志丹、徐海东‘匪’部，不准与毛、周靠拢。”在前方的西北军军委主席聂洪钧和十五军团首长研究此情，一致认为敌我情况属实可靠。刘志丹同志建议：我十五军团打出庆环、镇原地区，牵制敌人兵力，迎接中央红军来西北革命根据地。与会者意见不一致，写报告请示西北代表团。朱理治同志接到报告，找在瓦窑堡的程子华、郭洪涛同志商量，程子华同志建议：如果十五军团打出去不回来，就有失掉根据地的危险，十五军团南进，打富县、洛川之敌，在革命根据地内大量的歼灭敌人，也能起到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的作用。朱理治和郭洪涛同志都同意，并由程子华同志去前方解决。这是笔者六十年代前期走访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同志处知道的，最近又征求郭洪涛同志的意见校正过了。

劳山之战，对敌人震动很大。驻守在瓦窑堡之敌八十四师五〇〇团于十月二日夜，弃城逃往绥德县城，我独立四团团团长谢绍安率部和围城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奋勇尾追、堵截，歼敌一个连，俘获赤源、秀延、延川、延安等县的逃亡地主劣绅恶霸二百余人。到此原安定县的敌人据点全部拔除，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全县解放的第四个县。晋军孙楚，敌八十四师、八十六师都紧守据点，不敢妄动。为我红十五军团在南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西北代表团、中央陕甘晋省委员会、西北军委、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由永坪镇迁驻瓦窑堡，组建瓦窑堡市党政机关，崔田夫同志兼任市委书记和市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 （四）西北代表团进一步地搞肃反扩大化

西北代表团指示陕甘晋省政治保卫局在永坪镇逮捕了张庆孚、蔡

子伟、贺笑晓、张文华等同志和李西平、姜绪等人。使用残酷的肉刑，指名逼供，无限地扩大、陷害好同志。后方指名逼供的名单送前方，前方指名逼供的名单送后方。逮捕、杀害面越来越大。

劳山之战后两天，就无中生有地诬蔑红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三营李营长“贪生怕死，畏缩不前”，要“立即枪毙”。经该团政委李宗贵极力分辩，说明情况，才得幸免，但仍被迫改作地方工作。还无中生有地诬蔑红七十八师二三四团于振西营长是右派反革命，调到军团部，结果被朱仰熹残酷肉刑后活埋了。

十二月二日，接到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同志写给十五军团副军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同志的信，通知刘志丹作北线总指挥，领导独立四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三纵队作战，向无定河北岸发展根据地，与神木、府谷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这完全是骗局，其本意是把刘志丹调离红军主力兵团，交给他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工作任务，好为欲加之罪，多一份证词。刘志丹同志看的明白，知道是为什么。他只带两个乘马警卫员，于十月四日告辞徐海东、郭述申诸战友，三人三骑直奔北线。

刘志丹同志途经安塞的真武洞时，遇到西北军委的两位骑兵侦查员将送给军团部的一封信，当面交给刘志丹同志。拆封一看，原来是逮捕刘志丹和红七十八师营以上军政指挥员，以及陕甘边党、政、军县以上干部的名单。刘志丹同志顾全大局，以党内和兄弟部队的团结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不动声色地封好信，令侦察员送到军团部去，自己立即策马扬鞭，星夜兼程，奔赴瓦窑堡。他本想找西北代表团当面申诉，表明自己愿意就捕受审，但为了消灭敌人，夺取反第三次“围剿”的胜利，不要逮捕七十八师和陕甘边的诸同志。说明他们都是好同志，绝不会是反革命，希望西北代表团不要轻信右派反革命分子的陷害和肉刑逼出的口供，要相信这些好同志的革命斗争事实。谁知道刘志丹同志刚到西北军委，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就被西北代表团叫去，不容分说地秘密关押在政治保卫局。傍晚时，那个政治保卫局长兼参谋长的戴季英派人到西北军委传令，“刘副军团长要

到北线去指挥作战，让警卫员赶快去备马准备”。就这样连警卫员一起被关押审讯。在洛河川，依然逮捕了杨森、习仲勋、刘景范、黄罗斌、王据德、马文瑞等数百位好同志。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朱理治等人，在审讯中无视刘志丹同志的赤胆忠心，大义凛然的革命行动，反诬刘志丹同志“看了逮捕名单而不逃跑，是以狡猾的手段，骗取党对他的信任。”更可恶的是，西北代表团成员及其保卫机关竟然诬蔑刘志丹同志“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整营整团地歼灭敌人，解放六座县城，纯属反革命欺骗党和群众耍的花招。”这真是古今中外、荒谬绝伦的奇怪逻辑。刘志丹同志及数百名军政指挥员和党政干部蒙受着不白之冤，带上手铐脚镣，在牢狱里遭肉刑拷打，受尽百般折磨。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党内残酷斗争的事实，眼看着在洛河川活埋二百余位同志，现又在瓦窑堡的汇川通后院挖好了活埋人的大坑。

#### （五）强攻套通镇土围子

十月四日，红八十一师参谋长任浪花同志被抓去受审，五日命令郭述申同志率领八十一师，由关家沟、雷家沟、高家哨一带出发，急行军赶到富县套通塬上。部队没有来得及吃饭休息，敌情不明，地形没有勘察，没有做任何战前准备，就被命令强攻套通镇土围子。套通镇周围是平原开阔地，秋庄稼刚收割完毕，毫无隐蔽接敌条件。接火后，二四三团伤亡很大，团长李仲英同志也负伤。师部无可奈何又命令二四一团政委李宗贵同志（团长刘明山在劳山之战中被诬陷撤职）带队投入战斗，付出了很大的伤亡，才攻到距敌土围子二、三百公尺的开阔地坪上，李宗贵也负伤昏绝在阵地上，经警卫员白锋同志背下战场，才抢救脱险，反复进攻，屡攻不下，这才被迫撤出战斗。红八十一师在这场无准备的战斗中伤亡比劳山战役要大一倍多，新任师参谋长路文昌同志也负伤。实际上，是为了逮捕刘志丹同志，为了逮捕红七十八师营以上军政指挥员，为了逮捕陕甘边县以上的革命干部，才把红八十一师拉开去打这场毫无意义，徒增伤亡的消耗仗。

#### （六）强攻榆林桥敌据点



榆林桥位于洛河左岸，距甘泉城六十华里、富县城三十华里。洛河川道宽约两千公尺，洛河水面宽一百公尺，水深一公尺，西东流向偏南。榆林桥镇有旧城墙，东西两道城门楼，东北军占为据点后加固了城墙工事，南北两山和城外要点均筑有碉堡。守敌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〇七师三二〇团的一个加强营。我十五军团的部署：红七十五师攻北山碉堡，地形容容易接敌，定为主攻方向，首先发起进攻；红七十八师由南山横过川道，渡洛河穿越河岸开阔地，接敌难，有旧城墙和加筑的工事，要攻碉登城；红八十一师为预备队。十月十二日拂晓发起进攻，主攻方向红七十五师反复冲杀，敌人凭工事碉堡火力防守，进攻受挫，伤亡很大。徐海东同志命令预备队红八十一师顺洛河左岸开阔川道向榆林桥城门及其两侧进攻。由于接敌难，贺晋年师长、张达志政委率第一梯队二四一团团长、政委奋勇冲杀四、五次都未能攻克敌阵。后敌机四架又来助战，更长了敌军的士气。在此紧急关头，贺晋年同志亲自带几个战士和轻机枪，爬上北山糜高地，居高临下，瞰视敌火力配系和阵地编成，倒爬小山顶，亲自协同战友，用轻机枪猛烈扫射敌阵，掩护二四一团第一梯队第一连首先夺占了西城门楼，与敌人白刃格斗，歼敌一个连，控制了全镇制高点。接着二四一团第二梯队上去，继续扩大战果，用火压制了全镇敌阵地，敌人北山的碉堡工事全部失效，顿时守敌乱了阵，红七十五师、七十八师也从两面山上攻下来，占领了全镇，全歼守敌，无一漏网。我红八十一师伤亡又很大，新任叶团长阵亡。此战敌一〇七师二一〇团团团长高福元被俘。

劳山、榆林桥两战，歼敌六十七军一一〇师部，三个整团，一个整营，击溃两个营。甘泉城内驻守的一二九师六八五团第二营又陷入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严密包围之中，行动不得。进驻延安之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及一二九师和留驻富县、洛川的一〇七师和一一七师处于首尾不相顾的瘫痪状态。王以哲损兵折将，一蹶不振，守卫不暇。南线敌六十七军发起的战役进攻，至此已被我粉碎。

榆林桥之战，红八十一师打的很出色，战功很大，伤亡也大于主

攻部队。战后，把师政委张达志调军团政治部当民运部长，派张明先来当政委。张为人开口爱称“老子”，因此指战员称他为“老子政委”。他军阀作风严重，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师长穿双袜子也要经他批准。二四一团政委李宗贵调师部任党务书记，并派两位同志监视，防止逃跑。其他人被用种种手法或借口而剥夺了指挥较的事例，屈指难数。

至于红七十八师处境则更惨。劳山之战后，根据李西平、姜绪等人的口供，营以上的军政指挥员绝大部分被西北代表团逮捕审讯，幸存者少数，有的没有送后方瓦窑堡，就在前方被活埋失踪。在榆林桥之战中，被部署在南山，要接敌作战就要徒步洛河及其宽阔的河川攻坚登城。因此，伤亡大而战功微，士气低落。又因新调来的一些军政指挥员常打骂基层干部和战士，因此，出现了建军以来首次开小差逃亡的严重现象。

## 第六、中共中央拯救西北革命根据地

西北代表团大搞肃反扩大化，造成西北革命根据地内和西北红军中人人自危、互相疑惧的恐怖混乱局面。在广大干部中，由于把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大量的逮捕甚至暗杀活埋，少数人由疑惧而开始动摇。在革命群众中，互相散布着许多恐怖猜疑的传说，加上敌人有意的造谣破坏，革命根据地边沿区已经发生游击队叛变（金铃、宗文耀等人带的几个游击分队），引起“三边事件”，群众打白旗反水。在十五军团中，引起兄弟部队间的互相猜疑、不信任，军心涣散，由于不能忍受新到任的军政指挥员的打骂和军阀作风，有的战士开小差逃跑，有的指挥员要求离队或辞职当战士。红军中因为不满而产生了盲动情绪，十分可怕的气氛在滋长着。

而敌人并没有因失败停止进攻。“西北剿总”在十月初重新调整部署，在西路调动东北军五十七军董英斌部一〇六师、一〇八师、一〇九师、一一一师自庆阳、合水地区沿葫芦河向洛河川筑路前进；在南路的六十七军一〇七师由洛川原向洛河川甘泉辅助攻击前进。两路敌人的矛头都指向红十五军团。“西北剿总”命令孙楚统一指挥晋军

四个旅，配合八十四师、十六师向南压迫，首先夺占瓦窑堡、延川县，继而向延河南岸发展进攻。“西北剿总”还命令十五路军骑兵各团和三十五师向吴旗、保安、安塞压击。各路敌军向心进攻红十五军团，欲聚歼我军于延河、洛河之间。

值此西北红军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胜利到达吴旗（今吴旗县）镇。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从吴旗镇工农民主政府和保安游击支队长张明科等同志那里，了解到西北红军、十五军团、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确实状况，获悉刘志丹等许多革命的好同志被西北代表团或捕或杀，肃反扩大化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立即先后在吴旗镇、下寺湾、瓦窑堡召开了一系列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1）立即派贾拓夫等同志带无线电台先行，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联系，传达中央的决议，制止肃反扩大化，停止捕人，停止审讯被捕的同志，一切听候中央处理。（2）歼灭尾随之敌东北军骑兵第二军第六师白凤翔部，不要把“尾随”之敌带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去。（3）整编军队，一、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聂荣臻同志任政委，林彪任军团长。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以下称陕甘支队），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杨尚昆同志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一军团、十五军团和西北红军游击队，粉碎敌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4）撤销西北代表团，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共陕北省委，郭洪涛同志任书记。成立中共陕甘省委，朱理治同志任书记，李富春同志任组织部长，李一氓同志任宣传部长。还取立了神府、关中两特委。（5）成立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博古（秦邦宪）同志任主席，定瓦窑堡为中央政府所在地。（6）撤销西北军委，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周恩来同志任主席，刘志丹同志任副主席，张云逸同志任参谋长。（7）承认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马明方同志仍任副主席；霍维德同志仍任副主席；成立陕甘宁省工农民主政府，马锡五同志任主席，朱开铨同志任副主席；还成立了关中、神府两个特区工农民主政府。（8）恢复中共中央党校，董必武兼校

长，成仿吾任教育部长。（9）撤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恢复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周恩来同志兼校长，袁国平同志任副校长，郭化若同志任教育长。（10）成立陕西省军事部，钟赤斌同志任部长；成立陕甘宁省军事部，肖劲光同志任部长。（11）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前方指挥作战，张闻天等同志率中央各机关先去瓦窑堡办公，执行处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规定的各项事宜。

张闻天、李维汉、董必武、博古、王首道等同志于十月三十日到达瓦窑堡，撤错了中共陕甘晋省委保卫局，接收了所辖一切。经过党中央在瓦窑堡组成的五人小组（董必武负责、李维汉、张云逸、王首道、郭洪涛组成）审查，于十一月七日下午，首批释放了受诬害被捕的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祺、张秀山、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锦纯、赵启良、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朱奎、王据德、王佳娃（刘志丹的警卫员）同志和高岗共十八人。当天下午，在便宴会上，王首道同志对被释放了的同志们说：同志们受苦啦！你们都是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好同志，作战勇敢，工作积极，是无私无畏的指挥员和革命干部。这次错误肃反把你们抓起来是错误的，党中央给你们平反，恢复你们的工作，并向你们道歉！刘志丹同志代表解放了的同志们致答词说：感谢党中央解救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和我们自己。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得很及时，如果晚些时候，就很难设想了。这次错误肃反扩大到我们头上，完全是由于西北代表团在政治上的偏见，相信个别同志的错误见解，偏信右派反革命分子对我们的误供所造成的。有的右派分子，在去年就被我们逮捕审讯在押，他们有意误供陷害我们，企图蒙混过关，保护自己。西北代表团在政治上的偏见，不相信自己同志的斗争历史，以致错误肃反扩大到不可收拾，无法解脱。但是大家不要埋怨主持肃反的同志，他们原是一番好意，也是为了巩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我们仍要对他们团结友爱。我们在工作中，也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引起人们的误解，要严于律己，善于作自我批评。同志们出去，接受工作不要计较职务高低，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做好本职工作，紧密地团结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的同志，向他们学习好的经验。英勇作战，壮大红

军，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争取抗日救国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奋斗到底！讲话完毕，王首道同志带头鼓掌，我们全体都经久不息地鼓掌。

十一月八日晚，张闻天、李维汉、博古同志找到刘志丹去中央机关所在地齐家湾，传达了中央给刘志丹同志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西北办事处副主席的职务和工作任务。从此被诬陷受害者陆续全部解放。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晚上，周恩来同志召见了刘志丹同志。刘志丹同志热情激动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是你的学生。周恩来同志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周恩来同志授意刘志丹同志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篇《三边地区反革命破坏的事实真相告群众书》，并派刘志丹同志去三边处理善后事宜。在党中央到达前，已有二百余名优秀党团员和英勇善战的军政指挥员被无故杀害，后来党中央给他们都一一平反昭雪了。

西北办事处，在毛主席、周副主席领导下，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纵队，独立三团、战斗团，分别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三十军、陕北独立一师、二师；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第二、三路纵队，抗日义勇军，分别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陕甘边独立师，关中独立团。诨

中央军委还派了许多久经考验，战绩辉煌的优秀军政指挥员，来组建和加强西北红军各军，西北根据地的革命武装，紧跟党中央东征、西征，纳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队列建制。全体指战员感到自豪，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心，西北革命人民感到光荣幸福。

党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红军；领导中央红军继续长征，胜利地到达吴旗镇，又拯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毛泽东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直罗镇一战，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大大地发展和巩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从此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走向新的伟大胜

利，获得了最根本的保证。

一九八〇年十月

# 李仪祉先生年谱

胡步川

## 引言

先生姓李氏，讳协，字宜之，后改仪祉，陕西蒲城县富源村人，累代清白传家，世有隐德。祖蔚然，祖母王氏，业农。父桐萱，为关中宿儒，晚年好佛，造诣极深。母马氏。伯父仲特，精数学，富著述，晚清时以古学名家。兄约之，后称约祉，弟知祉，妹文祉。夫人张孟淑，长子赋宁，次子赋洋。先生终身尽职于水利事业，幼而学，壮而行，老而成。综其荦荦大者，计从事水利工程教育凡十年，门人遍国中，成绩斐然；从事江河治导工程凡九年，泽被十七省，救济灾民无算，从事灌溉工程凡十五年，灌田三万顷，惠普三秦。而孝友成性，志行高洁，热心公益，正直敢言，聪颖过人，好学不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待人和易，治学谨严，临终犹以科学治水为念。在当时为水利界山斗，中外重视，歿后为百世楷模者矣。

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一月初三日先生生。

九年（一八八三），先生年二岁。

十年（一八八四），先生年三岁。

十一年（一八八五），先生年四岁。

十二年（一八八六），先生年五岁。

十三年（一八八七），先生年六岁。

十四年（一八八八），先生年七岁，始识字。

十五年（一八八九），先生年八岁，到永丰镇从伯父读书。

十六年（一八九〇），先生年九岁，从刘时轩先生读《毛诗》。

十七年（一八九一），先生年十岁，从刘时轩先生读四书、五经，始学作诗作论。

**按：**刘时轩为陕西三原贺征君复斋高足，于学生言行必绳以礼法，先生一生德器，盖基于此；又承父桐萱公、伯父仲特公庭训，文学及数学皆大进。然先生对举业文字，谓“不求有用实学，顾乃溺思沦精于此，吾不为也”。

十八年（一八九二），先生年十一岁，从父在家读书，学作八股文、八韵诗，但不当意。

十九年（一八九三），先生年十二岁，从父至县城应县试。

二十年（一八九四），先生年十三岁，从父学《九数通考》。

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先生年十四岁，从父学《西学大成》及《梅氏丛书》，再应县试。

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先生年十五岁，从父至同州府应府试，与新村张氏订婚。

二十二年（一八九七），先生年十六岁，从伯父学几何、代数、四圆、八线及诸子百家，应县试录取。

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先生年十七岁，至同州府应仁和叶伯皋大宗师案试古场，考取进第一名秀才，兄进第七名秀才，玉笋联芳。恰如仲特、桐萱二公，于光绪四年同入泮者相若。继兄弟同被拔为崇实书院上舍生，是年娶妻。

**按：**先生《自传》中有云：“我们考算学、几何、代数都做对了，居然高高录取，正场八股，胡诌一场，也不在乎。李氏兄弟算学之名，大震关中”云云。而先生名列第一，尤以为喜。

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先生年十八岁，肄业崇实书院，学英文、算学，旋以年荒辍学。是年先生母马太夫人逝世。

仿严几道《天演论》，著《权论》及《神道设教辟》。



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先生年十九岁，经庚子之乱，返泾阳崇实书院，组织天足会。学使嘉兴、沈淇泉选先生入宏道学堂，以不屑事举子业，请假回家，作《女子不缠足歌》。

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先生年二十岁，入关中学堂，与张季鸾争列前茅，习英、日文。

著译冈田雄治《日本国史》。

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先生年二十一岁，仍在关中学堂，以不满意功课，印传单指陈之。是年先生祖母王太夫人逝世。

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先生年二十二岁，时学便沈淇泉南归，先生应商州中学堂堂长于右任招，赴商州，为中学堂教员。

三十年（一九〇四），先生年二十三岁，时于右任以著《半哭半笑楼诗草》被当道严缉，先生乃辞商州中学堂教职回家。寻与兄同考入京师大学堂，赴北京入预科德文班。

**按：**先生于是年家书中有云：“儿之志欲以哲学为终身之成名，以工学为平日之生计。”考终先生之世，虽以工学成名，然非研究哲学有素者，或其名不能如斯之高且远也。**又按：**先生记于右任之获罪篇中有云：“有忌右任者，将其《半哭半笑楼诗草》及被发握刀影片，献于陕省宪，即行文三原县密捕，该该县令为旗籍德锐，谋诸儒学教谕王友益，王与余兄约之善，曾泄其事。兄急与程搏九谋救，觅一急足者送信千里至汴，限九日达，右任即遁迹上海，次晨遯者始至。”

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先生年二十四岁，在校极用功，各科学业进步甚快。是年，先生祖父逝世。

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先生年二十五岁，肄业京师大学堂。日俄战起，国中预备立宪，革命风声紧。

**按：**先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为反对中美条约，上王侍御仙洲书中有云：“天下事以千万人之力成之而不足，以一人败之而

有余，历观历史，从古如斯；但不意此等事乃见于先生，先生不为全国人民计，独不为一身名誉计乎？”即此数语，足见先生少年刚锐之气，溢于言表。

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先生年二十六岁，肄业京师大学堂。

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先生年二十七岁，肄业京师大学堂。从师与同班同学到汉口、汉阳、大冶、武昌各处旅行，参观各工厂、学校、矿山。

清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先生年二十八岁，京师大学堂毕业，派某部录事不就。译《平面几何学》。由西潼铁路筹备处派赴德国留学，道经上海，与刘梦锡、严敬斋、吴希珍等为友，始剪去发辫。是年七月放洋，经福州、槟榔屿、锡兰岛、苏彝士河、开罗、英国海峡，由比利时登陆，往柏林。报入皇家工程大学土木工程科，攻铁路、水利甚勤奋。除读书外，最喜游览风景，并以独游为乐。同学中送先生诨号曰：“圣人”；而先生自号曰：“葫芦”。

**按：**先生《自传》中有云：“我是除用功外，最喜游览，即觅不得伴，也常以独游为乐。并且觉得，独游胜于同许多人一块。寂寞之中，且有天然的景象作伴，常常一个人翌期日携一本书，到树林中睡觉。尝吟曰：“一卷相随势不孤，林中偃卧鸟相呼；醒来神识忽颠倒，误认青天做碧湖。”即此四句诗，足见先生课余时之心情。

二年（一九一〇），先生年二十九岁，求学德国，与马君武等为友，同游巨人山，及德、奥、瑞典等处风景区。课余以德人提倡佛学，出杂志，先生尝作《耶佛是非之辩》，译《佛举问答》，作《涅槃解》，又作《新闺怨诗》

**按：**先生于清宣统二年，致胞兄书中有云：“德人力闵脱者，福音教人，询弟何教，答以佛。竭力劝弟改为福音，与之辩二教之优劣。伊勿能胜，惟云：‘佛以寂灭为主，引人入不幸’。驳曰：‘耶以求福为主，贪妄之所由生。求而获，则我幸，人不幸；

求而不获，则我更不幸。佛之归点曰：无幸无不幸。所以云尔者，人世之幸不幸，不足以形容之也’。”又云：“弟本非佛教，胡以佛教应？缘近世民贼，动据孔说以谄上虐下，弟不屑与为伍。中国危亡之机，尽人皆知；而近日其机，若不可终日”云云。又按：章太炎设立宗教论中，以耶为独神教，道为多神教，佛为无神教，惟其无神，故见其大，故能超脱一切，包容一切，先生言良有以也。

三年（一九一一），先生年三十岁，求学德国，春假中与萧友梅等参观莱比锡(Lebcig)建筑工程展览会；暑期实习于Fronkforf. a. M铁路局。是年秋，国中大革命，公收束行李，携枪弹回国参加。乘车经瑞士、意大利，始乘船与张继等同归。抵沪，则浙军已定金陵。军政府派先生为津浦铁路局长，陕督举先生为省参议员，均不就，只身西归省亲。

中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先生年二十一，先生于元宵前旬日，自上海西行，至河南峡石遇盗。作《峡石遇盗记》，感于当日武士骄横，庸流鬪茸，乃倡办三秦公学，并掌教课。

二年（一九一三），先生年三十二岁，于二月三日再赴德国求学，以竟其业。曾与郭希仁偕行，由俄而德，而法，而比、荷、英、瑞诸国，考察河渠闸堰堤防，相与慨吾国水利之颓废，毅然有振兴之志。既而郭希仁归陕，属公专研求水利，继郑白事，乃专攻水利一科。

按：先生是年与郭希仁同游欧洲，为先生复兴陕西水利之起点，读先生祭郭希仁先生文，及序郭希仁游欧日记二篇，即可见陕西水利局创业垂统艰难之史迹。兹录先生当时与郭希仁同游德国四林湖坟园译诗云：“君辈今若何，吾辈昔亦若；吾辈今若何，君辈将勿脱”。可谓诗讖。编者以其攸关陕西水利颇巨，为重译云：“负后死之责，循先贤之迹；后人之视今，亦犹今视昔。”

三年（一九一四），先生年三十三岁，仍在德国求学。

著《甲寅修学旅行记》。

四年（一九一五），先生年三十四岁，值世界第一次大战，学成归国。时张季直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于南京，延先生为教授，一切课程编制，多出先生手。课余对中外治河书籍，穷搜博览。

著《最小二乘式实用微积分》。

**按：**自是年起，为先生从事水利工程教育时期。其后八年中，皆以掌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为主，贯注精神，乐育不倦。穷搜中外治河书籍，矿物标本，建筑材料，制作各种河工模型。赴国内各河流域视察形势，著为文章，用作课外教材。而先生之学不限于水工，凡天文、气象、地质、数理、史地，以及文艺、宗教，莫不深入堂奥。故其培植学生，多有成绩，今日国内得有如许水利人材，及举办如许水者，信非偶然。

五年（一九一六）先生年三十五岁，掌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每授课除教科书外，罗列参考书甚多，学生多称善教。

著《水功学》、《诺模术》。

六年（一九一七），先生年三十六岁，仍掌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值华北大水灾，乃率学生查勘河北五大河及海河，历时半载，收获极丰。整理所得，用作教材，并制作各种河工模型，用资实验。是年长子赋宁生。

七年（一九一八），先生年三十七岁，除掌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外，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及上海同济医工专校教课。每四季假日，即率学生作修学旅行，常登紫金山最高峰，栖霞山绝顶，牛首山天阙峰。寓言志论事，及探矿勘地质。于游览风景之中，从者有沂水春风之乐。

著《潮汐论》、《水工试验》、《土积计算截法》及《实用水力学》。

八年（一九一九），先生年三十八岁，掌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率河海学生参加“五四”运动，主持正义。

著《工程家之面面观》、《森林与水功之关系》。

按：先生于是年发表《工程家之面面观》又中有云：“一般青年学生，醉心于德谟克拉西，以服务社会自任，社会救星自命，改良社会为目的，那知要为社会尽一番责任，再无工程家易于为力。”又云：“实行爱国，惟有工程家做得远大；实行打倒帝国主义，亦惟有工程家做得结实。”又引大禹治水，将整个中国由水里救出来，足见其功业之。可谓语重心长。

九年（一九二〇），先生年三十九岁，仍掌教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课。是年次子赋洋生。

著《电力探水器》、《土压力》、《固体物质在水中行动》、《黄运交会诸问题》。

十年（一九二一），先生年四十岁，仍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授，兼南京高师课。中国科学社举先生为董事，凡社中设备及章则，多由先生手擘划。以束修所得，送侄赋京赴德国留学。率河海学生至大冶及武汉三镇，参观工厂、矿山。

著《修建计划之讨论》、《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北五省旱灾之主因及其根本救治之法》、《德国水官制》。；

按：先生一生廉洁自持，自奉甚薄，而孝友成性，视侄如子。其于清宣统元年致胞兄书中有云：“弟之耽擱，以嫂自县归，病体莫支，医药经营种种需人。弟行时，已见其实无可望，大概不出半月之内。衣衾棺槨，已预备妥贴，不必挂念。林林日夜依其祖母，颇驯适；都都愚騃，尚含饴笑跃；惟京京知啼哭，令人酸鼻。嗟嗟，吾兄弟失恃早，观诸儿情状，忆往感昔，五内欲裂矣！”又民十七年，复友人赵玉玺宝山书中，有云：“年来两侄留学，负债甚多，正欲作苦数年，还清夙负。刻大侄已归，二侄亦不久返程。国中失一老朽之留学生，而得崭新之二留学生；家中去无能之子，而获二克承之孙。”即此，足见先生心情忧乐之所在。

十一年（一九二二），先生年四十一岁，上半年仍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授，兼高等师范学校课，兼任南京鼓楼公园工程师，送侄赋

都赴德国留学。下半年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筹划关中水利，兼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进行引泾溉田，从实测地形及水文作起。

著《黄河根本治法商榷》、《论引泾》、《再论引经》。

**按：**自是年起，为陕西水利事业进行时期。然兵变陕乱，年荒财尽，历六年之困苦艰难，虽计定泾惠渠硕划，而不能实施工程。先生于十七年，复赵玉玺宝山书有云：“弟自十一年回陕，乡人之属望愈切，弟心神之苦痛愈甚，荏苒光阴，去我如矢，前后五年，终无一事可以慰我乡民者。去春冯公来，注意郑白。弟行谷口，遍告乡中父老，谓锸云挾雨，不日可期。无如时期未至，终为画饼。于是弟羞见父老。”又云：“陕西父母之邦，弟何爱于涂山，遂忘泾渭。果当局有兴工之决心，聚集可靠之经费，弟亦不再为局长，但畀以工头之职，畚锸径施，弟即奋然归矣。”又云：“引泾之事，时局负我，我负希仁。他日干戈载戢，政府有意兴办，尚欲高陟仲山之顶，望小子辈努力成功也。”其对陕西水利，期望之切，负责之重，用人之专，百折不挠，矢志靡他，信不可及。

十二年（一九二三），先生年四十二岁，仍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推进引泾预备工程；兼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倡办水利道路工程专校。并筹划陕西全省教育，及振兴文化事宜，查勘渭河及黄河水道。

著《考察龙洞渠报告》、《测勘黄渭航道报告》、《泾惠渠之首功郭希仁》、《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第一期报告书》、《水利道路工程技术传习所改组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宣言书》。

**按：**先生所创办陕西水利道路工程专校，系由水利道路技术传习所改组后，复改隶国立西北大学工科，为陕西省造就水利道路人才之惟一学府。当时以经费困难，因陋就简，及后逐渐扩充。嗣后八年，复创办陕西水利专修班，后改名为国立武功农学院农业水利系，则设备更好。至今所有毕业学生，多为陕西省水利技

木之基本人员矣。

十三年（一九二四），先生年四十三岁，仍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及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兼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扩充大学设备，培植西北最高学府专才；倡设陕西古物保管会，复振兴陕南水利。是年冬，渭北水利工程设计完竣，在长安开渭北水利工程展览会。

著《勘察泾谷报告书》、《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泾第二次报告书》、《引泾第一期工程计划大纲》、《我之引泾水利工程进行计划》、《请拨庚子赔款以兴陕西引泾水利说帖》、《工程上的社会问题》、《重农救国策》。

十四年（一九二五），先生年四十四岁，仍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兼西北大学校长。陕局变乱，关中及陕南水利工程，以乏款停顿，先生多致力于西北大学。是年冬，赴京、津、沪、宁等处，筹措引泾工款及扩充西北大学经费。

著《沟洫篇》。

十五年（一九二六），先生年四十五岁，仍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兼西北大学校长。长安围城八月，先生欲赴汤蹈火，叩潼关归秦而不可能。乃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旋回河海工科大学讲学。是年夏，西北大学工科学生毕业。冬回陕，当道任以陕西省建设厅长，辞不就。

著《自传》、《上新航江堤合龙记》、《太湖东洞庭山调查记》、《请恢复郑白渠，设水力纺织厂，渭北水泥厂，恢复沟洫与防止沟壑扩展，及渭河通航事宜》及著作《西京围城纪事诗》。

**按：**是年冬，先生回陕，对陕西建设寄有无限希望，但时局不允许，伟志未遂，终于离陕。然先生《请恢复都白渠，设立水力纺织厂，渭北水泥厂，恢复沟洫与防止沟壑扩展，及渭河通航事宜》一呈，不啻涕泣而道。

十六年（一九二七），先生年四十六岁，仍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对陕局未定，引泾工程不能进行。先生欲只身东去，然对引泾计划书

图颇恋恋，其心至苦，即赴陕北调查无定河水利。至上海任上海港务局局长，筹备数月，因故中辍。至南京，兼任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冬改就四川重庆市政府工程师，修筑成渝公路。重庆市郊老鹰岩盘道，为先生得意之设计。

著《呈请辞退陕西建设厅长专办水利事宜》、《兴修陕北水利初步计划》、《无定河织女泉水渠说略》、《中国旧式之防洪堰》、《水理学之大革命》、《湖之停蓄推算流量之新法及其应用之经验》、《通用流速算式之误点》，作《由西安至米脂沿途纪事诗》、《咏骊山雪诗》。

**按：**先生以陕事不可为，乃于是年春不就陕建设厅长职，拂衣去陕北，考察无定河水利，且一去不复返矣。时陕水利局东大街局址被借用，不得已搬至西大街城隍庙西，旧长安县址办公，一种风雨飘摇之境，尤有伤于先生之心情。在晋致严敬奔函中有云：“陕政局有急应改撤之事：（一）不应盲目听人指挥；（二）勿故意为派别之争，淆乱人心；（三）勿视人心皆如我心，以致上当；（四）敛嚣张之浮气，以实心实力寻救陕之路径。凡此诸条，皆我冷眼旁观，在西安时久欲言，而惧加诛，緘然未发，乃以不忍之心，终发之矣。”此正孟子所谓迟迟吾行，去父母之国之道也。

十七年（一九二八），先生年四十七岁。是年夏，养病中山陵园三茅山。秋，任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筹划白河、黄河水利事宜。

著《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华北水利委员会之旨趣》、《永定河改道之商榷》、《化兵为工之意见》、《工程学生与新中国》。

十八年（一九二九），先生年四十八岁，仍任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春，兼任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倡办华北灌溉讲学班，设置黄河水文站。夏，改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及工务处处长。亲赴淮河上下游查勘，并视察运河，计定导淮计划。兼任浙江省建设厅顾问，设计杭州湾新式海塘。



著《中国水利前途之事业》、《说明华北灌溉讲习班之旨趣》、《指导永定河上游民众兴办灌溉工程办法》、《华北、导淮、黄河三委员会有联合工作之需要》、《恢复陕省农村的意见》、《导淮委员会工务处勘查日记二种》、《民国十八年日记二种》、《导淮兵工民工之管理及编制方法》、《黄河及其治导开展》、《杭垣附郭及城内航导之研究》。

十九年（一九三〇），先生年四十九岁，仍任导淮委员职。倡办中国第一水工试验室于天津。冬，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与北平华洋义赈会合作，进行引经工程。决定省府与华洋义赈会合作，计由渠首至十一公里一段之引水工程，由义赈会担任；十一公里以下之分水工程，由省政府担任。时工款奇绌，因以灌概区中破庙之砖木材料，充作工料，及进行三秦各项建设。

著《海港之新发展》、《陕西水利工程之急要》、《华北之水道交通》、《免除山东水患议》、《组织西北防旱研究会》、《泊黄研究意见》、《对于改良杭海段塘工之意见》。

**按：**是年先生返陕，任陕建设厅长，为陕西水利工程实施时期之开始。至二十一年，泾惠渠完工，即辞去建设厅长职，专任陕西水利局长。凡洛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织女渠，相继施工，以底于成；而先生之志愿，则在惠遍三秦之水利。故关中黑惠渠、涝惠渠、泔惠渠、泔惠渠，陕南汉惠渠、褒惠渠、湑惠渠，及陕北定惠渠，皆计划及之。至今次第施工完成，近来冷惠渠、千惠渠，亦开工矣。**又按：**二十一年夏苦旱，泾惠渠泾阳、三原、高陵一带，农家掘渠引水、以救禾苗之枯槁。农民一面致力工作，一面默念先生名，是先生之德惠，不啻万家生佛。

二十年（一九三一），先生年五十岁，仍任陕西建设厅长，致力于泾惠渠工程之推进。并兼任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主办江河复堤工程，往来江、汉、陕、沪间。时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组织成立，先生被选为会长，连任以迄逝世。

著《中华民国水利机关组织拟议》、《中华民国水利行政组织拟议》、译卫乐赫与司徒培《液体计算》、《河流试验》、《引泾水利工程之前因与其进行近况》、《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事业计划大纲》、《救济陕西旱荒议》、《救济西北旱荒之拟议》、《巩固西北边防策》、《小清河航道整理管见》、《陕南水利要略》、《敬劝人民自动的禁烟》。

**按：**先生于是年组织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实为晚近各学会组织之先声。其建议水利行政统一，与水利建设规划，已蒙政府采纳施行。凡在《水利杂志》、《河海月刊》、《水利月刊》、《黄河水利月刊》、《导淮委员会月刊》、《陕西水利月刊》中，先生所发表文章，均足以沟通世界水利学术，且为水利界及其他各界圭臬。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先生年五十一岁，仍任陕西建设厅长。春，先生父桐萱公逝世。夏，经惠渠第一期工程完成放水，江汉堤告竣。参加全国经济工程新闻界陕西实业考察团，赴陕南考察水利等。辞陕西省建设厅长，专任陕西水利局长。创立陕西水利专修班，后并入武功农学院，为农业水利系。秋，先生大病，几濒于危。筹划泾惠渠工程。

著《灌溉有无自动方法之可能》、《泾惠渠工程报告》、《对渭北人民切切实实说几句话》、《泾惠渠管理管见》、《泾惠渠管理章程拟议》、《陕西省水利应要做的许多事情》、《推广凿井灌溉之计划》、《陕西灾情与农村经济破产原因及其状况报告》、《三省会派工程师往德国作治导黄河试验之缘起》、《汉水上游之水运》、《汉江上游之概况及希望》、《函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陈述陕灾状况并请赈修第二期泾惠渠工程》，及作《祭父文》。

**按：**是年夏六月二十日，泾惠渠第一期工程于工料奇缺，疫病盛行之下，完成放水。农民初获灌溉之利，相与鼓舞于池阳之野。先生并与父老约：凡渠水所到之处，概不得有一株毒卉发生。是年灌田二

十万亩，灾荒之余，活人无算。又按：是年先生发表《陕西建设事业计划大纲》。其关于财政者，设陕西实业银行于西安，设分行于郑州、兰州；关于交通者，设西潼、西长、咸同、咸榆、凤汉各公路，及长途电话；关于工艺者，设交口、泾阳纱厂及西安电厂、机器厂、制革织呢厂等；关于水利者，为引泾甲种计划；关于农林垦殖者，为终南及华麓苗圃，渭南北植棉试验场，华州蚕桑试验场，延鄜一带垦殖区，及各县开辟沟洫，改良堆肥等；关于文化者，设西安机器商品物品陈列馆、华山气象台，古物保管会，各县雨量站，及修复华清池，与完成西安革命公园等。以上种种，经十五年来之惨淡经营，十九均已做到。

十二年（一九三三），先生年五十二岁，仍任陕西水利局长。是年春，先生亲于查勘洛惠渠引水地址，及干渠所经沟峪，即就省府公报余款，筹设引洛测量队，实施洛渠灌区测量。夏，筹设黄河水利委员会，先生兼任委员长。时大病初愈，八月黄河决口，扶病至南京，召开黄河水灾救济会。九月一日，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式成立，先生又兼总工程师，筹划黄河治本治标工程，兼筹办渭惠渠工程。

著《论涸湖垦田与废田还湖》、《导渭之真谛》、《黄河治本的探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计划》、《导治黄河宜注意上游请早期派人测量研究案》、《关于治导黄河之意见》、《请由黄河水利委员会积极提倡西北畜牧以为治理黄河之助案》、《请测量黄河全河案》、《黄河应行兴革事》、《治黄关键》、《洛口猛涨时发表治黄谈话》、《整理洞庭湖之意见》、《淮河流域之水道交通》、《二十二年大病经过情形》、《陕西引洛工程计划书序》、《谈治黄进行状况》、《双十与水患》。

按：先生是年论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及工程，致王棻庭书中有云：“黄河水利委员会之主干任务，在根本消除河患，其次乃及航道交通，又其次乃及农田水利。国家特设此机关，必求其能策进主干任务者，仅维持河防，则有三省河务局足矣，如但及农田水利，则各省有建设厅足矣，又何须特设此重大机关哉。所谓

随测随作者，亦视何等工程。吾人造一房屋，测量、设计，估工、探验地基，选择材料，亦费许多手续。治河工程，视建屋重大多矣，谓独可以涂草为之乎？故随测随作，施之于小工程，无上下游关系之局部工程，可也；而非施之于根本治河。治河之道，虽一裁湾取直之小工程，亦必详审测度其上下游之结果，何况全体治导。协之意：不欲邀一时之功，而在为国家奠永久之大计。小功利在一时，设计未周，或一、二年而弊又见，是岂治河之道哉。且更不必虑及政局之变动，盖果吾人之事业，确实为国为民，则人事虽有变更，而事业必不毁”云云。此种定论，上下千古，岂独治黄为然。又按：先生论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用人及防汛事，致许心武、张含英书中有云：“唯河溢走故道，以愚见之，尚不至为大害，亦决不致遂改道而南。目下情形，今道虽日高，犹较故道深畅，如改道必不及于故道也。惟今年大汛以后，必须详细研究河流变迁趋势，而筹划严密防范之策。报讯之制，尤宜速事筹备，使上下消息灵通，各河汛水位，皆得于三日前预知必至若干高，则人知所虞矣。”又云，“筹备时期，用人尤宜审慎，须具有开创精神，不需之人，勿用一人，前拟各简任技正，须经一度常务会议议决后，再行呈请任用”云云。足见先生用人行政之一斑，至河流改道一层，烛照数计，亦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者矣。又按：先生是年为委托德国水利泰斗恩格尔，代作治黄模型试验事，致于右任请赞助经济书中有云：“素仰我公饥溺在抱，于数千年来泛滥决口，为害最烈，糜费至巨之黄河，关心尤切，今幸得有根本治导方法，则此次终结试验，关系民生国计，机会尤不可失，务垦鼎力成全，予以襄助。”足见先生之实心实政。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先生年五十三岁，仍任陕西水利局长，兼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讲座。是年，洛惠渠兴工。秋，亲赴黄河上游查勘，视察江汉一带，赴浙江绍兴参加会稽大禹庙祀典。是年十一月，至镇江出席并主持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四届年会，当选为会长。

著《西北各省应励行沟洫之制》、附《请令西北行政长官励行沟洫之制以免旱荒而减河患案》、译《波河之水文及其治导方略》、《弯曲河道挟沙之大模型试验》、《治水本论序目》、《函德国恩格斯教授关于黄河质疑之点》、译《恩格斯复函》、附《沈怡与恩格斯质难之文》、《豫省河堤远距原因之推测》、《鲁省河堤近距原因之推测》、《宋以前河堤之概况》、《宋以后河防沿革摘录》、《巩固堤防策》、《论德国堵塞决口法》、《关于治河之准备》、《治理黄河工作纲要》、《治黄意见》、《黄河上游视察报告》、《研究黄河流域泥沙工作计划》、《黄河流域土壤研究计划》、《黄河水文之研究》、《审查华阳河流域整理工程计划大纲之意见》、《对于华阳河流域整理工程计划之意见》、《对于襄河防洪治本初步计划之审查意见》、《对于整理东太湖水利工程计划之审查意见》、《关于废田还湖》、《导淮先从入海着手之管见》、《二十三年视察黄河上游日记一段》、《会稽大禹庙碑》、《渭惠渠计划书序》、《西北农林专校水利组规划》、《二十三年大病后对部属训话》、及作《航空由西安至兰州纪游》、《航空中观刘生毓中一字狱》、《武功农校诸诗》。

按：先生于是年，作武功农校诗云：“正襟危坐乎高岗，山巍巍兮水汤汤。漆可濯纓渭濯足，天作笠兮云为裳。倦来偃卧枕岐梁，梦入周公之故乡。右手触文帝之寝堂（隋），左手托太宗之摇床（唐）。倾耳以听音锵锵，似闻凤鸣于朝阳。太白皑皑冰雪光，焕如明镜照我肺与肠。臚臚周原黍稷黄，思我先民荐蒸尝。吁嗟乎！孰维新命于旧邦？安得起后稷公刘文武于地下，使我民族复发扬。”又先生访青冢云：“嗟呼此绝代之殊色，一度陷于汉宫，再度陷于虏侧。不得真爱之良俦，汉与胡又何择。天子悲，单于喜。一曲琵琶塞上音，秋风吹进玉关里。长安万户息砧声，尽道良人罢征已。”忆先生作诗，不假思索及推敲雕琢，而情真意美，有近天籁，惜随作随掷，无多存稿耳。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先生年五十四岁，仍任陕西水利局长，兼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年

春，辞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未准。渭惠渠开工时，关中水利有泾、洛、渭三渠，同时进行。夏，奉令验收贯台堵口工程，又奉命培修黄河金堤。时黄河董庄决口，亲历河干，实地决策，然未行。泾惠渠第二期工程完成。秋，赴苏、鲁巡视不牢河、微山湖及运河上下水灾，辞准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专任陕西水利局局长，筹办梅惠渠工程。是年先生伯父仲特公逝世。

著《在武功农林专校之讲词》、《农田水利讲义》、《农田水利之合作》、《利用洪水与蓄水地下》、《陕西省水利行政大纲》、《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巩固西北边防策略》、《一年来之陕西水利》、《利津以下筑堤不如巩岸论》、《免除大河以北豫鲁冀九县水患议》、《治河罪言》、《后汉王景理水之探讨》、《本年董庄决口救济水患之失机》、《固定黄河河床先从改除险堤入手议》、《固定黄河河床应以何水位为标准》、《培修堤防法》、《黄河水患原因及其急切补救办法》、《黄河流域之水库问题》、《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濮阳杂记》、《韩城潼关间黄河滩地之保护法》、《纵论河患》、《电经委会建议黄水入苏补救办法》、《电经委会开黄花寺民埝原文》、《整理平汉路黄河铁桥上游河槽计划》、《视察导淮工程后发表概念》、《二十四年日记一段》、译彭胃氏《水力学》及作《南园忆胜》、《泾惠渠碑跋》、《河工名谓叙》、《泾惠渠志稿序》、《泾惠渠锡名记》、《洛惠渠锡名记》、《黄河堵口工程实验录序》、《谈贯台堵口工程》、《黄河修防自给论》、《中国现有之生产力》及作《乘陇海铁路快车东行诗》、《冬至视洛惠渠二至老湫因省墓》等诗。

**按：**是年为先生心情最劳苦之年。计：一月，因公自陕至洛、至汴，陪国联水利专家至陕参观水利，赴京参加水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赴津参加华北水利委员会会议，返汴辞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未准。二月，视察黄、沁二河，并定黄河铁桥新址，赴陕为先生父举行禅祭。三月，陕渭惠渠工程开工，赴京再请辞黄委会职又未准，至汴研究贯台堵口工程，防河北徙，赴陕又赴汴，

进行金堤工程，并常川驻濮阳二次。四月，督筑金堤，公余著书。五月，至汴验收贯台堵口工程，赴濮阳赴陕视堤工，至陶城埠又赴汴，开中国水利工程学会董事会。七月十日，董庄黄河决口，赴鲁赴决口勘查，赴汴赴京返汴，赴董庄返汴，议定统一河防办法，赴陕。八月六日，赴京赴苏赴鲁，巡视不牢河、微山湖及运河上下，又赴董庄开会，又巡查朱口及陶城埠等处，风餐露宿，致遭腹疾，赴鲁赴京赴平。九月，因公赴津、赴鲁、赴京、赴汉、赴郑、赴陕。十月，已辞黄委会职，视察渭惠渠工程，视察泾惠渠灌溉情况，视察洛惠渠工程，返富源村省墓，赴大荔赴西安。总此短短十月内，计赴京五次，赴汴十次，赴陕六次，赴津三次，赴郑二次，赴濮阳三次（常川驻工不计），赴陶城埠二次，赴贯台四次，赴董庄三次，赴鲁四次，赴苏一次，赴平一次，赴朱口及汉口各一次，著书十一种，正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又按：**先生居常喜谈古人治河策略，均有所发明，或以麻纸作图，启发古人深意，是证先生于著书之前，已费推敲，句斟字酌，故得成佳构，为当世所重视，达到水利救国之真谛。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先生年五十五岁，仍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元旦在西京举行陕西水利工程展览会，昭示大众。梅惠渠开工。兼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视察江汉间。修筑长安崇义路良斋成。试用良斋新笺，曾云：俟渭惠渠工程完竣，即辞去一切职务，居斋中闭户著书，不问世事。冬，渭惠渠第一期工程完成，陕水利局大楼筑就。适逢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开年会于此楼，聚全国水利专家于一堂，允称胜会。双十二事变起，先生对国家事极形忧虑，及除夕前，始喜形于色。

著《我国水利问题》、《日本水利略述》、《水土经济》、《关于变迁河床河流治导之模型试验》、《水利之家政》、《陕西灌溉事业》、《蓄水》、《西北水利问题》、《西北水利之展望》、《西北农功水利文化史略》、《全国经济委员会兴办西北灌溉事业与地方政府合作办法》、《西北灌溉工程局组织大纲》、《巩固西北边防策》、

《我们须要提倡西北农村建设》、《对于治理扬子江之意见》、《对上车湾裁湾取直工程之意见》、《甘宁青历代大事记序》、《追念芬次尔文》、译《方修斯之子来函》及作《试新笺诗》。

**按：**先生是年不就经济委员会顾问工程师，致郑叔伯肇经书有云：“在陕工作之技术人员，完全以精神相团结，忠诚努力，而彼此毫无间言。此不能不谓有一人领率之关系也。若我一去，不免人心涣散。余在水利局，每月仅支一百五十元，以颇敷家用，而此等精神相济之人心，则万金难买。故宁舍彼而守此也。”**又按：**先生不就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专门委员，复曾养甫书中有云：“猥以菲材，辱承聘为专门委员，本应勉尽棉薄，用副知爱之厚。顾以主持陕西水利工程任重事繁，鲜有暇晷，来京开会，既非时间所许，势不能尽襄助之责”云云。此二书语出至诚，可为先生代表作。即先生去世已十年之今日，陕水利局同人，仍本先生一贯作风，不计个人权利，不见异思迁，而能践到枵腹从公之诺言，皆先生精神所感召也。**又按：**先生是年论华阳河工程意见，致傅汝霖沐波书中有云：“窃以为本计划能待一、二年，将内部地形测量明确，江水情形再加探讨。然后，将马当工程、水库工程、水库内之排水系统、及航路与堤防等工程、水闸与泄水道工程融纳为一，彼此相顾，拟成一完满计划。上可取信于政府，下可取信于人民。然后，定为步骤，分期兴工，策之上也。若此时即欲为之，弟亦不敢言其必不可为，然其将来成效，或得或失，正未可必，恐工成之后，待补救者必多。此犹小事，而计划未能完备，使一般人士不免生疑，徒为华阳河口附近一部分人民之利益，殊觉不值”云云。可见先生忠于谋国，又可见先生之水利事业，成功全在计精图确，丝毫不苟故也。

二十六年（一九二七），先生年五十六岁，仍任陕西水利局长。视察扬子江中、上游，并赴江苏调查导淮入海工程。秋，被聘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员，抗倭战将起，参与庐山谈话会，返陕加入陕西抗敌后援会。冬，渭惠渠第二期工程完竣，管理局组织就绪，织女渠开工。除夕赴兴平，召集渭惠渠同人叙餐，及返西安似感伤风症。



著《一月间邀游记》、《如何救四川之饥馑》、《视察四川灌县水利及川江航运报告》、《抗战期间之农田水利工作》、《水工基础》、《请建议国民政府筹设大规模材料试验场案》、《请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提请吾国地质学专家注重实用地质学之研究案》、《水工讲义目录》、《第二渭惠渠》、《倡议三渠民众教育》、《议整理秦岭山下各水》、《如何利用土地》、《大战期间之青年培养问题》、《大战时期青年教育问题》、《大战后之种种建设问题》、《同种同文》、《西京市民之安全问题》、《敬告西安市民》、《告青年》、《重重大灾之下人民应如何图存》、《致李维城、续式甫、韩威西、李紫东诸先生函论各县救国公债保存办法》、《国亡了要钱有什么用》、《对经募公债条陈意见四项》、《再劝购救国公债及捐输》、《拟请印制救国印花以资宣传救国公债》及作《行三峡中吊屈大夫》、《芦沟桥》、《南岳观日出》诸诗。

**按：**是年夏先生参加庐山谈话会，病胆囊炎，飞京治疗。及芦沟桥事变后，自京返陕，以羸弱之躯，加入陕西抗敌后援会。凡他人所顾忌不敢言、而不能言者，先生则侃侃言之，复常至西安广播电台，大声疾呼，陈述抗战利害，警惕民众。又西安市防空工程之建设，秦中禁烟种麦之提倡，伤兵难民灾童之养护，救国公债之募集，及战时西北一切经济建设，多仗大力推进。又常亲作抗战宣传文字，寄登国内外各报章，伸张正义。以上种种，皆先生致力水利以外之工作，国乱寇深，年老力衰，诸葛孔星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亦有焉。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先生年五十七岁，仍任陕西水利局长。是年一月四日，抱病赴眉县，参加渭惠渠拦河大坝南土坝合龙工程归，病加重，卧床数日痊愈。二月十九日，偶得腹疾，痛苦剧烈，遍体流汗，四肢发冷，大便不通，休食不进，逆气失眠，虽延医诊治，病益增重。初断为胃癌，继认为急性胃炎。继输血注射皆无效，温度增高，脉搏增急，喉有痰。三月七日夜病亟，惟神志甚清楚，口述遗嘱。八日正午，逝世于长安艮斋。

著《目前及将来重要问题》、《农村与国家》、《函经济部论大战中经济建设八条及水利行政等事》，为先生对经济事业最后而最有价值之呼吁。《函西安行营主任论收容流亡工程师拟编为大战中工程队》。

按：先生是年条呈国防工业建设，航道、铁路、交通以及水利、水力、增产等八项。致经济部函中有云：“政府为抗战持久计，退而守腹地，并恃西南、西北为奥府。然西南、西北素乏建设，欲恃之以为抗战之根据地，自非谋所以充实其力不可。前闻一面抗战，一面建设，抗战终结之日，亦即建设完成之时之壮语。以目前战事之剧烈，吾国民生之凋敝，同人等窃疑何以实验此等壮语。今读大部对于经济建设之谈话，知建设事北果有可为，而且必为也。”又云：“水利行政，素患机关庞杂而涣弛，宜借此非常时期，裁去各委员会，而并其政权于一部”云云。即此二点，是先生之言验，而先生之道行矣。三月十一日晓，遵先生遗嘱，移灵至泾阳。长安各界公祭于西关，素车白马，满街塞巷。十五日，安葬于泾阳社树堡两仪闸畔。民众远道祭奠者，五千余人。二十八日，国民政府特令褒扬，文云：“陕西水利局局长，前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德器深纯，精研水利。早岁倡办河海工程学校，成材甚众；近年于开渠、浚河、导淮、治运等工事，尤瘁心力，绩效懋著。方期益展所长，弼成国家建设大计，永资倚畀。遽闻溘逝，悼惜良深。李仪祉应予特令褒扬，着行政院转飭陕西省政府，举行公祭；考试院转铨叙部，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以彰邃学而资矜式，此令。

#### 编辑缀言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六日，水利部开全国水利行政会议于甫京，曾决议编印《李仪祉先生全集》，由陕西水利局集稿之案。又陕西水利局，于抗倭战中，在敌机轰炸声里，恐先生遗稿散失，或成劫后余灰，曾急就成章，仓卒编印《李仪祉先生遗著》石印本。然必须再加整理，妥为笺注，俾全集本事，缀述稍详，并照编年制重新

排列，或可免阙文之憾。爰于是年冬，由编者于办公之余，开始工作，并由傅建哉襄助，经本年春夏至秋仲完成。复觉有余力，即编辑《李仪祉先生年谱》，至双十节脱稿。每当挟笔肆书之时，常忆先生毕生事业，以陕西水利局为报基，然后及江、淮、河、济。但抗倭战起，后者多被破坏，惟陕西水利安然无恙，且在陕工作同人，锲而不舍，踵事增华。计自民十一年进行以来，至十九年开始施工，到于今已近三十年。历史及成绩，对大战中军需民食，不无小补。但水利工程创始固难，守成亦不易，而际此乱世，其破坏性为尤烈。论者谓郑国渠之远大规模，系被破坏于楚汉分争之时，不为无据。吾人在警惕之中，固守岗位，各有护渠之责，深望李先生毕生事业，硕果仅存之陕西水利，得于狂风得于狂风骇浪中渡过彼岸，而永久垂惠于人民也。

民国三十七年双十节浙东门人胡步川谨识

（文内标点，系编者所加，未经作者校阅。如有差错的地方，应由编者负责。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六日）

## 陈树藩事略

韩维墉

陈树藩，字柏森（又字伯生），祖籍湖南宁乡，清嘉庆年间落户于陕西安康县之王彪店。世代耕读。父声德，初事农后经商，以卖绸为业。母夏氏，年四十余方生陈，以是特别钟爱并尽力培养。

陈树藩生于一八八五年农历十月十四日，七、八岁时，从其叔父（清末拔贡）在家塾读书，二十一岁考入陕西陆军小学肄业，二十四岁挑送到以北洋军阀段祺瑞为督办的保定“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一九一〇年毕业，被派充本省新练陆军“陕西陆军混成协”某标（团）军械官。

陈树藩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从小又接受孔孟教育，封建正统思想极为浓重。他对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都视为犯上作乱。当时正值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蓬勃发展，无论在保定速成学堂或在陕西新军中都有同盟会的秘密组织与活动，但陈一律反对，从不参加。并诋参加者为好虚名、尚空谈，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直到一九一一年农历九月初一陕西新军中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前夕，他才浼由井勿幕、景定成（梅九）介绍入同盟会。事定后又参加了以张凤翔（翔初）为首的“秦陇复汉军”都督府工作。在哥老会头目万炳南与张凤翔争夺大都督开会讨论时，陈树藩初露头角，在会上隐指炳南，大骂其夜郎自大，双方几至动武。万等哥老会诸人始为之收敛。

陕西辛亥革命初期，各派系间争权夺位，争吵不休，局面极为混乱。陈树藩不动声色，一面靠近中上层革命人物井勿幕、景定成、郭希仁、郭瑞浦、张瑞玘（衡玉）等；一面交接哥老会头面人物陈树发等；并网罗渭北刀客（游侠一类人物）如：严飞龙（小泉）、严锡龙（野狸子）、严纪鹏（白翎子）、王飞虎（子风）等和同盟会党人胡

景翼、曹世英、冯毓东等。兼并了纪律不良的“冯翊军”巡缉营郭坚部，掌握了数千之众的实力。陈以东路宣慰使名义驻防同州（大荔）一带。不久，奉调以河东节度使的名义，支援山西革命，光复了运城。结交了河东军政分府王用宾（太鷗）、李凤鸣（岐山）等革命人士。获得了王等酬谢的官盐两千“名”（每名三万斤），自己又订购清盐（免税）六百万斤，以此为资本，招兵买马购械，扩充实力。此时清署理陕西巡抚升允纠合甘军马安良、陆洪涛和固原提督张行志分三路犯陕，中路由升允统率，围乾县、陷礼泉，进攻咸阳，西安震动。陈树藩又奉调率其劲旅严飞龙团紧急驰援，围攻升允所盘据的礼泉。战争激烈，严飞龙中弹阵亡。解除了西安、咸阳的威胁，终于迫使升允议和撤军。由于这一系列的战功，所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陈任旅长。

一九一四年元月，河南白朗（白狼）起兵入陕，袁世凯以“剿匪”为名，派其亲信陆建章率北洋陆军第七师（后改编为第十五混成旅、第十六混成旅）入陕。旋即发表陆建章为陕西将军。陆到后，首先排除异己，先后编并、遣散陕西路军第一师张云山部和第二师张钊（伯英）部，唯独陈树藩以二万两烟土为贽，拜陆为老师，并于陆子承武结为盟兄弟，又以大量金钱、烟土贿通陆之左右，得保存其第三混成旅，又以在陆未入陕前，陈曾重创白郎于兴平、礼泉之间，立有战功，在当时陕军中比较正规能战，不久又兼任了陕南镇守使。

陆建章残暴成性，素有“屠户”之称。督陕后，他秉承袁世凯意旨，捕杀陕西革命党人张深如、王绍文等十八烈士，引起党人的极大愤恨。陆原籍安徽蒙城，他用人唯乡，当时有“会说蒙城话，便把洋刀挂”的谚语。陕人统以“徽客”称之。这些徽客们抱着发财的目的，远来西北，横行霸道，欺压百姓，首先引起刀客们的仇视。在长安市上，凡在小街僻巷，不分白天黑夜，一遇徽客便抽出匕首刺杀。刀客徽客，互为敌视，相激相荡，矛盾逐渐升到上层。此时国民党人也在渭北各地奔走联络，发起“讨袁逐陆”。焦子静、高峻（峰五）一度在白水起义独立。陆遂调陈为陕北镇守使，兼渭北缴剿“匪”总司令，

妄图以“毒”攻“毒”，制造陕人内部分化。胡景翼时隶陈树藩部，被编为游击营，该营革命党人最多，战斗力最强，驻防富平，早被陆所忌视。陆在排商震团追击郭坚开至陕北后，又派其子承武率一旅之众，所谓“中坚团”，开到富平，意图解决胡景翼营。不料被胡侦知，经过周密部署，一举将陆承武（陕人称作鹿儿子）活捉。时在一九一六年五月。陈树藩遂以小陆为奇货对老陆进行要挟。双方达成协议，以小陆换取陕督。当时，袁世凯正忙于帝制自为，不特对陈容忍，反封陈为男爵和汉武将军，不久，袁死黎继，段祺瑞当国，又于一九一六年十月明令发表陈树藩为督理陕西军务兼民政长（省长）。

先是陈树藩在陕西党人一致讨袁逐陆声中徘徊观望，及至小陆到手，始于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勉强就任了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但在袁死之次日（一九一六年六月七日），即通电取消独立。在这个电报中，他寡廉鲜耻地说：“袁大总统之薨逝，实在未退位以前，依其职权，实属中华共戴之尊，溯其勋劳，尤为民国不祧之祖，所有饰终典礼，拟请格外从丰，并议定优待家属条件，以表我国民未尽之思。”这个电报一出，陕西革命人无不切齿痛恨。于右任在质问电中问道：“阅公阳（七日）电使人发指！陕西独立，取名护国，自当与西南首义诸省一致行动。今袁氏朝死，暮即取消独立，且殷殷推袁为共戴之尊，不祧之祖，是则陕西何必独立，独立岂非叛祖。”对于陈请对袁饰终典礼从丰及优待家属一层，于右任在电中责问道：“试问袁氏遗产岂少，何待越俎代谋？军兴以来，战地人民死者不下数百万，此等家属更谁恤之而谁怜之？”后来有人对陈问及此事，陈推说是秘书长何达夫（陕南石泉人，清进士，刑部主事）属稿，未判即发。又有人当着陈、何的面提出此事，何竟大发脾气厉声说：“我就是不打死老虎。”陈在一旁笑而不言。

陈树藩因缘时会，登上督军宝座后，一面依附其老师，皖系首领段祺瑞为靠山，并参加了反动的督军团，成为院系的一个忠实走卒，完全背叛了革命。一面采纳了他的参谋长瞿寿祺（号湘衡，湖南人，保定速成同学）的建议，认为孙中山绝不能成事，段有实力，统一中

国大有希望。自己应先把陕西治好，再向甘新两省发展，俟羽毛丰满然后逐鹿中原，并与国内各实力派密相联络。陈首先扩充基本队伍刘世珑、曾继贤、张鸿远等部，并趁河北省遭受水灾，丁壮流离失所之机，派张宝麟在保定姚村招募、装备、训练新兵一旅之众。同时对于异己分子和带有革命色彩的部队，则设法排斥或严加限制。编郭坚、耿直所部为游击军（后改称警备军），胡景翼部编为步兵团，曹世英部编为骑兵营，而仅给高峻以团副。在用人方面：重用陕南同乡、外省同学。人们称之为“二同主义”。如第一混成旅长刘世珑（璧如、广西人），是速成同学；第二混成旅旅长曾继贤（子才），第三混成旅旅长张宝麟（仲仁），后来扩编的第二师师长张金印，都是陕南同乡。其次独立晒长細远（飞生）、麵（贿），也都是陕南同乡。此外，督军公署、省长公署上层人物，也完全是外省同学或陕南同乡。关中带兵的人只有团长李天佐（襄初）、团长姜宏模（伯范）二人。对与自己同甘共苦、流血流汗、共同创业的革命人士歧视疏远，或使之屈居下僚，甚至阴谋杀害。这都为后来“反段护法”与陈树藩对立的“靖国军”播下了种子。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陈树藩应党人宋向辰、樊灵山之请，派警备军郭坚部渡河，假道山西讨伐，兵到永济县境，张勋即败，晋阎来电质问，陈竟以“郭坚为叛军，请邻封协剿”作复，并派胡景翼、王飞虎阻击于河西，致宋、樊先后牺牲，郭仅以身免，所部几乎全部覆没。更激起关中人士普遍愤怒，为以后历次起义倒陈起了导火线的作用。

段祺瑞在讨平张勋后，撕毁约法，解散国会，实行独裁，全国开展了反段护法运动。陈树藩既倒向段祺瑞的怀抱，又成了陕西人民的公敌，所以各方酝酿倒陈，自然是反段护法的必然趋势。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九日，高峻、焦子静首先在白水宣布独立，高就任孙中山所委派的西北护法军陕西招讨使，传檄渭河南北声讨陈树藩。但以外援不至，寡不敌众，被陈树藩很快击溃。紧接着于十月二十六日，耿直之警备军在陈树藩肘腋下的西安发动军事政变，设计刺陈未遂，旋即展

开巷战。陈树藩仓皇中越过督署后墙，逃至北教场兵营，并调陈式玉营来西安增援，才将耿直击退。这就是陕西人当时津津乐道的耿直“西安打炮”的故事。人们对耿直深佩其英勇而又惜其不寿（耿直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攻蒲城战役中中弹阵亡，年仅二十三岁）。于右任事后为诗题耿照：“覆局何尝古异今，义旗虽倒果成因，英雄关内知多少，血战长安有几人。”足见评价之高。

就在耿直在蒲城殉难之日，胡景翼团留驻三原的备补营长张义安，被陈树藩的劲旅曾继贤旅严锡龙团所逼，奋起抵抗。张以机智勇敢迫敌缴械投降，曾、严缙城逃走。胡景翼、曹世英闻变，分别由蒲城、耀县驰至，至是与各方反陈力量组合，共同树起靖国军旗帜。

靖国军初成立，以普世英为左翼司令，胡为右翼司令，合力进攻西安。右翼一度攻入西安西关，直扑城下，左翼一度占领韩森冢，并攻入北关。陈部樊钟秀营又倾向于靖国军，暂时撤离战场，严守中立。陈树藩被迫两面作战，疲备不堪，每日早出晚归，东奔西驰，自谓“杀四门”。

陈树藩在此形势之下，急向北洋军阀政府求救，并以陕西省长一席为饵，调来驻豫西之镇嵩军刘镇华部增援，这才稳住了阵角。镇嵩军本嵩山土匪，刘镇华在政治上也是看风使舵，从此陕西人民又增加了一个凶恶的敌人，为尔后十余年刘镇华祸陕种下了恶因。

在陈树藩、靖国军对垒期间，双方参加战争的军队，陈树藩方面除自己的陕军外，有刘镇华的镇嵩军，许兰洲的奉军，张锡元、管金聚的直军，陆洪涛、马福寿的甘军，刘存厚的川军，李际春的绥远军和阎锡山派过河来的晋军。靖国军方面除各路陕军外，还有樊钟秀的豫军，卢占魁的绥远军，叶荃（湘石）的滇军，熊克武的川军，王安澜的鄂军。两方合计有十省的军队。关中各县几尽沦为战场，战事持续达四年零五个月之久。民食匮乏，又不能不勉应军需，而战久兵疲，纪律废弛，扰害人民之事处处皆是。陈树藩部之王飞虎，无异土匪，即靖国军方面之郭坚部纪律亦特别坏，人民深受其害，追源祸始，陈



树藩资历之阶也。

陈树藩在与靖国军对垒期间，有两件事为陕人所最关心，但至今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其一是“捉胡放胡”。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与陈树藩军骑兵团长姜宏模共事甚久，交情亦深，一天胡由三原轻骑至姜之防地渭南固市镇，姜以电话向陈树藩告密，陈即率领大批人马驰至固市，劫胡到西安。在西安督署囚禁了几年。此事发生后，有些人说是姜宏模卖友求荣。但又有人说是胡、姜连同驻蒲城的陈军团长李天佐合谋以胡诱陈，反而弄巧成拙。究竟内幕如何，至今没有定论。到了一九二一年直军大举入陕，陈树藩眼看大势已去，乃将胡景翼放回三原，希冀借胡之力收拾靖国军共同对付直系。所以人们说：陈树藩“捉胡无心，放胡有意”。特别是陈对胡一向有好感，始终未萌加害之念。软禁期间在生活上很照顾，并延宿儒毛昌杰为胡讲授经史，胡之书法与学业皆植基于此。

另一件是井勿幕在南仁堡遇害。胡被陈囚后，陈树藩托关中道尹井勿幕往三原收抚胡部，妄图分化靖国军，但井一到即被推为靖国军总指挥，一去不返。一九一八年秋，井由三原至凤翔慰劳滇军叶荃部，归途至兴平，郭坚函约到南仁堡其支队长李栋材驻地开会。至期井去而郭尚未到，即被郭派来的马弁李新生、任申娃击毙，李栋材函井的首级率队渡河至西安向陈树藩献功。李栋材驻军于西关糜家桥年余，勿幕兄岳秀时任陕北镇守使，屡向陈索李栋材，陈不得已，资遣李栋材逃匿汉口租界。此事发生后，一致认为井之死是陈树藩阴谋策划的。于右任挽井联说：“我哭井勿幕，耿耿爱国热忱不亚宋渔父。谁言李栋材，明明杀人凶犯就是陈树藩。”好象已成铁案。但陈树藩一直私下对人说：这是他们内部的事，与我无干。人们经过分析，也认为郭坚嫌疑最大，其理由录枪杀人者是郭坚的马弁，他们由马嵬来仍回马嵬；郭出面召集会议，始终避而不来；如此大事，也不追究凶手，李新生、任申娃在以后守乾州战役中且都当了连长。有谓郭之用意，想一箭双雕，杀井刺陈，特李栋材未得手耳。此说亦不无道理。但郭对井下此毒手，未免代价太大。说者又谓靖国军内部分子复杂，素有人

贼两行之分，郭坚匪性难改，所部纪律废弛，久为正人所不齿。井勿幕在陕西为革命先驱，享有崇高威信，他又担任靖国军总指挥。出于对革命负责，自不免于公私场合，对郭坚有所箴规。郭深衔之，故乘机报复泄愤。但事更有出人意外者，事隔二十余年，当年同盟会党人户县华孝康忽提出杀井的凶手实系当年郭的参谋长，时任陕西省政府委员马凌甫。其根由可以远溯在辛亥革命前。当时陕西学生在东京者分为关陇（咸长）、夏声（渭北）两派，马凌甫虽籍隶渭北，但参加的是咸长派。一次开会争吵，渭北派学生打了马凌甫，马凌甫认为是井勿幕指使，一直怀恨在心。这次在兴平召集开会，郭坚本不同意，但马凌甫以参谋长职权命令张昉（蒲城人，为郭差弁，摹郭书法酷肖）以郭的名义缮发公函，约于十一月二十一日齐集南仁堡会商攻打兴平贾福堂及进取西安计划。井不察竟遇难。华孝康并提出张昉当年随郭工作的亲信冯绍芳来信，以为佐证。控于长安地方法院，为井伸冤。法院以时逾二十年，依法不予追究而驳回，马凌甫亦不安于位而去职。此一椿公案终不了了之。所异者，华孝康忽于次年以被人暗杀闻。凶手又是谁？人们都认为“闲事少管，免得遇险”。井死时年仅三十一岁。昊天不吊，哲人其萎，对于革命损失无可弥补。但却证明了陈树藩并未预谋杀人。

陈树藩既招兵购械，扩张实力，自不能不搜刮民财，竭泽而渔。他继陆建章诱民种烟之后而大开烟禁，强迫人民种烟。设立“禁烟善后清查处”，以寓禁于征为名，无论种烟与否，统按各县土地面积，强征百分之五十的烟亩罚款。还在各地设卡，征收烟土运销税，又公开熬膏发售，供人吸食，牟取厚利。这期间弊窦重重，难以尽述。结果上自督军、省长，下至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发其财。而小民任其压迫剥削，未见其利先受其害，苦不堪言。特别是烟夺良田，农业日趋凋敝，吸食者日多，少壮均沦为烟民，驯致农村破产，盗贼蜂起，社会秩序不宁，贻祸无穷。陈树藩并预征田赋加重农民负担，为以后一年征几年粮，无限制地预征田赋开了恶例。

陈树藩在北洋军阀中根基很浅，资望较差。他既要巩固自己的地

位，就不能不向各方拉拢，要拉拢就得借助于万能的金钱。他不仅要向有权有势的军阀们进贡，即在安福系中，也要用金钱铺路，才能通行无阻。为了讨好徐树铮的欢心，每月捐助“安福俱乐部”十万元，作为该部经费。至于向某要人送古玩，向某督军送名贵土特产，那都是经常的事。陈对由外省来投靠他的同学或有力者介绍来的人，除隆重接待外，走时至少送川资二百两银子。有一位广西同学蒋自雄来投靠他，他委以参议，每月供其各种花费达千元左右。有一次李家中来电要款，陈一下就汇给三万元。他曾约奉系人物杨宇霆、常荫槐来陕为他整军理财，后以局势变化而终止，临去时各送旅费二万元，对人说：咱这里庙小容不下，让人家拿钱买官去。陈又常以金钱收买部下能为他出死力者，马弁赵元向他要钱，一给就是两个元宝（每个值五十两白银），嫌少又添一个。陈又把搜刮来的金钱在津、沪、杭购买房屋，在眉县齐家寨一带购水田数百亩，建有“配岳山庄”派专人驻守收租。他在西安旧满城的大片土地，是通过财政厅过到“陈××堂”（旧时富豪之家对外一般用堂名）的名下，至于出售这些官产应付的价款，是当作军费由督署出据领回。陈是督军，又是省长，他利用职权，就这样空卖空买，化公为私，凭空把官产倒在自己手中。至于军费不足怎么办？部队就向驻地征发！结果仍转嫁到穷苦的老百姓身上。那些财政厅的官员、督署军需课、以及地方官绅，巴结、奉承督军之不暇，谁还敢道个不字，自讨苦吃。

陈还广置姬妾，人问其故？答以老太太只生我一个儿子，受尽乡里人们的欺侮，动不动扬言要将我撂到汉江河里去，老太太为此惊慌颤栗，伤尽脑筋。我这是养的鸡多下的蛋多嘛！向老太太行孝。

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在陆建章督陕时期，已被美国文化强盗某贿通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协同上海专营盗卖祖国文物的某公司掇客，持袁函到陕西见陆，盗走了“拳毛騧”、“飒露紫”两骏，运到美国陈列在费城博物馆。所余四骏，这个强盗贼心未死，时陈树藩已接充陕督，他又串通某掇客来陕，通过陈的马弁某人与陈的父亲接上了头，将四骏打碎成零块，由昭陵驮运到草滩装船待运（一说三河口

或潼关)，被陕人发觉截获。此事当时风声甚大，与陈为敌之靖国军攻击尤力。陈自不便缄默，听说把往来奔走传话的某弁狠狠打了一顿了事。内幕如何，无从详悉，亦从无人追究。

陈的不动产，在宋哲元主陕时期，被当作逆产收归公有。以后在邵力子主陕时期又发还了。传说是陈的申请，以为自己并未遭到通缉，也未明令抄没家私，理应归还。并托由张翔初等大绅出面关说，才得发还。但又有说：华北特殊化后，蛰居京、津的一些失意军阀政客，跃跃欲试，对陈也有谣传。蒋介石为消灭隐患于无形，才指示邵力子发还陈的不动产，以示安抚。两说不知孰是，或此竟是一事，姑且存疑。

陈树藩就是这样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但他的一个高级幕僚某君，还为之鸣冤叫屈，说什么“他下台后只剩三十几万银币，和新旧军阀、官僚甚军他的师、团长相比，则少得可怜。”无论这个数字是否大大地缩小了，别的军阀政客究竟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揆某君的用意，直欲陈树藩把陕西的老百姓压榨成骨瘦如线，好让其能穿过针眼，进入天堂，方才甘心。

陈树藩还压迫省议会拒绝民党知名人士李根源长陕，及李到后，复百般阻挠其行使职权，限制其行动自由，终于迫其潜行离陕。对陕西同盟会创始人、关中道尹井勿幕，也监视、抑制，使其不安于位。又杀害了革命人士李岐山、康毅如、张承拭等。完全充当了北洋军阀的走卒，成了革命党的叛徒，陕西人民的凶恶敌人。

如果说陈树藩在陕西当政期间，还有一点可取的话，那就是独资创办了一所私立“成德中学”。这个学校，以所谓陕南才子、留日学生黄锡九为校长，由于经费充足，在师资设备上，不但一般私立学校望尘莫及，就是比之公立学校，也未可多让，总算为国家培养了一些人材。

一九二〇年北洋军阀直皖两系矛盾激化，爆发了战争，旋即以皖系失败而告终。陈树藩靠山已倒，预感到其末日来临，乃急派张藩奔

走于奉张（作霖）洛吴（佩孚）间，希图恋栈。翌年七月，北洋政府决定免去陈树藩的陕西督军而代之以阎相文。阎统率自己的陆军第二十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后升编为第十一师），会同原留陕的北洋军张锡元、管金聚（后改为王锡三）两个混成旅，吴新田由荆紫关一路进军；冯玉祥当正面，由西潼路向西安长驱直入。陈初尚欲抵抗，认为自己有三个师，镇嵩军也有三个师，连同直属部队和白刃人、袁鉴吾所统率的地方武力，不下十余万人，足可一战。其具体部署：以陕军刘世珑的第一师当东路正面；以陕军张金印的第二师，驻守礼泉、兴平、咸阳之线，防止西路靖国军郭坚部袭击；以镇嵩军第一师柴云升部驻周、户、眉三县，巩固后方；以镇嵩军第二师张治公部保卫西安；以镇嵩军第三师憨玉琨部与驻汉中的陕军第三师张宝麟部联防，迎击由荆紫关进军的吴新田部。不料刘镇华首鼠两端，表面上拥护陈树藩，暗地却派代表向直系输诚。驻在彬县的陈军郭金榜部，早派人向冯玉祥联系。结果是：刘世珑一触即溃，退到咸阳后又向冯玉祥投降；张金印只身逃走，所部由李纪才统率投降胡景翼。兵败如山倒，陈平素所赖以欺压百姓的封建集团，到了紧急关头，早已各自为谋，谁肯为陈树藩的个人利益卖命。若非张治公泄露了刘镇华的阴谋，陈还蒙在鼓里等待冯玉祥活捉了。陈在众叛亲离、束手无策之时，带着他的百余骑兵卫队，取道眉县斜峪口，拜赴汉中依靠张宝麟去了。憨玉琨得到刘镇华的授意，未发一枪，毫无抵抗地让吴新田顺利进军，与冯玉祥会师西安。陈逃到汉中后，打出西北自治军的旗号，还想收拾余烬，依靠张宝麟作垂死挣扎。一九二一年农历九月，冯玉祥、吴新田两路大军向汉中压迫，陈部惊魂未定，不敢应战，仓皇退往川陕交界之“大竹河”和万源、宣汉等县，依靠其保定同学川军林光斗苟延残喘。陈见大势已去，前途渺茫，先把家属、细软送到广元的朝天驿。搭嘉陵江船到重庆，托庇于刘湘，犹存观望。次年即转赴上海定居。陈旋以治病，撇下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残部，带着黄锡九等几个亲信，抄近路由万县乘江轮到了上海。过其寓公生活去了。

陈树藩离开队伍后，其残部由张藩统率，流落四川各地，粮饷即无来源，军心不免涣散，士兵经常零星逃亡；川军又垂涎其精良器械，遇有陈的小部队，也不断偷袭，从而吃掉之。这一期间，四川各军阀间混战正酣，陈部驻在甲施区，就替甲方打仗，驻在乙方防区，就替乙方卖命，为着就食，完全受雇于人，成了名实相符的雇佣军。到了最后实力日损，竟以十一万元的代价，将仅余的几千三秦健儿，卖于贵州军阀袁祖铭，改编为川黔边防军，驻于川南之合江县。陈树藩六年督军，搜刮民财之不足，最后竟连陕西老百姓的子弟当作货物出售，这是何等的残忍！真是创古今中外之奇闻！

陈树藩在沪匿迹一个时期，就迁居到天津，以十万元开了一个永盛德钱庄。由同乡王介藩任经理，以此维持日常生活。陈在津的长期寓公生活，寂寞无聊，也和一般失意军阀政客一样。日唯研究佛教经典如：《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并手写《华法经》四部。抗战时到了四川，旋赴峨嵋某寺休养。其复某友人书有云：“峨嵋自囚，忏悔罪孽，日在佛前祈祷，为众生消灾化劫。”俨然大慈大悲，佛门弟子。

陈树藩不特息影津门，闭门思过，而且绝意于政治生活。在当时战乱频仍，屡次政权嬗递中，从未萌有白云出岫，东山再起之念。传说蒋介石在北伐时期，特派他们的同学姚琮（他们是保定速成学生）到津，约陈担任某项军事工作，被他婉谢了。及至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华北，王揖唐在北平组织伪政权，请他当汉奸，一说陕西失意军人郑某到津，打着陈的旗号与日寇勾结。当时西安盛传陈伯生已到了运城，将随日寇进入陕西。他为避嫌疑，怕胁迫，于一九四二年抛弃妻子，间关万里，只身逃到大后方四川。当时交通梗阻，道路不宁，有时一肩行囊，跋山涉水，踽踽独行，备尝艰苦。过故乡陕西安康时，他过门不入。仅于远处山头上遥望故居“五彪店”即掉头而去。及到成都，蒋介石闻讯，派人送来军事参议院参议聘书一张、法币二百，他说：钱是需要的，留下，聘书退还。如此倔强，总算保持了晚节。

当二次直奉战后，奉张以安国军大元帅盘踞北京，大捕共产党人。

北京“三眼井”地方的陕西革命学生地下组织被破坏，杨晓初等被逮捕，陈树藩运用与奉系的杨宇霆等关系，将杨等二十余人完全保释。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了杭州西湖金沙港为他父母所置的庐墓房，又过其逍遥生活。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时，他一反故态，忧心如焚，上书蒋介石，劝其接受十年内战的教训，悬崖勒马。及至李宗仁当政，派出和谈代表去北京与共产党谈判时，他托胡景通带口信给于右任，务须争取参加代表团，消弭战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陈树藩庶几近之。

陈有三子，长泽秦、次泽晋、再泽湘。泽晋早亡，泽秦为人耿介，精于书法篆刻，尤善于辨别古籍版本，不类纨绔。

陈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卒于杭州寓庐，终年六十三岁。

本“事略”参考冯玉祥所著的《我的生活》，吴沧洲所写的《我所知道的陈树藩》和《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有关各篇。并得到胡景通、刘安国、耿庄、陈泽秦诸人提供了许多资料。但以个人孤陋寡闻、水平有限，疏漏和谬误势所难免，希阅者不吝指导补充，以期翔实，勉成信史。并向以上诸人致谢！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 北洋军阀统治陕西时期的史料

### 陆建章血洗陕西省模范监狱二则

[编者按]

一九一六年五月初，陕西督军陆建章长子第一旅旅长陆承武所率中坚团在富平被陈树藩部胡景翼所歼灭，陆被生擒，陈树藩即在渭北宣布陕西独立、反袁逐陆，陆建章以爱子生死不明，张慌失措，下令封闭省城四门，实行戒严，且征集大量石油、笞帚，准备纵火屠城。

此时陕西省模范监狱押有犯人三、四百名，他们闻知渭北陕军分三路向西安进军，陆的统治临近土崩，遂乘机暴动越狱，从监狱蜂涌而出。陆建章派军队镇压，把赶回监狱的犯人一一斩首；并沿街搜捕，把抓获的逃犯或被误为犯人的行人、乞丐都就地杀戮，一时西安城内各大街、路口，死尸横陈，极尽惨凄。

此事发生在五月十五日。接着，陈树藩入城，迫使陆建章交出印信。陈于十八日布告就任陕西督军兼民政厅长，陆建章旋于二十五日狼狈离陕。几天之内所发生的上述事件，过后并未引起人们所关注。现征集到有关此事的回忆录两篇，一并刊出，借以保存这一历史事实的记录。

### 陆建章屠杀陕西模范监狱亲历记

侯 明 玉

陆建章屠杀陕西模范监狱一事，我是身历其境的，现就回忆所及，写出如下材料：

我是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圣力寺村人，幼学木工。辛亥革命后，在兴平张子宜开设的“西安精业公司”作工。一九一五年陕西成立了



模范监狱，他把我介绍给典狱长俞宪曾，从此我便担任了监狱木工科的技师。同时经张子宜介绍担任模范监狱技师的还有裁毯科的关自利，油漆科的王林三，染织科的宁天训等人。染织科的宋锡侯技师，是由北京染织学校毕业的，与典狱长是朋友。我们这些人都是技术人员，专教犯人学艺。

一九一六年的春天，忽然听说，督军陆建章对监狱犯人颇有怀疑，并令高等检察厅长易恩侯和典狱长俞宪曾共同对犯人严加防范。为此，高等检察厅还召集了一次会议。会后对犯人的管理较前严了一些，经常考查犯人的行动，还实行轮流值班巡逻。

当时监狱的犯人共有四、五百人，他们是由陕西各县送来的。监狱的看守人员只有三十多人，有枪十几支，其中能用的仅有两支。

记得是一个星期一，高等检察厅突然打来电话，叫典狱长和科长们去开紧急会议。这时监狱里只留下几个看守，犯人们借此机会，发动了暴动。

这次越狱暴动，是由犯人王兴奎和小向首倡的。他们原在木工科学习，暴动前，他们先做了准备：偷去了一把凿子，启掉了屋墙上的砖。当看守查号时，他们用棉被堵住了挖通处，使看守不易发觉。暴动这天，他们打通了砖墙，并用砖先砸开了脚镣，冲了出去，打死了看守，夺去了枪，开了监房门；还到第二科取来铁凿子、榔头等物，把各监房的门启开，砸开脚镣，以院内正在修房用的木椽作为武器，发给犯人们，一涌而出，去找典狱长和各科科长，当时他们不在，只有姓索的教诲员在屋，即被打死。犯人们还开放了女监，一起冲出大门。不料他们一出大门，就被城上的机枪兵和九府街、老关庙十字的军队包围上来，开枪射击，打死了不少人，抓回来一百多人，连那些没有越狱的犯人都都捆绑起来。这时我躲在监狱对门姓杨的老百姓家里，后被士兵搜出，硬说我是逃犯，捆绑起来，拉到他们连长面前，不由分说，命令把我杀掉。当时我已吓糊涂了，被拖出监狱门口，正要处决，跑来一个士兵传令到九府街口执行。走到刑地，眼看就要杀

头，突然来了一队巡查队，为首的军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押我的两个兵士说：“他是抓回的逃犯，连长命令杀头”。这位军官立即解释说：“他不是犯人，他是监狱的技工。”并命令兵士给我解绑，把我带到北院督军府，交与一个管马号的人，要他保护我。这时我的头脑渐渐清醒了，才想到刚才救我的那个军官，是督军府卫士营曹营长。曹营长曾在监狱木工科订做过一批行军床，我曾几次给他交货，因而相识。在这九死一生的时刻，我侥幸免遭屠杀。

我在马号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到监狱一看，不由心里一怔，大吃一惊：监狱的技工关自利、王林三都被陆建章的兵杀了，大门上姓赵的和姓薛的看守，还有其他一些不知姓名的看守也被不分皂白地杀了，每天给监狱送货送菜的酱园、面房的几个伙计也一同被杀了。至于因越狱暴动被捉回来的犯人，更是无一幸免，逃脱性命的只有宋锡侯技师。听说这种残暴的处决，是奉了陆建章命令的。在被杀死的一百多人中，有些不是犯人，很多是街上的乞丐。只要谁说话是陕西口音，都被指为逃犯。有些刑期快满，并没有参加越狱暴动的犯人，也都被提出来砍了头。陆建章借此泄私愤，祸及无辜，人称他为活阎王、大屠户，真是一点不差。

有一个犯名叫张三女，是山东人，在城隍庙门住，以收破烂为业，犯的是小罪，他在受斩时，刀砍在后背肩上，随手倒下落在坑里，后来搬尸的人发现他尚有气息，立即抢救，才慢慢地活转了。他是被陆建章害而未死的一人。

我看见在监狱西边因筑墙用土所挖的深坑里，填满了尸体，血水腥气令人闻之恶心。搬尸的人，泪落如雨，非常伤悲。

当时有人说，在各十字路口杀的人，比在监狱杀的人还多，多是无家可归的穷人和乞丐，头天半夜及当日清晨都下了雨，这时尸横街头，血水四溢，真是惨绝人寰！

### 回忆陆建章血洗模范监狱事

## 宋 锡 侯

一九一六年陆建章被迫离开陕西的前夕，曾大屠杀西安模范监狱越狱犯人尽数杀戮，在各大街巷口又杀了许多无辜人民，造成空前血案。其时我正供职监狱，目击此事，现就记忆所及，作以下记述。

我于辛亥后，在北京住染织学校，毕业后回到西安。因与模范监狱典狱长俞宪曾熟识，被介绍到监狱作染织科技师，教犯人织毛巾等工艺。这时陆建章刚做了陕西督军。

犯人暴动越狱事，发生在民国五年农历四月中旬，记得当时气候还不热，监狱附近麦田的小麦正在吐穗，被杀死的犯人们都还扎着裤腿。

陆建章在陕西，剥削人民，压迫陕军，杀戮革命党人，助袁世凯谋帝制，引起各方人士的义愤。当时高峻、郭坚、曹世英等先后举兵反对陆建章。陆命其长子、陆军第一旅旅长陆承武率中坚团追击郭、曹，军至富平，被胡景翼将其全部歼灭，生擒陆承武。陈树藩乘机宣布陕西独立，渭河以北陕军向省城进军，北路由草滩过河，东路进至十里铺，西路亦由咸阳渡渭。此时西安城内，风声鹤唳，陆建章的局面已呈动摇。因此，狱中犯人认为时机已到，遂发生暴动越狱事。

当时狱中在押犯人约三、四百人，有许多是由外县送来的“要犯”。越狱是那些人首倡，我不甚了解。侯明玉说是王兴奎和小向。据我知道，王兴奎是蒲城刀客，小向是辛亥时从富平监狱出来以后，带领向字营在西路作战的哥老会大爷向紫山的儿子。他们因什么案情系狱，我不清楚，暴动由他们首倡这是很可能的。狱内犯人同外边反对陆建章的活动有没有联系？这确实是有的。我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一个从事秘密活动的朋友，托我给在押的吴清纯（字志德）传递了一封密信。信的内容虽不知晓，而吴清纯确是一个搞革命活动的人。最近陈省生对我说：吴清纯（白水人）在二次革命时，被张凤翔捕押，陆建章来后移交，张于离去时曾嘱把吴处死，后因有人从中缓颊，故而搁置。迨陆建章子承武在富平被擒，陆急欲觅得与渭北有关的人前

往疏通，挽救他儿子的性命。适陈省生此时来西安，为救吴清纯，通过王一山，向当时的军警督察处长张绰甫、警察厅长张竹亭，推荐吴清纯可担任赴渭北传讯之任。张果欣允，即将吴从狱中释出，送至王一山家。次日即雇骡车一辆，送其出城，陈省生与吴同车从草滩渡河时，遇到从河北开赴逐陆陕军，遂应邀一同加入陕军转而共趋省东迫进西安。这是犯人暴动越狱前一、两天的事。

越狱暴动的那天早晨，我正在房里，忽然听得人声咆哮，犯人们从监房冲出，有的手拿铁镣，有的拿着棍子、大椽，乱嚷乱喊涌出大门，我跑到门口，看见约有百十人向西，朝老关庙街一带奔去；一路，约七八十人向东从九府街奔去；还有一路，人少一点，向南往许士庙街奔去。其中老弱带病的，分散潜藏附近民家。接着陆建章的军队来了，鸣枪禁止骚动，从东、西、南三路把逃出的犯人压迫退回，但逃走了过半，被胁迫回到监狱的约百数十人。这时他们锁住监狱大门，遂在附近居民家挨户搜查，把那些不能走路的，患病的犯人搜出，一律拉进监狱。

当时我躲在监狱西边一家老百姓屋里，也被搜出。我一再申明是监狱的职员，不是犯人。他们把我带进监狱里。带队的营长从电话得到陆建章的指示，着将越狱犯人一律斩决。他们便着我记录犯人姓名，一一叫到，记下名字，拉往监狱西边一个大坑旁斩首。后来见我一人记录来不及，又加了一个人一同记录。仿佛记得那个营长在电话上报告说一百一十七人，这一点不能确定。总之，在监狱杀人绝对在一百人以上，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在各街抓到就地斩首的人到底有多少，因我当时在监狱，不得知道，但据事后听人说西安各街口，如南院门、西大街、西华门、九府街口都杀人不少，确实是骇人的大屠杀。

陆建章未来陕西以前就因残酷嗜杀，有“陆屠户”之称，是袁世凯的一个凶恶的爪牙。他血洗陕西模范监狱一事，就完全可以证明。

## 刘镇华筹建铜元厂弹药厂的经过

## 李宗祥

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发生，陕西督军冯玉祥离陕，刘镇华从省长而又攫得陕西督军，掌握了全部军政大权。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扶摇直上，他的军事力量也逐步扩大，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军阀。就他所带领的镇嵩军说，已由援陈入陕时的三千余人，扩充到四个师，连同直属部队和收编的麻振武、缙章保、郭金榜等，不下六、七万人。但是，当时陕西境内仍存在宰事集团割据一方的局面：吴新田盘据陕南；井岳秀占据陕北；渭北几县仍被胡景翼的留陕部队驻扎，在行政、军事、财政方面经常掣肘。野心勃勃的刘镇华，既掌军政最高职权，又拥有较大的兵力，绝不甘心于这种现状，时刻企图巩固统治权力，扩大地盘。因此，进一步奠定经济基础，垄断金融，补充军队实力，就成为刘镇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筹备铜元厂和子弹厂的计划，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措施。

一九二二年，刘镇华甄录国内外大专学校毕业生，我被录用在省长公署第四科（教育实业科）充任科员。当年秋季的某二天，刘令我检查民国元年张聚庭任实业厅长时所办的面粉厂机器，看现存的那些可以使用。当时，我猜不着他的意图，不知要用这些机器作什么。经检查制面粉机器大部破烂不堪，仅有一部卧式单汽缸蒸气机和一部水管式锅炉尚完好，但蒸气机的负荷量如何，因机器上的牌子已脱落，无由知悉，估计不过一百多匹马力，仍须加以修理，才可使用。以上情形，我向刘当面报告后，他对我说：拟在陕建设铜元厂一处，日造铜元二、三千串（以制钱计），作为富秦钱局钞票兑换准备基金。嘱我把这件事计划一下。

我在日本大阪上学时，曾参观过大阪金币制造厂，对于造币厂内部设备和工作过程，只有一些印象。对大同小异的铜元厂，确是茫然无知，无法着手计划，只好向刘敬谢不敏。但过了几个月，刘镇华又派我和梁文焕（号温如，河南宜阳县人，第四科科员，学过化学，系当时陕西财政厅厅长梁文渊的兄弟），持刘的介绍信，到豫、津、鄂、宁、沪等处作一次调查，等回来再作决定。我们于当年冬初出发，到

指定地点的几个铜元厂调查了一番，于次年二月间返陕。把调查所得的设计、建厂、内部组织和开工使用的工人数，以及原料的来源等，向刘报告后，还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到了一九二三年农历七月间，刘镇华又命我同张霁若（河南巩县人，系刘的老师，又是刘的妹妹的公公），同往上海购买机器。临行前刘对我说：除购办铜元厂机器外，再买一套制造七九、六五弹药的机器；另外再各买一套制造马克沁机关枪和修理枪械的机器。我与张起行时，刘交给我俩三十万元向汉、沪两地的汇兑票据，并指示下余不足之款，俟我们到沪后陆续兑去。他还对我们表示说：今年周至、户县所有烟款和税款收入，将作为购机器和建厂的专款，决不移作别用。在此时，外人只知筹建铜元厂，关于购买制造弹药和修理枪擒机器一事，对外还讳莫如深。

### 筹建铜元厂的原因

刘镇华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垄断全省的财政经济，势必要统一全省的货币。当时陕西境内流通的各种货币大约有下列几种：①清末遗留下来的制钱，仍在全省各地流通使用；②当十（当十个制钱）、当二十的铜元主要流通在关中地区，大部分由奸商运入，少部分是由外来军队和旅客带来的；③四川造的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的黄铜元，流入陕南城乡；④安康还使用湖北官钱局发行的钱票；⑤除镇嵩军以外，有些驻军也自己发行纸币，流通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内；⑥有些县也以该县署名发行纸币，在一县之内或邻县边境上使用；⑦陕西省署财政厅所属富秦钱局发行的纸币，流通于关中地区和镇嵩军驻地。不仅货币流通情况是极其纷杂的，其价值也有差别。一般是硬币高于纸币，硬币中又以当十铜元为最高，当二十的次之，制钱又次之；纸币中以富秦钱局发行的为最高，县级发行的最低，一元硬银币可换七、八十串（指它的票面额而言）。就富秦钱局发行的纸币而论，人民群众对它的信用也不高，平时兑换较少，一遇时局有变，持该局的纸币兑换硬币者，蜂拥而至，秩序大乱。该局库存自来有限，为了应付现状，每人只许兑制钱一串，每日规定只兑出若干串，兑完

即行停止。富秦纸币因此而贬值。

在这种币制混乱的局面下，地方财政也相应造成许多混乱，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不可估计的灾难。可是却给税收人员营私舞弊和在邻省制造劣币谋利造成了一个大好机会。

刘镇华一心想要扭转这个混乱的局面，筹建铜元厂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铜元厂如建成后，有以下的利益：①铜元厂在制造铜元过程中，就可获得一部分纯利；②制造铜元给富秦钱局作兑换纸币的准备金，在社会上造成声势，可骗得人民群众对它的信用，借此能以少数的准备金，继续发行大量的纸币；③在重要城市建立富秦钱局支局，扩大营业范围，发行纸币，以抵制其他地区发行纸币，可以集中金融财权；④支局可在各地以纸币收进银币，给省银行作准备金，借以增加银票的发行额，又可吸收制钱作为制造铜元和子弹的原料；⑤本省货币统一后，邻省的劣质铜元和纸币即可逐步排除出境。刘镇华这项预谋如果现实，他的经济实力即可渗入全省各地。在铜元厂和富秦钱局两相结合之下，既可统一本省的货币，又给刘的统治打好经济基础。铜元厂就变成剥削人民的工具了。

### 计划以制钱做原料

军阀割据时代，各省十有七八都没有铜元厂，而造铜元的紫铜（电解纯铜）大都依赖进口。当时国际汇兑高涨，紫铜售价随之上升，依靠进口已无可能。我调查时了解到天津铜元厂库存有大量制钱，作为制造铜元的主要原料。在销毁溶炼时，首先提出其他金属，再化验铜的质量是否合格，如不合格则掺加该厂自制的电解铜（该厂有电解设备）。这样比购买进口紫铜成本低的多。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在大阪上学，在大阪、神户电车道两旁，就有六、七十处专门销毁中国制钱的工厂，仅提炼出的铅已够成本，其他金属——铜占大部分，均为纯利。按照陕西当时情况，各地制钱流通仍占主要地位，参照天津的办法，用制钱作原料，制造当二十铜元，能获得很大的利润。故

在我们赴沪购办机器时，刘镇华即密令各地县署和税收机关设法大量收集制钱，为铜元厂开工准备原料。

### 筹建弹药厂的企图

刘镇华兼任督军以后，部队扩充至七万余人，所有枪支弹药来源，一部分系收编杂牌和土匪带来的；嫡系镇嵩军除原有枪支弹药外，补充部分是凭陆军部护照向汉、沪等地的外国洋行购买。但这个护照不用金钱礼物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凭护照购买一支大号盒子枪，带一千颗子弹，价格七十元；如在上海黑市，买一支盒子枪带一百颗子弹，价格二百余元。可见“护照”的价值了。还有一部分步枪、机枪、大炮弹药，是分别购自汉阳、上海、巩县的兵工厂。这些兵工厂，均控制在该地区的军阀手里，如吴佩孚之巩县厂，肖耀南之汉阳厂，何丰林之上海厂等。因此，订购械弹，首先须与那些军阀拉好关系。否则，订立购买合同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合同成立，对兵工厂中的上层人物如无金钱礼物馈赠，迟至一年以上还不能按合同将军火交付。在上海，陈树藩曾交给我一张他在任陕西督军时，向汉阳兵工厂订购的价值三十万元的枪支弹药合同一份（他下台已一年有余，终未办妥），并嘱我将合同转交给刘镇华，以使用陕西省署名义向汉阳兵工厂交涉。刘镇华同以上几处的军阀关系拉拢的很好，并在这几处都设有陕西督军署办事处，派有专人办理购买军火事宜。据办事人对我说，这几个兵工厂科长以上的重要职员，经常收到以刘的名义给他们送的金钱礼物。因此，陕西订购的军火合同于成立后的三、四个月内，即可成交。但是，在订购军火的数量方面，刘镇华也常受制于人。镇嵩军虽拥有七万有余的枪支，而每支枪配备的子弹数量，较之皖、直、奉、晋，以及占有海口的军阀部队，相差很远。刘镇华对此是决不甘心的，故筹建弹药厂，就成为他迫切的要求。当然，在子弹厂建成后，他首先要充实壮大嫡系军队力量，巩固在陕西的政权，用以镇压人民；其次乘机问鼎中原，扩大地盘；再次是西北各省小军阀都没有弹药厂的设备，弹药缺乏，势必要仰仗刘镇华就近接济他们。刘便可进一步与



他们拉好关系，稳定后方。

### 购买机器及建厂的经过

刘镇华筹设铜元厂、弹药厂，包藏着很大的野心，而吴佩孚不但未发生疑心，且给予支持，代刘向陆军部索取这批机器进口的护照。这是因为远在直系军阀在陕西撤换陈树藩时，刘即暗与直系勾结，倒陈附直，故未经较大战争，很快地赶走了陈树藩，从此得到吴佩孚的赏识。嗣后刘派他的策士马连樵常住洛阳，继续迎合吴佩孚及其左右亲信。据我所闻，刘对吴身边的差官马弁等，每月每人都有一、二百元以上的馈赠，对吴的参谋长李卓章馈赠尤多。因此，吴的左右全是替他说好话的人。所以这批机器进口护照，在我们决定同汉运洋行订立合同时，即按时寄到。

一九二三年农历七月间，刘镇华派我同张霁若赴上海购办铜元厂和弹药厂的机器。我对于铜元厂虽然作过一次调查，但对于兵工厂内的一切设备，确是茫然无知。无奈“兼座”有命，只得跟着这位张先生前去。在赴沪途中，经巩县，张在家住了几日。我到巩县兵工厂访问同学刘守愚（号建庭，陕西商县人，日本帝国大学造兵科毕业，任该厂技师，后曾任全国好几个大兵工厂的厂长），在该厂住了数日，一面参观，一面向刘领教。后到汉口和上海，我们都住在陕西督军府办公处。这两处的办事人员，与汉阳、上海兵工厂的中上层职员都混的很熟。因此我们常到两个兵工厂内部参观、领教，了解兵工厂设备结构。大体胸中有数后，遂拟定购买制造铜元、弹药机器的计划，以便在沪着手进行。上海的洋行消息异常灵通，接踵来到陕西督军府驻沪办公处与我们接洽。他们照例先备盛宴招待我们，吃喝游玩，极尽拉拢之能事。与上海一些洋行交易，时常会发现滑头骗局。我们也提高警惕，从中选择了几家资本雄厚，信用素著，比较可靠的大洋行，如英商怡和洋行，美商慎昌洋行，德商西门子洋行，德商汉运洋行和中国军阀资本家经营的信谊公司，提出我们的计划要求，请他们开帐，

以备选购。最后与德商汉运洋行订立了合同。其中的原因：①当时我们知遣德国的机器，特别是军火机器比别国的好；②运洋行所开的帐与其他洋行比较，机器相同而价低；③商议订立合同中，许多条件汉运洋行尽量迁就我们；④在付款方面汉运洋行能使我们放心。特别在付定款方面，其他洋行要在订合同后先交百分之四十的价款，机器运抵上海进口后再交百分之五十，到汉口起卸后全数付清。而汉运洋行，依我们的条件，订合同后不需交上述款额，只要我们给浙江兴业银行（我兑沪之款全数存该行）去一封信，声明这笔存款是以后交付汉运洋行订购机器的专款；然后由汉运洋行持订购合同向兴业银行交涉挪借一部分，付德国工厂定造机器，机器运到上海后，付价款半数，到汉口起卸后全数付清。同时汉运洋行经理夏尔曼（德国人）人极精干，对我们配备机器和建厂计划等等，还提供了许多建议；该行善于拉拢生意的买办朱殿元（湖北省人）又从中周旋，这笔巨款交易终于落到汉运洋行手里。

订购机器的内容，共分三大部分，即：动力厂、铜元厂、子弹厂。动力厂系由水管式锅炉、蒸气机、交流发电机、配电盘等组成的。发电容量为二千五百瓩。两厂使用动力，本不需要这样大的容量，因我当时主张为以后两厂扩充时的动力留下余地，或作西安市电灯照明之用，故应当大一些好。

铜元厂的内部，系以烘炉、轧条车间、冲饼、光边冲洗车间、轧花包装车间组成。在生产过程中，冲饼、光边、轧花各部机器，都附带两套铜板，可造当十的铜元，也能造当二十的铜元，每日的生产量约计三、四千串（就制钱而言）。

子弹厂的内部，系由弹壳车间、弹头车间、制药车间、底火车间、成品车间、装箱车间等组成的。每台机器，均配备制造七九、六五子弹的铜板各一套。每颗子弹的制成，需经过十五、六道工序。工序过程，大半是自动操作，因之这部机器构造复杂、精密、灵巧，价值亦高，在三厂机器价值中，占比重最大，每日生产子弹约计四、五万发。

以上三套机器是由德国汉堡和柏林几个厂承造的，购买价值经过讨价还价，多次磋商，最后决定为八十三万元。我们以陕西省署代表的名义，于当年农历十二月除夕晚与汉运洋行经理夏尔曼，在汉运洋行一同签字。合同中规定，一九二四年十至十一月全部机器陆续运抵汉口。

此时，原先为扩充陕西机器局（即在西安城内西南角的枪械修理厂），所购买的制造马克沁机关枪和修理机械的机床等，也业已起运。至此，我们在上海需办的一切手续，均办完毕。一九二四年三月间，我和张霁若、夏尔曼、朱殿元一同返西安，以便同刘镇华商定建厂设计。选定西安西关外，即现在的飞机场为厂址。厂房图样，由夏尔曼负责设计。在此基础上筹备了一两个月，所定购的建筑器材，如水泥（在唐山启新洋灰厂定购五千筒）、美国松木料、钢材等等有一部分先后运到，有一部分尚在运陕途中。不久，机器也如期由德国运至汉口。适于此时，胡景翼与憨玉琨在豫西发生战争。刘镇华企图夺得河南地盘，遂将陕西军政权交给吴新田“照料”。刘亲率镇嵩军几个师，倾巢开出函谷关，满以为他有优势兵力，可以一战就消灭国民二军。不料交战不久，刘军全军败溃，刘镇华由茅津渡过黄河，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去了。他在陕西的一切阴谋计划和铜元厂、弹药厂等等都成为了泡影。

### 刘镇华围城祸陕的资本

刘镇华虽在豫西战争中失败，而野心仍然不死，逃到山西后，为了卷土重来，换取阎锡山的支援，遂将与汉运洋行订购机器的合同和交款条据献给阎锡山。胡景翼和在豫的陕籍军政人员，均以这批机器系用陕西省署名义订立的合同，购买的价款也是由陕西省库支付，所有权当然属于陕西。应由陕西省署接收方为合理，故决不许刘镇华私人盗卖。为此，曾招我去河南。当时我因父亲病重，迟延了几日，不久胡景翼又病故，我也因此未赴开封。一九二五年五、六月间，李虎

丞驱逐了吴新田，以帮办陕西军务（督办孙岳未到职）处理军政事宜，派我去汉口，表面上是为第十师（李任师长）和西安电话局（当时我任局长）购买一批电话和电料，实际为调查那批机器存于何处，以便赴沪与汉运洋行交涉。我到汉口向各有关方面了解后，方知此项机器早由阎锡山派人协同刘驻汉口办事处人员接收了。他们为了途中安全，未经京汉铁路，而是装船顺长江而东，经海道运至天津卸货，再经北京、石家庄运抵太原。以后听人说，阎锡山用这批机器在太原城北，原有兵工厂的西边，建立第二兵工厂一座，比他原有的厂还大。

岳维峻继胡景翼任河南督办后，不自量力，派出国民二军的几个患督军迷的师长，演了一场“杀四门”，进攻山西、山东、河北等省。此时，吴佩孚已与张作霖暗中勾结讨伐国民军，拉拢各方面可以利用的力量，刘镇华和阎锡山，都是其中主要的角色。吴佩孚给刘镇华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名义，刘即往太原与阎密商截击国民二军，俟机而动。在樊钟秀攻晋碰壁，李纪才攻鲁溃退，胡景翼收编的旧直军陈文钊、王文蔚、田维勤等师同时倒戈，国民二军在各方面军事失利。刘镇华乘机而起，纠集豫西及驻安康一带的旧部，占据函谷关以西高原要点。阎锡山派兵数团渡过黄河，帮助刘镇华夹攻，很快的把函谷关以西、潼关以东的地区完全占领，截断了国民二军的归路。云集在陕州、灵宝之间的国民二军残余部队约四万余人的武装，完全被刘镇华所解除。是役，若无阎锡山给刘镇华弹药军械和军队的帮助，单凭刘镇华的军力，仅能占据函谷关的几点险要地点，决阻挡不了国民二军数万之众。刘镇华得阎之助，对国民二军达到了报复的目的，且进一步率领约十万之军匪混合部队，未遇重大抵抗，长驱直入，抵达西安城下，围城八个月之久（由一九二六年四月至十一月）。刘军入陕，阎又由风陵渡陆续给刘军供给械弹，其确切数字不得而知。但据当时风陵渡的船夫说：每日运弹药下河滩的车辆，平均在百辆以上，每车以半吨计算，八个多月，约计一万五千吨去右。船夫的传说，未可认为是确切数字。但八个月战争需要的弹药，数量之巨大是可以想象到的。阎支援刘在政治方面固有其他原因，但刘镇华把铜元厂、弹药厂、发电厂三部分机器向阎纳贡，就成了他围城祸陕的资本。我是购买这

批机器和筹备建厂的一员，当时也出了许多主意，卖了不少力气，其后果竟做了刘镇华围城祸陕残害人民的帮凶。在围城期间，我的家属居城内，几被困死。我的胞兄在乡间被刘军的旅长万选才拉票，押在城北肖家村三个半月，直到刘镇华失败溃逃后才脱险，这是我自食帮凶的后果，至今思之，惭愧万分。

一九六四年

（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 刘镇华种烟敛财，对周至人民的危害

### 周至县政协调查组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刘镇华攫取陕西省长后，便大开烟禁，强迫扩大种烟面积，加大“烟亩罚款”的征收，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其惨重的祸害。兹就在周至县的见闻，概述如下：

#### （一）

刘镇华在陕西八年的反动统治期间，对周至种烟面积的扩大，“烟亩罚款”的加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周至县种植鸦片烟，始于清末。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周至即征收“烟亩税”。当时烟亩税款的款额是：平原地区每亩白银一钱；坡地、滩地六分。全县年征一千七百余两。光绪末年，“烟亩税”增加为平均一两，全县年征白银两万余两，种烟面积约为二百余顷。民国初年，陕西禁种鸦片烟较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自刘镇华充任省长后，始则与陕西督军陈树藩狼狈为奸，大开烟禁；继则扩大种烟面积，加大“烟亩罚款”（以下简称烟款），祸国殃民，遗患无穷。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刘镇华给周至摊派了一千顷烟亩，比清末增加了四倍；规定每亩征收烟款白银十两，比清末加重了十倍，全县烟款总数为一百万两，比清末骤增了五十八倍多。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烟价下跌。刘镇华将每亩烟款白银十两，改为征银元十元，但给周至强派了两千顷烟亩，勒令交纳烟款二百万元。到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间（民国十二至十四年），周至烟亩因刘镇华的强派，竟扩大到三千顷以上，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庞大数字啊！

#### （二）

贪婪无厌的刘镇华，在摊派烟亩，催收烟款方面，极尽残酷暴虐之能事，言之令人愤慨！

刘镇华对周至烟款，始终采取硬性摊派、勒令定案、强制科敛的政策。每逢农历二、三月间，他便从省上派遣一批所谓查烟委员来县，协同县派委员前赴各区（当时周至有东南、东北、南、西北、中五个区）游转一趟，名义上是勘查烟亩，实际上是勒索受贿。委员回到县里，便召集官吏、土豪、劣绅宣布刘镇华硬性规定的烟亩总数，强行定案上报。这种摊派的数字，当然不符实际，往往是实种面积少，摊派的烟亩数字多。例如，一九一九年摊派的一千顷烟亩分派到各村后，农民群众无不表示震惊，曾联名呈请实地丈量，以期核实。这时刘镇华巡视各县，来到周至。看见沿途烟花盛开，烟苗茁壮，认为周至地区适宜种植鸦片烟，可作为全省种烟主要县份。对群众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决定逐年增加种烟面积，以满足欲壑。这是周至种烟面积较全省各县特多的主要原因。

到周至的查烟委员，动辄达十余人。这些委员，除领干薪外，还在地方勒索受贿，及至返省交差时，无不腰缠累累，满载而归。例如，一九二一年派到周至的查烟委员师某，到处勒索受贿。他在二屯东所索贿八百元，二屯西所索贿六百元。因向二屯中所索贿未遂，就将东、西两所应派烟亩数，大部转嫁中所承担，以泄其私愤。其他省上来的查烟委员，亦莫不如此。至于县署给各区、各所、各村分派烟亩时，县派委员则以送贿多少决定种烟亩数的标准。送贿多的则以多报少，送贿少的势必以少报多，而最后都由他们上报定案亩数，平均计征烟款。因此，各所、各村实征数字，极不平衡。例如，一九一九年哑柏东上堡西门巷种烟五十四亩，除去缺苗断条部分外，实有烟苗三十六亩，却被分派了八十三亩，每亩烟款十两。结果，该巷被迫以三十六亩的烟苗，承担八十三亩的烟款，按每亩二十三两白银交纳。

刘镇华征收烟款，每年分做两个阶段：一是征收当年烟款；二是预借下年烟款。两种办法都采取严刑勒逼的手段，残酷暴虐，达于极点。

征收当年烟款。周至县署催收烟款，按五个行政区划进行。各区设置保卫团总，以土豪劣绅充任。五区共辖三十六所，每所辖十余自

然村。所设总乡约，村设散约（又称小乡约）。散约直接向农户收集烟款上交。一九一八年以来，烟款由县署统一经收。各区总团就近督促。到了收款期间，县署严刑勒逼，夜夜板子打到天明。一九二二年以后，为了催收便利，达到如期洗数的目的，改由五区分别经收，每逢收款时期，各区还经常住有刘镇华派来的镇嵩军参谋、副官等所谓催款委员；各所住有“坐所”（经常住在所里催款的差役）；各村则有时来时去的催款差役。各区每到所谓比款日期（一般每月九次，如中区每逢农历二、五、八日，西北区逢三、六、九日），总散乡约，齐集各该区应比。催款委员为了如期收清烟款，常采取责打催收不力人员的办法，来吓唬群众。由于每一比期，常有人挨打流血，因之群众把这种比款，叫做“血比”。一九二三年农历五月间，刘镇华派镇嵩军副官汪某来周至催款。汪带武装士兵二十余名，在中二屯庙前广场，召集中区各所总散乡约八十余人，勒逼交款，并喝令士兵对交款少的乡约轮流责打，受伤重的有数人，经过几月的治疗始能下床。此即“血比”中突出的一例。

总散乡约一旦挨了打，回到村庄就有了借口，偕同县区派来的催款团丁、差役，对欠款农民施以非刑。除采用鞭打、绳拴、带枷、游街、监禁等刑罚外，还以拉走农民的耕牛，提走饭锅等手段，进行勒逼，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在这种蛮横暴戾的压榨下，迫使许多农民变卖房地、出售牲畜农具，来交纳烟款。例如：二屯堡农民白受采因交纳烟款，卖掉了土地房屋尚不足以贖官府，被迫卖了活人妻，本人以乞讨为生；豆村堡郭升因交纳烟款，卖完了数十亩土地和耕牛农具，全家流离失所。此外，被迫放弃耕耘，逃避烟款的，则为数更多。如一九二三年夏忙后，豆村堡七百余户中，临时逃避烟款的竟有二百多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

预借下年烟款。贪得无厌的刘镇华，不仅当年的烟款要洗数收清，还向农民预借下年烟款。每到征收烟款尾数的冬季，便开征预借烟款，直到次年夏忙前止。其数额全县为二十万至四十万元之谱。这时农民已到山穷水尽、精疲力竭之际。但刘镇华不顾人民死活，硬性摊派。



贪官污吏，为虎作伥，巴结上司，图多得奖金，更是加成摊派，严刑勒逼。

刘镇华如此强取豪夺，犹嫌不能应其急需，竟然采用“拨款”的办法，直接指拨烟款抵付军政繁费。每到征收烟款时期，省财政厅就给军队、机关、学校“拨款”，让各单位派人提取。当时带上“拨文”来周至提款的，有镇嵩军军官，有警察厅警官，有省署各厅以及法院、学校等单位派来的人员。这些住在县署的提款人员，常达数十人。特别是需款紧急时，刘镇华即派人称“五大人”的胞弟刘茂恩来县提款。他带领武装卫士，横冲直撞，立逼付款，时日稍久，便对经征人员进行威胁打骂，甚至对县知事也不宽恕。各级经征人员，明知征收不力者受罚，超额征取者可以多得奖金，便不惜残害农民，以逢迎“五大人”。

农民除了缴纳刘镇华额定的烟款外，还要负担额外的摊派和受军队的抢劫与讹诈。各区保卫团、各所和各村的总散乡约，常年催收烟款，招待催款委员，供应“坐所”、“散差”烟饭零用，都有相当开支。这笔开支的唯一来源，就是额外摊派，即在上一级摊派的数字外，暗中加派若干。县知事、团总、乡约便趁机混水摸鱼，中饱私囊。例如一九二二年，刘镇华给周至摊派了二百万元烟款，县知事熊飞就按二百五十万元分摊到各区。浮摊的这五十万元，除贿赂和招待查烟、催款、提款委员外，熊飞便和驻扎周至的镇嵩军第一路司令柴云升等进行分肥。此外，军队的抢劫和勒索也十分严重。每到收烟时节，镇嵩军的散兵游勇在烟田里抢劫农民烟土的事，屡见不鲜。一九二〇年，竟发生镇嵩军在二家庄因抢烟不遂，开枪残杀农民毛豹子的事。一九二一年夏忙中，驻哑柏的镇嵩军营长赵清海，以安宁地方为名，派一位连长率领武装士兵一排，每早在哑柏附近地区巡逻，扬言为保护老百姓收烟。忙后，赵即勒令哑柏八所农民按每亩烟田交纳十两烟土的“保护费”，并派军队下乡勒收。哑柏八所农民在如狼似虎的匪军淫威下，只得被迫缴纳。仅此一地，镇嵩军就从农民手中掠夺了二十万两烟土的“保护费”。这种自上而下，用一切高压手段，蛮横残暴地

榨取人民，是刘镇华军阀苛政的突出表现。

### (三)

刘镇华扩大种烟面积，压榨广大人民的事实，远不止于征收烟款中的种种暴虐，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遗患。

1、毒害了广大人民群众。清朝末叶，周至吸食鸦片的人，多系官僚、富商和地富阶级，劳动人民吸食者尚少。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间，由于统治当局陆续禁种烟苗，烟价大涨（每两十余元），少数有瘾的劳动人民相继自动戒绝，吸食的人更加减少。自刘镇华强迫扩大种烟面积以来，吸食鸦片的风气在农村中开始普遍蔓延起来，吸上瘾的人便大量增加。甚至婴孩患病，父母就给“喷烟”，因此自幼时就有了烟瘾。据调查：在刘镇华统治陕西期间，周至郭家堡三十户、一百七十人中，有烟瘾的四十四人，烟具四十付；东村堡四十七户、一百九十五人中，有烟瘾的三十六人，烟具三十二付。其他村庄，也大致相同。按此估计，当时周至县吸鸦片者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左右，大多数的人家都有烟具。当时全县有二十余万人，堕入烟雾之中的男女老少不下四万余人。平均每人每天以销费烟膏一钱计，一月消耗烟膏十二万余两，全年消耗九万余斤。一县之中，四万余人天天耗财戕身，贻误生产，这是多么严重的恶果啊！

县署的胥吏衙役，总数在千人以上，没有不吸鸦片的。他们吸大烟的开支及生活费用，专靠敲诈勒索维持，也给劳动人民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2、民食艰难，饥馑成灾。清末民初，周至耕地总面积为七十余万亩，粮食一般可自给自足。但由于刘镇华强迫扩大烟田面积，最多的年份竟占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致使粮食作物面积锐减。同时，因烟款奇重，烟价反因种植过多而不值钱（一九一九年大烟土每两五元，到一九二二年每两只值三角，最低时竟只值二角）。大烟歉收，即有倾家荡产的危险。使素谓粮仓的周至，无论在丰歉之年，所产粮食均不敷用，而要仰赖渭北旱原之乾县、礼泉等县输入弥补。粮食贱买贵

卖，农民又多受一层粮商的剥削。若遇天雨，道路泥泞，渭河水涨，运输不济，则粮价立即上升，在靠买粮度日的情况下，农民生活更受熬煎。所以，每到青黄不接之季，穷苦人民无钱余粮，便以糠菜度日，甚至流浪乞讨。遇上年馑，周至农民的生活就更陷于绝境。民国十八年大旱，麦、烟歉收，周至饿死和逃出不归者，共达六万余人。这就是刘镇华迫民种烟所带来的惨痛后果！

3、凭空窃取民财的“砸款”和高利贷猖獗，加剧了农村的破产。周至种烟既多，烟款又奇重，农民难以将烟款一次交清。因此，便给贪官污吏、绅商、高利贷者又一敲诈剥削的机会。

如前所述，烟款是由官吏按照各所烟款多寡，分定比额，勒迫限期交纳。而农民纵有烟土，一时也难以大量售出。因此，农民在比款日期无法交足比额，即遭到无情的毒打。受刑不过，只得央请官吏指定的所谓殷实商号，开出代付烟款的条据，转交给征人员提取。群众把这种办法叫做“砸款”。“砸款”利息，由起初每天每元一分，涨至一角，最高时竟达三角多，并附有过期未还，利上加利的规定。

当时包揽“砸款”的商号，在哑柏有镇嵩军第一路司令柴云升开设的“德盛成”，在县城有商会会长郝维新开设的“福德永”等号，在终南、马召等集镇，也有类似上述商号。“砸款”的残酷性，不仅仅是时限短、利息高，它完全是一种凭空窃取民财的圈套。包揽“砸款”的商号，并不真的垫付现金，只开张空头条据，应付提款单位，也是用此来障群众的耳目。等到下次应比农民将“砸款”的本息还清后，他们才将烟款汇送，而“砸款”的利息，就落进了这伙亦官亦绅亦商者的腰包。这样一来，使农民上一比期的烟款交不出，下一比期的烟款就更难清，一回“砸款”，回回“砸款”是一条捆在农民身上的绳索。

一部分农民为了不致于落入“砸款”的圈套，或为度过青黄不接时的生活；只好向高利贷者告贷。于是土豪、地主、富农，有的开设“小押当”，有的采取“支土”方式盘剥（是一种春季贷出烟土一两，

夏忙收回烟土五两的高利贷剥削)。还有的干脆“买青苗”，一盘端走，大发其财。例如：西北区余家城堡的任东明，就在哑柏和西安等处开设了“忠信和”等三座商号，置街房八院，田地一千八百余亩，迫使青化、竹峪一带许多农民成了他的佃户；东北区西坡村卢三娃，在尚村、终南等处开设“长春隆”等七座商号，盖房一百五十余间，置池四百多亩，使该村附近不少农民，卖掉了全部土地，流浪他乡。“砸款”和高利贷剥削，夺走了农民手中最后一文钱，大大加剧了农村的破产。

以上所举，仅系荦荦大端。他如征收烟土运销税、内销税等搜刮，以及使人民精神生活的堕落，农村勤俭风尚的被破坏，种种滔天罪恶，难以尽述。总之，刘镇华扩大种烟面积加重“烟亩罚款”对广大人民的危害，较之洪水猛兽，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 陕军冯毓东部两次参加驱刘战役回忆

叶 雨 田

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陕军冯毓东（子明）部，两次参加驱逐刘镇华战争，笔者时任冯部骑兵连连长，现就见闻所及，追述于下，以资参考，疏误之处，还请读者指正。

### 一、第一次战役

一九二四年秋，第二次直奉战起，刘镇华奉吴佩孚命出兵豫西，以巩固后方。陕军冯毓东等部趁此时机，发动了第一次驱刘的战役。

刘镇华自一九一八年率镇嵩军来陕，以对抗靖国军为名，要挟陈树藩当了省长；一九二二年，趁冯玉祥出关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机会，又爬上了督军的宝座。从此军政大权在握，肆意扩充实力。到一九二四年前后，所部已由原来的几千人扩充为三个师（师长为憨玉琨、张治公、柴云升）、五个混成旅、三个骑兵团，加上炮兵团、独立团等

兵种，总计不下十二、三万人，这都是搜刮陕民膏脂豢养起来的。

刘在政治上，又一手包办一九二二年陕西省第三届省议会选举，当时有八个县区以其非法，拒绝选出议员，不久乾县吴博山、韩城杨干丞，遭刘派人暗杀。刘既组成御用省议会，一切苛派勒索，加增粮加税、收烟亩款、派地亩捐、预征钱粮等等，都假借议会通过，强迫人民交纳。陕民苦不堪言，遂激起一九二三年渭南农民的交农运动。

刘原属段祺瑞的皖系，适直皖战后，皖系失败，刘又倒入直系曹（锜）吴（佩孚）怀抱，竭尽其恭顺拉拢之能事。如吴在洛阳过寿，刘孝敬寿礼二十万元；曹锜贿选，得到刘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对曹的左右李彦青之流，也曲意逢迎，时有馈赠。

刘对陕西地方部队，采取排挤分化甚至武力消灭的手段，陕军受其迫害，积愤已久，常想得机一逞。时田玉洁驻泾、原，所部康振邦驻蒲城兴市镇，冯毓东驻富平、耀县。卫定一驻凤翔。石象仪驻高陵。马青苑驻临潼的交口、雨金。高峻部驻白水、澄城。其中田玉洁名义上是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即胡景翼师）留陕的一个旅，实力较强。刘对力量薄弱的高峻部已用武力解决，而对田、冯则采取分化离间手段。他认为田容易控制，冯难以对付。于是示意田为冯扩编部队，经田征得胡景翼同意，编为陕西暂编陆军第一师第五旅。刘意冯部扩编，可望调离陕西，以减轻对自己的威胁。果然，胡景翼不久即电调冯率部出关训练，刘借机派王普涵催其开拔，冯以富平一带财源充裕，粮饷不匮，借故一再拖延开拔时间。这是一九二四年春天的事。

及至第二次直奉战起，刘镇华部张治公师随吴佩孚开赴前线，憨玉琨师东开洛阳，留陕者大部系收编豫西之土匪，关中空虚，有机可乘，陕军内部就开始了驱逐刘镇华的酝酿。由于他们对刘素存积怨，加上个人都怀着争夺权力、扩充地盘的欲望，所以很快就取得一致同意。当时采取三面包围、东西截击的战略计划。卫定一部由西路出兵，牵制咸阳、周至、户县柴云升师；田玉洁部除派康振邦渡渭助冯堵截华县马水旺部外，大举进兵渭南，控制省城；冯毓东部渡渭河攻华阴，

直扑潼关，切断憨玉琨后路，迫使镇嵩军首尾难顾，然后联名通电声讨，驱逐刘镇华离陕。

冯毓东部辖张菖、韩兆瑞两团，王雄藩、冯晋卿、刘子威、杨子猷、范升初、刘定邦六补充营和叶玉田骑兵连，约四千多人。一九一四年十月四日冯接康振邦从兴市镇来函，云率田玉洁命，派任子扬团五日出生，按计划进行。冯即集合部队，于八日全军出动。彭仲翔、成柏仁、严敬斋、纪子文、马青苑等随军至渭南北焦家村，值路禾甫衔刘镇华命劝冯暂缓东开，冯军不顾，由仓渡过渭河，留张团刘成章连守渡口，余部十一日抵华阴属义合村一带宿营。当晚决定先扫清华阴城憨玉琨留守部队，解除后顾之忧，即令叶玉田率骑兵连袭击华阴，并破坏沿途电线。叶率部于十二日拂晓前出发，一举占领县城，并迅速扫清窜逃在附近的敌人。当日上午七时，冯旅司令部进驻华阴。遂商定十三日进攻潼关。军事部署如下：

- 1、韩兆瑞团由岳庙至东、西泉店吊桥一线向潼关西门进攻，并派范升初补充营扫荡三河口少数敌人。

- 2、张菖团由东原经刘家沟、习家堡一带，向潼关东原十二连城等地挺进，进攻潼关南城。

- 3、王雄藩补充营以两连防守华阴西关与西关堡，一连由十里铺向南山根择地驻扎，防敌从西侧窜扰。其余各补充营，集结华阴东南各村待命。

- 4、骑兵连除以一排随张菖团前进，余接替华阴城防。

- 5、冯毓东司令部驻华阴城内，运筹全局。另派马青苑任前线临时指挥，随韩团前进，并与张团随时保持联系。

韩团十三日下午进至东西泉店、沙城子，与约两连敌人遭遇，鏖战至次日上午，将敌悉数缴械，继续前进。至吊桥，又遇约两营敌兵，在官道北抵抗，激战甚烈，赵营王志成连长阵亡，嗣经姚营猛攻，敌不支，始退向五里铺。

张团于十三日晨进至刘家沟，与敌六十九旅李德标团遭遇，经尚振明营猛攻，向前越过两条大沟，已望见十二连城，敌人固守阔沟一道，利用迫击炮向我方轰击，我军两次进攻，未能冲过。乃调骑兵连排长刘某率骑兵，抄袭敌人后方据点刁家堡，敌遂东退磨沟，据吊桥河东岸，凭险顽抗。十四日下午，我军进攻未有进展，乃于十五日与尚振明、王家曾两营攻河岸之敌，并派王丕经营绕道南山袭敌后方。敌仍顽抗，固守待援。

我军占领华阴，进攻潼关，切断豫、陕交通。憨玉琨回师援救，尚在途中。西路镇嵩军受卫定一、田玉洁等部牵制，未敢轻动。在这种形势下，冯毓东即派严敬斋赴三原，促田玉洁如约出兵，攻取渭南，控制西安。而刘镇华亦大施政治手腕，加紧拉拢田玉洁，使不为冯助，派关中道尹贾济川，陕西暂编陆军第一师驻省办事处处长赵宋丞赴三原，佯称刘愿让出省长一职，请田担任；并表示对冯此次出兵，极愿和平解决，让其仍回渭北。田虽口头推让，内心实已动摇。刘又派路禾甫持宋芝田、宋菊坞诸名流函至三原劝驾，并提出各厅长名单，田也派郭锦屏赴省探听情况，同时，故作持重，迟不出兵。严敬斋至三原见田，田正为刘甜言所感，心旌不定，仅派人送现洋两万元，子弹两万发，到华阴慰劳冯军。严见其毫无诚意，愤而离去。这就是冯部孤军作战，终至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刘镇华一面以省长为饵诱骗田玉洁，一面又对冯毓东摆出求和姿态，派杨叔吉、张扶万于十六日到华县，由华县知事魏祖旭转来刘的求和信，略谓：杨、张两人已到华县，请冯派代表前来和谈。冯邀集彭仲翔、成柏仁等主要人员研究，鉴于田玉洁延不出兵，憨玉琨方正反扑，而康振邦部任团（实际一营）一度渡渭后，又被阻退回，我军陷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下，大家认为刘既求和，不如就此下台，遂决定派彭仲翔为代表。彭于十七日下午三时由华阴出发，晚抵华县，始知杨、张已于上午回西安。彭见其求和既无诚意，即欲折回，无奈杨松轩（杨叔吉之兄，咸林中学校长）与镇嵩军张营长再三挽留，劝其明早再走，彭遂下榻咸林中学之内公储局。孰料刘镇华电话命令所

部于次晨二时许将彭就地勒毙，并移尸埋于城隍庙后殿东墙下。

憨玉琨已回潼关，向冯部大举反扑。十七日晨，憨亲率八团兵力，全线进攻，意在首先打通东西大道。我左翼韩团，受到极大压力，姚思信营由五里铺退至东泉店，沿渭河及中路我军也纷纷后退。敌以三团兵力尾追，并用大炮轰击。十九日晚，我军退至岳庙南城子一带，各部有很大伤亡。

我右翼阵地，虽地形复杂，较易防守，但要抵抗敌人三团的进攻，实感吃力。十七日上午，敌首先突破吊桥河防线，经尚营连长罗伯章奋勇反击，毙敌二百余，夺回阵地。接着敌人连续进攻，罗伯章阵亡，另一连长侯子善胸部负伤。加上左翼失利消息传来，士气大馁，不得已全线撤至刘家沟，凭险固守。终因敌军攻击猛烈，于二十一日撤至庙前、小张村、南寨等处。在憨玉琨大举反扑同时，华县敌人夺去了我所扼守之渭河渡口，刘成章连退回华阴。二十一日晨，敌人向华阴大举包围，进占岳庙。刘镇华又调马河清、王老五等部集中渭南，自西向我军夹击。

时王丕经营突然投敌。憨玉琨派人劝冯接受改编，并愿让出一条去路，让我军回驻渭北，这显然是敌军企图诱我军出城乘机予以消灭的诡计，经冯严辞拒绝。在强敌重围下，外援无望，粮尽杀马充饥，这样苦撑五、六天，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商议突围，决定骑兵连以第一排袭击岳镇与县城间小庙之敌，掩护退却。待城中全部撤出，向南山山麓撤退，绕道省城西边渡渭河。其余三排作前卫冲击，张、韩两团及各补充营跟随前进。弹药全部发给士兵，辎重、马匹及行李一律不携带。二十六日晚十时出发，沿途未发一枪，天明抵华县境。检查部队，张团全到，韩团大部向西大小涨一带去了，补充营只有范升初营跟来。遂由侯坊东渭河，向固市前进，于二十九日回到富平。

此次战役，从十一月八日发动，到二十七日撤退渡河，历时整二十天。这时直系已倒，刘镇华忙于向河南发展，对冯部也就无暇过问



了。

## 二、第二次战役

直系失败，背离皖系的刘镇华，又倒向段祺瑞，得到段的支持，仍稳踞督军、省长的宝座。接着反戈倒吴，令憨玉琨进兵洛阳，迫使吴佩孚离去，并收编豫西一带许多地方团队和散匪，以王老五、李有才、张崇勋为一、二、二混成旅长；又将匪首孙魁元、袁英、马文德、詹老末等分别畀以旅长名义，分布河洛；进而占据孝义兵工厂，破坏黄河铁桥，阻止国民军人员来往。同时鼓动河南地方人士反对胡景翼，意图反抗国民军。一时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刘镇华等利用段祺瑞对冯（玉祥）胡（景翼）的不满，乘机勾结皖系，发展实力。他把军事重心东移，图谋控制河南，对抗国民二、三军及樊钟秀等部。刘在陕西，则极力拉拢盘踞陕南的吴新田和陇南的孔繁锦，以壮声势。同时提出“陕人治陕，豫人治豫”的口号，扬言以井岳秀督陕，田玉洁任省长，冯毓东任陕北镇守使，以迷惑欺骗陕人。

一九二五年二月，豫西胡、憨战争爆发，憨玉琨登封战败，刘镇华只好亲自率部增援，遂将陕督交吴新田代为照料，于同年二月十七日，率卫队旅及严际明旅离陕赴豫。这时，刘在陕西兵力空虚，陕军各部又互相联络，酝酿发动堵击刘镇华、驱逐吴新田的战争。

时陕西地方部队，田玉洁、冯毓东等部编为国民二军，杨虎城部编为国民三军。刘出关后，冯（毓东）杨（虎城）即向田玉洁表示，如仍不顾大局，再按兵不动，就要单独行动。田既恨前受刘之骗，又见大势所趋，只好采取一致行动。商定杨虎城部担任省西地区；田玉洁部出兵渭南，派康邦团占华县，冯敏东部担任省东地区，直取潼关。此次作战，是支援河南国民军，并清除刘、吴在陕西恶势力的重大战役，为慎重计，吸取上次战役失败教训，成立统一指挥机构——援豫总指挥部，推冯毓东为总指挥，马青苑为副总指挥，发出通电，声讨

刘镇华祸陕罪行。

三月中旬开始军事行动，田玉洁部由上涨渡渭河，与吴新田部接触。冯毓东部于十六日下午二时，由华县东朱村渡渭河，先头部队赵汉章营与敌接火。赵营官兵多系当地人，熟悉地形，并得到群众协助，很快扫清了敌人。后续部队韩团姚思信营过河后，西趋赤水，与田部取得联系，荡清沿河布防敌人，并助康振邦部攻华县，击溃华县守敌两团之众，残敌向南山逃窜。二华一带敌守军邓全发旅，亦被韩团击溃。这时渭华间敌人，全无斗志，当晚都退向南山山麓一带。我张团尚振明、王家曾两营，十八日下午三时占领华阴，推进至岳庙。沿河东进的汝光杰营，亦于十八日下午四时占领三河口。

当战事进行中，由于通讯器材缺乏，情报工作不灵，对豫西国民军的进展毫无所闻。及至占领三河口，方听潼关来人谈，当地镇嵩军十七日晚已经逃光了。我军即派骑兵驰往侦察，适国民二军李云龙部丁增华团开至，得悉豫西敌军已全部击溃，刘镇华只身逃往山西。十八日晚，冯毓东司令部进驻华县。次自田玉洁部王文秀旅占渭南，渭潼大道，已无敌踪。

吴新田部退至临潼斜口一带，重新布防，仍图抵抗。直到孙岳、李云龙部队向其进攻，吴新田方于七月十五日退出西安，在逃回陕南途中，既受何经纬反戈一击，又被杨虎城在省西拦截，迭遭攻击，溃不成军。窜到洛南一带镇嵩军邓全发残部，以后也为李云龙收编，就此结束了刘镇华在陕西七年的罪恶统治。

一九六四年

（民进、工商联西安市委员会供稿）

## 北洋陆军第十五混成旅王鸿恩部被消灭经过

俞 嗣 如

一九二五年春，刘镇华率镇嵩军东出潼关夺取河南地盘时，调北

洋陆军第七师兼陕南护军使吴新田来关中“照料”督军兼省长职务，并邀驻川陕边境之北洋陆军第十五混成旅王鸿恩驻咸阳，以防兴平、礼泉、武功、岐山一带国民二军的陕军。

一九一七年间，省署派我为汉中区吏治财政调查委员。王鸿恩时任北洋陆军第十五混成旅管金聚部参谋长。我们在汉中相识。此次王调咸阳，设办事处于西安红埠街，不时来省。我正办《新秦日报》，彼此往来较多。

王鸿恩与吴佩孚系山东同乡，关系较密，吴曾给他一个配备新式武器的学生营。此时见国民二军节节胜利，李虎臣进驻潼关，二华、三原、耀县又为国民二、三军势力，他在三面武力包围下，逐渐动摇了对吴佩孚的信赖。一次向我说：“胡笠僧虽然死了，国民二军还不断发展，看来吴新田是站不住脚的，吴佩孚的前途也未见乐观。”我乘机劝说：“目前吴新田与你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如南山一带再要受敌，就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如早谋出路。”他说与国民二军曾有联系。我说：“这还不足取信于人，要干就得加入二军。这样吴新田即使失败，也影响不到你。”王鸿恩权衡利害，认为甚是。但又顾虑时机还不成熟，怕吴新田觉察不利。我乘势鼓动他说：“既下决心，说干就干。近我去华山参加胡笠僧葬礼，事毕往开封，你可写一封诚恳的信致岳西峰，由我代交，玉成其事。”王表示同意，不久将信给了我。这时，驻长安、户县一带曾由刘镇华编为镇嵩军第七混成旅现属第七师步兵旅旅长邓全发，也辗转托人请我带信致岳西峰，愿意投靠国民二军。

我于华山参加胡笠僧葬礼后到开封，把王等的信，通过刘允臣转岳西峰。刘并电邀暂去北京的主鸿恩代表郭瑞圃（曾任《新秦日报》总编辑，与我相识。）回开封。我们三人研究了收编王鸿恩的问题。

岳西峰很快派人送来国民二军任王鸿恩为第廿二旅长、邓全发为廿一旅长的委任状。我偕郭瑞圃到洛阳，见国民三军总司令孙岳。孙对王鸿恩等投国民二军，很表称赞。我在洛阳小停，搭船至潼关，把

王、邓两旅情况，告李虎臣，即回西安。过渭南时，见吴新田军队已在布防。我到田玉洁的办事处，托该处长将二军给王、邓的委任状，转送三原田玉洁，以便王鸿恩派人来取。

我回到西安，已是风声鹤唳，气氛紧张，城门增加岗哨，旅馆一日数查，吴军上下惊慌不安。王鸿恩也回咸阳驻地，不再和吴新田照面。

我赶到咸阳见王鸿恩，王让我偕其参议张某，赴三原县，与田玉洁、杨虎城谈得都很融洽。回咸阳，王鸿恩对我说，李虎臣由潼关西进，吴新田调邓全发旅东开堵击，他们拒绝调遣。吴获悉这两旅已受国民二军改编，知事不可为，已于七月十五日夜，弃西安南遁。有人曾劝王截击，王不愿落井下石，未予采纳。他又让我去兴平县见卫定一，卫对王投靠国民二军，甚表欢迎。我当日下午即返咸阳。

翌日，我回西安，见李虎臣，告其因王、邓按兵不动，吴惧而退出西安，李颇以为是。我又介绍李虎臣与王鸿恩在长途电话中交谈，李邀王来西安。次日王来，由我陪同见了李虎臣，两人谈得也很相得。

一天，我到李虎臣处，李的朋友王某，自称咸阳人，任某银行行长。王坚邀我至其住室，在烟灯下没谈几句闲话，就小声对我说：“王鸿恩有一营学生兵是新式好枪，大家看的眼红，得想法把枪弄到手，特请帮忙。”我正色告诉他：“王鸿恩已与吴新田脱离关系，现在属国民二军。李虎臣西进时，由于王、邓两旅拒绝吴新田的调遣，才加速了吴的溃退，李虎臣得以顺利入西安，现在怎么能对王的一营枪打主意呢？”那人仍是刺刺不休。我又说：“王鸿恩投靠二军，是我居间介绍，不能因一营新枪，使二军失信于人。如果这样做，以后谁还肯再来归顺呢？”我看那人见利忘义，也就不再与他交谈。正是这些人从中挑拨，使李虎臣与王鸿恩的关系冷淡下来，终至产生裂痕。

某天半夜，李虎臣派车接我到他处，说咸阳来人报告，王鸿恩扣留县参议员，有反叛迹象，嘱我立刻乘车前去，查清原因。

我天明赶到咸阳，分别向县知事刘次枫和王鸿恩了解情况。原来

有人鼓动几个县参议会参议员来县署，要求停发王旅粮饷，王旅派人守提，双方发生冲突，后由王旅稽察处长命人把几个参议员带走，等提完粮饷，即把他们放了，并无军事行动。我对王说：“这样做会招致地方士绅不满，不如将稽察处长撤职，给些钱让他回家，免得受人报复。这样既有助于你和地方士绅恢复感情，也对李虎臣有理可讲，是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王表示愿意照办。我又到县参议会，议长张宝珊等人也说，王旅军纪还好，只是四千多人粮饷咸阳负担不起。我劝说：“饥寒生盗贼，如没粮饱，纪律也就谈不上了。过去西路一带驻军，苛害人民，可为前车之鉴。王旅人多，咸阳供应不起，可请军署调出一部，或请省署令他县接济，不能停止供应，以免酿成事故。”他们认为有理。第二天，我回西安，李虎臣听完报告说：“这下我的心掉到原地方了，只要不是兵变，就好得很。”由李话中，想来报告此事的人，故甚其辞，想煽起李的怒火，一举派兵往剿，他们好趁火打劫。幸李虎臣未急躁用事，否则真不堪设想。但王、李之间，自此隙嫌日深。此次我在咸阳，王鸿恩颇有感慨地说：“你这次来是上级所派，我要以客礼相待。”流露出对我不信任的情绪。

咸阳士绅与驻军王鸿恩发生冲突后，县知事刘次枫，深感左右为难，坚决辞职。省长刘治洲，几经考虑，希望我能继任，我想王鸿恩投国民军，是我介绍。二军改编时，把一个混成旅编成普通旅。后又有人向李虎臣谎报王要叛变，几至酿成战事。王虽未对我明说，内心不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他一直不挂国民二军的旗职。这已使我对双方失信，若任其发展，势必还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那我就更对不起人了。于是决定将新办的《新秦日报》稍加安排，应允刘治洲去咸阳干几个月。

王鸿恩得悉我继任咸阳知事，立刻打电话欢迎。陕西省长公署很快送来委任令，接着王鸿恩又送来一份国民三军总司令孙岳委我咸阳知事的委任令，弄得人莫名其妙。问王鸿恩，他说孙原委了一个县知事，后听王说已委我，就改成我的名字。我表示推辞，王说孙已下委，就不能再变更，还是早来咸阳。这时孙岳以国民三军总司令督理陕西

军务，李虎臣帮办军务，刘治洲任省长。孙、李之间已有矛盾，暗中磨擦。李、刘同为陕人，可能关系较近，从发表咸阳知事这件事上，可见其中微妙关系。而王鸿恩靠拢孙岳，对李很冷淡，也就造成了王、李关系的加剧恶化。

我将报社事务安排就绪，到咸阳接事。中秋节后，王鸿恩以咸阳驻军过多，与田玉洁部张九才团商洽，开出一部。初决定张团开渭北，后改王旅开河南。我为此事曾劝止王鸿恩，因他对我已有芥蒂，加以国民二军对王旅虎视眈眈，万一再发生问题，就使我更加为难，所以不便多加劝阻。于是就为王旅筹款征车，准备开拔需要。

王鸿恩离咸阳前一天，张九才团长在县署三堂设宴饯行，邀王旅营长以上军官出席，我是陪客之一。席间闻女人喊冤，县署收发员徐筱轩和张部两个护兵跑进来，说有人告状，请我解决。等我出去，人已走了。我再回席上，王鸿恩已向张九才辞谢，在哈哈声中，一哄而散。

晚间，徐筱轩告我：“今天好险，你们快入席时，张团两个护兵来收发处对我说：‘一会有女人喊冤，你就把俞知事请出来，我们要解决王旅。’不久，真有女人喊冤，他们就挟着我到席间，请你出来，喊冤的人又不见了。以后张团的兵没来，宾主辞谢时候，都还很客气。”事后打听，原来张团阴谋，为王旅发觉，早有戒备，张团无法下手，一场火并才算暗中熄灭。他们表面雍雍揖让，骨子里却想置人于死，想起这场“鸿门宴”，我心里尚有余悸。

翌日拂晓，王旅出发前，张九才还想截留两门大炮，经我劝阻，他才作罢。我们一同骑马，到咸阳城外送别王鸿恩。

王鸿恩逃过了张九才的暗算，全军及辎重乘船至潼关时，遭到守军李虎臣部的猛烈狙击。王旅独立营长张某，骁勇善战，绰号张飞，舍舟登岸，率部向潼关猛冲，已占南原高地，李军纷纷后退。这时暗通李军的王旅机枪连连长郭某，集中火力，向张营扫射，李军乘势回扑，转败为胜。王旅大溃，王鸿恩率千余人东渡黄河，又遭阎锡山部

缴械，王仅以身免。这支四千余众枪炮齐全的陆军混成旅，离咸阳不足十天，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一九六五年

## 吴新田祸陕记略

本会史料调查组

### (一)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北洋军阀吴新田盘据陕南，横征暴敛，荼毒人民，较之在他以前和以后驻军陕南的大小军阀，为时最久，为祸最烈；且曾两出秦岭，助刘镇华为虐，关中人民亦深受其害。

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阀夺得中央政权，遂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明令免去附皖之陕西督军陈树藩职，以直系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六月，阎相文率阎治堂第二十师及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由潼关入陕。驻湖北随（县）枣（阳）一带之吴新田第七师亦奉北京政府命随阎相文入陕驱逐陈树藩。

当时，陈树藩以外有靖国军之压迫，内有所置省长刘镇华暗通直系，故于直军西来时，稍作抵抗，即退陕南。直军进据西安、咸阳；吴新田率其所部入荆紫关，经商南，出蓝田，至西安。七月七日阎相文就督军职。冯玉祥乘胜扩编其部为第十一师。未几，阎相文自杀，冯玉祥继为陕西督军。

时关中各县久经战乱，地方财政濒于绝境，冯玉祥急欲统一陕局，调吴新田第七师开赴陕南，进一步驱逐陈树藩，占领陕南富庶之区。

吴新田号芑荪，安徽合肥人。原为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第七师的一个旅长。直皖战时，湘军谭延闿、赵恒惕乘机驱逐张敬尧，张败退湖北后下野，吴新田遂代第七师师长，转附直系，并听命率部入陕。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吴新田以陕南边防军总司令名义，率第七师七千余人，分兵两路向南进军。一路是第十三旅，经柞水、镇安进取安康；一路为第十四旅，经宝鸡进取汉中。吴新田及师属部队随第十四旅进发。

这时陈树藩在汉中重整残部，欲凭秦岭天险保存力量。可是，南进吴军于十二月二日攻克凤县南天门天堑，继向柴关岭推进；向安康方面进军之第十三旅亦于同月四日取得安康。而陈树藩犹欲作最后挣扎，乃打出“西北自治后援军”的旗号，以党自新为右翼司令，张仲仁为左翼司令（时张为汉中镇守使），陈以总司令自兼中路，誓师抗吴。所谓“自治”，是浩时浙江督军卢永福捏造出来的一个以军阀割据为实的骗人的幌子，陈于穷途无奈，举此为号召，真是不伦不类，且新由关中败退入山，士失斗志，更是不可克服的弱点。故当吴军攻至汉中迤北最后一道门户——褒城鸡头关时，陈以大于吴新田的兵力，对战四昼夜（九日至十二日），终于退出汉中，至西乡，再经镇巴逃往四川万源，投靠川军林宓。吴新田于一个月之内拿下了兴（安）汉（中）两府，从此陕南落入吴新田的统治之下。

吴新田取得陕南后，北京政府加委为陕西军务帮办，旅长刘宝善为陕南镇守使。当时驻在汉中的王鸿恩第十五旅（管金聚旧部扩编的）也归吴新田节制。吴新田对于退往川北之陈树藩，时备其反扑，乃派第十三旅之第二十五团及炮兵第七团驻防安康，第二十六团驻石泉，第十四旅敌二十七团驻西乡，第二十八团驻汉中，骑兵第七团驻城固，严密防范。

一九二二年春，直奉战起，冯玉祥率部开往河南，陈树藩乘此时机，分兵三路：一路向镇巴，一路向紫阳，一路向岚皋，反攻安康。吴新田一面急电刘镇华（时为督军兼省长）求援；二面亲赴西乡督师堵击。刘镇华即派镇嵩军第五、第六两路等部驰援。未待援兵到达，吴新田已将陈树藩军打垮，陈部张仲仁旅在紫阳投降，陈树藩再次逃往川北。但驰援之镇嵩军仍继续南进，分驻于汉阴、石泉、商南和凤县、留坝一带。



吴新田于打退陈树藩反扑之后，进一步北与刘镇华相依托，西与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通声气，南与川军刘存厚相勾结，不仅稳住了他在陕南的统治，还形成了一个附属于直系军阀、地跨陕、甘、川三省交界区域的军事联盟。从此野心勃勃，“得陇望蜀”，覬觎川北。

是年冬，曹锟、吴佩孚为贯彻其武力统一政策，对川用兵，派五省军队入川。次年春，熊克武受孙中山命组成四川讨贼军，北伐曹吴。四川境内南北两军展开了一场大战。刘镇华承曹吴旨派遣其留驻陕南之镇嵩军配合刘存厚打回四川，支援刘湘、杨森。吴新田亦派刘宝善旅、王鸿恩旅、张仲仁旅，共编为十个支队，由广元、城口入川。刘宝善等部侵占绥定府十余县，进到昭化、广元、剑阁后，见曹吴五省联军被讨贼军击败，遂停滞不前，意存观望。此后，吴新田闻知刘宝善直接向曹吴活动扩编成师，急将刘调回撤职，以团长张耀枢继为旅长兼镇守使。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发动政变，直系军阀倒台，刘镇华急调援川的镇嵩军回关中。吴新田的援川部队也陆续撤回陕南。

## （二）

吴新田独据陕南之后，称王称霸，扩张实力，横征暴敛，压榨人民。又由于当时政局变幻，给了他两次出山、为害关中的机会，并曾一度跨上了陕西督军的宝座。

第一次出山在一九二四年冬。“北京政变”，直系北京政府被推翻，冯玉祥联合奉张（作霖）拥出段祺瑞组成“临时执政府”。这时，在汉中的吴新田和在西安的刘镇华喜出望外，他们原属皖系，今段氏再次上台，遂心猿意马，跃跃欲动。特别是刘镇华，时为陕西督军兼省长犹不为足，乘段执政当国的机会，急调镇嵩军三十五师憨玉琨部东出潼关，名为驱逐洛吴（佩孚），实想逐鹿中原，与国民二军争河南。当北京政府已明令发表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时，刘镇华犹进兵未已，憨玉琨师至郑州，胡、刘矛盾日益显著，大战一触即发。刘镇华遂急电吴新田及甘肃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分别由汉中、安康、天水

各抽出一部兵力，开入关中填补镇嵩军所遗防地。

吴新田即于当年十二月间派两个团出益门镇，接防宝鸡、眉县、周至、户县；又调安康顾琢堂八个营，接防蓝田、长安等县；派第十五旅王鸿恩驻咸阳一带。孔繁锦也调兵千阳、岐山。是月二十三日，吴、孔应邀联袂至西安，与刘镇华共商所谓“陕甘军事善后联防事”。这三个安福系爪牙休戚与共，其中刘镇华势力最大，吴、孔竭力助其发展，企图从中分得好处。迨胡、憨战争爆发，刘镇华次第把柴云升、王振等部投入战场，并亲率严际明旅出潼关参战，遂将陕西军政悉交吴新田暂为“照料”。这桌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七日的事。

刘镇华倾其全部镇嵩军与胡景翼国民二军战于豫西，战未半月，镇嵩军大败，溃众多窜入伏牛山和商洛山中为匪；柴云升等部得到吴新田的眷顾，退致安康一带，一切军需照样取给当地人民。

如上所述，吴新田是代刘镇华“照料”陕西军政的；刘既逞兵豫西而于转眼之间溃不成军，不能再回陕西，只身逃山西，投奔阎锡山。这时吴新田将何以自处呢？事有出奇：北京的段执政竟于此时正式任命吴新田为陕西军务督办。可是，好运不长，他的正式督办并没有当上几天就被赶走了。

当北京临时执政府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任命吴新田，陕西军务督办后，国民二军、三军同声反对。豫西之战，国民军的目的就在于取得陕西地盘，形成陕豫统一局面，然后与奉张（作霖）、鲁张（宗昌）争霸，绝不能让吴新田坐收其利，为自己留一后患；而陕西人民则因吴新田在陕南作恶多端，已陷陕南人民于水深火热，更不能容其窃据全省军政，毒害全省；同知，吴新田一心拥段，支持段氏的“善后会议”主张，与当时全国人民欢迎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的政治主张大相迳庭。所以吴新田在政治上正处在一个极不利的地位；而且在军事上，处境也很不妙：吴的军队占领着眉县、周至、户县、长安、蓝田、临潼一线；渭南、二华虽有镇嵩军邓全发一部，澄城、合阳有何梦庚一部，已成残败之余；西路千、陇、宝、岐数县

虽有孔繁锦部驻守，但已在国民三军杨虎城和陕军卫定一部的监视之下，缓急难济；大荔、朝邑、韩城一带的麻振武和蒲城的缙章保等部虽曾投靠刘镇华，甘作爪牙，但刘倒以后，纷向国民二军输诚，不受吴新田调遣；渭河以北，泾（阳）原（三原）一带，尚驻有国民二军田玉洁部，随时可渡渭河以薄省垣。因此，吴新田这时虽有段祺瑞的支持，他在陕西的地位是非常孤立的。特别是吴部军队在西安以足球故殴打学生，引起轩然大波，卒至发展为全省学生的驱吴运动。运动扩大发展，带上了浓厚的政治性质，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界反吴斗争，促进了各派陕军联合的军事行动。

吴新田惶恐之下，派陈世钰为代表赴河南与国民二军求妥协。时胡景翼已死，岳维峻率其众，陈世钰求好未得要领。接着孙岳、李云龙即领兵西进，吴新田部在新丰稍作抵抗，西退周至、眉县一带。在眉县遭到何经纬团（张仲仁部）的反戈一击，丧失全部辎重，又遇卫定一、杨虎城部截击，狼狈溃逃入山，吴新田本人逃往天水，后又回窜汉中。

第二次出山在一九二六年春。吴新田于上年被逐回汉中后，段政府又委以“陕南护军使”名义。遂重整旧部，编为四个旅，任顾琢堂为陕南边防军总司令，张耀枢为副司令。划安康属数县为镇嵩军柴云升、王振等部驻地，以深结刘镇华。又由汉江运现洋一百五十多万元，白银二十多万两，烟土百余万两至汉口，大量购买枪械弹药，准备乘机再起。会国民二军用兵山东、山西相继失败，放弃河南回陕，刘镇华得吴佩孚、阎锡山之助，集结旧部，在豫西截击国民二军，二军溃败弃械，刘镇华复振，并以吴佩孚所予之“陕甘讨贼军”旗号，悍然西入潼关，再图陕西。吴新田也再次出山，帮助刘镇华攻略关中。吴军一路出子午峪，直指长安，一路出益门镇取宝鸡。时国民二军新败，李云龙与国民二军杨虎城及陕军卫定一部共守西安。刘吴两军合共十万之众，围困西安城八个月之久。围城期间，吴新田军驻周、户一带，暴虐人民，过于镇嵩军。在周至屠杀焚掠三十余村庄，死农民一千五百余人，尤为罪大恶极。迨冯玉祥军经甘肃来陕，打退刘镇华，解西

安之围，吴新田再次龟缩陕南。

吴新田第二次逃回汉中后，全国政治形势大变，国民革命军奄有大半中国，北洋军阀已日薄西山。于是，吴新田急忙另谋出路，利用与冯玉祥的旧关系，取得冯的改编，遂脱去陕南护军使旧帽，戴上了国民联军第十六路司令的新冠。这时，吴部共三师。第一师师长吴自兼，第二师师长张耀枢，第三师师长李长明；另外编两个旅，为孔繁锦在甘肃被冯玉祥军击败投归吴新田者。

### （三）

在吴新田驻军的那个时代，陕南被称为富庶之区。其实所谓“富”，指的是汉中盆地盛产稻谷，安康山区特产山货。而土地、山林多为少数地主豪绅所占有，广大贫苦农民在封建的野蛮压迫剥削之下，饥寒交迫，其痛苦更有甚于山外各地。吴新田长期盘踞陕南，真是所谓“山高皇帝远”、为所欲为，极尽压迫剥削之能事。他的刀锋主要对准汉中、安康两府所属二十余县的广大贫苦农民，对于那些富有的地主豪绅，则勾结利用，千方百计搜刮自肥。兹就吴新田压迫剥削陕南人民的罪恶事实中略举数端，以例其余：

一、随赋加征。当时陕南二十五县田赋，全年折征银币二十二万四千三百余元，约自一九二一年间，刘镇华通令附加省税百分之百，即加倍为六十四万八千六百余元。吴新田到陕南后，全部截留尤不为足，别立名目，随赋加征军谷，每完纳正银一钱加收稻谷一斗。此项加征军谷总数约在十万石以上。一九二五年九月，吴新田由关中败归南山，又将军谷改为加收粮秣款，并以道尹阮贞豫为筹饷局长。着力催办。此项加收粮秣款是每完纳正银一钱，加收一元五角，总数约在一百二十七万元以上。虽然赋银是由地主缴纳，但地主总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所以农民以此破产者很多。在这种固定加征之外，还有临时摊派，其名目奇特而繁多。如所谓“直奉战费”，“冯军加款”等等。仅一九二二年八月至次年三月的一次“军需借款”就达八十万两之巨。

二、禁烟罚款。吴新田在其统治区域内强令农民种植鸦片烟，征收烟亩罚款。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此项烟款逐年加大，由年征一百余万元增至四百余万元。从产、运、销、吸，层层征收款税，名堂之多，方法之巧，著成奇观。自吴新田及其僚佐以至士兵，人人都从鸦片烟里讨生活，成为一支“黑军”。吴的扩充军队也从鸦片中来，当时汉江上高悬吴军旗帜的船只，满载烟土顺江东下，载运军火逆水西上。而被迫种烟的陕南农民因此倾家荡产者更是不计其数。

三、捐、税和支应。吴新田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举不胜举，如客军捐、驻军捐、服装捐、铺盖捐、公益捐、自治捐、船捐、斗捐，土地捐等等，有脚柜税、牲畜税、牙税、赌税等等，又有临时军事费、临时维持费等等。至于支应，是无偿地向各行各业人民强索用品，不惟军队用的麸料柴草要民间支应，就是军队的眷属家什如桌、椅之类，也在支应之列。每遇节日“劳军”，也要卖肉的供肉，卖鱼的供鱼。公馆衙门修缮房屋，人民也要支应木工、土工。

更应该说到的是吴新田奴役陕南人民，异常野蛮残酷。陕南山区，时无公路，交通运输除汉江行船外，陆路全靠人力肩挑背负和牲口驮载。吴军的军需转运、货物贩运、代私商保运物品，都要强拉民夫。这种超经济的剥削，即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亦属罕见。

有压迫就有斗争。陕南人民从军阀吴新田驻军陕南起，农民的抗捐斗争，此起彼伏；一九二三年六月，佛坪县农民由尹天禄等领导，打进县署，将现任知事张治和卸任前知事车正轨一同捉住，杀于财神岭；同年，在宁陕、商县镇安等地，都发生了农民群众的武装抗捐斗争；一九二四年，宁强县爆发了农民群众反压迫斗争。吴新田对于人民群众的愤起一律采取镇压的手段，因之陕南人民与军阀吴新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于是有一九二六年冬，兴（安）汉（中）两府八县农民大规模的反吴武装斗争。

风暴首先发生在石泉县下八地一带。农民群众在下马岭的农民郑

克斗倡导之下，从一九二五年就开始以练团自卫的名义，团结起来，建立武装组织，并以抗捐相号召，从而得到石泉县各地农民的响应。很快地自下而上的凤阳台、麦子坪、莲花石，直到县城以南汉江对岸的银洞山，全县大部地区都聚集起了团练。一九二六年夏，团练惩办了下乡收捐款的差役，石泉驻军吴新田部开队前往镇压，郑克斗带领群众上山结寨，打退了吴军的进攻。从此农民武装的声威大振，参加团练的人越来越多；而团练打击那些仗官势欺凌人民的土豪劣绅和官府派来的催款委员、收税差丁的事，所在多有。

洋县农民的斗争组织名为“大刀会”。一九二七年二月，农民群众在锅滩杀死了催款委员，掀起反吴斗争。洋县驻军牛埭椿团派兵“进剿”，农民武装在铁石关、土门关于吴军对战，并在相庙村夜袭吴军营地，歼灭了不少吴军；随后与吴军转战于佛坪、宁陕等三县地区。

此外，在西乡、旬阳、白河、汉阴等县，都有农民群众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吴新田对于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一律采取武力镇压的办法。如在白河县，一九二七年二月，吴军一团在厚子河以至枣树岭一带七十多里，屠杀农民数以百计，房屋一概烧光。同年夏季，吴军攻破了石泉三鼎寨，逮捕了郑克斗及其全家，最后把郑克斗杀害于汉中。吴新田的屠刀虽然杀害了农民斗争的首领，但广大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意志是压不下去的。农民的斗争也推动了社会各阶层人民反吴的活动，当时陕南各界组织有“陕南人民驱吴公民团”、“陕南人民自决会”等反吴团体，以印刷物揭露和声讨吴新田的压迫剥削陕南人民的种种罪恶。

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分路进攻北洋军阀最后的奉系，会师北京，分配一、二、三、四集团军驻军区域。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分得鲁豫陕甘宁青六省地盘。冯为整顿内部，调吴新田所率第十六路军移驻河南信阳，陕南防务由张维玺师接替。吴新田对冯素有戒心，自知在陕南七、八年间劣迹太多，而又身染沉重的大烟瘾，绝难见容于

冯玉祥。遂暗派代表与驻汉口之第四集团军李宗仁接洽，请求归李改编。李循其请，允为编一个军，由吴任军长。吴新田乃通令沿途各县准备给养，佯作开往信阳，又密令其参谋长陈世钰先期赴汉口，商洽开到湖北以后的驻地及人员编制问题。同年十月初，探明张维玺师先头部队已从宝鸡入山，吴新田即将汉中以北由褒城至凤县一带驻军撤退，转向安康、平利集中，以便进入豫鄂边境；其所属之第二师因已参加北伐战斗序列，早已驻扎湖北郟阳、均川和老河口一带，更便于向南转移。

一九一八年十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吴新田偕其总司令部直属部队卫队营、辅重营等，最后离开汉中。经南郑、城固、洋县、西乡、石泉、汉阴，到达安康。等到张维玺进入汉中，吴新田统辖的各师旅团大部分已开至湖北境内。原来李宗仁指定江陵、沙市一带给吴部暂驻，吴新田畏山路跋涉，派旅长王宗良代理第一师师长，率总部直属部队向指定地点行进，他自己带着卫队营乘船由汉中顺流到了汉口。这时冯玉祥闻知吴新田已归李宗仁第四集团军改编，急电话责李宗仁，说吴为第二集团军部队，违令私开湖北，应予包围缴械，不许擅自改编；并派其参谋长熊斌到汉口会同李宗仁监视缴械遣散。李亦见吴军腐败不堪，只编了两个旅，其余大部解散；对吴新田本人则委以第四集团军高等顾问。吴新田从此北走天津，在帝国主义“租界”的庇护下作了“寓公”。

（李子健、沈传忠执笔）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 盘踞陕南之吴新田与鸦片烟

薛紫丰 罗搏九 傅输卿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北洋陆军第七师吴新田部初来陕南，枪不满六千，人不过八千，但在三、四年之内，大肆扩充，卒拥枪二万四千

多支，人逾三万。吴军盘踞陕南七年期间，一切军政费和挥霍用度，全以残酷剥削陕南人民而来。除了把持地方财政、截留各种田赋、税收外，其敛财的主要手段是大开烟禁，迫使陕南人民广种鸦片。当时烟款之奇重，为数之巨大，为先后驻军陕南的军阀所不及。本文所述吴新田种烟敛财资料，是薛紫丰等数人互相交谈回忆综合所得，错误难免，至希阅者指正。

## 一、从“广盛老”钱铺说起

“广盛老”原是一家估衣铺，它由估衣铺转营钱铺，是经过一次意外事变而发展起来的。事情是这样：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夜，汉中城内驻军余永宽团的两个营突然哗变，一时市面骚然，银钱、布匹，百货、药材等大商号损失巨大，而广盛老估衣铺幸免抢劫。恰好这时铺中囤积食盐三十石，劫后物价陡涨，获利颇丰。复以市内钱业被抢，倒闭者殊多，该号遂在门口摆了一张桌子兼营兑换银钱业务。由此积资，置田地买街房；数年之内卒成“广盛老钱铺”。一九二一年，广盛老钱铺声誉渐著，居然自己发行钱票三千串。但是它的流动资金不多，只有白银一千两。

是年冬，吴新田率军来驻汉中。当时汉中没有银行和大钱庄，遂由南郑县知事阮贞豫（字翱白，合肥人）推荐广盛老、万镒合、长盛合等钱铺与吴军做银钱往来。从此广盛老成为吴部的外库，受陕南边防军总司令部、汉中道尹公署、南郑县公署的委托，经手代收南郑、褒城、城固、洋县等县烟款，支拨军饷，并代吴军官兵收购烟土。广盛老遂一跃而为汉中首屈一指的钱铺了。这是由于广盛老的东家兼掌柜的张文学为人善于奉迎、结交官场、博得吴新田信任的原故。一九二六年，冯玉祥的西北银行西安分行，计划在汉中设办事处。吴新田为抵制西北银行势力进入陕南，就自己开办“兴元银号”发行纸钞，并利用广盛老钱铺的人力，委张文学和薛紫丰分任正、副经理之职。一九二八年，吴军东开，薛紫丰也随军同行。这时广盛老钱铺因吴军提取军款，市面震动，业务一蹶不振，购兴元银号同归结束。



## 二、吴新田开放烟禁，迫民种烟

陕南地区开始公开种植鸦片烟，始于刘存厚驻汉中以后。虽然一九一七年间陈树藩曾在关中大开烟禁，而当时陕南所受影响尚不为大。及至一九一八年冬，四川督军刘存厚率其残部窜入汉中地区，才公开迫令人民种烟，起初，农民都不敢在邻近城郊的田里种烟，刘存厚竟指示其军队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来大量种烟。如此提倡的结果，农民种烟者渐多，烟款的收入，来成刘存厚窃踞汉中期间的大宗财源。待至吴新田来驻陕南，“萧规曹随”，把公开种烟大为扩展，于是，兴安、汉中两府所属及当时划归的商洛区二县，共二十五县，凡是能种烟的土地都种植了大烟。

当时开放烟禁的军阀都有一个通用的名堂，叫做“寓禁于征”。吴新田也用此掩耳盗铃的手法，把所征烟款叫做“烟亩变价”。意思就是说，政府（军队）禁种鸦片烟，种烟者的土地本应予以没收，但农民失去土地则失去生业，所以将地亩变价作为罚款，土地仍归农民。这样一来，种烟者继续种，军阀则继续征收烟亩变价款。吴新田就是利用这种手法，公开迫令农民种植鸦片烟的。究竟一年收入多少烟款，烟款逐年增加的情况又是如何？这在当时外人就不易知其详情，时至今日更是无法摸清的。仅据道尹王丙坤编著的《汉南纪事类编》载：一九二二年即吴新田摊派烟款的第一年，其数为一百四十万元。这项收人是官方记载，显系大大压缩了数字，但已几等于陕南二十五县每年正杂各项款收七十五万元的二倍。如果按当时“烟亩款”每亩十元计算，则种植鸦片烟的面积就在十四万亩以上。但是，实际种烟亩数绝不止此，因为这当中尚有层层隐瞒、上下舞弊的情事。而所谓年收一百四十万元只是吴新田总司令部伸手向各县要的数字，经过县、区各级的增派和勒索各种名目的附加，实际人民缴款也绝对大大超过此数。

说来也有趣：当一九二二年鸦片烟收割以后，北洋政府重申厉行禁烟，委令特派员赴各省查勘烟禁。陕西省长刘镇华在西安也摆出一副雷厉风行的禁烟样子，订有各种单行惩办章程，并将全省分为五区，

每区委督察大员一人查勘烟禁。陕南分为汉中、安康二区，汉中区十二县督察是刘次枫，安康区十三县督察是刘介甫。汉中并成立了“禁烟自进会”，辅助官厅进行禁烟，标榜的是“务使根株净尽，决不容发现一茎”。汉中区十二县中，竟有十一县呈报“冬烟禁绝，境内一律肃清”，并出具了“印结”。可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吴新田和汉中道尹王丙坤以“陕南军集如林、财空似水”的理由，认为对于“烟禁一层恐难过持严格主义”，仍按上年前例，又摊派了一百数十万元的烟亩款。若“冬烟禁绝”烟款何出？原来各县出具印结，只是为了给督察大员能以消差的一纸凭据，完全是一句空话。

一九二四年，道尹王丙坤病故，吴新田推荐他的亲信阮贞豫升任道尹，其迫民种烟，就越加疯狂。扩大种烟的办法，就是增派烟款的数额，数额既已派下，农户不能不缴，势必随着烟款的增加而扩大种植的面积。每年征收烟款多少，是由吴新田根据他的需要而定。道尹公署则按照总司令部筹款的总数，略按各县之大小，土地之肥瘠，分摊所属各县。各县又分到各区，区再分到各乡（坝），直至派到各花户。款子一经派定，即使花户一亩鸦片烟也不种，烟款照样要缴。农民为减轻沉重负担，防止天时不好减产，遂不得不将粮食和经济作物耕地面积缩减，改种鸦片烟。迨到翌年，又在此基数上增加。如此年复一年，越种越多。这就是那时陕南地区罌粟遍地的主要原因。

汉中地区种烟最多的县份，是南郑、褒县、勉县、城固四县，尤以南郑占首位；其次宁强、洋县、西乡等县。南郑县一九二二年间，据说经过县公署查实过的种植面积，是二万四千亩。薛紫丰回忆：广盛老此年代收南郑大西区、南区两地烟款，是十万余元，而到一九二五年陡增至五十万元之谱，增加的数额在五倍左右。其他各县数字虽不能以此类推，但二、三倍的增加是可信的。人们至今还常说：那时鸦片之多，多的没法说，出了汉中城四门，一望无际都是烟地；由洋县到汉中的沿途，春季罌粟花开，只见阡陌相连，一片花海。在汉中盆地上，估计百分之四十的耕地种植了鸦片烟。每当割烟时节，男女老少都忙着去“赶烟场”，代人割烟，或是“拣烟”，形成一种特殊

的忙碌。

### 三、“烟亩变价”与“禁烟罚款”

吴新田盘踞陕南的七年间，凭借鸦片烟以自肥，并赖以扩充其军队实力，汉中、安康所属二十五县人民备受其毒害。吴新田在鸦片烟上的敛财手段，是无孔不入的，产、运、销、吸食，各个环节上，都巧立名目，层层剥削，亟苛征暴敛之能事，故当时陕南人民把鸦片款叫做“千层皮”。

吴新田征收鸦片烟款，可以分为两大项：一是向种烟农民征收的，叫做“烟亩变价”和某种“附加”；一是向运、销、吸食者征收的，统名之曰“禁烟罚款”。

烟亩变价款，每亩计征白银十两或银元十元、八元不等，视各地土质的好坏，产量的高低而定。例如城固的土地好，烟的产量高，质量也好，每亩款是库平银十两，而高山地区的县份则有每亩八元的。烟亩变价是烟款中最主要的一项，征收的办法是：花户根据上面摊派的烟款数目，来定各自的种植面积；待烟下种，烟苗出土后，县署派委员下乡查实亩数，根据实际种烟的面积填造花名册，报送县署复审，县署认为各区所报的数额业已超过摊派的烟款，即可准予定案；若不足则以不实再令复查。一经县署定案，即将这一区按乡或坝（坝是陕南地区一种行政区域，与乡相等。）各花户种烟亩数出榜揭贴。让农民核对，明年即据此榜示数额缴纳烟亩款。凡是种烟的人都在榜上有名，但到缴款时，那些首事、团总、乡约以及“有面子的人”。却可以不交烟款；不仅如此，首事、团总等还要在办理烟款上弄到油水。收烟款时，县署与各区首事等人伙同舞弊。上报的款子，既要减去首事、团总、乡约等应缴的款额，而且要给县知事匿报二、三成，作为县署人员的好处。官吏们彼此心照不宣：满足了吴新田司令部的派额，剩下的就可以中饱私分。所以每年实际征收的数额，谁都无法知道确数。

新烟一上市，催交烟款急如星火，县署收款还恐不及，便委托钱

铺分区代收。钱铺每天将收到烟款的数目，造名册送到县署，未交或欠有尾数的花户，县署派委员、班头带着差役下乡催征。委员和班头一上门，除饮食招待之外，还得奉送黑费（贿），才得宽限数日；稍有不合，便绳捆索缚，带到县署大堂，按下就打，直打得血肉横飞。打后还得花钱取保，限期缴纳。如此相逼，种烟的农民只得以最低的价钱把烟卖出，受烟商的宰割。

若遇产量减收或无收，烟款丝毫不得减免，农民就陷于绝境。据《汉南纪事类编》载：一九二二年，陕南雨水成灾，为历年所仅见，面积普及二十五县，仅汉中十二县，灾民就有二百余万之多。王丙坤写到当年烟亩变价催收的情形是“各属囿于派额查报多未翔实，以故各县原报总数九十余万两，现收之款仅五十余万两，尚不及原报十分之六，而荡家鬻产、卖儿逃亡者时有所闻。……兹据各属报明，尾数可收之款，不过十万余两。”虽然如此，还是严令于阳历八月以内，将烟亩变价尾数催收齐全，解道备文军饷。这时农民的处境如何，人们是可想而知的！

至于烟亩变价的附加，名目之多，各地不一。就《汉南纪事类编》记载，城固县当时附加等于“正款”的三成以上。一九二二年间，城固县烟亩变价共计是十余万两，每亩征收库银十两。该县收银每两加收钱四百三十文，又每两附收坐沽钱二百五十文，总计每两浮收六百八十文。那时每两白银抵制钱一千八百文，附加在百分之三十七以上。迨后，附加的名称越来越多，有总司令部的，有道尹公署的，还有县地方的临时附加。据经收过烟款的人回忆，附加有达“正款”的百分之五十者。附加的款项，多是假借名目，实际是落进了官吏的腰包。无怪乎吴新田的亲戚故旧，相互角逐当县知事和委员，吴之宠妾三姨太竟公然卖官鬻爵，有人说黄官岭县佐余敷五调升褒城县知事，就花了活动费一万二千元，这不是无因的。可是肥鹵人人垂涎，吴的部下都为此不平起来，吴新田为缓和此种内部矛盾，特示凡驻军所在县份的知事由驻军提名推荐，然后加委任命，以示“利益均沾”。这是一九二五年七月吴在关中失败后，军心动摇，不得已而为之。

自一九二四年阮贞豫任道尹后，每年烟亩变价增加到多大？由于吴新田走时，将各县烟款案卷焚烧无存，现已难知确数，但从其扩军的情况看，亦可推知大概。一九二二年，吴新田所部不足万人，每月的军饷十五万元，一年发饷八个月，年一百二十万元，到了一九二四年后，拥军三万，依此照加，一年的军饷当不下三百六十万元；吴军每个士兵月饷是四两二钱银子，折银元六元多，三万人每年也近二百万元，而当时官兵薪饷相差悬殊，按此推算一年也得三百万元以上。仅此薪饷一项，至于购置枪支、弹药等的耗费，尚不知道有多少。如此浩大的军费，大部是仰赖鸦片烟款一项来维持。据罗搏九（当时在洋县县署搞总务工作）回忆，他记得一九二七年吴新田给各县摊派的烟亩款总数是三百七十万元。由此可以推知，陕南每年烟亩变价款一项的收入，约略估计为数在四百万元左右。

再说“禁烟罚款”。此项罚款，由禁烟罚款局征收。汉中地区设有：南（郑）褒（城）、城（固）洋（县）、西（乡）镇（巴）、勉（县）略（阳）、宁强、凤县六个禁烟罚款局，留坝、佛坪因系山区，种烟较少，只派有禁烟罚款委员。安康、镇、柞等十三县同样有类此设置。局下又设所、卡，如此机构遍及二十五县，人员密布各要津关卡。

“禁烟罚款”是统称，按照不同的征收对象区分，又可分为：内销，外销，熟膏罚款三种。“内销罚款”是向坐商征收，每一千两烟土收“罚款”十元。“外销罚款”是向贩运商征收，每一千两烟土收“罚款”五十元，故又称为“罚款大票”，有“罚款大票”的烟土，始准运销陕南辖境以外；另外，还有一种短途临时行销，即由甲县运到乙县出售的烟土，得扯分运票，所缴纳的“罚款”叫“运销费”，每千两烟土收“罚款”十五元。“熟膏罚款”是向烟馆征收，按营业额计算；甚至还有“烟灯税”，一灯一日收费一至二角，逐日计征。仅此几种罚款，每年吴新田的收入约近百万元之多！

以上“罚款”，是所谓照章征收的。除此之外，各局、卡人员，每当烟土过境，要点货验票，一千两烟土又要收点验费一元，这是明

要的。至于局卡人员借故刁难，恣意勒索，其中弊窦丛生，不是身历其境的人能知其详的。

#### 四、汉中的烟土买卖

鸦片烟大量种植，对陕南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南、城、褒数县的变化尤其显著。素以产粮著称的汉中盆地，由于种烟而使夏粮作物面积大大减少，城镇食粮的供应要仰赖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县输入。城镇商业贸易，也由于鸦片利厚，彼此争相经营，趋之若鹜，使传统的商业受到很大的影响。例如药材这样素称陕南大宗贸易反趋向衰落。与此同时，高级奢侈品、舶来品随着烟土商进入汉中，为上层社会的享乐而开设的妓院、赌场、酒馆、戏院等行业，栉比相连，造成了市面的畸形繁荣，而盛极一时的“烟市”尤为“奇观”，使朴素的汉中城充满着糜烂的气息。

吴新田既大开烟禁，种烟者缴了“烟款”，买卖烟土者也照章缴纳了“罚款”，所以鸦片的买卖，在吴新田的独立“王国”里，形成了公开而“合法”的交易市场。

烟土交易主要是在每年的四至六月（阴历），新烟上市的季节最盛。在这个期间，汉中这座山环水绕的城市，显得异常活跃，四乡的种烟农民进城卖烟，外地的烟贩子，也由远道成帮结队赶来；其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接踵而至，反正各色人都有。茶肆酒楼终日座无虚席，旅店栈房为之客满。各种商业，都多少与烟土交易相联系着。

烟土市场是分布在城的四关，尤以东关为最大。自四月下旬至六月，东关街道两边，地上摆满了盆盆罐罐，装的尽是“黑土”，肩挑手提的也多是“大烟”，买卖烟土的人把东关狭窄的街道拥挤得水泄不通。但是不管烟土多少，买卖都要经过“土行”。土行既是买卖双方的经纪人，又是烟税征收的监督者，它控制着烟土交易的进行。土行全是由吴新田的亲信开设的，后台老板就是吴本人，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的把土行称为“官行”。土行每县都有，在主要产烟地区的集镇，

如黄官岭、新集、周家坪也都设行。只是在偏远的集镇，吴新田的人力达不道的地方，才不直接设行而包给包税人去经营。但到四至六月新烟上市的旺季，往往又临时收回自营。在汉中共有五家土行，其中最大的是东关土行，经理是吴的军需处长兼南褒禁烟罚款局局长李庆纯（字少仙，合肥人，吴的表弟）。土行有牙人、司称、记帐等人员。农民把烟土摆在沿街两旁，内销烟商看好货色，要买的话，买卖双方偕至土行，牙人从中议价，达成交易。土行还负过秤、记帐、结算之责，而赚取佣金。佣金向买方收百分之三，谓之“行用”，向卖方扣百分之二谓之“秤钱”，合计是百分之五。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这笔收入，除发给员工薪资外，余数概入吴新田及其亲信的荷包。土行不仅给吴新田增加了一道收入，更重要的是买卖都要经过土行，便于他从中操纵，对于征收各种“罚款”起到监督作用。未经土行成交的烟土，就是“私卖”，一经查出则处以重罚。

汉中烟市每年的成交数目是非常巨大的。阴历的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五日，是最旺盛的一个月，在一九二二年，东关土行每日的过脚有五万两上下，加上北、西、南三关的过脚合计每日约在六万两左右；待到一九二四年以后，每天过脚约在八、九万两以上。大致五月成交的总数约在二至三百万两，六、七月，每月也在一百多万两以上。以后几个月为数逐渐减少。烟土的成交为什么都集中在这三个月呢？原因在于烟亩款自四月起征，再拖也拖不过六月，除了有钱能纳税的大户不急于求售以外，大多数的农民都要在这个时候把新烟卖出，缴纳烟亩变价罚款；而一般高利贷者，也多在割烟时收债。烟商则利用农民求售心切，乘机压价，因此，烟的季节差价非常大。汉中四至六月，每两土的售价只卖二至三角（因土有干湿和质的高下），待到八、九月间，就涨到七、八角，前后不过二、三个月，差价悬殊在三倍以上。可见吴军的官吏和烟商从中猎取了多大的高额利润。

烟商有内销和外销之分，做内销的是坐商。坐商向农民零星购进，经过加工，制成“烟砖”，再卖给外销商。烟砖分五十两、一百两二种。供应市面的还有碗装。烟砖上盖有字号的印记，标明货系某家的，

便于闯出牌子，以广招徕。那时，烟土内销一般多由钱业兼营，特别是代收烟款的钱铺，没有不做烟土内销的。因为烟款存在钱铺，逐月支拨军饷，所以它时常拥有大量存款可资利用。而且，也只有假手烟款，转购烟土，流转既快，得利又厚。若经营其他象布匹、百货、药材等商品，均要往外贩运，在陕南这样交通极不便利的地方，是不便于周转的。钱铺做烟土外销的很少，因其风险太大。汉中城郊那时共有大小二十余家钱铺，经营鸦片烟最多的除广盛老之外，尚有昌盛合、万镡合、正发永等四、五家。广盛老在一九二四年以后，每年要卖五、六十万两烟土，每年的存土也不下二十万两。所以当时的钱铺无不以拉好与吴新田及其部属的关系，视为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命脉。巴结吴军的手法，主要是代吴部人员收购烟土，除代劳而外，还要低于市场的价格计算，实质上是变相行贿。其他商业兼营烟土者亦不少，只是均不能与钱业相比，在烟土内销上可以说由钱执其牛耳。

所谓外销，指的行商，也就是烟土贩运商。做外销的，主要有商洛、汉阳、西安三大帮，以商洛帮为最大。

商洛帮原是做川土的烟帮，陕南大量产烟后，舍远就近，转向汉中。这帮土商，都是商县、洛南一带的人，他们在汉中地区进货，由洋县槐树关进山，经两河、关口，出东江口，转往商洛地区，运至湖北安陆县之巡检司出售。由于山高路险，沿途土匪很多，所以这个帮的组织严密。帮内银钱统一管理，烟土统一买卖，结伙而行，盈亏也是帮内统一分配和负担。凡入帮的人，买货的银两交帮汇总后，先运西安交永兴庆号银楼铸成成色划一的银锭，然后携来汉中买烟土。银子和烟土往返，都是自己挑运不另雇人，故人们称他们为“麻鞋缠子客”。商洛帮每一帮有三百多人，最多的有五百来人。一个三百多人的帮，每来一次，就要挑来二、三十万两银子，运走二、三十万两大烟。在路上，他们把人分成二队，一半人挑银子或烟土，另一半人则是选拔年轻力壮者，手执扁担组成护路队，以防土匪抢劫。商洛帮和豫西南的反动地方武装别廷芳多有联络，在那里可得到别的武装保护，安抵巡检司。若路遇土匪，因格斗而丧命者，帮内给予偿命钱。



盈利除掉开销，则按交银的多少，按成分配；如因匪抢损失，即在以后经营所得利润中补偿，使之不亏血本。由于利害相连，结合较牢，故此帮长期不倒，获利也最厚。

商洛帮每年在四至六月和九至十月两季来汉中，一年两次合计约来十帮或八帮。来汉中多住在东关、十八里铺，旅店住不下，就住庙宇；也有直接去主要产地——褒城的黄官岭（现属南郑）、南郑的新集等地。由于人多，不能久候，只向内销烟商整批进货。此帮每年运销的总数约有二至三百万两，运到巡检司可获百分之三十的利润。

其次，是汉阳帮。汉阳帮是指他们由湖北汉阳上来的，也不一定是汉阳人，而且以兼营烟土者为多。此帮以汉水为孔道，上水带的是匹头、百货（实际他们原来都是布匹、百货批发商，做烟是回头生意），下水运的是烟土，每年在春夏涨水上来，赶秋雨水涨下去，一年只来一回，一次约百十人，运销的数量次于商洛帮，行销于长江下游。

再次，是西安帮。西安帮主要是由西安来汉中的药材批发商转化来的，如西安帮中的恒聚合、世聚协、大有林等，原都是经营药材的。见烟土利厚，渐渐抛开了本业，转而竞销烟土，形成外销烟商的一帮。每年运销总数在百万两左右。因关中地区也产大烟，汉南烟土横越秦岭，雇人挑运，运费大，且常遭土匪抢劫，故利润不甚稳定。以后慢慢就垮下去了。

陕南既是鸦片的大量产地，也是大量的消费地。经营烟土零售业务的，是烟馆。陕南烟馆遍及穷乡僻壤，难以数计，而最多的地方自然是汉中。

汉中烟馆林立，满布大街小巷，有挂牌的，也有不挂牌的。那时，汉中城关人口不满五万，烟馆却有一千来家。每馆烧烟的男女枪手，最少二人，多至七、八人。以此为生的至少有二、三千人，所以当时流行着一句笑谈：“烟是禁不得的。禁了烟，手握烟枪的人也要造起反来！”又如协税是南郑县的一个集镇，那时居民只二百多户，而烟馆就有三十来家。烟馆之多，流毒之广，可以概见。

烟馆还将烟釉于从烟枪内刮出来，卖给专收烟釉子的商人。商人将烟釉子配上其他几种药料，制成“杂药面”，也是一种毒品，专销山东、河北等地。起初，还不为外人知道，被视为一种药材运出去，每百斤只纳一、二元的税，待到袁华斋、袁聘如父子进厘金局作会计，他们尽悉其中奥秘，向吴部献计加大税率，每百斤课以二十元的税款，商人还得向袁氏父子送黑费。袁氏竟以此发了很大的财。“杂药面”税，也就是烟釉子税。吴新田统治陕南时期的“千层皮”的烟税，至此也就剥到了最后一层。

## 五、吴新田武装贩毒及其没落溃败

上面说的是从征收烟亩变价到抽烟釉子税这一整个过程，以及吴新田在这一过程中大发其财的情况。可是这还未道尽吴新田在鸦片烟上的“雄才大略”呢！吴新田在当时是一个盘踞秦岭、巴山之间、拥兵数万的军阀，他无所顾忌地凭其兵力，武装贩运烟土，把烟毒顺着汉江直放长江下游。武汉、上海成为“吴记”特货的销场。每年新烟上市，吴及其左右官员便低价买进，或从烟亩变价款中折实收进，封装装箱，号定民船，沿着汉江顺流而下，沿途既有他的驻军保护，船上又派亲兵押运，“陕南边防总司令部”的旗帜和船帆一同飘扬在汉江上空，如此浩浩荡荡，乘风破浪直达老河口。吴新田又和当时老河口驻军张连升勾结，一帆风顺地把烟土运到汉口、上海等通都大邑，猎取最高暴利。

在这条水路以外，还有平行的一条陆地运输线，以防水瘦不能行舟时的间断。吴新田在陆路上组织了运输营，有骡子五百匹，每次走一百匹，往来于老河口与汉中之间。

如此大做烟土生意的结果，当然利市百倍，吴新田遂由一个并不太大的军阀，变作“百万”富翁。但是，吴新田及其官兵，都无例外的大受鸦片的毒害。一九二八年十日，霹雳一声，冯玉祥电令其开离陕南，率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接着冯派张维玺部向南进军，吴军上

上下下，慌做一团，大有“地动山摇”之势。吴军中有的犹依恋于鸦片烟利益，不愿放弃汉中，主张拒张维玺于山外；有的因家资太重不便骤离，主张撤往川边，再观局势。一时去留难定，军心涣散。吴新田呢？本身烟毒很深，早已不能振作，只好被迫东开。这支由鸦片烟养育大的军队，一离开了陕南老巢，就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牛埔椿旅溃败于西乡；在白河山峡，老河口西又遭陕军李纪才部邀击，以致溃不成军。吴新田惧冯玉祥的为人，遂暗与李宗仁接洽，受其改编。李宗仁点验吴部以后另委张义顿率其余众。吴新田从此下野，躲天津租界，一榻横陈，永堕黑乡了。

（李子健、沈传忠执笔）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 陕西学生驱吴运动回忆

吕 颖 荷

一九二五年陕西学生掀起了一次驱逐封建军阀吴新田的斗争。运动规模很大，坚持时间七十余天，终于赢得驱吴的胜利。我当时是西安一中学生，并担负学生会工作，参加了学生驱吴运动。唯时隔三十多年，有些印象已经淡漠，现就记忆所及，写出片断回忆，不够之处，还请参加过这一运动的同志补充指正。

### 吴新田军队的蛮横不法行为

吴新田当时依附北洋军阀直系，进而勾结陕督刘镇华，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率军进驻关中。次年二月豫西胡憨战起，刘镇华率部出关督战，以吴新田代为“照料”督军，省长职务。及至刘镇华失败，走依晋阎，吴新田以皖系旧部，得段祺瑞临时政府四月三十日的任命，遂正式为陕西督军兼省长。吴高踞陕西最高统治宝座之后，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吴军纪律素坏，入驻西安后，经常抢劫财物，侮辱妇女，

寻衅打骂市民、学生。受害者向督署控诉，吴新田一概置之不理。于是军人更加蛮横不法，引起人民无比的愤懑。学生对吴新田及其军队集恨尤深，路遇每遭吴军殴打，弄得学生不敢单人上街，以后愈演愈烈，殴辱学生事件经常发生。各校屡向督署呈报军人不法事，吴新田拒不理会，反命教育厅责成各校严加管束学生。没有丝毫是非曲直，这就更激起了广大学生对吴新田的愤恨怒火。

### 吴军制造的“五四”惨案

驱吴运动的直接爆发原因，是吴军殴打一中学生激起的。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址在西安城隍庙后街。西侧是操场，与吴部第二十八团驻地西仓以矮土墙相连。学生在操场踢球，不慎将球踢出场外，等开门寻找，往往就不翼而飞。问附近居民，都说是军人将球拿去了。到兵营去索球，吴部官兵非但坚不承认，而且还打骂学生。我记得有一个月，象这样就丢失了五个足球。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午后，一中两个班级比赛足球，旁观的同学很多。正在比赛激烈的当儿，有人猛力一脚又将球踢出墙外。看球的同学，深恐军人将球拿去，有两三个同学立刻爬上墙头，见军人正抱着球向营房跑。有人跳下墙追赶上去，拉着军人索球，军人反诬学生抢球，随手将球抛给站岗的士兵，将学生按在地下拳打脚踢。其他同学看见这样凶恶蛮横，纷纷向前说理。这个吴军见许多学生围在面前，就撒泼耍赖地大喊大叫起来，于是营中吴军蜂涌而出，拉着学生乱打，有的学生就起而还击。这时，有个军官回营，不但不制止殴打学生的士兵，反而纠集大批全副武装的官兵，命令号兵吹起冲锋号，象凶神恶鬼般地朝一中冲来，首先捣毁操场西门，闯进学校，见人就打，学生向内奔跑，因内庭门狭，许多人的鞋袜都被挤掉，一时拥塞在门口。吴军就将手中所执棍棒、铁锹、扁担等凶器齐向学生头上打来，学生呼号之声，惨不忍闻。吴军继而闯入学生宿舍，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毁。正当这伙匪军逞凶肆虐之际，有一个督署官员从墙外经过，闻声

进入学校，方命吴军军官率队退出。这时，遭吴军破坏的一中，血迹满地，什物狼藉，据统计，挨打学生近百人，负伤三十多人，其中八人伤势沉重。骇人听闻的“五四”惨案，就这样产生了。

### 驱吴运动的展开——西安学生罢课

惨案发生后，一中教师魏野畴（中共党员）等，立即约集在校师生，于当晚召开全校师生紧急会议，共商反抗吴新田的具体措施。提出：惩凶、赔偿损失、保障学生安全，由一中学生会发起，自五月五日起，西安各中等学校一律罢课，不得圆满答复，决不复课。这些办法，得到全体学生和一些进步教师的赞成，唯有校长侯良弼，深恐事态扩大，影响他的位置，期期艾艾地提出反对罢课的意见。他的话才落点大家就群起驳斥，侯迫于群众声势，也就默不作声了。会上并决定由一中学生会建议陕西省学联，立即召集紧急会议，领导全城学生的驱吴运动。同时，还推派了赴各校联络的代表，准备天明即赴各校报告被害真相，呼吁各校采取一致行动。

第二天，西安中等以上等校全部罢课，各校并派代表二人，来第一中学慰问和参加陕西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会议选出成德中学的耿觉、张秉仁，第三中学的张含辉，西安师范的王秉成，农业学校的师受命，第一中学的季步月、吕颖荷为陕西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会议通过向吴新田提出惩凶、治疗受伤学生、保证学生生命安全、赔偿损失、保证不发生类似蛮横不法行为、调西仓吴军离西安等件。如以上要求不获完满解决，决不复课。会议还决定将吴军暴行和西安罢课情况，写成材料，广为散发，取得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 所谓“调解”与各校解散

西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全体罢课，声讨吴新田暴行的宣言、公启陆续发布，学生走上街头通过讲演、张贴标语、漫画揭露吴新田的罪

悉，使吴新田感到事态发展严重，才派了一个军官，来到一中，先见校长侯良弼，说愿作调解人，要求与学生会负责人见面。恰好当时学生会负责人只我在校，侯就介绍我与那军官见面。那人说：“吴督办对这一事件，极为关心，调查清楚，定要依法惩办。”又说：“吴督办觉得学生要爱惜光阴，不能长期荒废学业，要及早复课。”我郑重回答说：“我们学生为求学而来，决不愿意荒废光阴，现在受军队迫害，才忍痛罢课。如果吴督办能完满履行学生所提各项条件，复课不成问题，否则，谁也无权命令我们复课。”那人立即用威胁的语调说：“我是在吴督办授意下，来作调解的，能复课，甚么条件都好办，不复课，就是和政府对立，你们学生会各负责人，若执迷不悟，引起不良后果，将来后悔也就晚了。”我听了很生气地说：“你先生愿作调解人，我们是很感激的，但我们的目的是要完全实现学生会所提出的各项条款，任凭海枯石烂，意志决不动摇。任何后果，由我们承担，不劳先生为我们担忧。”那人见欺骗威胁无效，就没好气地对我说：“好吧，我回去代你转达，三五日后见话。”临去又威胁侯良弼说：“你是一中校长，事情友生在这里，你们能复课，其他各校也会复课，学生不上课，你得负责。”这才扬长而去。

那个军官走后，侯良弼就责备我不该说话态度那么强硬，给他招灾惹祸。又让我通过学生会其他负责人，劝导各校早日复课。我未置可否，遂不欢而散。

吴新田的所谓调解，只是欺骗学生的一种伎俩。仅知督署给侯良弼打过电话，责成侯强迫学生复课。此外，官方的行动，不过是把吴军第二十八团调驻坝桥和由教育厅负责受伤学生医疗费。显然是用这两件事敷衍塞责，决没有履行条件的诚意。我们不得已继续罢课、宣传，向各方呼吁求援。吴新田见欺骗无效，转而采取镇压。因此吴军对学生凌辱，日益加甚，把学生呼作“黑猪”（因穿黑制服），并扬言打死不偿命。迫使学生出外要换上长衫改扮商人模样。

压力愈大，反抗愈烈。学生驱吴运动不仅在省内取得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而且旅外陕西学生也大力起来声援。旅京陕西学生进步

组织共进社，于五月十四日发表宣言，支持西安学生的正义斗争。其他如湖北、上海、南京等地陕西学生，也都发出宣言、通电响应。就在这种形势下，学联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继续坚持和扩大斗争，继续坚持和扩大斗争，全面展开驱吴运动，大约在五月中旬，经过开会讨论，决定照顾同学安全，各校暂时解散，学联迁往三原，学联干部和各校代表，限一星期内到三原集中。

### 学联迁移三原后的驱吴活动

三原是渭北文化中心，时为国民二军第三师田玉洁驻地，不受吴新田统治。学联迁三原后，一城内南街贞节寺为办公地址（与田司令部仅一家商号之隔），由于房舍狭小，大部人员分住渭北中学和第三师范宿舍（城隍庙）内。学联即日派人赴三原各中、小学作驱吴运动的报告。并派人见田玉洁，请其协助。田的态度极为冷淡，不愿支持，但又迫于学生驱吴运动的正义行动，也不敢下逐客令。五月十八日，渭北学联假第三师范举行各校代表会议，欢迎陕西学联和西安来的同学。陕西学联代表，详尽地报告了惨案经过和西安学生罢课情形，到会的三原学生代表慷慨发言，誓作西安同学后盾，坚决驱逐吴新田。三原很快地成为一个驱吴的中心。

学联为了扩大驱吴力量，曾派代表到各地陕军和国民军中，宣传联络。又派人与河南的国民二、三军接洽，要求他们入关。为了选派赴各地的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与渭北学生联合会的干部及西安各校代表，特在三原师范召开了联席会议，经过慎重地讨论，方才决定。我当时被派赴兴平去见卫定一，不料中途遇兴平来人，知卫已去开封，遂改变计划，转赴礼泉见党玉昆（卫的参谋长兼团长，是卫军实力派），经过几度长谈，党表示决与陕军各部尽释前嫌，联合驱吴。并捐助学联一百元，还代卫定一垫捐一百元。又为我与了见卫部另两个团长党海楼和陈发荣的介绍信。到武功见了党海楼，到扶风见了陈发荣，接洽得都很顺利，他们也各捐助了一百元。这时本应回三原，因想到乾

县还有陕军岳维峻旧部丑秀山，于是又绕道至乾县，时丑奉岳命准备赴开封，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表示乐意把陕西学生驱吴运动向岳转告，并给学联捐助一百串钱。这次赴西路接洽，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回三原后，学联又派我和三原师范王之鼎，去大荔见麻振武，谁知麻已与吴新田勾结，一日去其司令部三次，都拒绝接见。不久，同州师范校长由麻部亲信中得悉，吴已电令麻将我们逮捕送省惩办。于是只得离开大荔，北走合阳，转道蒲城、富平，返回三原。这次虽未完成任务，却与同州师范、合阳中学的学生取得联系，他们都按时选派了代表，出席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

为了统一领导，加强驱吴运动的力量，学联与渭北学联发出联合倡议，号召成立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总会，邀请全陕各地学联派代表参加。这个倡议得到了各地学联的一致赞成，代表陆续到达三原。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出席有陕北、陕南、关中十三个学生组织的代表。在魏野畴同志的指导下，通过了驱吴的十三项决议案，成立了全省学生联合总会。学联会还出版了专门揭发吴新田罪恶、报导驱吴运动实况的刊物“血泪”（原为不定期刊，继改周刊，后改三日刊），受到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学联总会并组织了五个宣传队，深入富平、高陵、蒲城等地，进行宣传活活动。同时，陕军和国民军各部，也都抱着不同的目的，先后发动武装驱吴的战事。七月上旬，国民军孙岳、李云龙部逼近西安，杨虎城、甄寿珊部亦由耀县南下。吴新田陷于绝境，遂于七月十五日夜，放弃西安南逃，陕西学生驱吴运动，至此取得完全胜利。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

（政协泾阳县委员会供稿）

## 陕军截击吴新田史料三则

### 卫定一部在眉县截击吴新田部



## 冯 幼 青

一九二五年，吴新田在孙岳、李云龙的兵力压迫下，于七月十五日放弃西安，取道渭河南岸，向汉中遁逃，沿途遭陕军节节截击，狼狽不堪，溃不成军。

笔者时任卫定一部沈仲斐团连长，曾参加眉县截吴战役，仅就记忆所及，略述梗概，以供参考。

大约在七月十七日，卫部独立营李泮池部，奉命进攻周至，城中敌军稍作抵抗，即弃城西窜。沈仲斐团奉命攻眉县，事先派便衣队百余人，潜入县城，谁料城中并无敌军，适逢吴军先头部队西进，得乘其不备，予以袭击，歼灭敌官兵二百余人，缴获汽车二辆，马车数十辆。沈仲斐率大队继至，即将所获辎重及俘虏押解入城，就地布置，防敌反扑。稍顷，吴军大批开至，鏖战甚烈，沈以部属伤亡惨重，众寡悬殊，遂退守城中。敌复调山炮十余门，轮番轰击，炮弹迸裂，烟焰涨天，半日间未尝稍歇。于炮火掩护下，敌步兵连续扑城，达四、五次之多。至晚，卫部陈发荣团来援，吴军知不敌，乘机西窜。是役，卫部伤亡官兵二百余人，而战果亦颇辉煌，除上述缴获物资，仅步枪子弹一项即达十余万发。

卫部党玉琨团，于宝鸡附近与吴军接触，激战后，亦颇有俘获。

## 何经纬反戈截击吴新田

### 周 端 甫

一九一五年四月，胡（景翼）憨（玉琨）豫西战起，刘镇华率镇嵩军出关作战，陕西军政交吴新田（字芑荪）代为照料。吴率其部第七师一部及收编之陈树藩部张仲仁旅，踞有宝鸡以东至西安渭河以南数县。黑石关一战，镇嵩军溃败，北京段祺瑞政府任命吴新田为陕西督办，国民三军军长孙岳、二军第十师师长李云龙均不服。孙、李率

国民军西进潼关。吴新田惧，欲弃省城南逃。有说吴者曰：“敌未来攻先自退去，宁不畏人耻笑乎？芑督拥有第七师，又有第三十旅（张仲仁旅）及何梦庚（刘镇华留陕之镇嵩军）、王鸿恩（字锡三，直军管金聚残部）、孔繁锦（皖人，时任陇东镇守使）等部，兵力亦不为薄，何以自馁若是？吴乃陈兵省东以御孙、李。”

何经纬原为张仲仁旅第一团团团长，此时兼代旅长。何前在陕南，屡受吴新田歧视，吴曾分其兵力，故深恨吴。及吴至西安，将何部由户县调周至，再调眉县。时郭坚旧部卫定一旅驻兴平，与眉县仅隔一水，何与卫皆陕军，因相联络，欲乘吴新田溃败之际，施以报复，夺取军械财物，企图扩充实力，以为结纳国民军之资本。

是年夏初，孙、李由潼关西进，吴军节节败退，吴新田于七月十五日夤夜弃省城西遁，拟由眉、宝入南山。孔繁锦时在西安，其部驻宝鸡、千阳一带，知事不可为，前三日率随员先行，退回陇南。途经眉县，人有劝何经纬扣孔缴械者，何意在吴，虞其知而有备，未从，并于眉县城郊设茶点迎之。孔至，互致慰问而去。

越二日，吴军退至周至西之哑柏镇。何部即由眉县城移师齐家寨。卫定一亦派营长陈某当夜进至眉县城。次晨，何于齐家寨出兵金渠镇。吴军以陈世钰（陈为张仲仁第三十旅第二团）为前卫。陈团之一营原系何团第二营，其机枪一排亦系何团机枪连所拨。吴军行至眉县东之槐芽镇，何经纬督队痛击，吴军大溃。笔者时任何部书记官，目击官兵收缴吴军枪械累累，由前线往返运下。陈团行至眉县城畔，又被卫派陈营迎头拦击，何部官兵皆大呼曰：“我们二营，我们机枪排，都快回来！”陈团官兵遂纷纷逃向何部。团长陈世钰及营长吴某亦被迫走投何经纬。吴军先头部队既溃，其后队进至金渠、槐芽间，与何部展开激战。一时枪炮齐发，战火纷飞，烟尘蔽天，酣战竟日，吴军退回哑柏。何军仅留方少海营守金渠，余部携所获械弹回齐家寨。此役缴枪千余支，机枪一整排（水机枪二挺），俘虏四百余人，子弹等军用物资甚多。

卫定一闻知战况，乃倾其全部兵力（三团、一独立营），夜渡渭河，进驻眉县西原，以备迎击吴军。吴军退回哑柏，虑有追兵，当夜以两团围金渠，两团围眉县，余部护家眷辎重行李由王张公寨西行，未料卫旅已陈兵眉县西原，翌日至该处，卫旅迎头痛击于前，何军集结兵力追击于后，首尾受击，吴军大溃，尽弃所有，争相逃命。吴新田走依天水孔繁锦，仅以身免。卫旅获其无线电台二部，枪支、弹药、军用物资颇多。何部在高店子截获大车八、九十辆，吴之高级幕僚郭汝嘉及随军医院全体人员亦均被俘。官兵所获物资，除军用品缴公，其他烟土、银元、钞票悉为个人所有。陈世钰、郭汝嘉等，何厚待之，后皆乘间离去。

其后，吴新田自陇南回汉中，复与刘镇华勾结，以图再起。孙岳就任陕西督办，李云龙任帮办，编何经纬部为国民二军第十师第三混成旅，以何任旅长。一九二六年，刘镇华围西安，吴新田率众复来宝鸡、周至、眉县一带，何部驻户县，诡称中立，实暗与刘通。一九二七年五月，何在户县，纵兵捣毁农民协会，大肆残杀农运干部与农协会会员，罪恶罄竹难书。何一生善变，争权夺利，十足军阀行径。一九二八年秋，卒为西北军宋哲元以异己杀害。

## 杨虎城在岐凤截击吴新田

### 窦荫三 李百朋

一九二五年夏，北京段祺瑞政府，任命孙岳为陕西军务善后督办，岳率何遂、门致中两师入潼关。盘踞西安之原陕督吴新田，知力不敌，节节退缩，于七月十五日夜弃城西遁。行至周、眉，遭陕军何经纬、卫定一两部截击，损失惨重。残部继续西逃，冀回汉中老巢。

时杨虎城任陕西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驻耀县。因防地狭小，军糈不济，乃指挥所部姬汇伯、孙蔚如等分兵攻打麻允文占区韩城、合阳、澄城等地。澄城守军为麻部段茂功，负隅顽抗，久攻不克。杨虎城得悉吴新田西撤，食指欲动，拟乘机截拦。遂撤澄城之兵，移师

西向，分兵两路截击吴新田。一路由孙蔚如率部自咸阳渡渭河，尾追吴军，至眉县槐芽镇方将吴部顾琢堂旅追及，稍一接触，吴军无心恋战，即向西撤去。一路由李德升率部至武功、岐山拦击，于高店、虢镇一带，与吴部遭遇，吴军因沿途迭遭陕军拦截，已如惊弓之鸟，军心惶惶，斗志毫无，接火数小时即溃。

吴军之炮兵进至岐山境高店地区，欲涉渭河南逃，乃将十余门大炮移至中流，为杨部团长杨明斋所见，必得而后甘，率部奋力夺之。吴军以其兵力甚少，坚拒迎战。杨以寡不敌众，遂退，半途饮弹阵亡，吴军趁势猛追。正值危急之际，冯钦哉主力部队至，大军蜂涌而上，战斗甚烈，须臾吴军气慑，弃炮四散，狼奔豕突，溃不成军。是役缴获德国克虏伯大炮十余门，炮弹数十箱，步枪数百支，各类子弹数万发，其他军用物资甚多。

战斗结束，杨虎城总指挥部进驻虢镇。是年秋，杨虎城入省，谒孙岳，孙任其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驻宝鸡、虢镇一带，严防吴新田军之再犯。

（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供稿）

一九六五年九月

## 郑克斗领导石泉县农民反抗吴新田的斗争

### 郑修华口述

我叫郑修华，生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现住石泉县后柳公社仙鱼大队郑家院子生产队，是贫农。祖父郑珍金，是个木匠。父亲郑克斗，生于清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母亲张氏，生我弟妹三个。

我的家在石泉县原下马岭磨石沟郑家院子，距县城六十多里，是个山区。郑家在磨石沟是子孙枝叶较多的一姓，老家听祖辈们谈是江南什么地方人。郑家院子分上下两个院子，相距不到半里，两个院子

的老屋住的是我的本家，我一家子是另住在上院子月后的山坡上，盖的是一道门的草房，现在郑修明住房的院坝，就是我家原来盖房的基地。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叫黑沟，与郑家院子隔一道斜梁，相距里把路。

我父亲郑克斗领导石泉县下八地的农民，集团练，给官家作对，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闹到十六年（一九二七年），结果失败了，弄得家破人亡，虽然那时我只有十岁。由于我与父母自记事没有离开过，直到他被吴新田杀害和母亲病死狱中，才与双亲永别了。所以这一段历史，我可以就自己知道的从根谈起：

### 一、起事的原因

我父亲是靠租种油房坎渡船会的几亩地和打贩挑过日子。我说的打贩挑就是挑担柴米下山到集上去卖，赚个“过河利”，这种营生和卖劳力差不多。自己没有地，倒也穷的“轻快”，除了交几石租稞外，一不完粮，二不纳税。父亲为人好交朋友，能说会道，性情耿直，爱打抱不平，奉母极孝。附近的人都信任他，有事多找他商量，他也愿给人帮忙。

那年头，陕南是北洋政府第七师坐天下，师长是吴新田。石泉县知事先是余铭新、张世舒，后是陈光斗。三个都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贪官。磨石沟一上梁，就是凤凰山，地瘠民贫。可是，就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也逃不脱官家的搜刮，出不完的罚款，纳不尽的杂税。加上衙门里的差役，地方上的恶棍为非作歹，苦害百姓，大家都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我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每当他见差役捆人打人，就愤愤不平，常说“差狗子把人整的这样厉害，连猪狗都不如，非整他们一下不可。”

磨石沟上头是仙鱼洞。仙鱼洞的张家，有三兄弟，老大叫协林，老二叫顺娃，老三叫长娃，是一方的恶棍，倚仗兄弟多，无恶不作，叼着吃、打着喝，合伙诱奸人家的媳妇，奸后把女的藏起来，又诈向女的婆家说：“帮我回来，拿钱才能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

徐家新娶了个媳妇，就被张家三兄弟拐藏了，要徐家出一百二十吊钱，徐家没钱，张协林强迫徐家把媳妇改嫁给他为妻。我父亲看不惯张家兄弟横行作恶，张家兄弟也我父亲视为眼中钉，扬言要杀郑克斗。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六月初二日，因天旱，农民在黑龙洞求神取水。回来时，在汉江黄滩河坝里坐。有一个叫阮祖耀的说，“烟酒畜屠款子要得太凶狠了，我们要想个办法。”大家说：“有啥办法？”他说：“办法就是集团练，打款子。”又说“集团练要有一个承头的，郑克斗能干会说，大家平时都信服他，就叫他当头。”我父亲连忙说：“我没得这个能力，承不起头。”群众都说：“非你不行！”就这样算是商量集团练了。

初三，农民继续“游水”；游到仙鱼洞，在仙鱼洞团练就干起来了，把张协林三兄弟用土枪打死。杀了张家三个恶棍土豪，为地方除了害，人心大快，参加团练的人也就更多。自集了团练，大伙腰杆硬了，都抗款不交，磨石沟的团总周立仁（是郑克斗二姐夫周立德的弟弟，与郑有姻亲关系）收不到款子，交不了差，就向县里上禀帖，告郑克斗的状，县知事余铭新准了状子。七月间，县里派下差人，拿着铁链和火签拘拿郑克斗，并催收款子。差役到了油房坎，说要捉拿郑克斗到县里去法办。事情一传开，团练就知道了。差役过了汉江到磨石沟来，住在乡约王忠安家里，郑克斗带着团练把差役都捉住了，拉到泰山庙，捆吊在庙门前的屋檐梁上，团练用木棒子打，打得差役求饶。最后，团练又把六个差人的眼睛用梭标挖了；舌尖也割了，放他们回县上去告诉狗官，不准再来要款子。这班差役平时作威作福，不仅敲榨勒索，而且动不动就打二吊，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这次落在团练手里，不整一整他们不足泄民愤。

磨石沟的团练集起来后，凤阳台、中坝河、喜河、黄村坝，麦坪的干沟河、前柳溪的水磨沟等地也都集了团练。石泉旧时分上八地和下八地两部分。下八地包括曾溪、前溪、后溪、马岭、喜河、凤阳、熨斗、麦坪八个地区。石泉县署急向汉中报警，说：“石泉县下八地的人都反了！”我父亲是各地团练的总头子，“树高风声大”，就成

了官府要捉拿的“要犯”，又出告示又悬赏。官府拿的紧，外间关于我父亲的传说也就越多，说：“郑克斗是能人，头大如斗，身高丈二。”地方上的土豪，平时作恶多的，在团练起来的地方，都受整了，他们左一告，右一禀，向县上搬兵，这样官府就派了军队来打团练。

## 二、马蝗寨和太平寨打仗的经过

就在这年的八月，因为风声紧，我一家随着团练，扎上了马蝗寨。八月十五过节，在寨上摆下四、五桌酒席，各地团练派人来恭贺，推我父亲当团长。十六日早晨，团练的哨兵上寨说：“队伍上来了！”有些人一听到队伍上来了，就吓得要跑，中马岭松树沟倒骑龙的李宗鼎就喊叫：“你们不要走，走也走不了，只有大家齐心与队伍打！”经他一喊，有些人就转来了。寨子里有一个以打草鞋为营生的陈老汉，听外边枪响，他说没见过，要看一下。当陈老汉头伸到寨墙外，一声枪响，头被打成两半。

吴新田的队伍来攻寨，寨上的团练只有二、三十人，大家用鹅卵石朝下打，又用土枪土炮向下轰，打到中午，队伍拢不了寨。在徐家院子做饭的士兵，挑着饭担子送到马蝗寨跟前，队伍在离寨不远的地方，分成两堆，围着吃饭去了。

我父亲前额被子弹擦破了皮，流着血，见队伍停止了攻寨，赶紧用手巾把头包扎起来。我祖父朝外一看，回转头说：“快，他们都在吃饭。”我父亲翻身站起来，往炮洞里一看，转身就同李宗鼎把土炮瞄准吃饭的队伍，同时放了两炮，炮声一响，这两堆兵被打得东倒西歪，饭桶和饭碗，破的破，滚的滚。队伍给打散了伙，撤下了马蝗寨，路过磨石沟郑家院子时，把我家和周昌贵的草房烧个净光，在火堆里只拣出一把火钳，现在还用着。

队伍一走，团练就商量转移地方，马蝗寨的山不高，寨墙也矮，当天下午就拉上太平寨，离马蝗寨相距只几里路。

九月间，吴军又来攻打太平寨。寨上有百十个团练，三、四门土炮，是由马蝗寨抬上来的。这些土炮听说是防“长毛”的时候造的，

团练拿来修理一下，装上火药和铁砂子就能使用。炮能打里把路，散开是一大片，这是团练最厉害的武器。还有猎枪。差不多都会使用这些武器，要算我父亲打的最准，气力也最大，一根炮百十斤重，能端上端下。寨上除了火器外，就是卵石，早已拣了不少，人多扔下去也很厉害。

敌人队伍围了寨，有个营长派人喊和，说：“我们不要打了，说和了事，只要你们把团散了就行。”团练没理这一套，怕散了团会吃亏，都说：“跟他们和个‘鸡巴’！跟他们在枪口上说和去！”不和就准备打，团练分开把守寨门，聂老毛（聂克登，是中马岭的团练头）守东门，我父亲守西门。

不久，敌人队伍由西门上来攻寨，团练拿枪的开枪，打炮的放炮，没有火器的就朝下扔石头，打得队伍拢不了寨。队伍攻打一天，也没有攻上来，天黑了队伍退下山，在徐家院子休息（在马蝗和太平两寨之间，相距各二、三里路），寨上的团练一个也没有打死。

第二天，敌人队伍又来攻寨，这天仗打的恶，寨的团练被打死二个，伤了好些，我父亲又受了伤，一颗子弹从左脸穿到嘴边，打掉了一排牙齿，下巴和上腭脱了节。他用手巾托着下巴，又继续打仗。队伍死的更多，但没能攻下寨。等天黑队伍又退了下去。在太平寨上的团练，来自高川、喜河、中坝河、筒车坝等地方。队伍撤走，团练电跑散了很多。我祖父说：“大家散了，我们也只有走。”

我父亲同一些团练，由太平寨去凤阳台阳子明沟，住在黄光华家里，黄请“水师”（外科医生）给他医伤。母亲领着我弟妹三人上了凤凰山竹木扒，住在姓孟的家里。过些日子，我们母子也搬到阳子明沟，住在甘田湾张家。这时，我父亲的伤已养好了，打算下四川。团练都劝不要走，就没走成，后来被许乡约接上三鼎寨。

### 三、三鼎寨被捕

许乡约是汉阳坪团练的头，我父亲在阳子明沟养伤时，他曾来看过。谁知道他受了吴军的收买，听说得了一百块现洋，勾结敌人来捉



郑克斗。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许乡约派人拿信把我一家接上三鼎寨。二十四日，许乡约就暗派人给队伍送信。在三鼎寨上，是阳子明沟和许乡约的团练，磨石沟的团练，都打发回去了。

当晚，队伍悄悄摸上寨，把放哨的团练都杀了，进了寨才知道。我父亲一见队伍进寨，说：“不好了！”赶紧把所住的庙门拴上。这时庙里除我家六口外，还有许乡约等二十多人。庙是青砖墙，墙上有窗子，庙门上也挖有炮眼。庙内有两根土炮，三支怀抱子土枪，团练也多有猎枪。我父亲指挥大家防守，门口、窗子口、屋上都分得有人把守，往外开枪放炮，一共打了一天一夜，队伍也没能把庙打开。因为庙在后寨上，三面临岩，只有庙门对着寨内，墙又结实，团练居高临下，队伍很难攻进来。后来队伍爬上庙外岩上的柏树，从窗口往里打枪，庙内的人都急得团团转。

许乡约说：“没有办法了。”

我父亲一看，说：“怎么没有办法，把土炮移到窗口，用怀抱子枪守门。”

说着，团练们就装好两根炮，每根炮里装两碗火药，捧上两捧铁砂子，装好放在窗口，瞄准柏树上人最多的地方轰，轰了两炮，不被打死的，就是打得跌下树，摔也得摔死。因为树下是几十丈的深沟，掉下去就别想活。

这一仗，队伍死得虽多，但团练伤亡也重，队伍偷寨时就杀了十几个守寨门的，队伍上了寨，团练没处跑，跳岩的就有几十，在庙里的二十多个人，当时有九个人受伤，负伤的都藏在庙内的地洞里，这洞一直通到悬岩上。

三月二十六日早晨，队伍喊着要烧房，许乡约就要缴枪说和。

许乡约说：“我们不打了，自投兵。”

郑克斗说：“投降是一死，烧房是一死，打仗被打死了，也是一

死，反正是一死，我们不能投降！”

许乡约还是坚持要自投兵。

团练中有人说：“你自投兵，也不得活，现在跑也跑不脱，只有拚他娘的一个算一个。”

许乡约说：“就是死，也要投降。”

郑克斗说：“那我可不愿意。”

许乡约又说：“到了这步田地，你不愿意也要愿意。”

我父亲弄得没法，就对我娘说：“你把女娃子捆在背上，我们有两把马刀，背靠背，杀也要杀出去。”

许乡约顶着说：“你杀不出去，一阵乱枪就把你打死。”

说到这里，我父亲大概想到一家人都在庙里，硬拚都会死，口气就软了，说：“你说那样子，要得吗？”

许乡约一听口气软了，就打开庙门，对外喊道：“我们把庙门开了，你们不要乱放枪啊。”

吴军的彭营长，就招呼队伍，没有乱打枪；等我们出了庙门，队伍才进庙搜查，将地洞里九个受伤的团练，都用枪打死了。

彭营长问：“郑克斗，你一家几口人？”

我父亲说：“我一家有六口人，父亲、老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队伍把我们六个人点开，绑了我祖父、父亲、母亲和许乡约等十二个团练。我那年十岁，弟弟七岁，妹妹才两岁，我背上妹妹，队伍就押着我们一行下了山。

下了三鼎寨，往汉阳坪去，渡过汉江，在汉阳坪的沙滩上，吴军说：“先杀他一个。”就见一个兵把一个团练按着跪在地上，抽出一把“电刀”，举起就往脖子上砍，一连砍了几刀，也没有砍死。那个

团练痛的受不住，就喊叫：“你要杀老子，做快活些。”吴军说：“你要快，就给你一枪。”结果，一枪就打死了。其余的，都押到汉阳坪街上，吊在土街头一户人家的屋梁上。

#### 四、汉阳坪陪斩

二月二十七日，没吃早饭，吴军就把我们都押到汉江边的大沙滩里，我家六个人跪一列，许乡约等十一人另跪一列。只见一个刽子手，一手拿刀，一手提一手巾热蒸馍，走到十一个团练的那一列，手起刀落，先杀了一个。又是一刀，把第二个团练的头砍了下来。人头落地，身子没有掀倒，脖颈上直冒血，刽子手用蒸馍沾一下血，吃一口，直把手巾里的蒸馍吃完。吃了又连续杀第三个，这个刽子手，一口气就杀了十一个。看着这种残忍景象，我人都吓呆了，连哭都不晓得。末尾，杀许乡约更是残酷，先砍手脚，后砍头，又把身子开腔破肚，取出心肝，然后把尸体抛入汉江。人头挂在汉阳坪街上示众，许乡约的头和手脚，还解到县里去了。

吴军杀完人，又把我一家人押回了汉阳坪。回到街上，吴军的一个副官，把许乡约的心肝炒着吃了，还问别人吃不吃？别人都不吃，又问我父亲吃不吃？我父亲说：“只有你们才喝人血，吃人心肝！”吃罢饭，吴罕副官就审问我父亲。

副官问：“郑克斗，你为啥闹团练反对官府？”

我父亲答：“不是我要闹团练。”

副官：“不是你，谁闹起来的？”

我父亲：“是你们逼起来的，禁烟罚款和烟酒畜屠税，把人弄得没法活。有钱的自然给钱，没钱的，你们是一根铁链一根绳，捆着套着就往街上拉，拉在桌子边就拴在桌腿，拉在床边就拴在床脚。你们却去大吃大喝，吃饱玩够了，转过身来又是逼钱，打呀，捆呀，都由你们。”

副官被说得没话说，又问：“我问你还有哪些人？”

我父亲答：“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没有别人。”

副官见我父亲不说，就命令士兵上踩杠，上了踩杠仍没说，副官威胁道：“你不说，把你全家诛抄？”

“全家诛抄就诛抄，再没有别人。”

副官问不出口供，就命令士兵割我父亲的脚筋。只见几个士兵将我父亲按倒，把脚向后弯转来，一个士兵拿一把尖刀，朝脚筋窝窝里插下去，用力向外一搬，“卜”的一声响，我父亲“哎呦！”一声喊，就割断了，雪白的脚筋浸在血泊里。两只脚筋一割，我父亲痛得脸上变了颜色，眼睛里含着两颗好大的泪珠，但他并没有求饶，只是说：“要老子的命，就放痛快些，不要折磨人。”我一家人，看着他受这么大的苦，都大哭起来（口述者说到这里，流泪不止）。万恶的刽子手，并不给人痛快死，说：“你是上司要的人，我们杀不了。”

然后，用一付滑竿抬着我父亲，押着我一家往县上送。到石泉县，陈光斗叫人拿来一面锣，要我父亲喊街。我父亲说：“老子又没有钻到你妈房子里去，给你喊什么街。”士兵押着我一家人，打着锣，在城里转了一圈，就送进了看守所。一家人关在一个牢房里，每人脖子上套一个铁项圈，项圈上有一对铁环，在墙上挖一个洞，从洞里放进一根木杠，套在铁环内，杠子的另一头插进里面的墙洞里。这样，人只能翻身，不能起床，直直地躺在床上，连拉屎尿都不能起来啊。

## 五、公堂抗审

第二天，陈光斗坐堂审问，将我一家都带上了大堂。

陈光斗问：“郑克斗是不是你？”

我父亲答：“就是我。”

陈光斗说：“你好可恶。”

我父亲说：“嘿！我好可恶，你不可恶！”

陈光斗说：“我怎可恶？”

我父亲说：“你放差役下乡，逼鸦片烟款，要烟酒杂税，款又重逼得又紧，老百姓交不起，不是打就是吊，你不可恶！”

陈光斗说：“点了鸦片要收罚款，种了烟要上烟税，有什么不应当？有什么可恶？”

我父亲说，“你放的人，一到乡下，比土匪还凶，奸淫勒索，见啥要啥，你做官的，坐地分肥，你不可恶！”

陈光斗不仅没有问出一点口供，反被我父亲数说了一顿，就气急败坏地喊叫起来：“你是土匪！”

“你是土匪狗官！”

大堂上，吵了起来，说不成话。陈光斗就摆起淫威来，说：“郑克斗，非把你全家诛抄不可。”我父亲毫不示弱，冲着他说：“你陈光斗还把我全家诛抄不了。”陈又说：“不仅要诛抄你全家，还要把你钉活门神。”我父亲接着说：“你还得再转一世。”陈光斗最后说，要在二天限内钉我父亲的活门神，说完就退了堂。衙门就找人做门板，打铁钉子。门板做好了，六根钉子，只打好了四根。钉子为啥打不出来，怕是由于人民的同情，故意慢慢打。没等钉子打好，上头来公事，要解郑克斗去汉中，说是吴新田要亲自审问。因此，我一家在石泉只关了三天，就被押送汉中。

## 六、汉中殉难

在汉中监狱里，我一家分三个牢房关押，父亲关一个房，祖父关一个房，母亲和我与弟妹关一个房，妹妹不久因母亲生重病，在狱中无法照管，就送给了人家。大约关了近一月，就在父亲被杀的前几天，把我一家带到吴新田那里受审。吴新田身材稍长，留了一点胡子。我父亲割了脚筋，无法站立，坐在地下。吴新田第一句话是说：“你站起来。”我父亲把不能站起来的原因说了，吴啊了一声说：“你现在成了没有用的人了。”继续又问：“郑克斗，你没有出过款，没有被派支过伙，为什么偏要反对政府？”我父亲仍是那一番话：官家的差

役下乡，敲诈勒索，一打二吊，把百姓看待的猪狗都不如，我反对官府，是叹息老百姓受苦。吴新田再没有问什么，只说：“把他们带下去。”没几天，大约是五月初一、二日，父亲就被杀了，把头送到石泉县示众，又送到马池示众，最后是在油房坎示众。后由我表兄周本善兄弟俩把头偷回来，埋葬在我家右边的斜梁上。母亲因受折磨生着重病，又见父亲被害了，她拒绝吃吴新田给买的药，又不吃东西，情愿一死，五月初四日就病死在狱中，当天埋葬了。吴新田就下令将我祖孙三人送回故里。

第二天，是五月端午，我祖孙三人由几个差役押着起身回石泉。这时，我兄弟俩也生了病。送的差役，是一县送一县，每到一县给十个馍和六吊钱，到了石泉，万恶的陈光斗，还要折磨我们，又关了一月零十天，吃用要自己花钱，每天吃两顿烂包谷，最后，找保才被释放。我们祖孙临出狱时，几乎病得要死，回到磨石沟，祖父嗓子就气哑了，第二天也就死了。陈光斗用心是极恶毒的，他想把我们一家子都整死，又不落杀人的罪名，故意拖到我们快要死时才放。

听说陈光斗在西乡县十里铺落了户，是个大恶霸地主。西乡解放后，一九五〇年七、八月减租反霸时他畏罪投粪水坑自杀，虽然逃脱了人民的惩罚，但也没有得到好死。若不是共产党解放了穷人，我一家的冤仇，贫苦农民的冤仇，真不知那一天才能报得了。

（沈传忠记录整理）

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

## 冯玉祥部驱逐吴新田及其在陕南的活动

张宣武 王恒心

### 一、西北军驱走吴新田后进入陕南

冯玉祥所部西北军自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五原誓师后，很快就囊括了陕、甘、青、宁四省地盘。但其主力大军东出潼关，忙于参加

北伐战争，当时顾不着分兵进占陕南，因而吴新田的土皇帝寿命得以延长了两年。北伐战争告一段落，西北军对陕甘后方的所谓“戡乱战争”亦已基本结束，这时冯玉祥才派遣其六方面军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张维玺统率所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中旬从关中凤翔出发，向陕南进军。笔者张宣武时任第十三军手枪营营长，王恒心（原名王志远）时任十三军二十师六十旅旅长，我们都曾参加了这一行动。

在汉中的吴新田得知西北军南来的消息后，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自知力不能敌，却不甘心自动的退出陕南，又以北有秦岭之险可守，栈道交通易于堵塞，或可以寡敌众，以弱敌强，冀侥幸于万一。于是，他就决心“背城借一”，抗拒西北军的南下，指派他的第十四旅旅长（姓名忘记）指挥两个团的兵力，在由宝鸡通往汉中必经之路的凤县以南留凤关（俗称南天门）、柴官岭一带，前后布置了两道防线，并构筑了必要的阵地工事。

留凤关和柴官岭是秦岭山脉的最高峰。留凤关矗立在凤县城南门外一座耸入霄汉的山顶上，一条不及两米宽的陡峻石磴路，望之如上天梯一般，道路两旁尽是悬崖峭壁，无法攀登。从留凤关至柴官岭之间的一段道路，只有一两米宽，弯弯曲曲好象一条长蛇架又似一根在高空的独木桥，因为它的两侧都是万丈深涧，而柴官岭则横陈在这条道路的南端，直是一道天然城墙。这两条防线，的确是易守难攻的天险，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人莫入的所在。

西北军的前锋第十七师赵凤林部到达凤县后，侦察了敌情、地形，认为从正面仰攻、硬攻，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没有得手的把握。乃决定以主力从正面佯攻，以麻痹敌人，另以一个团的兵力，轻装从凤县以西绕越三十里开外，循着当年韩信暗渡陈仓的那条山僻樵路，向柴官岭以南，敌人后路的古陈仓道——南星镇迂回前进。

吴新田的部队，在陕南过了七年之久的“太平日子”，既缺乏严格训练，又无实践经验，特别是绝大部分官兵有鸦片烟瘾。可以说是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而且军官佐们都做有生意，荷包里有了钱，

又有着一大堆妻子儿女，他们心里都在挂念着家眷，因而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当得知西北军从陈仓道口抄袭到后路时，人人惊悸亡魂，不战自溃地把留凤关、柴官岭两道防线轻轻地给放弃了，人马杂沓，犹如潮水一般地向汉中方向狂奔逃窜。

当西北军那一团人迂回到南星镇的时候，弃守留凤关、柴官岭的吴新田部大队人马已经通过南星镇继续向南逃去，只剩下一些辎重和二、三百名老弱残兵被截获缴械。

吴新田部第十四旅溃退到南郑之后，汉中情况一片混乱。吴新田连夜召集幕僚和一些部部长举行会议，研究对策，他们自顾逃命要紧，所以没有一个主张继续抵抗的。吴新田没有料到他的部队士气这样低落，更没有料到他的第十四旅溃败得这样迅速。事先，吴新田虽然也曾设想不得已时，向东撤退的腹案计划，但没有着手积极准备。今见部队既不能战，又不能守，他虽极不愿意舍弃这项“汉中王”的冠冕，已是不可能的了。只得采纳众议：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他们急如星火地连夜拉伏、拉骡马，抓轿子和滑竿，为他们搬家眷，运财物，被抓的骡马、轿子成百上千，被拉的人伕脚力成千上万，这条浩浩荡荡的运输行列，远远超过吴新田的第七师整个一师人马的数量。

吴新田放弃了南郑，领着他的师直属部队和已经溃不成军的第十四旅残部，沿着汉水北侧大道，昼夜兼程向安康方向逃走。

西北军的前锋部队，自从迂回到南星镇以后，一路上未遇任何抵抗，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进占了汉中首府南郑城。西北军的第十七师，得知吴新田率队向东逃跑，也就未在南郑停留，紧接着继续追赶。

吴新田部第七师的另一个旅——第十三旅，旅长牛堉椿（字植先），年岁较轻，个性较强，在吴部的第七师中是一个比较横暴的人。当时他刚把散驻在各地的部队集结在西乡县，吴新田东逃路过西乡时，曾嘱牛堉椿在西乡布防掩护一阵；同时，牛堉椿也有点不服气，很想和西北军较量一下。因此，他就在西乡县城以西的十里铺及其南北两侧高地布下了一道防线，准备抗拒东进的西北军。



西北军第十七师的前卫团进至十里铺附近，发现敌情，未待师主力部队到达，断然即行独立进攻。一举突破牛部防线，毙伤七十余人，俘虏一百余人，占领了十里铺及其两侧高地，牛部则败退到西乡县城。

牛培椿估计到西北军可能于当夜向西乡以东迂回，截击他们向东的逃路，遂出南门，入深山，沿着堰口、上司的山僻小路向镇巴县方向逃窜。他们在当天夜半开始行动。由于西乡县城很小，拉不到很多人伏和骤马，也抓不到很多的轿子和滑竿，而时间又迫不及待，因而许多眷属和笨重行李都遗弃在西乡而未能带走。

西北军十七师次日拂晓攻击，扑了一座空城。该师遂即分兵一部向南尾追牛培椿，主力仍沿大道经石泉、汉阴、安康方向继续追赶吴新田。结果，向南进击的部队一直进到陕南的镇巴县，只追下一些带不走的行李和走不动的老弱病号。牛培椿两千多队伍，除了途中跑散的和窜入深山老林去当土匪的外，仍然有一千多人，跑到川北万源县，投靠四川军阀刘存厚去了。吴新田那一帮残兵败将和大队的挑夫、驮马、轿子、滑竿，由于西北军的急进猛追，沿途丢盔擗甲，许多官兵抛弃炮弹，换上了便衣，本地人回到他们的家乡，外省人又做他们的生意去了，也有一部分官兵既不愿放下武器，又不愿跟着吴新田无止境地逃跑，他们就百二、八十人一伙，三、两百人一簇地窜入南山或北山当土匪去了。当吴新田跑到安康乘船东下的时候，除了一些幕僚、高级军官、亲信随从和眷属以外，剩下的部队总共不满千人。西北军的追击部队，一直追到陕南最东边境的白河县为止。当时，直系军阀首领曹錕、吴佩孚等早已垮台，吴新田已无靠山，他见大势已去，到了宜昌，就把随从人员和残余部队给资遣散，把武器弹药交给当地驻军，吴本人先跑到上海后又到天津作寓公去了。

割据陕南达七年之久的直系军阀部队的第七师，自最初和西北军接触，到牛培椿残部窜入川境和最后吴新田从安康乘船东下，前后为时一共不到二十天，一个整师的北洋陆军，就这样土崩瓦解了。但北洋陆军的部队番号，要算吴新田的第七师保持得最长久，它是最后被消灭的一支北洋军阀部队。西北军从一九二八年九月底据有整个陕南

地区，张维玺继吴新田之后作了“汉中王”。

## 二、张维玺在陕南的一年半

张维玺到了陕南之后，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对陕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概让他权宜处理，张维玺也抱“雄心”，想把吴新田蹂躏得残破不堪的陕南整顿一番，作出一点“成绩”来。他在到达汉中的当天，就接见汉中各界代表，询问疾苦，了解情况。第二天，汉中各界二、三万人在北校场举行欢迎大会，他在演说中当众宣布治理陕南的施政方针，其最主要的有以下四项：剿匪、禁烟、修路、兴学。

沟时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剿匪问题。陕南最著名的一个土匪头子名叫王三春，他的喽罗达四、五千人之众，在吴新田统治陕南时期，由于吴的部队无力剿办，竟和他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他的老巢扎在汉中城南四十里，号称“小汉中”的牟家坝，而他的“边棚”（前哨）竟然放到与汉中城仅一汉水之隔的油坊街。

西北军进入汉中的第二天，张维玺即命营长张宣武，率领军部手枪营的两个连进剿该匪。张维玺并非不知匪众有四、五千人，而他之所以只派两个连的兵力前往，是因为：如果派出队伍过多则土匪望而生畏，闻风远飏，打不着它，只是徒劳往返；手枪营（又名大刀队）是西北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每一个连配备有冲锋机关枪三十挺，驳壳手枪和步骑枪各一百二十支，大刀一百五十把，战斗力特别强，若与乌合之众之土匪作战，可以说是以一当十，以这样的两个连，足有把握战胜四、五千之众的土匪。

汉中城乡内外，到处都有土匪耳目，队伍刚出城，土匪即已警觉，仓皇拔营，向南钻山逃跑，油坊街、牟家坝全未抵抗。当队伍追至川陕交界的青石关附近时，匪徒已经摸清了进剿部队只有三、四百人，他们果真以为孤军深入，人少可欺，想把这支队伍吃掉。于是，他们就在青石关附近选择了有利地形，布下了一个口袋阵，让队伍往里边钻。手枪营以一个连钻进土匪的口袋阵，而以另一个连在其口袋阵的

外边二里远的丛林中隐藏起来。匪首王三春以为队伍都已进入圈套，一声号炮，约有五百来名彪形大汉，赤膊上阵，大部分手执刀、矛、钢叉，一部分端着陈旧的步枪，口中不停地发出“哼哼、哈哈”的声音，向着部队扑来。据说，他们具有“义和团”、“白莲教”那一套所谓刀枪不入的法术。当他们从千米以外朝着部队前进的时候，部队全都俯伏地上，并紧迫作业地构筑简易的卧姿掩体工事，隐蔽不动。土匪看着部队没有动静，首鼠两端，趑趄不前地进进停停，停停进进。当这一帮五百多名“硬肚”逼近部队的时候，四面山头上的几千土匪一面大喊大叫：“要捉活的！”、“不让跑脱一个！”一面纷纷下山，猥拢合围。直到那帮“硬肚”距离部队只有五、六十米的时候，突然一个“快放”的口令，三十挺冲锋机关枪和二百多支手枪、步骑枪好象火龙一般地扫射起来。一刹那间，那帮光膀子的“硬肚”倒下了二、三百名，前边被打倒了，后边的回头就跑。所谓刀枪不入的说法，全是欺人的鬼话，这是笔者亲见的事实。同时，隐藏在土匪口袋阵外边的另一个连，从本匪的外围背后猛攻上来，前后夹击，又被打倒了二、三百名，并活捉营长以下二百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和刀、矛、钢叉、梭标等几百件。其余匪众见势不好，化整为零，四散奔逃，窜入深山。我营也伤亡了二十多名士兵。

王三春股匪化整为零之后，很快又啸聚起来，有三、四千之众。不过，自从挨打吃亏之后，不敢再蹲到牟家坝、油坊街以及其他靠近南郑的地方，只在陕南边境的镇巴、紫阳、岚皋等县流动窜扰。以后，张维玺曾经三番五次地调动成团成旅的部队进剿，但王三春接受了上次的教训，见大军一来就跑到四川地境，等到部队返回，却又随之而返回陕南地境。张维玺在陕南的一年半中，大军几次东下忙于参加反蒋斗争，无暇顾及彻底剿匪，以致始终未能把王三春这股土匪消灭掉。其他如陈定庵、韩世昌、李刚五、沈玺亭、唐德楹、郑子美等股土匪的情况，亦复如此。

在一九二九年春“编遣会议”时期，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属第二编遣区，辖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二师，张维玺所部的第十三军，被整编

为陆军第二十七师。一九二九年三月下旬，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曾请冯玉祥出兵援助，进攻武汉。冯派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总指挥，统率六个师共约十三万兵力，主力由京汉线南下，张维玺师也在出动的六个师之内，沿汉水东趋武汉。其实，冯的出兵既非援蒋，也非援桂，而是准备在蒋桂两败俱伤之际，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大军迟迟不前，每天只走二、三十里，等待时机。不料，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胜辉等被蒋介石收买，倒戈相向，不到两个星期，桂系一败涂地，而韩复榘率领的大军只到了信阳，张维玺部才进至湖北郟阳。张部空跑一趟，只好返回原防。可是，一支二、三万人的部队调动，从动员到复员，就把整个陕南弄得动荡不安，闹了三、四个月才算安定下来。

一九二九年十月间，冯玉祥的西北军联合李宗仁的桂军和阎锡山的晋军，组织所谓的护党救国军，共同发动了反蒋战争。西北军的主力由宋哲元指挥，东出潼关向洛阳、郑州方面进攻。在陕南的张维玺部仍沿汉水东下，进至湖北南漳、襄阳一带，和刘峙所指挥的蒋军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的第九师、陈诚的第十一师及罗霖的独立第十四旅打了几仗。眼看襄阳就要拿下，不料阎锡山背约而未出兵，以致宋哲元所指挥的西北军主力遭到蒋军的大力压迫，退回潼关以西，张维玺部也不得不退回陕南。这样一来，陕南的局面又是闹了三、四个月不得安生，特别是在大军东下时，凡是能作战的部队统统调走，只把新兵、病号和眷属留守陕南，于是流窜在川陕交界的那些股匪，乘着后方空虚，一齐围拢上来。王三春股进占了镇巴，并向西乡、城固骚扰；陈定庵股联合了沈玺亭、韩世昌、唐德楹等股，竟然围攻安康。眼看安康不保，恰好大军从湖北退回，安康和其他一些城池才得未遭糜烂，但许多集镇和乡村已经受害不浅。

一九三〇年三月下旬，冯阎又联合倒蒋，掀起了中原大战。张维玺被任为第二方面军第一路总指挥（旋又被任为南路军总司令），所部第二十七师又恢复了原来西北军第十三军的番号，由陕南出荆紫关，经河南内乡、鲁山进到许昌、郟城一带，与蒋军作战。从此张维

玺及其所部主力大军离开陕南。当张部此次东调时，鉴于上次后方空虚，陕南名城要地几为土匪窃据，乃留兵一旅镇守。这一个旅，在陕南继续挣扎了两三年。

张维玺部在陕南的一年半中，由于迭次东征反蒋，不仅剿匪没有得到成效，连禁烟、兴学和修路也都没有搞出什么名堂。

关于禁烟问题。陕南各地只是在一九二九和一九三〇两年做到了禁种，却没有做到禁运、禁售和禁吸。及至张维玺大军东调以后，连禁种也做不到了。

关于兴学问题。只是增拨了一些教育经费，增添了一些小学，中学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充了一些班次。

至于修路问题，说来更觉可笑。当西北军进入汉中时，曾经得到吴新田未能带走的价值三十万元的现银和鸦片烟。张维玺向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请求，以这笔款项留作修筑汉中至宝鸡公路的费用。而宋哲元却命以二十五万上缴省府，只允留下五万作为修路之需。要想修通穿凿秦岭山脉七、八百里的一条公路，三十万元也无济于事，区区五万能够做什么呢？更荒唐的是，修筑这样一条工程浩大的公路，张维玺竟一位工程师也没有聘请，连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罗致，而只委派了一个对筑路工程一窍不通的军部副官长梁云升，指挥一营工兵部队来进行。搞了半年，五万块钱花光了。其结果，连鸡头关下的隘口也未凿通，褒城河上的一座桥梁也未搭起，仅只修成了从汉中到褒城一段四十里的平原土方公路。至于西由汉中，东至安康的公路，则根本没有着手动工。因此，陕南在西北军统治下的一年半中，仍和吴新田统治时期一样，始终没有修成一条公路。

### 三、王志远旅留守陕南时之种种

一九三〇年春，张维玺部东调时，留下了一个由新兵和病号七拼八凑，而且编制尚未就绪的西北军独立第三旅（旅长王志远），来镇守土匪如麻的偌大陕南地区。当时这个旅的兵力计有：两个步兵团，两个独立步兵营，一个山炮连，一个手枪连和一支有二百多人枪的游

击队。每个步兵团辖三个步兵营，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连，而每个步兵营都只有三个步枪连，全旅连一挺轻机枪都没有。所有武器，都是堆存仓库多年不用的陈旧东西，其中半数是土造，一部分是旧式汉阳造，还有一部分竟是十九世纪的“单打一”、“大十响”、“黎明墩”、“七子后续”等等之类的“老铅弹”。

留守陕南的这个旅，当时的兵力位置是：旅司令部、手枪连（连长何玉铭）、山炮连（连长李景先）、第一团（团长李德润）和独立第一营（营长周新胜），驻南郑及其附近；第二团（团长王玉文）团部和两个营、独立第二营（营长刘金铭）、有三、四百人枪的安康武装警察（局长蔺九州）驻安康及其附近；第二团的第三营（营长陈际春）和旅属游击队（队长郭秀生）驻汉阴县。

张维玺临离开陕南时，曾委派旅长王志远为汉中区警备司令，团长王玉文为安康区后方留守司令，而由王志远统一指挥。

适在张维玺离开陕南的前夕，忽由川北万源一带窜来一支两、三千人的部队，进据了陕南边境的镇巴县。这支部队的首领叫王光宗（别号海樵），贵州人，系桂州军阀王天培的侄儿，曾在王天培部充任团长，王天培被蒋介石枪决后，他拖了一部分队伍跑到四川绥定投靠了刘存厚，被刘收编为旅长。因与刘部发生矛盾，又叛离了刘存厚，率部窜到镇巴。王光宗正在走投无路，正值张部大军东调，张维玺正愁着后方空虚，无力控制陕南全境，遂派其秘书主任姜檀生前往镇巴与王光宗接洽收编。张委王为西北军第十三军独立旅旅长，即令其以一部留驻镇巴，主力进驻西乡县，而受汉中区警备司令部的节制指挥。

张维玺部大军东调之后，陕南土匪蜂起，大小不下二十几股，合计人数约在五万以上。其中力量比较大，头领比较著名的，在汉中地区者有王三春、陈得三、王佑邦、李刚五、郑子美等股；在安康地区者有陈定庵（绰号陈疯子）、沈玺亭（绰号狗大王）、韩世昌（绰号韩剥皮）、唐德楹等股。他们有的自称什么司令，有的自称什么师长、旅长、团长。

大军东调后不到一月时间，安康附近就遭到股匪窜扰，路断人稀，商旅裹足。安康区后方留守司令王玉文派独立第二营出城进剿。该营在剿匪过程中，曾经招抚了一股近千人的土匪，驻在安康以西九十里的恒口镇，当独立第二营经恒口西进剿办其他股匪时，被招抚的股匪突然叛变，在独立第二营必经的山峡隘路设下埋伏，左右夹击之下，独立第二营全部被歼，营长刘金铭亦被打死。从此，驻守安康的部队，只有困守孤城，再也无力出城进剿，而土匪就越发猖狂起来，不仅安康至汉中之间的交通为之断绝，甚至安康城竟被土匪包围，城外房屋多被焚毁。两个月后，城内粮食、燃料均成问题，安康岌岌可危。

张维玺部的军官眷属全都留在安康，同时还积存有大批的军用物资。因此，土匪对于安康更为眼红，志在必得。王玉文感到事态严重，一再向汉中警备司令王志远告急求援。王志远仍派驻南郑的第一团全部，并由驻西乡的王光宗旅出兵一营，连同驻汉阴的郭秀生部游击队，统归团长李德润指挥，向安康进发应援。安康至汉阴之间的恒口镇为匪所踞，部队由汉阴东进时，分兵三路向恒口进攻。左翼王光宗部之一营首先与匪接触，营长阵亡，该营溃退后向中路靠拢。中路和左翼部队尚未与匪激战，而胆小如鼠的团长李德润，竟然糊里糊涂地令退回汉阴城。并电告王志远说：匪多兵少，无力前进，请增派部队等语。其时，汉中几乎已成空城，无兵可派。在这种情况下，王志远只好商请王光宗率其全部增援安康，而将李德润团调回汉中，西乡防务则由郭秀生的游击队接替。王志远为使王光宗得到“甜头”而乐于接受任务，特许如进安康后，即以该地区归其管辖，而将王玉文部及第十三军的眷属全部撤至汉中。意想不到，求之不得的王光宗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沿途土匪摸不清王光宗部的底细，不敢阻截，因而王光宗一路通行无阻，非常顺利地到达了安康。

安康有新旧两城，老城在西，紧靠汉水码头，机关、学校和商店都在老城；新城在老城之东，相距约有二里，里边尽是居民住宅。王光宗部到达安康后，王玉文本应遵照王志远的指示尽快地西移汉中，而王本人和部属及大部分军眷却在幻想着中原大战胜利后从安康东

下归队要快一些，认为西迁汉中不仅麻烦，而且是徒劳往返，因此犹豫不决，迟迟其行。但王玉文为了避免两支部队混住乱杂，并向王光宗表示好感，将自己的部队、军眷和军用物资统统集中到僻静的新城，把繁华闹市的老城让给王光宗部驻扎。

王光宗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之所以接受张维玺的收编和听从王志远的指挥，不过是借水养鱼的权宜之计。他到安康之后，原想独霸一方，为所欲为，而王玉文部迟迟不走，他认为碍手碍脚，视作眼中钉；同时，他已摸清了王玉文部的底细，安康城内统共只有两个营，加上武装警察，也是力量有限，吃掉他并非难事，正好借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而汉中方面的王志远正自顾不暇。对救援王玉文更是无能为力。王光宗的计谋已定，便借联欢为名，设下了“鸿门宴”，邀请王玉文部和安康武装警察的全体军官赴宴。王光宗事先在宴会场所埋伏下了刀斧手，等到王玉文、蔺九州偕同应邀赴宴的全体军官到齐之后，迅速调动队伍包围新城。在宴会中正当互相敬酒，划拳行令之际，王光宗借故离席，蔺九州的卫士在外边看到密布警戒和队伍匆忙的调动情形，急至席前向蔺伏耳报告，蔺知有变，托词离去，王玉文觉察有异，亦随蔺之后离席。蔺九州走到王光宗的司令部大门口，即被卫士开枪击毙。王光宗有计划地把宴会场所的门上挂了一幅拖到地上很长的门帘，当王玉文掀开门帘向外逃跑时，竟因脚下踩着门帘而绊倒，当被王光宗的刀斧手砍伤了左臂。王玉文用右手取出手枪把近身的刀斧手打倒后，且战且走，王光宗的卫士随后追赶，王玉文身中三枪，仍鼓气一直跑到新城的西城墙根。城上守兵缒下一条大便绳，王玉文以嘴咬绳，用右手拔绳，咬一口，拔一把，咬一口，拔一把，终于爬到城上。但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口渴过甚，刚喝下几口凉水，肠子即从腹部伤口流出，随即死去。当蔺、王二人离席和枪响的同时，王光宗一面将蔺、王两部全体赴宴军官扣留监视，一面指挥队伍攻打新城。驻在新城的王玉文团闻变之后，关闭城门，登城防守，相持半日，终因无人指挥，群情慌慌，不知所措，乃由地方士绅出面调停，双方派人谈判停火，并达成以下协议：



- (一) 王、蔺两部一律缴械改编，保障官兵和眷属的生命安全。
- (二) 军用物资全部移交给王光宗部接收。
- (三) 张维玺部眷属由王光宗部负责护送，乘船东下遣送河南。

王光宗吃掉蔺、王两部。得到大批军用物资，并踞有安康区十三县地盘，遂即招兵买马，大肆扩充实力。但好景不长。一九三〇年十月中原大战结束后，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派张鸿远（飞生）为安康区绥靖司令，张虽无基本正规部队，但因系安康人，以本土乡谊关系，招安了陈定庵、沈玺亭、韩世昌等股土匪，收编为陕西警备第二旅，整顿补充之后，很快的就把王光宗赶跑了。以后，王光宗率残部窜到鄂西，卒被驻宜昌一带的范石生部截击缴械，全部解决。

一九三〇年七、八月间，汉中地区的土匪也和安康地区同样猖獗。王志远旅的第一团由汉阴返回汉中后，团长李德润因贪生怕死，作战不力而被撤职，由营长李嵩山升任团长。同时，以独立第一营为基础扩编为第二团，由副团长李清涵任团长；另以原驻汉阴的王玉文团第三营为基础扩编为第三团，由营长陈际春升任团长。此外，旅部手枪连亦扩编为特务（警卫）营，由连长何玉铭升任营长。旅部及一、二两团均驻南郑，第三团驻城固，旅属游击队驻西乡。游击队长郭秀生还收抚了吴新田第七师入山为匪的杨某一股二百多人，随同郭部驻在西乡城。

投靠刘存厚的吴新田部旅长牛堉椿，侦知汉中空虚，认为有机可乘。此时，寄居刘存厚篱下的吴佩孚，委牛为“汉中支队司令”，牛遂于一九三〇年八月初率领所部两千余众，由四川万源卷土重来，窜踞西乡南境的母猪峡，准备进占西乡县城。王志远派其汉中区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邦彦，指挥驻城固的第三团向母猪峡进攻，牛部被击溃，毙伤百余人，俘虏百余人，缴枪百余支，并夺获牛堉椿本人的乘马，座轿以及图囊、雨衣等等。牛率残部遁入巴山。半月后，牛堉椿又纠合残部，于某日拂晓突向西乡县城袭击，竟被突进东关。驻守城内的

郭秀生部开城门出击，牛部不支，退出东关。但牛增椿事先已与驻守城内的吴新田旧部杨某有所勾结，到了夜半，杨某作内应，开放了东城门，等郭秀生发觉时，牛部已经进入城内，郭秀生只身跳城，跑回南郑。从此，西乡即为牛增椿部所踞。

一九三〇年九月某天，牛增椿亲率所部，黑夜潜行，袭击城固。拂晓前抵城下，正要树梯扒城，被在城上练号的司号兵发现，立即吹奏“紧急集合”的号令，守城部队急忙登城抵御，以瞬间之差，牛部未能得手。随后，团长陈际春亲率全团开城出击，牛部溃败，退回西乡。

一九三〇年九月间，中原大战胜负之分已见端倪，阎、冯行将失败，因而陕南土匪益形嚣张。在牛增椿袭击城固的同时，安康地区的股匪韩世昌部二、三千人西窜围攻洋县县城。城内守兵为王志远旅一支不满五百人枪的王士发部游击队，双方力量悬殊，洋县危在旦夕。王志远乃亲率步兵两营和一个迫击炮连，从南郑出发，前往洋县解围。接战约一小时，守兵出城夹击，韩股土匪不支，向东溃逃而去。

王志远解了洋县之围不久，就得到中原大战结束，阎、冯失败的消息。此时，冯部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还在发号施令，任命王志远为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而以前次派到汉中招募新兵的旅长李增禄所募新兵编为该师的一个旅，即以这个旅担任汉中区警备任务，而令王志远亲率其原有的一旅，火速取捷径开往潼关，防堵西进的蒋军。刘郁芬指望拿这一旅老弱残兵，从千里之外，济燃眉之急，以保陕西地盘，真是白昼作梦！果然，不到一星期，消息传来，杨虎城的部队已经入潼关，进西安，刘郁芬东渡黄河，逃入山西。王志远未听刘郁芬的乱命，着意筹划如何保卫汉中地区，不让土匪侵占和骚扰。

正当王志远解救洋县之围的时候，汉中西路各县又在纷纷告急。王三春股进扰宁强，王佑邦股进扰略阳，李刚五、陈得三等股进扰勉县。与此同时，四川军阀杨森所部的叛军何自聪、高树臣、侯世炯、张大经和钟某、郑某等首领，多者一个团，少者一个营，也都趁火打

劫地从川北窜入汉中地区，打家劫舍，到处骚扰。其中高树臣股并在城固县城的古路坝天主教堂架走了两名外国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王志远实感顾此失彼，应接不暇，无力分头对付。而汉中西路各县人士不堪匪扰，遂联合要求王志远推派代表入川，商请川北田颂尧部派兵入陕，协助剿匪。川军田颂尧、邓锡侯、刘文辉三将领，在前曾经联名通电，响应阎、冯倒蒋，他们愿对西北军后方的陕南予以支援。遂由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派出他的第四师师长王铭章为入陕剿匪的纵队司令，设指挥所于川北边境广元县，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为曾起戎，进驻勉县，担任剿办宁强、略阳、勉县一带的股匪；第二支队为曾亚伟旅，进驻南郑以南七十里的黄官岭，担任剿办城固、褒城一带的股匪和杨森部下的叛军。自从田部川军入陕南协剿以后，汉中西路的匪焰得以稍煞。

老牌军阀吴佩孚自一九二七年垮台后，带着一些幕僚和几百名卫队流落到四川达县，依靠刘存厚蛰居在达县河市坝的一座庙内，由刘存厚、杨森等供给钱粮，维持生活。据吴佩孚的代表说，正当中原大战激烈时，何成浚曾经备了一份厚礼派专人到河市坝给吴佩孚祝寿，声言系蒋介石的授意，请吴出来到西北网罗旧部，以扰乱西北军的后方。因此，吴佩孚就联合刘存厚、杨森等大肆活动起来。吴佩孚派出他的幕僚周近仁、倪九襄，携带大批盖有“孚威上将军”大印的调质委任状，到处收编土匪，招摇撞骗，陕南各股土匪头子差不多都被委为什么纵队、支队司令或什么师、旅、团长。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间，吴佩孚的代表周近仁、倪九襄竟然到了南郑，给王志远送上了一张“兴 国军第十三师师长”的任命状，并请王志远迅速就职，改挂“五色国旗”。那两个代表还说，吴佩孚随后就要经过汉中前往甘肃，俟吴到达汉中时，还要进一步发表王志远为陕南护军使。王志远严词拒绝吴佩孚的一套鬼把戏，并立即驱逐那两位代表出境。

同时，吴佩孚怂恿刘存厚派遣他的师长魏声华率领两个支队（即两个旅）进兵陕南。魏声华的师部和第二支队进驻镇巴县，其第一支队（司令廖震，字雨辰）进驻南郑以东仅四十里的沙河营，并一面分

兵包围城固，一面派出小部队进据南郑以东的十八里铺，意在示威夺取汉中。廖震在电话上向王志远说：“对不起！我奉上命所差，请原谅，欢迎你和我们合作。”言词傲慢，盛气凌人，直把汉中视作他垂手可得的囊中物，王志远为了避免地方糜烂，不愿与川军发生冲突，乃请地方士绅汉中商会会长杨子林，南郑中学校长彭俊卿和前西乡县长房少玄等为代表，前往沙河营同廖震协商和平解决办法。不料，廖震不容分辩，竟然咄咄逼人地提出以下三个条件：

（一）王旅应按照吴大帅的委任改编，改易“五色国旗”，并欢迎廖部川军进驻南郑。

（二）王旅部队应撤出南郑、城固、洋县等三座城池，撤出后愿驻何处听便。

（三）否则将队伍带出，择地应战。

廖震这样蛮横无理地逼人，王志远断难俯首听命。于是决心西联田部，东打刘军。一九三一年元旦之夜，南郑城内除留极小一部分兵力守备城防，王志远亲率旅直属和一、二团全部兵力，绕道北山麓向东进发。二日拂晓，分为左右两路向沙河营猛攻，廖部猝不及防，仓皇应战，激战不到一小时，廖部不支，纷纷向汉水南岸溃败逃窜，一直跑到镇巴才敢住脚。这一仗，廖部伤亡约三百余人，其中有廖震的外甥某营长被打死，并丢下意大利造的比斯尼式步枪百余支。

当魏声华进占镇巴，廖震进占沙河营的时候，吴佩孚已从河市坝起身向汉中进发，刚走到宣汉县，得到廖震战败的消息，立即中途折返，仍旧回到河市坝。随后，魏声华也卷旗收兵，率着他那两个老队由镇巴返回川北老巢。此后，汉中地区大体上得到了暂时的安定。

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于一九三一年一月间电令王志远部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一旅，以王为旅长，仍驻汉中。同时，四川的田颂尧特派他的参议张乃庚、李蕴滋二人为代表到南郑，给王志远送来一张“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独立师师长”的任命状。王志远召集他的副司令刘邦彦，参谋长庄际平，参谋处长张宣武和三个团长，共同研

究分析，一致认为汉中地区既属陕西的一部分，就应听命于陕西省政府。接受陕西当局的节制和指挥，而不应接受川军的委任。因此，就谢绝了田頌尧的任命，而接受了陕西省政府的改编命令，并电请杨虎城将军指派其所部第十七师的第五十一旅赵寿山旅长率部前来汉中绥靖地方，王旅愿受其节制指挥。这是因为赵寿山与王志远曾经有过师生的关系：赵寿山一九二一年在西安参加冯玉祥的第十一师，任学兵大队教官，当时王志远在学兵大队第二连当副班长；一九二三年冯玉祥部在北京南苑开办军官、军士教导团（即干部训练班），赵寿山又在该团任测量、数学教官，而王志远也在该团受训，在毕业考试中，王曾名列第一，因而赵对王印象颇深，王对赵具有深厚感情。

杨虎城采纳了王志远的意见，即派赵寿山为汉中区绥靖司令，率其第五十一旅进兵汉中。从此，汉中地区又换了一种局面。

一九六四年七月

##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阻击红四方面军的史料

### 第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商洛战役之回忆

刘 子 潜

一九三四年中秋节后，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鄂北受到东北军之王以哲师和萧子楚师的追击，乃转入豫西卢氏县境内。在阴历十一月间，向陕西洛南县之三要司、景村镇西进，中经米粮川一带，遭遇到由豫南南阳追击的蔡廷锴部的袭击，程子华头部受伤，乃转向龙驹寨一带。

当时我任十七路军特务第三团团团长，驻防商洛五县，负责地方治安。我团第一营营长是王俊杰，二营营长是郑培元，三营营长是李自新，步炮连连长是田作俊，全团官兵除去通讯人员外，共计一千九百余人。长短枪一千二百余支，轻重机枪十二挺，八二重迫击炮六门。分布情况是：团部、步炮连和第三营之第一连，驻防商县；第一营分

驻山阳、镇安；第二营分驻商南、洛南、龙驹寨；第三营分驻商县、黑龙口、黑山等地。防区东西绵亘四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

当红军进入卢氏后，我团为了巩固防区，堵击红军西上，乃命令第二营营长郑培元将该营集中龙驹寨待命，并将团部直属步炮连拨归指挥。

红军进至龙驹寨附近之秋树坪、浦峪沟地区后，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韩威西用电话命令我说：“共军约四百余人，窜至龙驹寨附近，令你立即前赴龙驹寨，指挥郑培元营，在该地区将其包围剿灭。”我向参谋长报告说：“据侦探报告，红军约一千余人，且有缴获东北军王以哲师自动步枪二百余支。我团分驻在各县，一时不能集结，仅第二营一营兵力，恐难胜任。”韩参谋长说：“团长亲身到，就等于一团兵力，兵在精而不在多，我军人地两熟，必能获胜，你速往，勿迟疑，免误战机。”在此严格命令下，我只得服从，但在思想上是有顾虑的。一因红军实力，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比我军强大，难以取胜；二因红军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拥护，尤其是徐向前经陕入川时，遗留在商洛各县儿童很多，这些孩子，这时都已十五、六岁，平时做了不少宣传工作，结识了许多青年，他们知道红军是给穷人办事的，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开穷人会时，群众都争先恐后地参加，都自动积极地给红军带路和做侦察工作；三因我思想上不愿打自相残杀的内战；四因据侦察报称，红军声言，该部入陕，是徐徐向前入川之路去四川，绝不与地方驻军为难，也希望地方驻军不要与红军为难等语。有此以上原因，既不愿与红军直接发生冲突，又怕违抗命令，受到罪责，除命令各营严守防地外，只希望红军履行诺言，早日离开陕境。所幸红军在龙驹寨附近逗留不到数日，即由资峪店经山阳境之竹林关，离开陕境返入鄂西陨西、陨阳一带。我得报后，松了一口气，当即具实上报。

红军回到鄂西陨阳一带，因受到国民党追剿部队之堵击，于十一月间经上津二次进入陕境。红军在山阳境漫川关和商南县境时，到处组织穷人会，张贴消灭白军等标语。由于一九三二年冬季，红四方面

军经过陕西商洛地区时，遗留下的人员和鄂豫陕边区红军地下活动的人员，一时并起，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红军人数增加到二千余人，武器有缴获东北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枪支，声势日大，从者日众。蒋介石据报，电责杨虎城将军，限期在陕西境内，将共军全部消灭（这时杨在汉中视察）。杨将军接电后，立即电令我团，全部集中，负责“追剿”，我接到电令，立即命令各营到龙驹寨集结。集中后，即经商南，向山阳漫川关追击。但我团到达漫川关时，红军已向西进至镇安地带。我团追到镇安，红军又转往安康；我团追至安康，红军又离开陕境，东去陇西，总是我团到达，它已先走。追击不上的原因是我团未设兵站，每到一地，必须征发粮秣；在行军时，深恐中埋伏受到袭击，要按战备行军部署，官兵平时山地行军训练不够；更主要的是得不到当地老百姓的帮助，老百姓对我军虽无恶感，但亦无好感，较之对红军，则大不相同。相反的，红军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开穷人大会，斗争土豪劣绅、恶霸地富，不但有足够的吃用，还把恶霸地富的粮食衣物，分给广大穷人；在行军时，有当地老西姓带路侦察，不怕中埋伏，官兵都是久经锻炼，能日行百余里，红军走一天，我团就要赶两天，所以始终没有赶上。所幸红军又离陕境，我团未受损失。

红军进入陇西后，受到萧子楚师的截击，复回至陕西境内之山阳、镇安等地区。由于两次入陕，人地两熟，活动扩大，“追剿”不易，“围剿”更难。杨将军据报后乃电令冯钦哉的四十二师柳彦彪旅长率景志勤团，不分星夜，赶往山阳，与我团协同“围剿”。并电令我团归柳旅长指挥。这时红军已由山阳转往商南，柳旅长函召我到山阳汇报“追剿”情况。当时我将红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以及红军每到一地，即召开穷人会，斗争恶霸土豪，打富济贫，深受广大群众拥护的情况，作了汇报。特别指出红军行军神速，又有地下人员的协助，在行动上忽现忽逝，忽聚忽散，其聚时不知从何来，其散时不知其何往，善长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我军无论在军事力量上，还是在人心向背上都无法与红军比。想以我们这两个团的兵力，将这股红军在此地“围剿”消灭，恐非易事。请旅长考虑，作出今后“围剿”方针等语。柳旅长当时未作具体答复，令我回团部待命。旋即接到总指挥部

参谋处电称：杨将军由汉中率张汉民警卫团经紫阳来商洛，亲临指挥“围剿”，令我接电后，即率全团官兵到镇安的石边崖迎接。杨将军到达石边崖与我见面后，略事询问“剿共”情况，即责以“追剿不力”，撤职法办，并立即将我押送到军法处，交处长张依中审讯。张处长曾对我说：“杨将军将你撤职管押，有说不出的苦衷，你在军法处等于休息。请安心勿躁，不久将会官复原职。”此后情景，非我所知，当由其他参加这一战役者补充之。

（王锦山整理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日）

## 陕西警二旅张鸿远部和红二十五军作战的经过

鲁 秦 侠

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徐海东率先遣部队三千多人北上，经豫鄂边境，进入陕南山阳、镇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立边区根据地。西安续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迫于蒋介石的严令，乃于一九三五年元月亲自到汉中、城固，检阅十七路军队队伍，随即率领警二旅张鸿远（字飞生）部两个团和张汉民的警卫团，迅速地自城固出发，经洋县、宁陕关路钱，开赴镇安和商县布防，又调冯钦哉的柳彦彪旅和安康的唐嗣同（字子封）旅到商洛地区，共同堵击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他本人率领孙辅丞的特务第一团和王振华的特务第二团，坐镇蓝田，指挥作战。

一九三五年的元月下旬，我们自城固出发。出发那天，大雪飘扬，部队轻装，随时准备作战。警二旅下辖四、六两个团，除在城固留守一部分外，共有两千八百多人，带有迫击炮和重机枪等武器。旅部有参议陈式玉等和手枪队一连，团长为我和沈玺亭。行军中所需给养，概由地方供应，官兵自行背带，严申纪律，公平买卖，亦深得镇安熊、刘、倪、王、党等各大家族地主豪绅等的欢迎。旅部还组织有侦探队，消息也甚灵通，并采取全部出队游击的办法，不固守县城的一定据点，即队伍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碰见红军就展开作战，或获得情报，



即进行追击。故镇、柞各乡镇，多为我们部队常经之地。

### 红军徐海东部的情况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主力有三千多人，潜伏在各地作地下工作的人员甚多。有的假作小商小贩，住在各地和群众暗中联系，对于地方情形和山川道路，以及陕军部队的情况，都很了解熟悉，故其行军迅速，所向无阻。他们在陕南秦岭山区一带，展开游击，扩大影响，也是配合红一方面军等大部红军突围、转移北上，以牵制蒋军分路堵截的策略计划。又和川北红军徐向前部，互相策应，互相联系的。一九三五年春节前的三十夜晚，川北红军乘隙攻陷宁强县城，驻军杨竹荪团全部覆没，杨团长阵亡，刘文伯、王劲哉退走，勉县因而失陷，红军遂迫近汉中和褒城，攻城数日，未被攻克，仍退回川北。这时，汉中为孙蔚如军长和段象武旅，褒城为耿景惠团长所防守，汉中地区也是紧张一时的。

### 警二旅和红军作战的情况

#### 一、钻天岭和红军第一次接触

红军的游击战术，是运动迅速，东出西没，敌来我走，敌住我扰，得势则战，不利即退，处处自己居于主动，不受敌人牵制，是把战术用活了。陕军各部共计兵力，是大于红军好几倍，都被它运用战术和利用地形各个击破。

警二旅部队抵达镇安之后，休息没有十天，张鸿远即命令部队向镇安东区铁张铺、黄花铺、花园铺一带游击。有一天，部队经过崖屋河、七里峡抵达“钻天岭”的山脚下，正休息准备作饭，忽接前方探报，说“红军徐海东部自山阳边境前来，距此不过十多里路”。钻天岭是必经的道路，山高路险，崎岖盘垣，岭上还有卡门，是一险要之地，为兵家山地作战所必争的据点。我们当时即紧急集合部队，派遣一营兵力，跑步上山，飞快地预先占领了钻天岭的要隘。其余大部继续跟进，按地形布置了兵力。未及片时，红军前卫已抵达岭下，向我军进攻，前线双方都发现枪声。接触未久，红军忽然撤退，只绕别路

以去。我们也未追击，仍返原地宿营。次日，我军又向米粮川一带游击。此是我部和红军初次接触的经过。

## 二、宁陕关口镇和红军三次接触

一九三五年，我们在镇安渡过春节之后，探得红军在柞水县城出没。张鸿远即率领我们部队出发，经屹塔寺奔上柞水县城，我们到达柞水，红军又转移到蓝田的曹家坪，我们赶到曹家坪，红军又转移到商县边界了。我们沿着秦岭山麓，不停止的追击红军，不顾士兵的疲劳和牺牲，积雪没胫，道路泥泞难行，以致士兵在途中多有怨言流露。我们未追击上，就由凤凰嘴开回镇安。沿途凡是红军经过之地，各乡镇的墙头上，都有红军写的大字和墨笔标语。标语是唤醒群众起来革命，打倒地主豪绅，分粮抗款等激动人心的豪壮语气，官兵看过读过的都有同情之感。

红军不但行动迅速，而且纪律严明。有一次，我们行军宿营在镇安的西沟口时，恰是红军先一日离开住宿的地点。我住在一家草屋的客店内，向店主了解红军的情况。据店主人讲，“红军几个女兵，昨晚住在我店中，喝些水，吃些自带干粮，将自己所背的单被铺放地下就睡觉，连我的床炕上都不住，天没黎明就随队而去，并未扰害一草一木”等语。我听了之后，心中感觉惭愧而又钦佩。因为我正是休息在店主人的床炕上，士兵做饭用柴，虽然给了群众的柴资，总是微薄的，用群众的锅灶做饭能无扰害吗？红军的妇女们，能同部队一路跋山涉水，日趋百里，其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真是难能可贵，令我不禁的敬佩和叹服。

红军东出西扰，吸引我军追击，中它埋伏，便于各个击破。在一九三五年三月间，红军到商县一带游击，张汉民旅长即率队跟踪追击。到了葛牌镇的山岭之下，有几个红军便衣侦探，化装农民采薪，张汉民不知，询问红军的消息。农民答说：“红军刚才下岭过去”，又为张的部队引路，下岭追赶。部队进入沟峡深处，红军伏兵前后截击，全部覆没，张汉民亦被俘虏，因以牺牲。

红军在葛牌镇胜利之后，又转移到镇安西南的俞师铺、庙沟口等处出现。张鸿远即率领我们部队进行追击。但是，红军消息灵通，运动转移甚快。我军刚到庙沟，老百姓说：红军是刚才离开该地，没有两个钟头。又转向满坪、太山庙、宁陕关口方向去了。这几天，我们部队都是跟着红军后尾，日趋百里以穷追，前后仅差一站之里。我军行至太山庙，不停留又向关口镇前进。正行军间，接得侦探报告，说红军在关口镇准备宿营做饭，我军就急速搜索前进。距关口镇没有数里之遥，我们的前卫尖兵即和红军的哨兵接触了，双方的部队都展开队形，各据山头，互相射击。此时，我们的炮兵也进入阵地，相峙约数小时，红军自动撤退，向四亩地、袁家庄、华阳一带去了。我军遂进关口镇宿营。这是我和红军二次接触经过。

### 三、华阳镇和红军第三次接触

“将骄兵疲，必遭失败。”古之名言，确有道理。我们部队到达宁陕关口镇后，已是阳历三月间了，和红军转战，已超出镇安防线之外。全部官兵，经数月的跋山涉水，冰天雪地，冒着严寒的气候，不停止的追击红军，连续作战，士兵已是疲劳不堪了。这时，我们大家一致要求停止进军，休息整顿。而张鸿远思想上，已产生了骄傲自满，轻视红军的心里。谓“红军两次接触的撤退，皆是怯战，战斗总未打美，不能过瘾，必须再鼓勇气，继续追击，务将红军徐海东部队打垮为止”等语。遂在关口镇补充了给养，遣送了营连的伤病兵，减轻了行装。此时，红军徐海东部已由茅坪转移到华阳去了。

华阳是旧属洋县的分县，接近秦岭太白以南的地区，山深林密，人烟稀少，地形极为复杂。这时，参议陈式玉，亦极力主张停止进军。谓“我们追击部队，必须要和友军截堵相配合，柳彦彪旅相距甚远，又迟迟不进，我们单独拚命地追击是徒劳的。”又谓：“红军力量未受挫折，是不可轻视的，不如就此停止等待。”张鸿远不听陈的建议，仍坚持自己贪功冒进的愚见，遂在袁家庄驻扎；没有几天，即命令部队开赴茅坪宿营。次日向华阳前进。

红军徐海东部在华阳是准备好了和我军作战的。距华阳镇以东二十多里路的地区，地形复杂，山高林密，红军在此设下埋伏军队。这一天，我们部队正在前进时，前卫尖兵忽然发现红军哨兵的枪声，就停止前进，布置抵御。不料，红军从两翼山沟的丛林中，勇猛的扑来，将我们的部队截为数段，一时枪声四起，山鸣谷应，草木皆兵。我军此时已失去统一指挥作战的能力，由各连、排、班自行作战。士兵抢着爬山寻找阵地和红军抗拒。这时，我亦陷入混战之中，急挥令自己的卫士，不必顾我，赶紧登山寻觅隘地，借以减小个人目标。只听见枪声隆隆和红军的呼喊：“士兵们，不要跑，不要打枪，缴枪吧，我们是穷人，穷人是不会打穷人的。”双方混战，由日午一直打到日落西山，枪声才渐始停止。我军散布在山上的各个部队，于夜间一个连，一个排或一个班混乱零星地陆续退到茅坪集合。我于夜晚遇排长的掩护，回到茅坪。

当部队前进时，张鸿远带手枪队，走在部队的中腰，有一股红军冲击到张的附近，手枪连展开战斗，伤亡甚多，势亦不支。张的臂上也带重伤，见情势危急，难以躲避，即以手血涂面，倒伏路旁涧沟内战士尸体之中，假装死去。有红军战士，经过张的身旁说：此人身体肥胖，象是一个军需的模样，未加详细检查离去。张挨到夜晚，摸上大路，遇见从山上退下来的士兵，扶持一路，才返回茅坪。陈式玉因劝张不听，拖在排尾，未受危险。

部队在茅坪集合，检查伤亡，张鸿远手臂负伤；我团团副边松山、营长王金州手脚带伤，全部官兵伤亡共计五、六百人。枪弹也损失甚多，我团较重，沈团较轻。逃散士兵数日后始归队，有被红军俘虏的都被放回，并未伤害。

红军徐海东部在华阳战斗之后，仍转回镇安一带游击。这时，西安杨虎城主任，又调唐子封旅到达镇安堵截红军，我团同张鸿运转回城固，休养补充。杨又命令陈式玉率领警二旅沈、韩两团（韩子芳由紫阳调来），进驻宁陕关口，堵截红军。

迨至一九三五年六月前后，红军徐海东部又转到柞水游击，唐子封旅长率部追击，在柞水和蓝田交界的某地，又中红军的伏击。毋润生团全团覆没，唐子封亦被生俘，押到子午镇一带枪杀了。

警二旅陈式玉率沈、韩两团又奉命转移到商县的黑山镇和红岩寺等地，吸收以前的作战经验和教训，乃改变作战方法，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办法，遂与红军周旋月余，未遭挫败。这时，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开进陕西，协助陕军两个师团，进击红军徐海东部。

这个期间，已届一九三五年七月前后，江西的红军大部突围任务业已完成，遵义已经会师，正要进入长征北上阶段。而陕南的红军徐海东，才率队离开豫鄂陕边区根据地，经陕甘边境，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红军会合，完成了红二十五军北上的先遣任务。接着不久，毛主席亦到达陕北进驻延安。

陕西警二旅，因此遂移住镇安和商县。

我军警二旅和红军作战的这一段历史，只能仅供参考，不妥之处，请为修正。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于陕西泾惠渠管理局

## 在陕南堵截红军历次战役的片断回忆

王 明 钦

**编者按：**作者王明钦先生曾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第四团团长，现已去世。本文是从他一九六四年所写《参加历次战役的片断回忆》一文中节录出来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 一、蔡峪窑战役，陈营长被围

一九三四年冬，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由河南向陕西前进。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奉命堵截，冯派柳彦彪旅长率兵三团：薛如兰团，景子勤团，刘云龙团进驻洛南一带。景团进驻洛南以东草坡镇（豫陕

交界要道)。在此处旋与徐部接火，景团败退。徐部进入洛南地区后，绕洛南向商县前进。从此徐部以商县为中心，打磨转圈。柳旅长率部跟踪追击，连打败仗，略有损失。以后徐部向西移动，在山阳、镇安一带，又打磨转圈。后又在蔡峪窑附近摆下了口袋阵，准备歼灭柳旅，柳旅不知是计，仍跟踪前进。刚进了蔡峪窑的沟口，前卫陈营长（连城）忽然发现山上有人，行动可疑，即令前卫停止前进；令尖兵连上山搜索，行至山腰，与徐部伏兵即发生战斗。此时徐部大部队由两边山上冲下来，猛攻陈营，陈营败退。败退中，又与徐部山上伏兵遭遇，发生激烈战斗。这正是蔡峪窑口袋阵的所在。此地山下有川，川里有个纸厂，厂有十几间房子，陈即率全部官兵且战且退，退入纸厂，先令机枪连把住纸厂大门，向追兵扫射。其他部队随即在纸厂周围墙上挖了几层枪眼，作为射击的堡垒，凭险射击，攻者不能接近，又无他物可利用，仍退回原处，遥为射击。因为纸厂屋顶是石板盖成的，弹不能入。于是，攻者复用大石头由山上滚下来，企图砸伤纸厂的队伍。不料纸厂的房屋一面依山，石头下来，因坡陡势猛，蹦跳性大，蹦过屋顶，都落了空，打不上房子，伤不了人马。从此双方相持，陈营陷入包围之中。

陈营被包围后，徐部在两边山上的队伍几次进攻，都被纸厂射击封锁，不能下山，继续相持。柳旅其他队伍看见徐部布阵已成，知中埋伏，争相退走。该营被围了三天，未遭覆灭。后来得到柳旅和友军的援救，安全退出，结束了战斗。是役柳旅各营都有损失，但中级军官没有伤亡。这个战役经过，是柳旅长和陈营长给我说的。

## 二、第一次九间房战役，柳旅受挫

在蔡峪窑战役后，柳旅拾得徐部讨论蔡峪窑战役的经验文件：“一个经验，不应当用全部力量包围纸厂，应该以少数兵力围住，用政治方法解决。”另一个经验：“应该大力追击柳旅，方可成功。”这时柳旅奉到蓝田行辕总部迭次电令，总是令跟踪追击。所以柳旅总是跟在徐部的后边。

是年农历腊月间，徐部向东前进，经过镇安、曹家坪、九间房、蓝田，自葛牌镇前进。柳旅仍跟在后头，向葛牌镇追击。到了曹家坪，得悉情报，说徐部已到葛牌镇，在此镇开会。柳旅不知徐部扬言在开会，乃是诱敌入阵之计，反而放心大步前进。在前进途中，路上所遇到的老百姓，引路向导，都是徐部的侦察人员，为了将柳旅引入布好的口袋阵，所以引路人引他们只走山下，不走山上。行至九间房附近，宋鸣岐营长有了怀疑，就问引路的人：“山上有路没有？我们为什么不走山上头？”引路人答：“山上头是小路，不好走，山下是大路，好走。”宋营长看他言语吞吐更发生怀疑，就令前卫上山。一上山就和徐部的小部队接触了，该小部队随即向后撤退。宋营长不知是计，跟上追击，于是全面发生战斗。后面部队听见前面接火，很快的都爬上路边的小山上。这一带的大小山上，都是黑呀呀的松树林，丛棘栈栈，最有利于埋伏。中间仅有一条小路，再无出路，是个布阵的最好所在。这时柳旅就陷于徐部包围之中。徐部布阵于两边的大山上，柳旅爬在路边的小山上。虽是小山，但有地物可利用。在对峙的形势下，发生战斗。在这大山和小山之间，隔着凹地，徐部要由大山上到小山上来，必须通过中间地带的凹地。这时徐部向山下猛扑，被柳旅在小山上的射击阻止，不能下山。因为小山对大山射击是仰射，有这个优越条件，从此双方对峙起来。经过三日的对峙，友军前来救援，徐部退走，柳旅进驻葛牌镇。是役柳旅损失很重，刘云龙团已残破不堪，开回后方。将景团和薛团编成一个团，驻在葛牌镇，等待后援部队。我率队于一九三五年农历正月初八日，到达葛牌镇，柳旅长等给我详述了这次战役的经过。

### 三、桃花岭战役，唐嗣桐被俘

一九三四年，我驻防三原，到农历年终，我已办好年事，准备过年。不料腊月二十九日晚，我接到西安电话：令我率部于明早向西安前进。因我团第二营驻防淳化，调遣不及，另拨补充团第一营（营长房九斋，解县人）归我指挥，当日晚同到西安。翌日，总部参谋长韩光琦检阅队伍。检阅后说：“补充团第一营官兵的服装不整齐，和第

四团军容相差很远。”（因为我团官兵服装都洗涤补纳的很干净，准备过年，一律带的白茶缸，第一营官兵站在一起，相形见绌）韩又说：“今天不走，要给你们第三营换新枪，我即通知军械处，王团长可到军械处和处长窦荫三接头领枪。”因给第三营换枪，耽延了一日。时值大年初一，市面停门，买饭困难，官兵没有吃好。晚八时即由大营盘出发，向引驾回前进，在此处休息、吃饭两小时后，继续东进。第二天晚上宿营汤峪口。此时红军声威远播，情况紧张，总部又派骑兵团（团长张廷祥）前来，归我指挥。骑兵团在汤峪镇住了三天，和我团一同东开蓝田县附近待命。在蓝田县住了两天，受命后，即向葛牌镇前进。

农历正月初八日，我率部到达葛牌镇。郭仰汾副师长也在此处，驻在柳旅旅部。柳旅长和我见面后说：“你来了，好的很，我已疲惫不堪。你接事后，我就回去了。杨主任给我有信，叫我交代后即回西安。”我说：“你不可回去，杨主任对你不满，轻则撤职，重则法办。”柳说：“杨主任给我也写了信，说要杀我。”我说：“那么你还敢回去？”柳说：“杨主任有命令叫我回去，我敢不回去？”我说：“你可以不回去，我情愿负责，向杨主任说说。”他说：“哎呀！恐怕不行呵！”郭副师长插言说：“明钦如能负责，那就可以，你不要害怕。”从此柳旅长有点安心了。我即给杨打电报说：“我才薄识微，难符众望，柳旅长虽然有些不是，但他是老旅长，还有一定威望，因此我请将柳旅长留在前方，坐镇一切；所有军事指挥任务，我完全负责。”第二天接杨复电：“准如所请”。于是，我和柳旅长召集团营长开会。我宣布由柳旅长挂帅，我负军事指挥责任。订出作战计划：行军时，我率本团在前边走。柳旅长率旅部及薛团在后边二十里处跟上，以免全部被敌包围。如果敌人包围了我，你来增援，彼此互相呼应。宿营时，再看当时情况，也可在一处宿营；也可相距十里八里各自宿营。山地作战，不要用大部队。我一个团轻装前进，负作战责任。柳旅长率旅部和薛团作为预备队，随后跟上。这样，我们就不至遭到大埋伏；也可以避免全部被围，遭到覆灭。我这个意见，各团营长一致赞成。会后，全军按照计划由葛牌镇出发，先向东南绕过山阳地区转向西南



前进，追击徐部。数日后，到达镇安。这时，徐部由镇安向西打磨转圈。到柞水一带，忽向东折，经过营盘镇东西大道向东前进。我没有跟他原路走，他由北路向东走，我由南路向东进。我部到镇安，徐部到山阳境内的黑山镇，我驻在镇安未动。徐部因我未动，驻在黑山也未动。

这时，新任陕西警备军一旅旅长唐嗣桐（子封），率所部来到镇安。当时，唐是新上任的旅长，气焰很盛，开口就骂，并说：“这是由南方打败窜过来的一股共军，狼狈不堪，已经溃不成军，不值一击。”我说：“共产党在南方打了多年仗，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南征北战，从未停止，或胜或败，对作战是有经验的。这次由南方到北方，经过几省，转战千里，强敌环视，到处截击，既无援兵，又无接济，尽管如此，也无人能挡住它。可见共产党的军队，是久经锻炼的军队，你未免太轻敌了。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给你说的是老实话。”唐气哄哄地说：“你不要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接事后，杨主任在西安给我说：‘你这次到前方，看向着，相机追剿。’我说：‘请主任放心，我老记着校长的训问：‘不成功，便成仁’。明钦兄，你要知道：我是不畏强敌的，我要为三民主义而牺牲。请问你，徐海东驻在黑山，相距咫尺，你为啥不撵？”我说：“不是不撵，因为共产党是有一套的，我们不能随便去撵，须得侦察清楚，免得中了他的计。”唐闻言，猛然起立，用手把桌面拍了两下说：“好！你们不敢撵，我去。”

于是，唐第二天率部即向黑山前进。唐未到黑山以前，徐部就走了。据我知道，小河口是个红区。阮应成是小河口人，他在小河口一带闹共产党多年，小河口的老百姓大部都赤化了。兼之地形复杂，前边不远，就是桃花岭，地势非常险要，由小河口西走，必须翻桃花岭。我前次走过那里，当时把我们几条驮骡都滚到沟里去了。这个地方，是下埋伏的最好所在。

后来，据唐旅逃回的官兵说，徐海东部驻在小河口一带，等待康旅追击，唐旅在黑山驻了两、三天，即向小河口追击徐部，徐部知道

唐旅来了，扬言由小河口向西退走了，其实就在小河口以西桃花岭附近埋伏，布下口袋阵势。这里地形是：靠近路口的两边山小，没有多少树，越往前走，山势越高，树林越稠密，徐部就埋伏在此处松林茂密的大山上。唐旅侦知徐部逃去，以为怯战，不敢应锋，就很大意地前进。不料行到桃花岭附近，徐部伏兵突起，从两边山上袭击下来，人如猛虎，弹如雨下。唐旅常驻西安，没有参加过大战，官兵临阵作战的经验少。唐初接事，对于官兵生疏，没有什么威信，兼之太轻敌了，行军很大意，突然遭到袭击，唐本人首先手足失措，官兵惶恐，阵地大乱，无法指挥，仅在数小时内全部覆灭，唐本人亦被俘。

#### 四、华阳镇战役，张飞生受伤

唐嗣桐失败后，陕西警备第三旅旅长张汉民率部到了镇安。曾和我谈到追击红军的问题。张说：“共产党由江西失败了，已成为流寇，没有多大作战力量。”我说：“打共产党，可不是打土匪哩，不能把他看作是流寇，千万不能轻视。共产党的军队，它是南征北战锻炼出来的，对于作战是有经验的。据我的经验，可不能常跟在它后边追击它。如蔡峪窑、九间房之役，我们这一旅都吃过亏了。在这两次战役中，我们把三个团打得只剩下一个团了。所幸没有全军覆灭；中级军官都在哩。”我又说：“你先驻在这里看一看。”这时徐海东部已向西走了，据情报说，红军已到了关口子一带。这时，张汉民旅奉命暂驻镇安，令我前去追击。第二天，我率部向关口子前进。本来一天即可到达关口子，我为了谨慎小心，行军很慢，一天的路程，用了两天的时间，第二天到距关口子三十里的地方，得到情报说：红军又向西走了。又据前卫部队报告说：徐部狼狈逃窜，在关口子遗弃的物资很多，有军刀、旧大衣、棉衣等物。我说：这些遗弃物资，分明是诱我们的钓饵，这说明徐海东不在关口子和我们打，是想诱我们到关口子以西，在对他有利的地带来收拾我们，我们决不上他这个当。于是，决定决不追击，先驻在关口子，我一面加强戒备，一面详细侦察红军的行动，并向总部报告说：“徐海东部向洋县以北地区逃窜。”总部复电，令我即速跟踪追击。当时我为了慎重起见，复又电陈：“徐海东

部向洋县以北大山中前进，这山内人家稀少，所有人家，都是猎户，山大，地形复杂，又是老梢林，我军不宜冒然跟在后边追击。过去的失败，应当引为教训，俟侦察回报后，即行追击。”就这样延迟了两个星期。

不久，得到侦探报告说：“徐部到了洋县以北，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张飞生跟踪追击，行至华阳镇，中了徐部的埋伏，也是几个钟头，全部覆灭了。”后来张飞生收拾残部，回后方，道经关口子我的军次，给我说：“我当时据报：徐海东在洋县以北。不知这是徐的扬言，奉命追击，军至华阳镇，中了埋伏。”他又说：“此地两边是山，中间是沟道，沟道里有一、二十户人家，几家小店。我军行至沟道，两边山上的红军一齐冲下来，弹如雨下，喊声震天。我军猛然遭到袭击，官兵仓慌无所措手，阵势大乱，各自寻找凭藉，企图抵抗。不料民房，小店，以及附近坑凹丘陵全为红军所占，向我射击，致使我军无处立足，手虽持枪，无用武之地，于是全军覆没。”我说：“这是徐海东吸取了蔡峪窑、九间房的经验教训，不但两边山上布置了埋伏，即就是沟道内，凡是可以藏人的地方都设伏兵，一经接火，使对方官兵无处躲匿，不能抵抗。”张又说：“我臂部受了重伤，随即躺在地上，以有伤的胳膊盖在脸上，血顺脸流，染的面部模糊，人没能辨，老黑当道，袒身露须，伸足仰卧，佯装死亡。红军士兵不识我是旅长，把我当成老夫子。看我已死，叹息地说：‘哎！老夫子也受伤了。’随即走去。”张又说：“路团长装扮了个抬花竿的蒙混过去，也被释放了。徐部走后，我才收容残部，休息了两天，现在要回后方。”

## 五、柳旅进驻袁家庄，堵截红二十五军

据报，徐海东部吃掉张飞生部以后，向老佛坪前进。当时我向柳旅长献策说：“我判断徐部经过老佛坪向东来，一定是企图占领新佛坪——袁家庄。因为袁家庄地面有二十多里长，五里多宽，是佛坪产粮地区。徐部原走的老佛坪区全是猎户，不生产粮食，他为了弄粮食，一定要来袁家庄。我们现在迅速占领袁家庄，把他封锁在大山内。关子口距袁家庄二百几十里，我们今晚就开拔，一天多些即可到达袁家

庄，不能再迟延。如果再迟延，袁家庄就被徐部占领，到那时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当时柳旅长虽有不同意见，但我有指挥的责任。当晚十二点钟只得随我一同出发，经过一夜的行军，第二天下午到达四亩地，此地距关口子一百八十里，距袁家庄只有二十里。我的意见是：恐怕有失时机，必须继续前进，今晚务要占领袁家庄。当时柳旅长坚不同意，只得在四亩地宿营。天未明，留柳旅长及薛团暂驻未动，我即率我团用急行军的速度向袁家庄前进。是日上午十时左右到达袁家庄。县长李慧亭（长安人，陕西测量学堂学生），很诧异地说：“此地并未得到军情，你军为何来此？”我说：“徐部经过老佛坪向这一带来了，要占领袁家庄抢粮食。”他说：“老佛坪向这里（袁家庄）来的路很难走，路上没有人家，他们吃啥哩？”我说：“正因为老佛坪没有啥吃，他才向这里来抢粮。”他又说：“那么他可向北走，是富区，就有粮吃；或者经过太白山，就可以出山，跑到这里干什么？”我说：“共产党的游击战术是打磨转圈，为了打击我们，他们由西向东转，吃掉我们，才是目的，他们出山干什么？你再不必说了，赶快派两个带路人，同我们的侦探向杆杖坡（在袁家庄西北四十里）去侦察。”后来，他带来了两个老百姓同我们侦探一道向杆杖坡出发。因为他认为军队来此是多余的事，又害怕军队来有负担，因此对我军之来有点不欢迎。我说：“我们旅长还带了一个团，今天下午即可到达，你可早作准备。”他说：“军队来的多了，地方都没法驻。”我说：“旅长驻在县城，薛团驻在十里路以外。”他才安了心。下午柳旅长同薛团都到了，旅长驻在县府内。我向旅长报告：我派的侦探已向西北方向杆杖坡去侦察。旅长强调说：“敌人在西南方向，决不会到西北方向杆杖坡一带去。”旅部参谋长李毓若也同意旅长的看法。天黄昏时，出去的四个侦探，由杆杖坡只跑回一个人，报告说：“我们正在那里吃饭，敌人来了，逃出我一个人，他三个人被捕了。我逃到山上看见敌人很多，陆续都来到杆杖坡。我临走时，看见已经到了好几百人。”县长说：“这才胡说哩，杆杖坡只有几户人家，他们来那些人？都在哪里驻哩？”县长虽然嘴里这样说，但面有惧色，露出恐慌不安的神气。旅长和参谋长说：“这股共军真的由这里来了，我们应

当怎样对待？”我为了保住军事机密，绽开县长，向旅长、参谋长一招手说：“来，我们三个人研究一下。”我将他俩引到另一个房间，先说我的看法：“共产党的军队决不攻坚，他们一定由杆杖坡向东走，翻过天花山到柴家坪去弄粮。因为他们这几天走的都是缺粮地区，他们必须弄粮，要弄粮就要到柴家坪去，由杆杖坡到柴家坪，只有这一条路。我判断他们今天晚上就要行动。”我的意见：留旅部和薛团驻此；我率我团由袁家庄向东走，今晚即可到天花山。因为天花山是天险，中间有十几里长的一条沟道，行人不能并肩，牲口更感困难。最上边一段路，是用石头铺的梯行路，到上顶时，还有个石洞，才能到山上面，这是一个最好的葫芦峪所在，是设伏歼徐部的好机会。当时旅长、参谋长和我辩论，认为徐部力量很强，有四、五千之众，他怎能走那么小的路上去，他可能攻击我们，取袁家庄。我说：“共产党长于游击战术，避实击虚，决不攻坚。牺牲实力，占领城寨，不是他的目的。况袁家庄有我们几团人，他决不会来攻。”反复辩论的结果，他俩同意了 my 意见。我即召集我团营长，准备出发，前赴天花山设伏待敌，满想一举而歼灭之。

将出发时，因为李县长不懂军事，是个胆小鬼，为了他个人的安全，向旅长陈说利害，不让我部离开袁家庄。旅长听了县长的话，也变卦了。把我请到旅部，对我说：“你不能去，因为薛如兰团几次被敌打败，已成惊弓之鸟，见枪响就跑了。假使你走后，敌人知道袁家庄兵力薄弱，向我进攻，那我们就糟了。到那时，我们首尾不能相顾，必为敌人所乘，你还是不去为妙，可以保我们的安全。况你们此去，未必得胜。”因此，我恐万一有失，责任攸关，于是打消原意，中止前进。

此后就在袁家庄以北各山头上布防。同时派精干侦探前往柴家坪侦察。据侦察回报说：“徐部通过天花山前往柴家坪。据老百姓说：徐部翻天花山时，翻了整整一夜，翻过天花山，到了柴家坪沟，因此处是产粮区，他们在此处休息了两天，将给养准备好以后，即向宁陕方向开去。”这时旅长一听说敌人由柴家沟已经向东去了，他就有点

着急，恐怕上级指责，说我们故意把敌人放过去了。所以催我赶快率部向柴家沟追击敌人，以便应付上级。我认为好机会已经失了，这时再追击，没有多大效果，况按照红军一贯战术，兵在前走，阵在后布，弄不好反中他们之计，有导致覆灭的危险。因此我和旅长商议：为了慎重起见，再派便衣向柴家沟侦察。第二天便衣回报说：徐部到了柴家沟，预备好了给养，即向东开去，现在已到宁陕附近。这时我军即向柴家沟前进，到达之后得到消息说：敌人已进入西山，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山口。这时我先派薛团王光营长率该营向西山搜索前进。因为从西山到西山口这一段，地形复杂，树林稠密，是容易设伏的地带。我判断徐部一定会在这个地带设伏以待，所以令王营长率该营在西山口一带假装修路，修路时，多捉老百姓，扬言我大部队向西山口追击徐部。待我大部队过去后，着他跟随前进。

后来我部由柴家沟出发，继续前进，到了西山口，没有进入镇内，由此折向南进，仍经过关口子、太山庙，到达镇安县，走的是南路。徐部走的是北路，经过营盘镇，到达柴家坪一带。张汉民率部由镇安出发，前往追击，我部即驻防镇安。

## 六、第二次九间房战役，张汉民被俘

我军全部到镇安时，张汉民由镇安率部已经走了。据镇安王县长（河南人，忘其名）说：徐部已到曹家坪几天了，张旅才由此地出发，去曹家坪追击徐部。柳旅长接过来：“曹家坪以东就是九间房，地势险要，丛林密布，道路窄狭，地形复杂，这是徐部对我旅下过埋伏的地方，张旅如果向那里追，一定有被消灭的危险。因为这是一条死路，我为汉民担心。”

张旅在徐部未东来时就驻在镇安，本应在营盘镇这一条路上截击徐部，方为合理。但他没有这样作，把以逸待劳的有利条件放过去了。徐部已经到了曹家坪接近有利地带，他却跟踪追击。他未到曹家坪以前，而徐部已向东开走了。张汉民的气焰很盛，轻视敌人，认为徐部怕他，望风而去。所以不顾一切，肆无忌惮，跟踪追击。行至九间房，

徐部仍用上一次打击柳旅的战术，在原地方用比上一次更周密的计划，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因为张旅对徐部没有足够的认识，徐部应用的手段，全部得售。沿路做小生意的，山上放牛羊的，给张旅带路的，都是徐部安排好的人，分工合作，各显神通，而张旅都误认为老百姓，毫不疑，仍然冒昧前进。行至九间房附近，已全部进入陷阱，而不自知。突然遭到袭击，大山、小丘、伏兵齐起，弹如骤雨，声震山谷，官兵惶恐，措手不及；加之骡马相惊，到处奔跑，把自己的队伍乱冲乱踏，于是阵势大乱，无法指挥，全部队伍陷于层层包围之中，左冲右突，不能得脱，只在两三个钟点内就全军覆没。张汉民旅长被俘。以上情况，是根据张旅逃回的士兵对我说的。并说张旅长到危急的时候，手里提了个斧头，在空中轮绕，象是表示投降的样子。

徐部二次在九间房设伏的布置，是吸取了以前谋歼柳旅未成的经验，比上次布置的更加周密，上次仅布置了大山，没有布置小山，使柳旅占据了小山抗拒数日，徐部没有达到全部歼灭的目的。这次在原地设伏，改正了以前的缺点，左泽右陵，全设伏兵，以致对方无处立足，遑言抵抗。因此，发挥了阵网的威力，收到了全胜的效果。

## 七、山阳战役，吴营长被围

在南山一带围攻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不到三月，唐嗣桐、张飞生、张汉民三个旅连遭覆没，柳彦彪所带的四个团损失过半。徐部所向无敌，军威大振。我军厌战，兵无斗志；指挥官心灰意冷，惧遭覆灭。因此我部变更战略，采取守势，选择要隘，固守待援。

奉命将归我指挥的补充团第一营调回大荔，将我团驻防淳化的第二营调驻山阳县。我率一、三两营由镇安移驻柞水石嘴子一带，扼守要隘，与山阳遥为声援。此时，赵寿山旅由汉中进驻关口子以西一带，由南方开来的庞炳勋军，王振武旅，都驻距山阳很远的地方，各自扼守要隘，不敢向徐部问津。徐部在山阳、镇安一带活动，如入无人之境。后来，因为无人跟踪追击，没有用武的机会。于是按照当时形势，另设诱敌之计：乃与阮应成汇合，共有八、九千人，佯装围攻山阳所

驻的我部第二营，意欲诱我救援。中途设伏，歼灭我部，我得悉山阳被围情况，认为山阳城小兵少，又无宝藏，何须用此大部兵力围攻，牛刀宰鸡，明明是计。我和营长们商议，大家对此事的看法，大致和我相同，都说：石嘴子距山阳二百余里，急行军也须两日方可到达。且地形复杂，孤军深入，危险很大，因此决心不去救援。适又得到山阳吴仲华营长的报告说：山阳城小而坚，北面枕山，地势险要，防守亦易，敌人虽多，无用武之地，请不要救援，从而我对山阳更放心了。

徐部围攻山阳三天不下，见我没有救援，大失所望，果然撤兵而去。是役吴营伤亡官兵二十余人。吴认为打了胜仗，滋长骄气，肆无忌惮，竟在山阳纳妾，希图享受。这时我团奉命限日开回三原，吴营未执行命令，迟回三原有一个星期之久。冯钦哉见吴，大为不满，不谈守山阳之功；只说临阵纳妾之罪。后来以违犯军纪论罪，打了四十马棒，押在警闭室，多人求情不予释放。我亲自由淳化防地到三原，向冯乞情。结果，人虽释放，但撤去了营长职务。

当时我认为：临阵纳妾，固然违犯军纪，但守城之功，也不可抹煞，有罚无赏，未免有些不公。以后得悉：原来吴带队过省，顺便去见杨虎城主任，杨给了吴五百元，对吴说：“你在西安玩几天，再回去。”事为冯知，因而吃醋，不好明言，所以给吴扣了个“临阵纳妾，违犯军纪”的帽子，打押之后，又撤其职。

（李百朋整理 一九六四年十月）

## 十七路军在汉中阻击红四方面军的回忆

韩 光 琦

### 一、红军入陕前的陕西军事形势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入陕，在秦岭山区进行过游击战争，时达半年之久。消灭十七路军两个旅后，由陕甘边境转进陕北与红二十六军刘志丹部会师。川北红军又发动了陕南战役。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部署如下：

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孙蔚如部附十七路军独立第一旅刘文伯部驻汉中各属，军部驻汉中，向川北红四方面军防御。独立第一旅辖两个团（团长赵雨晴、杨竹荪）担任宁（强）、勉（县）两县防务，杨竹荪团驻宁强，赵雨晴团随旅部驻勉县。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兼）五十一旅赵寿山部辖四个团（团长张骏京、张世俊、陈际春、王耀晨），担任西乡、镇巴一带防务，张骏京团驻镇巴，在川陕边境与红四方面军有过小部队较激烈的战斗，其余各团随旅部驻西乡；十七师四十九旅王劲哉部辖三个团（团长李俊彦、任云章、程鹏九）和五十旅段象武部辖两个团（团长耿景惠、王茂云），随同军部直属部队驻南郑。

十七路军特务第一团孙辅丞部驻凤翔；特务第二团、炮兵团、骑兵团等均驻西安。陕西警备第一、二两旅因阻击红二十五军损失很重，正在西安整训。四十二师冯钦哉辖两个旅（每旅两团）和一个补充团，驻大荔各属和潼关，柳彦彪旅因参加过阻击红二十五军，也在大荔整训。

陕北榆林驻有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和绥德的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名义上是“会剿”陕北红军刘志丹部，实际上他二人水火难容，以致互不相见，高部困守绥（德）清（涧）两城，井部坐视不理。

第四十军庞炳勋部驻防安康各属，军部驻安康。第一军胡宗南部驻防天水各属，军部驻天水。庞、胡两军是一九三三年春，尾追红四方面军时，蒋介石令留驻陕甘各地，为堵截红军，也是为对付十七路军的。

陕西除上述各重要城镇由军队驻防外，其余一般县镇，都由县地方组织的“保卫团”驻守（保卫团按县地方的具体情况，编制各有不同，多则四个中队，则一个中队，每中队一百人）。

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徐海东部入陕后不久，曾乘飞机到汉中，检阅三十八军和独立第一旅各部队，后来由汉中起身到商

县，沿途视察各地军民情况，最后由商县经蓝田县回到西安。

## 二、川北红军的进攻与十七路军的阻击

一九三五年二月，川北红四方面军进陕后，十七路军曾作如下的阻击部署：刘文伯旅防御宁强、勉县两城，必要时，缩短防线，专守勉县；段象武旅担任南郑、褒城两县防务，星夜构筑城防工事；王劲哉旅为机动部队，待命出击；赵寿山旅集中西乡为总预备队，整装待命；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驻南郑指挥各军作战，誓死坚守南（郑）褒（城）。

一九三五年春节，自红四方面军由川北进入陕西宁强与十七路军驻汉中部队交战时起，直到南褒战役结束时止，共计二十多日。在这二十余日当中，共进行过主要战役两次，即宁（强）勉（县）战役和南（郑）褒（城）战役。兹分别记述如下：

### 1、宁勉战役

红四方面军是一九三五年初，于昭广战役后进入陕南的。川北红军进入陕境后，于旧历正月初一晨进攻宁强，杨竹荪团拚命抵抗，结果全团被歼灭，团长被打死。

宁强战事发生后，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率所部三个团，由南郑开赴勉县增援，命令在勉县构筑坚强工事，进行阻击。可是王劲哉和刘文伯商定要在新铺湾（勉县和宁强间）进行迎击，随令刘旅赵雨晴团（缺一营，随旅长留驻勉县）开赴大安驿（新铺湾和宁强间），王劲哉旅即进至新铺湾布防。军长孙蔚如不要王在新铺湾作战，因为那里地形利攻不利守，王说：我已占领山头，没有问题（王外号叫王老虎，杨虎城常说王劲哉有勇无谋）。又决定在新铺湾阻击。

宁强战事结束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到大安驿时，一战就把赵雨晴团击溃了，赵只身逃回勉县。约在旧历正月五左右，红军就与新铺湾的王劲哉旅接火了，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有些地区还进行过短兵相接，终将王旅各团击溃，官兵纷纷逃散，与旅长王劲哉失掉

联系。王逃回勉县，勉县也溃乱的没法收拾，随即与刘文伯逃回南郑，收容残部。

新铺湾战事发生后，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率所部四个团由西乡开赴城固，准备增援，除留一个团随旅部暂驻城固外，其余各团均开赴南郑待命。赵寿山首先命令张骏京团开赴勉县增援，张团到达诸葛庙后（郑南和勉县间），前线部队全部溃退下来，张团即停止前进，占领阵地，掩护退却，随后也退回南郑，会同五十旅段象武部坚守南、褒两城。

## 2、南褒战役

独立第一旅和四十九旅在宁勉战役惨败后，孙蔚如命令五十旅耿景惠团在褒城星夜构筑城防工事。褒城位于山口褒河岸上，形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从宁强战役到南褒战役，相隔约十天，在此期间，褒城工事构筑的相当坚固。南郑城防由张骏京负责警备，并在南郑西三十里地的长寨，由王宗山组织的民团约四、五百人，坚守四个碉堡、以资警戒。

新铺湾战事结束后，红军仍继续北进，将驻守长寨各碉堡的民团消灭大半以后，约于旧历正月灯节前后，分两路同时向南郑、褒城两处开始进攻，战事重点在褒城。褒城之役，双方战斗极为激烈，红军日夜不停地进行猛烈攻击，前后不下数十次。耿景惠团凭借坚固工事，竭力抵抗，特别是该团周德功营据守褒城北山，抵抗的尤为顽强，战斗约进行了四、五天之久，红军终因攻占不了褒城北山，也无法占领褒城，开始由，原路退却，离开陕境，返回川北，汉中战事告一段落。

## 三、西安绥靖公署的通电

红四方面军遭到十七路军的阻击，退出陕境后，西安绥靖公署随即向各方发出通电，大意是这样：（1）川北共军徐向前部久欲“赤化”川、陕、甘边区，垂涎我汉中；（2）共军在入陕前，先以徐海东部在秦岭山区进行游击战争，诱我三十八军主力部队北移，以便乘虚进入陕南；（3）川北共军在徐海东部离开陕境后不久（此时红二

十五军在陕南东部，并未离陕——编者），突于本年春节日乘我军民欢渡旧历年的机会，先后向我宁强、勉县等地袭击和进攻，我以“敌”众我寡，损失惨重，全部退回南郑，坚守南褒两城；（4）褒城之役，共军以数万之众，攻我褒城仅一团之兵，猛烈进攻，先后不下数十次，幸我官兵用命，上下一心，血战七昼夜，始将共军击退，返回川北等等。

当时我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本文仅就回忆所及和张骇京先生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关于时间和战况，难免有些错误和不详尽的地方，希参加战役的人士加以更正和补充。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

## 一九三五年川北红军攻夺汉中战役

### 党 文 科

一九三五年，川北红军将领徐向前，攻夺陕南汉中，与国民党军队三十八军孙蔚如部激战半月，红军攻占了陕南宁强、勉县两城，击溃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部的独立第一旅，孙蔚如的十七师四九旅；安康地区红军将领徐海东，策应徐向前取汉中，由石泉、汉阴向西进攻，欲在汉中会师，途中消灭了杨虎城部的警备第一旅和第二旅，警一旅旅长唐嗣桐被俘，警二旅旅长张飞生负伤逃回汉中。是役战斗相当激烈，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红军二徐会师汉中计划虽未实现，但在东西两战场上大获全胜，并留给汉中安康一带人民群众及国民党军队的印象极深，人人皆知中国共产党革命必会成功，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要传播世界。我当时在孙蔚如十七师四十九旅九十七团一营充书记官，曾经跟随部队参加勉县一带的战役，两军战斗经过，亲眼所见，事虽相隔多年，但记起当时战场情景，犹历历在目，轰隆炮声，音犹在耳，兹将战斗经过写出以供参考。但其中有一部分是我在事后听到的传说，所以，失实和残缺不全的地方，请予补正之。

## 一、红军攻克宁强

川陕边境的宁强县，在民国二十三年腊月三十日（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晚上，人民都在悬灯结彩，欢渡除夕。城内驻军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独立第一旅第二团，据说在那天晚上，驻军团长杨竹荪，与宁强县县长白某，也在一块儿欢聚着，正在兴高彩烈的打麻将，忽有人送进一封信来，说是一个老百姓把信送到门上就走了。杨竹荪一看，才知是红军来的信，要他今晚上把宁强县城让出来，红军明天要在城内过年。当时杨竹荪与白县长知道红军的厉害，连忙先与勉县独立第一旅旅长刘文伯打电话，并请求援兵，一面部署队伍，准备守城，派了一个营去驻守城外一个山头，以便与城内两个营彼此呼应。在半夜里，红军在城外的信号枪一响，城里城外，尽是红军，杨竹荪与白县长立时被俘，城内队伍全部缴械，城外山上一个营被击溃，只逃脱百余人，当晚结束战斗，宁强为红军占领。次日（正月初一），红军继续经大安驿，向勉县、汉中进军。

独立第一旅旅长刘文伯及第一团驻防勉县诸葛庙。当晚接到杨竹荪的电话，知道宁强必失，红军要攻夺汉中，立时与汉中三十八军军长打电话报告情况，一面派第一团连夜往援宁强。第一团团团长赵雨晴率部当晚出发，天明抵达大安驿，即与红军先头部队遭遇，未经战斗即为红军击溃。刘文伯知道赵雨晴不是红军对手，就在正月初一日（二月十四日）早晨，带领他旅部的文官撤退汉中安全地方去了。

## 二、红军攻占勉县

汉中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接到勉县独立第一旅旅长刘文伯三十日晚的电话，知道红军来取汉中，连夜调驻汉中长寨之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王劲哉（素有战绩，人称老虎），率领全旅前往勉县一带堵截红军。王劲哉于除夕之夜十二时由长寨轻装出发，天明抵达勉县。此时红军尚在大安驿一带行进中，王劲哉又于正月初一日下午率部向勉县以西前进，至天晚已抵达距勉县四十华里之新铺湾。恰好独一旅援宁强之赵雨晴团在大安驿吃了败仗，溃退到新铺湾，红军紧跟在后边，

王劲哉下令停止前进，立刻布防，将九十七团布置正面大路上，补充一团左右两翼，九十八团为预备队，旅部驻新铺湾街上指挥。布署停当，各团连夜赶筑工事，但一夜未发现红军到来。初二日天刚拂晓，忽然发生一阵枪声，在新铺湾街西，有一座山头已被红军占领，山上放起火号，红旗已飘扬在火光之中。这座山头，恰在路旁大道上，山高势险，位处要冲，山上可俯瞰新铺湾各处阵地，并直接威胁街上指挥部。王劲哉命令非夺回这座山头不可，遂派九十七团第一营营长刘善禄去夺。自早迄午，刘营伤亡过半，未能夺下，王劲哉又抽调九十八团一个营加攻。红军以一班兵力，附有自动步枪两挺，在山上固守一日之久，至天晚弹尽粮绝，遂乘天黑冲下山去，退走了。

正月初三月初四日（二月十六、七日），双方对峙，白天稍有部分拉锯战，互有胜负。天黑各守阵地，红军方面向这边士兵喊话，边阵地也向红军答话，互相问生活待遇情况，颇有感情。到正月初五日，情况突告紧张，哨探来报，红军正规军赶到，由两侧向勉县开去，新铺湾有被包围之险，但旅部并未有应付情况之形态。此时，确实情况是红军大军一路由定军山（勉县南）直达勉县，一路由正面两侧，取钳形大包围，将新铺湾全部装入口袋。初五日正午，红军占领了勉县，勉县为新铺湾之后路，原由四十九旅补一团一个机枪连守防，后又由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助守，红军由南城攻入，教导队由东城撤退，机枪连连长韩慎斋由北城上领兵跳下，向北山逃退。新铺湾与汉中电话中断，王劲哉在新铺湾发觉勉县有失，急忙传令先撤退重兵器。命令还未传到阵地，各团阵地已为红军冲破，秩序大乱，两翼山上已有红军出现并发生枪声。在十分钟内，各处阵地瓦解，红军喊杀声、步炮声，已迫近街上。王劲哉急率三十余骑向下退逃，九十七团团团长任云章、九十八团团团长李俊彦、补一团团长程鹏九、独一旅第一团团团长赵雨晴，以及营长数人亦杂在乱军之中狼狈逃命，在半路上经红军追兵机枪扫射，两侧山上红军截击，遍地死尸枪弹，落后者尽被俘去。距勉县十余里有大河两道，水深均五、六尺，原有轻便板桥，此时已被牲口踏倒，人人涉水而过，被水冲去者甚多，重机枪及迫击炮尽弃河内。到勉县城外后，城上红军机枪扫射，别无路可出。幸有赵寿山之五十一

旅一个团在勉县东城外布防掩护，败兵才得以冲过勉县西城外，向汉中撤退。九十八团团团长李俊彦下来较迟，未冲过城外，被红军截断，即窜入勉县北山，经留坝一带，十几天后才回到汉中。王劲哉及其他各团官兵连夜逃回汉中，军部在半夜里派汽车接运病号伤兵，正月初六日（二月十九日）陆续在汉中西关收集败兵入城，初七（二月二十日）汉中即告戒严矣。

### 三、红军攻夺褒城

正月初八日（二月二十一日），红军进逼汉中西关外，但未攻城，却去围攻褒城。褒城为汉中通关中之咽喉要道，北靠鸡头关，南临黑水河，褒城不守，汉中即成瓮中之鳖，故为两军必争之地。孙蔚如派段象武之五十旅九十九团去固守，又恐兵力单薄，再增加一个十七师特务营助守。九十九团团团长耿志介（即耿景惠），当年曾任陕军陈伯生参谋长，后任十七师参谋长，久经戎行，素有战绩。耿志介到褒城后，侦察地形，见褒城西北有一座山头，名馒头山，地形险要，且为褒城屏障，此山不守，守褒城即无把握。耿志介特派特务营和自己团第二营去守馒头山，下令山与人共存亡。第二营营长周德功，当年曾为杨虎城卫士，山东、河南、陕西各战场表现勇猛，绰号“冷娃”，欣然领命去守馒头山。

红军于正月初九日（二月二十二日）兵围褒城，初十日（二月二十三日）夜先攻馒头山，双方战斗极为激烈。山上居高临下，且遍山埋有地雷、竹签，红军终未攻上山去。十一日（二月二十四日）又攻褒城，连攻两夜，亦未攻入。十三日（二月二十六日）红军大部始围攻汉中。

耿志介因守住了褒城，战后该团曾得赏洋一万元，耿本人被传令嘉奖。

### 四、红军围攻汉中

在红军围攻褒城时，汉中城已作好守城准备。各街巷遍筑工事，夜晚严禁任何人通行，同时准备巷战。汉中飞机场原在北郊，距城太

远，且已为红军占领。因当时每天由天水方面派飞机一架，在汉中上空侦察，并有时投弹，却无机场降落，于是利用汉中城内北教场广场，拆除两端民房，改成临时飞机场。令工兵修筑，三天完成，但只有一次降落过一架飞机。汉中城内兵力只有段象武五十旅之一百团、补二团、王劲哉残余整编约一个团和三十八军教导大队、炮兵营等固守城防，以赵寿山之五十一旅三个团分守城固、西乡、洋县三县城，余地一概弃守。红军在正月十四日（二月二十七日）晚，即开始攻汉中西南城，适值天气晴朗，月明如昼，有利于守城，不利于攻城，城上城下炮火激烈，枪炮声，冲锋号声，喊杀声，震耳欲聋。红军连攻汉中两夜未克，十六日（三月一日）转变战略，由原路撤回川北。此时，国民党由关中调来援军毛炳文及由甘肃调来之胡宗南数路开到，汉中之围遂解。

一九六四年